

第一章

我的情报生涯是从一九四九年春天一个犹如冬天一样寒冷的日子里开始的。雨点噼噼啪啪不停地打在埃塞克斯郡大巴多城一间简易实验室的铁皮屋顶上。当时我正在这个隶属于马可尼^①公司的海军实验室里作研究工作。眼前示波器上的波纹跳个不停，把我看得眼花缭乱。各种杂乱的数据摊满一桌子。研制这种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发现潜艇潜望镜的雷达真不容易，我已经花费了八年的心血，但仍没搞出什么名堂。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当时是马可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迪·布伦德里特叫我们去一趟。”他说。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布伦德里特以前是皇家海军科研处主任，现在为国防部首席科研顾问。他最近对于我们目前研究工作的进展十分关注，但上级需要立即作出决策，研究一下是否拨款生产一部样机。当然这种雷达耗资肯定不小，不过战后的国防科研工作都是在与政府削减开支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这次我不怕跟他再吵一场。

^① 马可尼 (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意大利电机学家，无线电报发明者。——译者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布伦德里特当面谈谈，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了。战时我和父亲都在他领导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工作过。我想，这次也许还有新任务。

第二天，我们冒着濛濛细雨驱车到了伦敦，把车停在离斯托利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白厅^①的建筑物看上去显得阴郁、疲蹒，它那典雅的庭柱、塑像与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显得很不调和。克莱门特·艾德礼^②这时还在唱“免费镶牙配眼镜”的高调，可是这一年冬天情况很糟，人民对配给制的生活越来越不满。1945年赢得战争胜利的欣喜早就为一种愠怒不满所代替。

我们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外间屋里向一个衣着整齐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这里的人们以一种白厅特有的方式小声交谈着。一些人比我们来得更早。我同几个面熟的人点了点头，他们准是哪个单位实验室的科学家。我不明白开个例会怎么需要这么多人。这些人当中有两位我从没见过，他们看到我和父亲时便从人群中向我们走来。

“你们一定是赖特父子吧。”两个人中个子较矮的突然向我们问，他说起话来带着军人特有的干脆劲。“我是陆军部的马尔科姆·卡明上校，这是我的同事温特博恩。”另一个人走上前来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个人。“这是约翰·亨利，我们外交部的朋友。”卡明和白厅的其他官员不知哪来的这套本事，一眼就能认出我们这些干秘密工作的下属。不管这次会

① 伦敦一主要街道名，政府机关所在地。——译者

② 艾德礼 (Clement Richard Attlee, 1883—1967)，英国政治家，于1945—1951年任英国首相，当政期间曾极力鼓吹“公费福利”政策。

——译者

议要讨论什么，我想总不会是关于潜艇战争吧，因为这里既有军情五局又有六局^①的代表。布伦德里特这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请我们进里边议事。

他的办公室同他的名声一样大得出奇，巨大的框格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那张办公桌显得非常矮小。他让我们在会议桌前坐下，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吸墨水器和酒杯。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精力充沛，才智超群。他和林德曼、蒂泽德和科克罗夫特一起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着英国的科技事业。战时他在作海军科研处助理主任及以后的皇家海军科研处副主任期间，主要负责政府各部门招募科研人员工作。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天赋并不算高，可他懂得科技人员的关键作用。他的原则是在各处尽量起用年轻人。因为他的上司很信任他，所以他可以给他们提供所需的材料、物资，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四十年代末期，当疲惫不堪且势力大大削弱的英国准备一场新的战争——冷战^②——的时候，布伦德里特当然是政府如何充分调动科学界积极性问题上最理想的顾问人选了。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科学副顾问，1954年又接替约翰·科克罗夫特当上顾问和防务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

“先生们，”我们坐好后布伦德里特开腔道：“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正在打仗。这场战争实际上从去年柏林发生一系列事件时就已开始了。”

布伦德里特明确表示，苏联对于柏林的封锁和继而出现

^① 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前称军事情报第六局，负责在海外搜集情报和进行间谍活动。——译者

^② 指西方与苏联1947年以来进行的间谍战。——译者

的西方空运逼迫，我们也该考虑一下防务问题了。

“这并不是一场正面冲突，而是一场间谍战，至少短期内是这样。”他接着说，“我一直在跟安全局局长珀西·西利托勋爵讨论着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老实说，”他开始下结论，“形势并不妙。”

布伦德里特接着简单地讲述了一下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今天再利用间谍到铁幕^①对面去搜集情报，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但我们又很缺苏联及其盟国的情报，所以我们只有靠科学技术上的主动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他接着说：“这事我已简要地向在座的一些人谈过，有安全局的卡明上校和军情六局的彼得·狄克逊。我成立这个委员会是想让大家多考虑一些方案，并且立即开始行动。我曾建议珀西勋爵找个年轻科学家帮他们搞些研究工作，现在我想推荐彼得·赖特。在座的也许有人认识他，他目前在军事电子研究室工作，先请他每天抽出部分时间来帮我们工作，以便弄清我们有多少事可干。”

布伦德里特望了我一眼，“彼得，你愿意帮我们的忙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转向父亲说：“我们当然也需要G.M马可尼，所以我也请你参加这个委员会。”（过去海军界上下常称父亲叫“G.M马可尼。”）

布伦德里特就是这样的人，他发出邀请的口气和犹如命令一般，总之充分利用白厅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着一些设想，然而军情五局和六局的人却一言不发，这也许是在当有外人在场时情报人员一

^① 指以苏联为首的东欧七国（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七国的分界线，转意为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前线。——译者

种本能的反应。每个科研人员都作了即席发言，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实验室哪些研究有可能应用到猎取情报方面上。当然，如果从技术角度全面分析一下情报部门的不足需要花很长时间，但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缺少新的窃听技术。如果有了这种设备，他们就不需再受穿墙入院之苦了。苏联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所以除了利用隔壁墙或重建大使馆的机会之外，直接接触目标的希望很小。

到下午吃茶点的时候大家已经提出了二十条很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建议，布伦德里特让我写个报告，分析一下这些建议，然后宣布散会。

我正要离开时，邮局的约翰·泰勒走过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会上就邮局使用窃听装置问题讲了许多话。“我们以后要一起干了，”他一边说一边与我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回大巴多的路上我和父亲兴奋地谈论着这次会议。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事先一点也没想到，在战时白厅经常有一些这类值得称赞的惊人之举，可惜后来这样的事少得可怜了。想到这么一来便可以摆脱反潜艇工作的烦恼，我心里激动不已；而父亲呢，他却在为家里又有人能将已有四十五年历史的祖业——秘密情报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而感到兴奋。

第二章

1912年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就来到马可尼公司。开始时，他在公司里当工程师，研究监测无线电信号的新方法。他和H.J.朗德上尉一起研制出一种电子管接收机，使拦截远距离通讯第一次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两天，我父亲正在切姆斯福城霍尔街的马可尼公司以前的实验室摆弄他的接收机时，突然发现他收到的是德国海军的讯号。他于是将抄好的第一组讯号送到公司劳资部经理安德鲁·格雷那里，因为安德鲁和海军情报部主任雷吉·霍尔上校是好朋友。霍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英国情报部门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在著名的海军部大楼40号房间里掌管破译德国密码工作。他曾安排让我父亲站在一辆机车踏板上来到利物浦街车站。霍尔在研究了他带去的材料之后，逼着马可尼让我父亲放下所干的工作，帮助海军建立讯号拦截和测向站。

大战刚开始时，海军情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报告德国外海舰队的出动情况，以便停泊在斯卡帕弗洛海^①的英国

^① 苏格兰北部奥克尼群岛间一内海，英国海军基地。——译者

舰队能够及时作好截击的准备。根据所得的情报，我们了解到，德国舰队平时停泊在基尔运河①东端。霍尔认为，德国海军司令在基尔的指挥舰上通过无线电向驶入北海的舰队发布命令时，我们也许能够在半路上截获这些讯号。

我父亲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工作，最后研制出“非调谐”式测向仪。这种仪器灵敏度极高，能够在众多信号的干扰下检测出所需信号的精确方位。尽管几年后这种测向仪才投入应用，可在后来对付德国潜艇的斗争中它却成为不可多得的主要武器。直至今日，所有测向仪仍是“非调谐”式的。

1915年在这种测向仪还没有投入使用之前，我父亲向霍尔建议，最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挪威首都奥斯陆旧称）安装一台。然而，当时挪威虽是中立国，但我们却不能动用英国大使馆，免得打草惊蛇。所以霍尔问父亲能不能亲自去一趟，为军情六局去执行这项秘密使命。就这样，几天后我父亲装扮成一个农药商人踏上了去挪威的征途。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一条偏僻街道找到一家小旅店，租用它阁楼上的一间屋子，因为在那儿安装测向仪既不用天线也不致太显眼。

大使馆军情六局的情报站给我父亲送来了一些通讯器材和零件，但干这种事得冒很大的风险。这些仪器迟早会使他暴露，而他又不是外交人员，没有豁免权。一旦事情败露，英国是不会承认他是外交人员的，所以对他来说，轻则会被拘留到战争结束，重则还会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怀疑。

这项计划成功地持续了六个月，为海军提供了有关德国舰队动向的不少有价值的情报。然而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

① 在德国北部，连接北海与波罗的海。——译者

餐，仍坐在他常坐的桌子前，当他随便朝外边街上瞟去时，发现在对面的墙上有一张新贴的布告。他定睛一看，竟是印着自己照片的悬赏捉拿他的通缉令。

不过，早在这项工作还没开始之前我父亲就与军情六局的人计划好了他的退路。他很快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屋里小心翼翼地将仪器装进箱子，然后把箱子推到床下。他带上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扔下不少钞票，希望这样一来老板也许不会报警找他的麻烦。

熟悉挪威那一带情况的人一定会说他走通往瑞典海岸那条路最保险，可他却偏偏往西南方向走。他沿着海边走了十英里后，曾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休息。过了一会儿，一个英国海军上尉走上前来问他的姓名，我父亲给他看过证件后就被领上一条小艇，然后一起向一艘正在等候他们的英国驱逐舰驶去。

多年以后，在我即将退休时我极力想在军情六局的档案库中找到这次行动的详细记录。我在征得当时六局的局长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勋爵的同意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他们的档案库里进行搜寻，但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以前的材料早就按照惯例全给销毁了。

我于1916年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①的外祖母家，父亲去挪威帮助军情六局工作后母亲就来到这里。生我的那天夜里德国的齐柏林飞机^②空袭了附近的谢菲尔德城，我母亲早产了。因为打仗，医院根本没有床位，但我母亲还是想方设法

① 英格兰中北部一城市。——译者

② 又叫齐柏林飞艇，为一种内装框架并设有许多气囊的简单飞机，由德将军齐柏林设计。——译者

让我活了下来。他们用一个实验用的大阔口瓶和一些盛着热水的小瓶为我临时作了一个保温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父亲又回到马可尼公司。马可尼亲自作了他的保护人，并委任他为研究部主任。我们举家搬到弗林顿附近一所靠海的大房子里，不过几个月后我们又搬到切姆斯福郊区。我们家看上去就像一个被废弃的无线电厂，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一些废收音机和装着电路板的小铁盒。我父亲为人热情，易动感情，脾气非常暴躁。与其说他是科学家倒不如说他更像个艺术家。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他就常常带我去公园，或把我带到离埃塞克斯不远的田野上，给我讲述一些无线电的奥秘。他把电子管呀晶体管呀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还教我怎样转动收音机上的旋钮，使杂乱的干扰波一下变成一个清晰的讯号。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自己作实验，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向阿瑟·埃丁顿和J·J汤姆森等客人表演我那些雕虫小技时父亲脸上露出的那副得意神色。

历史刚跨入三十年代时我们赖特一家好像是交了好运，根本没有留意到世界上正在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我这时在斯托特福特主教学校读书，学校虽然不大，但有一套自己的办学方法。我开始在学习上显露头角，身体也终于强壮起来，驱走了从生下来就一直缠绕着我的病魔。1931年我领到了毕业证书，毕业考试各门成绩均获全优。那年夏天我回到家里来度暑假，开学后我就要进入大学预备班，而且最后准能获得牛津或剑桥大学的高等奖学金。

但仅过了一个星期我瑰丽的宫殿就倒塌了。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告诉我们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他和富兰克林都被公司解雇了。那个年代他根本说不清这是为什么，而我还太

小，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过几个月我父亲就成了酒鬼，他没钱再供两个孩子读书了。我是哥哥，又已经领到了毕业证，让位的当然应该是我。一连串的打击使我的身体又垮了下来，而且口吃得很厉害，有时半天竟说不出一句话。在这短短的暑假中，我从一个前程似锦的中学生一下子变成个毫无出路的成年人。

我在《泰晤士报》个人专栏里登了一个找工作的广告，随便干什么都行。第一个给我来信的是个名叫玛格丽特·里福的妇女，她在苏格兰离西罗斯城不远的普洛克顿掌管着一个叫作“阿契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上的雇工，没有工资，只获食宿。但是在苏格兰绵绵群山和广阔无垠的天空的慰抚下我渐渐忘却了过去的痛苦，对农活产生了浓厚的情趣，而且这以后成为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

玛格丽特·里福是个理想主义者，她希望将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伦敦贫民窟穷孩子的基地，使他们以后能够找到工作，去当农场管理人。但她的愿望最后并没实现。不过她决定写一部描写阿契纳达罗奇生活的小说。我白天在田里劳动时她就在家里写作。到了晚上，在我干完了各种杂活之后，她就叫我把她白天写的篇章读给她听。没想到天长日久，我的口吃病倒给治好了。这本书最后也终于出版了，书名为《纯朴高原》，十分畅销。

1935年春贪心的农场主执意提高租金，我们因为付不起租而被从阿契纳达罗奇赶了出来。我们搬到康沃尔郡一个租金便宜一些的农场，又开始了大致和以前一样的生活。这时候我的理想是想成为一个农学家，专门研究粮食生产技术。但是因为学历不足，我是没有希望获得奖学金的，而三十年代

又没有助学金制度。后来玛格丽特给我提供了一些钱，我自己贩猪得手又挣了一点，并托家里的私人关系向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疏通了一下，总算交足学费，进入农业经济系学习。到了牛津的第二年，我和洛伊斯结了婚。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战争危机四伏，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们也感到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许不会很长。

战争爆发时，我们农业经济系停课了，我的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专家。大多数原来的同事都被他请去筹划全国粮食供给这项人命攸关的大事了。我成了家里唯一没有直接或间接参战的人。我弟弟进了军事电子研究室，妹妹在妇女皇家海军服务队作侦听员。（她后来紧密配合R.V.琼斯的信号情报破译工作，以后和军事电子研究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所以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在海军里为我找个工作。我一点也没想到他会打来电报，要我到他办公室走一趟。

布伦德里特早就认识我，他过去曾是个精明的农场主，弗里然^①牛养得很出色，所以对我在阿契纳达罗奇的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能在海军里作什么，我回答说通过多年认真观察父亲的工作，我在电子学方面已经打下坚实的基础，不亚于一个大学生。没过十分钟事情就谈妥了，他让我从下星期开始到海军研究实验室工作。

在海军研究实验室里我的顶头上司是斯蒂芬·巴特沃思。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人们不知为什么叫他萨姆。他高高的个子，面庞清瘦，一头卷曲的乌发，嘴里总是叼着烟

^① 北欧群岛、德国及丹麦沿海一群岛。——译者

斗，干起活来像不要命似的。在他的手下有一批包括马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在内的年轻天才科学家。由于缺乏资历，我刚到海军研究实验室时总感到忐忑不安。所以每天晚上我总要钻进汉普顿威克街我们窄小公寓的厨房里冒着德国炸弹的轰响学习高等物理课程。巴特沃思一直在鼓励着我，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把荣誉留给别人。这种谦让的精神虽然使他功名未就，却体现出他高贵的品格。但是英国政府在战争结束时对他的才华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的报答只是一枚微不足道的帝国勋章。

对于海军研究实验室在战争中的贡献应当给予更高的评价。战争刚一爆发时英国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德国磁性水雷的威胁。海军研究实验室开始研究一种销磁的方法，以便消除我们军舰的磁场，使它们免受水雷的攻击。如果不是我们发明的这种方法，我们在1940年能否坚持作战还是个问题。

例如德国在敦克尔克^①近海水域布下了成千上万枚水雷，希特勒相信这样一来英国的大规模撤军计划就会化为泡影。但是巴特沃思了解到德国水雷一般总是北极朝下，所以他建议我们将所有的舰只都磁化成南极向下，这样就可以避开水雷。海军各部队随即大规模地行动起来，将所有派往敦克尔克的舰只的磁力系统都改变了方向，结果我们一条船也没损失。

战争年代的科技工作经常要求我们在一个问题出现时迅速作出反应，利用现有的条件尽量彻底地解决问题；而绝不

^① 法国北部一海口，1940年英国驻法远征军由此撤退。——译者

能拖拖拉拉，贻误战机。战争使我学会了以后从事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法，懂得了应变能力的价值。同时我也看到，如果人们能够接受坚信科学真理的年轻人的意见，他们的工作便更加富有成效。遗憾的是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可贵的精神也逐渐消失了，各种官僚委员会把英国搞得萎靡不振。

1942年以后我开始研制一种侦测小型潜水艇的仪器。在以后的北非夜间登陆及欧洲西北部夜间登陆行动中它为了保护码头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在搞这项工作时还参加了一次袭击德国王牌主力舰“特比茨”号的行动。这艘军舰当时正停泊在阿尔腾海湾，时刻威胁着英国海上运输的安全。所以，一个用小型潜水艇炸沉它的计划形成了。我们了解到德国人在阿尔腾海湾布下了许多潜艇监视器，这些监视器是由布设在海底的一排排线圈组成，专门监视过往船只引起的磁波变化。这一套和我在海军研究实验室里搞的那些东西差不多，所以他们把我找来，问我有办法为我们的X式小型潜艇销磁，使它能够顺利进入海湾。

给潜水艇销磁要比对一般船只销磁复杂得多。不过我最后终于发现，只要在艇上从船头至船尾设置一条电磁铁，并给它通上适量的电流，潜水艇就可以冲淡海底监视器释出的电磁波。我又计算了一下，如果我们的X式小型潜水艇在磁暴^①时闯进去，被发现的可能就会比原来减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百。我马上动身来到设在埃斯克代尔米尔的地磁观测站，在那儿了解到他们已经很有把握地预测出一次相当强烈的“磁暴”。我把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海军有关方面。

^① 因太阳黑子而引起的地磁动乱。——译者

1944年，在一次磁暴的掩护下，一艘经过销磁处理的小型潜水艇成功地闯进了阿尔腾海湾。我们的战士英勇机智地靠着船舷摆好炸药，把它炸成一堆废铁。那天参战人员获得了三枚维多利亚勋章^①。但是如果没有海军研究实验室的技术援助，他们的勇敢也只能是匹夫之勇。

到了战争结束时我的命运已经无法转变了。尽管我最喜欢农业，但我命中注定要与它无缘了。我参加了C.P.斯诺主持的政府科技人员业务竞赛，这次竞赛的目的是从战争时期招来的众多科学家中选拔一些最优秀的人材。结果我以二百九十分——差十分满分——的成绩获得并列第一名。巴特沃思向我表示衷心祝贺，看来以前挑灯夜战的功夫没有白费，但我知道这个成绩的取得与他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

1946年我父亲回到马可尼公司当总工程师，我在同一年被派到军事电子研究室任主科研官。三十年代的磨难增进了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在以后的四年中我们一直携手同行，直到1949年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勋爵打来电话，把英国军事情报第五局引入到我的生活里。

^① 一种表彰陆、海、空战士英雄业绩的勋章。——译者

第三章

1951年的一天，泰勒给我打来电话，听起来他有些惶恐不安。

“我们迟了一步，”他喘着粗气说，“今天下午能来吗？”

那天过了一些时候我在外交部对面公园的一张椅子上找到了他。他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一天我们驻莫斯科使馆的空军武官正在像往常一样通过高频接收机监听苏联军用飞机的动向时，接收机里突然清楚地传来自己的声音。他意识到一定有人利用什么手段在窃听他的谈话，于是马上报告了这件事。我和泰勒分析了一下，这可能是某种窃听器之后，他委派外交无线电设备维修部一个名叫唐·巴利的工程师前往调查。在巴利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我简单地对他讲了一下怎样能最有效地查获窃听装置。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英国情报部门是多么缺少技术知识，他们甚至连件像样的工具都没有，我只好把我的工具借给巴利。他在那儿把大使馆搜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显然苏联人事先已得到消息，把窃听器关上了。

巴利回来后我向他详细询问了调查情况，很清楚这不是一个普通无线电窃听器，因为它在工作时发出了很强的无线

电讯号，这显然是载波。我怀疑俄国人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在搞谐振窃听器。六个月后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泰勒又一次约我马上到圣詹姆斯公园去见他。

他向我讲述道，美国国务院按照惯例在美国国务卿访苏之前派人对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大使办公室进行“清扫”。他们用一种标准可调信号发生器制造出一种“颤噪效应”，这就像是给电台打电话时他们的收音机或电视机正好开着而发出的噪音一样。结果他们在大使办公桌后面墙上的美国国徽后面发现了一个窃听装置。

这时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是1800毫亨，美国人以为这个窃听器的频率也应当相同。但他们在试验中发现，在把窃听器调到这个频率时它既不稳定，灵敏度又低。绝望中他们来找我们，希望能帮他们找到使用这个“小东西”（大家这样叫它）的方法。

布伦德里特在大巴多给我找了一个十分安全的新实验室，泰勒和两个美国人神情严肃地把那个“小东西”带到这里。他们把它装在一个像是盛西洋象棋的小木盒里，里边用棉衣包着。这个窃听器差不多有8英寸长，顶上一根天线和里面的一个空腔相连。空腔里有一个蘑菇状金属碗，调节上面的平盖就能改变谐振腔的形状。在小碗的后面有一层收音用的薄纱膜，纱膜上好像有裂缝。美国人不好意思地说他们的一个技术员不小心用手指把他捅破了。

这个差事来得太不凑巧了。反潜艇监视系统的实验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我需要投入很多时间。不过每天晚上或周末我都要挤出一些时间，穿过马可尼公司后面的空地，到我那

孤独的“尼森小屋”^①式的实验室里去摆弄那个“小东西”。整整过了十个星期，谜底终于让我给找到了。

我首先需要修复窃听器的薄纱膜。也许是为了赶在美国国务卿到来之前完工，这个窃听器整个给人一个十分粗糙的感觉。不过他们在安装薄膜时一定使用了一些微型工具，因为我用镊子每次总会把它撕破。在失败了许多次之后，我终于将纱膜装好、夹紧。虽然还欠完美，但也能凑合用了。

下一步我量了一下天线的长度，开始考虑它的谐振方法。它的工作频率看起来好像是1800毫亨，可是当我把它调好，用一个声频信号发生器向它发射声波时，正像美国人说的那样，它的声音一点也不清楚。又过了四个星期，我终于发现我们搞错了。以前我们都以为那个小金属盖开得越大谐振效果越好，其实恰好相反，它关得越小灵敏度越高。我将那个小盖关紧，在信号发生器调到800兆周时那个“小东西”发出了尖利的叫声。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给父亲挂电话。

“我会用那‘小东西’了！”

“我猜到了，”他说，“那叫声把我耳朵都快震聋了！”

我通知了泰勒，让他来看看。他和卡明上校、休·温特博恩和那两个美国清除窃听装置人员一起来了，我父亲也来了，还带来马可尼公司研究部主任R.J.肯普，他也是一个自学成材的科学家。我把窃听器放在实验室远处的墙脚下，在隔壁的屋子里放了一台接收机。我在实验室里用声频信号发生器发出的声音隔壁完全能够听得清楚，真像是在实地搞窃听一样。

^① 二次大战中英军所用的活动营房。——译者

我把声频器的指针拨到800兆周，开始向他们讲述其中的奥妙。那两个美国人给这么简单的道理惊得目瞪口呆，而卡明和温特博恩却十分得意。此时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引起的恐慌刚刚过去，1951年英国外交部这两个名门出身的外交官叛逃到苏联使美国非常恼火。事后我很快认识到，英国这时哪怕有一点点领先的东西能够夸耀的话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肯普很会说话，他说马可尼公司在和政府签订合同后自己也可以搞一份，这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卡明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它？”

我和肯普回答说要想使它完全合乎要求至少也得搞一年时间。

一年半以后，我们代号为“森林神”的样机终于诞生了。我和肯普来到军情五局总部的莱康大楼，休·温特博恩把我们带到六楼一间简朴的办公室，把我们介绍给一个高个子、驼背、穿着深色细条制服满脸堆笑的人。

“我叫罗杰·霍利斯，”他边说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局促地握了握我的手。“局长今天恐怕不能来了，我来作他的代表。”

霍利斯不想多聊，他那空荡荡的桌面表明他是个办事干净利落的人。我马上把带来的东西拿给他看。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小提箱里，包括窃听器的辅助仪器和两把藏有天线的普通雨伞。伞一撑开就变成接收机或发射机的抛物面天线。我们将窃听器安装在南奥特利大街军情五局一个秘密活动室里，把接收机摆在霍利斯的办公室。我们的试验相当成功，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连钥匙开门的声音都能听到。

“太妙了，彼得，”我们一边听，霍利斯一边不断地说，“这简直是巫术。”

卡明在后边傻笑起来。

这时我才意识到军情五局的官员们因为战时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与世隔绝，所以很少体验到先进技术的成功给人们带来的喜悦。试验结束后，霍利斯站在办公桌后面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这一天对于军情五局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正是布伦德里特组建工作委员会时所期待的。他那高傲的口气活像是说仆人们终于在玫瑰园中找到了主人丢失的钻石王冠。

“森林神”的确非常成功，美国马上向我们订了十二台。以后他们又厚着脸皮抄去图纸，自己生产了二十台。五十年代自始至终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森林神”被新技术取代之前都把它视作窃取情报最有效的手段。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得到了军情五局的信任。从这以后他们总是定期找我，越来越多地向我讨教一些技术问题。

虽然我现在还是只和卡明联系，但渐渐对他们处(A处)的组织情况有了一点了解。A处下设四科，一科负责物资供应，为军情五局大至窃听小到撬锁等工作提供所需材料设备；二科是技术科，拥有一批如休·温特博恩那样的科学家；三科是和特别行动处有联系的警察部队；四科是跟踪人员，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负责在伦敦街头跟踪监视外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人。

在对待科技工作上卡明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认为A处应当指挥科技工作，而不应当反过来。所以现代化之风迟

迟没能吹到那里。在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上我们配合得还算可以，但如果他和温特博恩不對我交底，我們总有一天要散伙的。比如，温特博恩常常問我对电话窃听工作有什么高见，我对他解释说，除非了解他們現在运用的各种技术我才能够帮忙。

在跟踪技术问题上我們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五十年代军情五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伦敦街头跟踪那些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而自己又不被发现。

“你有什么办法吗，彼得？”卡明問我，好像在我上衣的口袋里就装着现成答案似的。我对他讲至少我得亲眼看一下跟踪行动的整个过程。卡明答应去联系一下，但一去就杳无音讯。

不过尽管阻力重重，有一点还是十分清楚的：军情五局觉得我对他們有用。到了1954年，我每周要去莱康大楼工作两整天。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卡明請我到他們的俱乐部去吃午餐。我們穿过圣詹姆斯公园，沿着帕尔玛尔大街来到他們的“方便”俱乐部，卡明手里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那把伞。

我們在桌前刚刚坐下，我就感到，尽管我和卡明已经打了五年的交道，我們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亲近。他个子很矮，虽然没有过人的聪明，但对军情五局却忠心耿耿。他看上去有点像约翰·巴肯^①小说里的警察，经常可能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他过去曾是长枪旅里的一名军官，符合军情五局从创始人弗农·凯尔就开始的行伍出身传统。他和军情六局第一任局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是亲戚——这一

^① 英国小说家，《三十九级台阶》作者。小说中经常描写警察的无能。

——译者

点他几乎在刚见到我时就反复向我表明了。军情五局的现任局长迪克·戈德史密斯·怀特勋爵差不多可以说是他招收入伍的。三十年代有一次他们一起带领一群孩子出去度假时怀特说他不喜欢当老师，卡明就动员他去申请加入军情五局。结果怀特成为一名出色的、感觉灵敏的情报专家，很快使他的老师相形见绌。但是怀特对卡明的恩情念念不忘，五十年代时给了他不少的好处。

卡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在苏塞克斯郡有一个很大的庄园。他在乡下充当乡绅，到城里又变为一个情报官，这很符合他身上童子军的气质。但实际上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军情五局的文件堆里和其它枯燥无味的琐事上了。他和战争年代情报机关招募的大学生骄子们在一起总是觉得很不自在，不过卡明还真有一手。他神通广大，交游甚广，除了许多酒馆里的酒肉朋友之外，三教九流各方面都有熟人。如果局里需要找一个一条腿、会讲中国话的洗衣妇，只要找卡明就一定能够办到。所以当A处处长的位置出现空缺时，卡明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卡明点了鹌鹑蛋，问了一些我过去的经历。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又要了两杯白兰地。最后终于说出了这次款待我的用意。

“彼得，我想问问你，就技术方面而言，你觉得我们的工作干得怎样？”

我基本上已经猜到他要谈这些，心想倒不如趁此机会和他好好谈谈。

我开诚布公地说：“除非你们请一个为你们排难解忧的科学家并让他了解真情，否则你们将一事无成。”

招待员过来送上白兰地，我止住了口。

“你们要让他和办案人直接联系，事前事后多听听他的建议和分析。”

卡明倒了酒，将杯子拿在手中轻轻地摇着。

“你说得对，”他迎合着说，“我们倒想这样作，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琼斯^①倒是非常想来，但如果我们让他来的话，第二天他就要在这里指手划脚。”

这一点我倒不否认。

这段时间我一直向温特博恩暗示，只要有合适的工作我倒愿意加入五局，不再这样东奔西跑了。

“我想休已经告诉你我愿调到五局来了吧？”我问他。

他回答说：“关键就在这儿，彼得。我们和白厅已经有言在先，互不拆台，即使是你自愿我们也不敢用你。”

卡明一抬手，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然，”他继续说，“如果你离开海军，那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卡明的典型作风，他是要我先走第一步。

我提出养老金问题，如果我现在离开，在海军里的十四年就可能白干了。我又不像卡明，还有另外收入作后盾。卡明用手指敲着杯子，那副惊讶的表情好像是说这样的问题我怎么竟能说得出口。

他说：“彼得，我想你一定清楚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① 琼斯（R.V.Jones）战时和丘吉尔一起搞科学情报，对国家贡献巨大。但由于他喜欢独往独来，白厅普遍不太信任他。正像许多人一样，战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发挥才干。——作者

他停了一下，又开始了他的老生常谈。

“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机构，但你得相信我们。我们的经费都是秘密拨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作出书面保证。但只要有机会，我们是不会忘记下边的，谁也不愿看着自己的伙计们受苦，你说是吧？”

吃过午饭我们走出觥筹交错的“方便”俱乐部，来到灰蒙蒙的皮卡迪利广场上。

“彼得，如果你决定离开海军，给我打个招呼好吗？”卡明说，“到时我再征求一下处长局长们的意见。”

我们握了握手，他挟着雨伞大步朝莱康大楼走去。

卡明来的正是时候，反潜艇工作已经进入结尾阶段。海军部很想让我去朴次茅斯接受一项新任务，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这时马可尼公司和英国电气公司联合承包了“蓝条工程”，马可尼实验室副主任理里克·伊斯特伍德正要请我去监督生产“蓝条”的导航系统。一个月以后，我辞去了海军部的工作，来到马可尼公司作第一高级科学家。

后来我觉得研究导弹太不人道了，这样想也许是因为我希望尽快加入军情五局的缘故。但是许多人也都认为我们的导弹搞不出什么名堂，这是一件愚蠢透顶的事，是一座英国自欺欺人的历史纪念碑。从各方面来说，这种科学对于人类没有半点裨益，为什么要花费毕生的心血去搞一种我们祈求永不使用的武器呢？

我打电话告诉卡明我已离开了海军，问他下一步有什么安排。六个月之后，我终于接到他再次请我吃午餐的邀请。这一次卡明明显地不如上次那么热情，而且他也没有兜圈子。

“我和局委会的委员们一起讨论了你的建议，我们想让

你来搞这项工作。但如果我们把你作为一个科学家录用的话，我们对白厅就很难交待，因为以前还没有过先例，会将事情弄得复杂化。我们建议你以一个普通军官的身份进来，然后看看再说。”

我向卡明明确表示我不大喜欢这个建议。据我所知这样一来只有一点不同，他们可以按主科学家（或普通军官）级而不是按我现在的高级科学家级付我工资，也就是说一年少付我五百镑。另外还有个原则问题。我起初和父亲商量如不加入军情五局时他就给我定下了个原则。

他说：“除非他们请你去作科学家，要不就别去。你在这点上如有半点让步，就别想再搞科研工作了，不知不觉你就会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办案人员。”

卡明对我提出的异议感到意外，但也没有再说什么。他说他还要回莱康大楼办点急事，便匆匆离开了。

一个月后我在大巴多实验室里接到肯普的通知，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卡明和温特博恩也在，温特博恩嘻嘻地笑着。

“喂，彼得，”肯普说道，“看来我是留不住你了，马尔科姆要你去军情五局作他们历史上的第一位科学家。”

后来温特博恩告诉我卡明曾找到肯普，问要是他找我的话他愿付我多少工资。肯普知道卡明很小气，经常为了给国家节约一点钱而作得太过分。于是他回答说：“如果是我也会同样要求——一份公平合理的报酬！”

“当然这事还得局委会拍板，不过那只是走走形式。”卡明说。

我和在场的所有人都握了手，然后回到自己的实验室，准备迎接阴影中的新生活。

第四章

四天之后我到莱康大楼来见局委会的委员，这是最后一关。门口警卫室那结满冰霜的小窗子向下一拉，露出一双眼睛，仔细打量着我。尽管我已经不是陌生人，但还没有通行证，只得在值班员给卡明打电话时耐心在外边等着。

“先生，今天来见局长吗？”他一边问一边按了一下电梯按钮，大门嘤哪一声向后打开了。这是一个老式电梯，操纵杆装在一个铜盒子上，它载着我们晃晃荡荡喘着粗气向上爬去，一楼，二楼，直到六楼。军情五局高级官员的办公室都在这一层。

我们沿着走廊走了几步，转身进了一个长方形大屋子，这里是局长秘书室。它看上去和白厅的其它办公室没什么两样——上了岁数的秘书、花呢服装的噼噼啪啪的打字机。只是窗子对面几只装有暗码锁的保险柜透露出这里是一个保密机关。局长办公室的门开在远处一面墙的当中，长长的外间屋是专为那些不速之客而设计的。有了它的保护，局长就能在他们冲进房门之前赶上前去锁上门上的自动锁，把他们挡在外面。局长办公室门上的绿灯亮了，一个秘书领我走过长长的通道，开门让我进去。

局长办公室里光线充足，空气新鲜，古色古香的桃木家具和皮靠背椅使人觉得这不是在白厅，而是在证券街①。一面墙上挂着三位前任局长威严的肖像，对面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后面坐着军情五局局委会全体委员。我认出了卡明和霍利斯，其余的人都不认识。

局长迪克·戈德史密斯·怀特勋爵请我坐下。我以前到卡明办公室时见过他一次，但与他不太熟。事情竟有这么巧，他也是斯托特福特主教学校的毕业生，在学校里还保持过一英里长跑的记录，不过那是在我入学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个子很高，脸庞瘦削红润，目光炯炯有神。他很有点大卫·尼云②的味道，标准的英国风度，从容安详，穿戴考究。和在座的其他人相比，他的确是更耐看一点。

待大家坐定之后，他便一本正经地开始发言。

“赖特先生，我听说您想到我们这儿来工作，也许您可以先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我先向他讲述了一下我为军情五局作过的工作，然后把以前反复向卡明强调的话又说了一遍。我说只有加入五局，并且得到充分信任我才能作更多的工作。

“我想我可以代表在座的各位向您保证，”他说，“我们是不会请来一位科学家而不给他提供必要工作条件的。您放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

卡明迎合着点了点头。

“但是，”怀特接着说，“我想我应该明确地告诉你，这

① 伦敦一繁华街道，以许多大公司著称。——译者

② 好莱坞电影明星，专饰绅士学者。

里和你所了解的白厅其它部门不一样，一旦进来，也许就再也没升迁的机会。”

他又对我解释说，一般来讲，人们来情报部门工作要比到政府部门工作年龄大一些，进来之后，下级官员都要按规定接受训练，学习军情五局各部门的专业知识，然后才开始工作。这些普通官员很少有人能够进一步升到人员不多的高级官员（以后称为处长助理），能升为六个处长之一的希望就更小。他倒是高级官员，但他的工作专业性太强，所以基本上再也没有可能被提拔作处长工作。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生来不愿多管闲事，对于生活也没有什么奢求，所以他讲的那些我都不在乎。

接下去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政府部门消除隔阂，紧密合作。我认为这一点在技术部门应当引起特别注意。二十分钟后，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少了。最后，迪克·怀特作了总结发言。

“赖特先生，到底情报部门需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我还不肯肯定，”他停了一下，接着俏皮地说：“但是如果您想试试，我们也想试试。”

沉闷的气氛一下消失了。委员们从会议桌后面站了起来，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当我正要离开时迪克叫住我，我们一起来到屋子另一端他的办公桌旁。

“我想先让你去二科到休·温特博恩那儿工作，你的任务当然由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但我已和他讲了，我希望你在D处分管的苏联问题上多花点时间。”他用手指敲着桌子上的笔记本，眼睛朝窗外肯辛顿园苏联大使馆的方向望去。

“我们目前还没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他啪地一声合上

笔记本，然后说了一声祝我走运。

吃过午饭我又回到六楼，按照惯例来见人事处长约翰·马里奥特。战争期间他在“双十字委员会”^①当秘书，由于这个委员会在纳粹情报部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军情五局战时才干得那么出色。战后他去了中东安全情报局，以后又回到莱康大楼。他是个忠实的小官僚。

“只想和你简单聊聊，谈谈你个人的一些情况。”他一边说一边以一种明显的共济会^②形式和我握了握手。这时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我和父亲第一次谈起加入五局时他曾暗示要我加入共济会，当然我父亲也是个共济会员。

“你知道，我们得弄清你不是共产党。”

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说这在军情五局里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等着卡明通知的几个星期里听说局长秘书室派了一个退休的警察到马可尼公司去了解我的情况。这是例行公事，在这之后再也没有有什么其它调查了。当然目前军情五局正在对白厅所有官员进行严密审查，可是系统地审查自己的官员却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的。

马里奥特的办公桌上什么也没有，我想他可能把我们的谈话录音起来，放到我的工作档案中去。马里奥特神情严肃，但只问了很少几个问题。

“年轻时一定有点左吧？”

“有一点。三十年代我在工人教育协会里教过书。”

“这个协会很亲共产党吗？”

① 英国情报部门一双重间谍组织。“双十字”在英语中意为欺骗。——译者

② 一国际性的秘密互助团体。握手时将拇指藏在掌心里。——译者

“在康沃尔的不同。”

“1945年投工党的票吧？”

“我想政府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现在保持中立了吗？”

我告诉他我既恨纳粹又讨厌共产主义。接下去我又发表了一套长篇大论，他似乎对此很满意。话题转到个人问题上。他踌躇了一下，最后终于开腔了。

“搞过同性恋吗，哪怕有那么一点点？”

“从来没有。”

他仔细察看着我的表情。

“为什么人作过秘密工作吗？”

“只为你们作过。”

他哈哈笑了两声，但显然这话他事前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份表格要我填写，其中包括个人情况和直系亲属情况。审查到此结束，居然这样简单，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和布伦特之流那么容易就混了进来。

在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正式参加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新来的青年大学生一起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负责训练我们的人叫约翰·卡克尼，他很粗鲁，满嘴粗言秽语。但我们相处得不错。卡克尼有时非常粗暴，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因为他很讨厌这项工作，不愿把本来就很孱弱的青年变成呆板的情报官。他和局里一般人大不一样，作事喜欢大刀阔斧，讨厌局里那套单调、呆板的作风。他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很有远见。后来他离开五局去作生意，取得了很大成功，这在我看来都是意料中的事。他先去维多利亚投资公司，然后又

到了王冠地产经营公司，再后又作了伦敦港董事长。当今约翰·卡克尼勋爵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董事长。

卡克尼按照惯例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军情五局的法律地位。

“我们不受法律保护，”他坦白地说，“安全部门没有白厅一般机关的合法身份，因为我们的工作经常要超越公正和法律的界限。”

卡克尼列举了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情况，如没有搜查令就潜入他人住宅，侵犯个人隐私等。他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第十一条圣诫^①——“汝不可为人所乘”——是军情五局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他还讲了我们与警察局的关系。如果我们遇到麻烦他们倒是乐意帮忙，特别是在我们追踪到真正的目标时更是这样。但是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紧张。

“特别行动处倒是愿意干我们这一行，但是我们不喜欢干他们那一行。”

卡克尼递给我们一份目前军情五局各机构的介绍，开始向我们讲述它的组织情况，局下面有六个处：A处负责物资供应；B处负责人事；C处负责政府各机关的保卫和审查工作；D处负责反间谍工作；E处负责在当时众多的殖民地国家里搜集情报以及镇压马来亚和肯尼亚的反抗运动；F处负责国内事务，主要是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和工人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便也谈了一下我们的兄弟单位军情六局，或称秘密情报局。在白厅他们比我们出名。他也给了我们一份军

^① 自己杜撰的“圣诫”，圣经中只有十条戒律。——译者

情六局的介绍，告诉我们哪些部门经常和我们有联系。实际上这只包括六局的反情报科和一个很小的共产主义事务研究科，而后者在我到五局后不久就解散了。卡克尼在谈论六局时有意不多表态，直到以后我亲自与他们的一些技术人员打交道时才明白两边的积怨有多深。

两天以后我们照了相，领到了军情五局的身份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一个从特别行动处退休后来C处工作的警察，他给我们讲了怎样安全保管文件。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将文件带出办公室。出门时，哪怕只有十分钟，都要保证收起桌子上的文件，锁好办公室的房门。他还给了我保险柜的暗码，并告诉我还有一份存根留在局长的保险柜里。这样局领导就能随时在我们的保险柜里取到所需文件。这个办法倒是想得很周密，然而我却不明白审查制度却存在着那么多漏洞。

五十年代军情五局很不景气，好像到处都落满了战争留下的灰尘，很像是狄更斯的哈弗沙姆小姐。战时那些倾心于她的才子们在1945年都抛弃了她，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寻找新的情人，只留下军情五局孤零零地坐守空房，痴心地回忆着过去，与白厅的其它部门老死不相往来。

这里很像是一所中学，人们对局长、处长就像学生对老师那样又尊敬又奉承，而科长们就像是老师指定维持纪律的班长。在这里人们只对局长、处长称作“先生”，其余的人一般都直呼名字。这种特殊的气氛造就出许多乖张、放纵的性格，不少人对自己的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所以使本来枯燥无味的情报工作变得很有意思。

这种生活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古怪、呆滞。每年洛德国际板

球预选赛时整个五局就像是放了假，倾巢出动去观看比赛。他们甚至还在那儿挤进了爵士板球俱乐部，成为一个非正式会员。高级军官们每天早晨上班后的第一个小时差不多都要花在《泰晤士报》的字谜游戏上。这个时候防窃听电话到处丁铃铃地响着，但人们此时谈论的不是西方世界的绝密情报，而是一些稀奇古怪的黑话。

“我的左屁股疼”意思是说“左下角第七个字的头或末尾一个字母我猜不出来；”“我右乳房空了”意思是“第十二个字中间是个什么鬼字母？”反苏间谍科(D处一科)五十年代的科长考特尼·扬是局里一致公认的字谜大王，他总是说用铅笔作太容易了，有本事的要在心里作。我在他旁边看了一年，最后再也忍受不了，想和他较量一下。我们打了赌，没想到他不加思索一眨眼的功夫就把答案全填好了。没办法，一连整个星期，每天晚上我都要请他喝酒，把他给乐坏了。

军情五局的神经中枢是档案库，整个一楼都是它的地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证敌机轰炸时这些文件不致被炸毁，五局把它们从伦敦搬到沃姆伍德斯克拉博监狱。但此举并不高明，敌机当年也轰炸了这个监狱，许多文件都在大火中烧毁了。为了防潮，人们把剩下的文件装到塑料袋里保存起来。六十年代我在研究三十年代征兵史时经常需要参考这些战前的史料，但是这些材料看起来非常不便，需要用镊子和小木刮刀一张张地剥开那些被烧焦而粘在一起的纸片。

有了这次教训，军情五局在筹划新档案库时就谨慎多了。戴维·皮特里勋爵战时的副手布里格迪尔·哈克是一个理想的好管家，他找来一个管理专家罗德·波特，让他负责重整档案库的各项工作。波特干得相当出色，他喜好整洁，

讲求条理，即使在战争的动乱中仍能把档案库搞得有条不紊。

1955年波特这时已经快要退休了，但他很高兴地领我参观了他的档案库。档案库的主要部分是中间大厅，这里存放着主要文件和主要文件的索引卡片。大厅周围的小屋里备有其它特殊文件的分类卡。这些文件及其索引都要按照惯例复制在微型胶卷上，然后送到切尔特南一个保护措施完善的仓库里保存，以免再发生沃姆伍德斯科拉博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库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称得上是整洁的典范。

“彼得，请你一定要及时交还档案，行吗？我不想一开始就像我对那帮家伙那样拼命地催你！”

他是个十分和气的人，要是在一个小城里当图书馆员肯定很受欢迎的。但是说来真对不起他，结果我竟成了让他们十分头痛的人，经常整打整打地积压档案。但要是和F处带有传奇色彩的老处女米利森特·巴戈特相比，我还显得略逊一筹，米利森特多年来一直在F处监视国际共产党的活动，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我一直在想她是否就是约翰·莱卡利^①笔下那个无处不在的康尼的模型。她有点疯疯癫癫，但对人的面孔和档案有着超人的记忆力。波特和他的继任者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在接到F处调阅大量档案的申请时波特总是喃喃地说：“但愿她在退休之前能把这些文件还回来。”

这个档案库深深地吸引了我，一种期待的感觉油然而

^① 英国侦探小说家，康尼为其小说中一英国间谍。——译者

生。在这些平凡的卷宗里伸延着一条条扑朔迷离的踪迹，等待着我去追寻。他教我怎样签收和签发文件，以表明文件收到或读过了。档案的归档方法是他自己创造的，每份文件按时间排列为序，文件和附件放在右边，左边是目录和简介，以便快速查阅。

我们的档案基本上有三大类。第一类是个人档案，简称PFs档案，黄色封皮，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1955年我刚到军情五局时我们大概有两万份这种档案。在一段时间内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时档案才突飞猛进地增多起来。第二类是机构档案，或称组织档案，包括如英国共产党一类组织的材料。这种档案往往一下就是几大本，并且和人物档案紧密相连。第三类是鸭蛋青色的专案档案，一般是些很难归入前两类中的特殊案件材料。另外还有一种“丫盒”档案，这是一些高度机密档案，例如所有可疑的间谍和许多叛逃者的材料都归入此类。没有主管人有时甚至是局长的批准任何人不准私自动用这些档案。

波特对我说：“一定要保证档案的完整。”他又强调说，没有上级部门的文字批示，绝对不准擅自拿走档案中的任何材料。从我们每一个人刚刚来五局的第一天起，档案管理人员就向我们大力宣传这些注意事项，使我们懂得了档案的神圣性。这是十分必要的。

大厅里档案管理人员整天忙个不停，用小推车把架子上的档案送到专用电梯旁。为了尽快将档案送到楼上办案人员手中，小推车上还铺设了铁轨。档案库上面二楼是F处，三楼是E处，四楼和五楼是D处，六楼是A处。档案室还雇用

了许多姑娘，让她们在楼里传送文件和把大批新到的材料分类、核审、入档。凯尔任职期间这些“档案公主”（人们这样称呼她们）不是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就是五局官员自己的女儿，因为凯尔确信她们的出身就是对她们的最好审查。这些刚刚步入社会情窦初开的少女们一般都很漂亮，有钱，所以局里许多人都和她们结了婚。这种婚姻越来越多，后来人们开玩笑说这些“档案公主”在局里工作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九个月——她们的妊娠期，然后就去生孩子。

档案库下面是地下室，实际上是莱斯利·贾格尔的仓库和工作间。贾格尔是二科休·温特博恩手下的人，也是卡明的一个名气颇大的熟人。他高高的个子，膀大腰圆，以前和卡明一道在长枪旅里服过役，作过军士长。贾格尔身上总穿着一件黑外套，像个送殓人似的。

贾格尔是技术员，专门从事军情五局一些稀奇古怪的工作。我刚到局里时他一定感到一种威胁，但他从没表露过，而且我们不久就成了好朋友。他的绝招很多，但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用钢丝开锁的本事。以前受训时我在他的工作间里听过他给五局、六局定期上的开锁课。这间地下室的小屋里到处都是钥匙，确切地说有几千把，都标好号一排排挂在四周的墙上。贾格尔说这是一些办公室、宾馆和私人住宅的房门钥匙，一些是五局的人设法直接弄到手；另一些是通过胶泥模复制的，每把匙上面都详细地编了号。天长日久他们弄到的钥匙越来越多，现在他们已经能在全全国各地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了。

我正呆呆地看着这些钥匙时贾格尔又说：“说不定到哪天这些钥匙还会有用呢。”

贾格尔开始讲课。他说：“首先应当牢记，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用这一招。用钢丝开锁准会留下痕迹，十有八九会被受过训练的特工人员发现，知道有人进过屋子。我们应当尽量弄到钥匙，不管是用配锁的方法还是用胶泥取样的方法。”

贾格尔给我们作了开各种锁的示范，其中用在钻石保险柜上的伯马锁最难开。因为这种锁里的弹子不是上下而是左右移动，用钢丝开这种锁是不可能的。至于查布锁呢，尽管广告上吹的十分保险，对贾格尔来说打开它却是轻而易举的事。

“你们以后经常碰到的是这种锁。”

他一边说一边拿起一个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的耶尔锁内部机械结构模型。他向我们解释说，这种锁里的弹子摆布很不均匀，只有用钥匙齿将所有的弹子都顶上去的时候才能转动钥匙把门打开。他拿出一截一头带钩的钢丝，插进钥匙孔里，然后开始有规则地一下一下往锁里插。

“这是第一个弹子，你就这样一直往里插，直到……”他紧张的手突然松了下来，“它咔嗒往上一跳，这时你就知道第一个弹子捅开了。”

他那双大手一动一动的样子真像是小提琴手在拉琴，紧张一会儿，松弛一会儿，好像在拉什么曲子。

“就这样一直用力，直到打开所有的弹子……”他扭动手里的钢丝，耶尔锁咔嗒一下给打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去了……当然进去作什么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我们都哄笑起来。

第五章

开锁训练课结束后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了我来五局后的第一项任务。

有一天，休·温特博恩愤愤地对我说：“《第三者^①》的丑剧又要重演了。六局正在调查他们中间一个名叫菲尔比的家伙，他们想让我们帮助安装一个窃听器。”

1955年10月，五局和六局接到通知，幕后第三者的问题很可能要在下次下议院开会时提出讨论，外交大臣需要介绍一下菲尔比的情况。所以上级命令六局写一个案情报告，并且要求他们重新传讯菲尔比。他们给五局A处二科的任务是在讯问现场设置窃听器。

我和温特博恩坐出租车来到斯隆广场附近六处的一所秘密公寓，对菲尔比的讯问将在这里进行。作为讯问室的屋里只有很少几件家具——一只别致的沙发，一张小桌和周围的几把椅子。挨着墙还有一个老式餐橱，上面摆着一部电话。

为了使声音尽量清晰，我们决定采用一个高质量的英国

^① 《第三者》是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一部侦探小说，其中“第三者”为一幕后间谍。——译者

广播公司用的话筒，因为电话机里的那种话筒除非质量上乘，收音效果一般都不大理想。我们在壁炉旁边顺着壁炉撬开一块地板，把窃听器放了进去。菲尔比的座位就在这块木板上面。我们又安装了一个放大机，它能将窃听器收到的信号放大后送到附近的一部监听电话里，邮局的人再将信号转到莱康大楼。

五局的译报中心设在通向职工食堂走廊的另一头，门上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少数官员允许进去。门后是电铃和一道铁栅门，休·温特博恩对着门旁的监视器看了看，门上的自动锁咔嗒一声打开了。正对着门口还有一道门，里面是一间四方大屋子。在这里作录音工作的都是邮电局的职员，邮局可以将录好的材料交给军情五局，而五局却不能在邮局的线路上搞窃听，因为那是违法的（尽管有时为了查明事情真相或窃取重要情报我们——特别是我和温特博恩——就顾不上这么多了）。通过电话窃听来的材料一般录在口授留声机的圆筒上，而截获的无线电信号则录在留声机唱片上。这间屋子简直就是军情五局的巴比伦塔^①。材料录好后交给一些女译码员，由她们拿到走廊两边的小屋里去翻译。

休·温特博恩让他们把电线接到走廊尽头一间很严实的小屋里，我们坐在接收机旁等待着讯问的开始。实际上这只是六局的一次内部会谈，把它称为讯问实在有点可笑。菲尔比进来时，三个以前和他非常要好的同事亲切地和他打招呼，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他一些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的问题。

^① 据圣经《创世纪》，此塔为洪水后建起的通天塔。此处意为要害部门。——译者

首先，他们向他询问了以前参加共产党的那段历史，然后是在六局的工作情况，最后又问了他同盖伊·伯吉斯的紧密关系。菲尔比结结巴巴地回答着，极力为自己辩解。听着他那语无伦次的回答，我们明显地感到他是在撒谎，可是他一语塞时讯问人就给他提供一些暗示，使他能够应付过去。

“嗯，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吧。”

菲尔比非常感激地迎合着，然后他们又开始问旁的问题。当这情形已经显得很清楚时温特博恩去叫卡明。卡明疾步走进屋来，一脸愠怒。他听了一会儿，一个劲地拍着大腿。“这帮家伙是想为他开脱！”他愤愤地说。卡明立即给五局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写了一份报告，言词异常激烈地斥责了六局这种文过饰非的行径，可是这也无济于事。几天后麦克米伦^①在下议院宣布菲尔比无罪。这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周围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只要不合胃口，即便是事实他们也不愿接受。这种怪事在以后二十年间屡见不鲜。

这次行动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了解到五局监视系统的情况。莱康大楼实际上只是这个监视网的一部分，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邮局特别调查处是它设在外面最重要的终点。在那里二楼军情五局有个办公室，负责人是登曼少校，一个旧军人气十足但非常幽默的老头。他在得到邮局方面允许后具体负责信件检查和电话窃听工作。在他手下还有一个军情五局的密写实验室，专门研究如何破译和发送密写信件。每个大

^① 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1894—)，英国政治家，1955—1963年间英国首相。

邮局的信件分检部和乡下的信件转运处都有一个特别调查办公室，在登曼的指挥下窃听电话或截取信件。后来军情五局的实验室都汇总到萨福克郡马托沙姆城的邮局实验室，所以如果特别调查处打开的信需要进一步检查，登曼就会派专人骑摩托车把信送到萨福克来。

登曼最主要的办公室里纵向排列着一行行小桌子，每张桌上都摆着发往不同地区的信件：伦敦的在这边，欧洲的在那边，“铁幕”后面国家的在另一边。大约有二十所邮局技术人员坐在桌旁拆看着这些信件。为了不留下指纹，他们都戴着橡皮手套，每人身旁还放着一盏很亮的台灯和一把冒着蒸汽的水壶。他们有时仍旧使用竹棍卷信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有点过时，但却非常奏效。他们将一根小竹棍头上劈开，从拆开的信封角上插到里面。然后把信举到灯前，借着灯光慢慢转动竹棍，不一会儿信就会夹在竹棍缝里，卷在它的上边。最后将竹棍慢慢抽出，信就捎带了出来。

如果信封是用普通打字机打的，他们有时干脆就把信封撕开，以后再另打个新的信封给它换上。但是直到我退休时他们还是不能对付那些两头用胶带封口的信件。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得考虑是打开它然后毁掉还是就这样将它寄出，随便收信人怎么想。信打开后都要用缩微照像机拍摄下来，有关人员再把照片送到档案库存档。

登曼最得意的纪念品是一封镶在镜框里的信，他把这封信挂在对面的墙上。收信人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们经常偷拆他的信。当他们打开这封信时，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信里面是一个用打字机打的小纸条：“军情五局收，要是你们用蒸汽把这封信打开，你们就是一帮下流坯。”登曼

说这是一封猥亵信，按照法律可以把它扣下。

传讯菲尔比的工作刚刚结束后我便开始着手改进八楼的各项工作。当时的破译工作总有这样一个程式：办案人员交给破译部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写明他们需要哪方面的材料，译码员随之在获得的材料中寻找相应的内容。我刚到五局时窃听材料不是录在磁带上，而是录在唱片上。译电员将唱针一点点地向里挪动，迅速寻找着有关内容。找到后他们就用粉笔在上面作个记号，然后就从这里开始翻译。这种方法效率既低又费时间，不过比起当时的磁带录音方法来略胜一筹。

这些译电员大多是凯尔在职期间从一次世界大战后逃到英国的俄国流亡者中招募来的，她们把我们的八楼变为沙俄帝国的一小块领土。她们之中大多数都是贵族、白俄，坚信总有一天会回去收复在十月革命中丧失的领地。对她们来说，今日克格勃就是往日布尔维克的“契卡”^①。她们许多人都是十分虔诚的教徒，有些人竟把圣像挂在自己的卧室里。在五局里她们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这些人自认为是艺术家，趾高气扬，对我们从来不屑一顾。就连那些不可一世的办案官们也要怕她们三分，有时为了澄清译文中一两个不清楚的问题而上八楼时两腿直哆嗦，惟恐一句话说不对惹恼了她们。然而这也不能全怪她们。这些女译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时每刻都得认真收听着苏联外交官那些晦涩难懂的暗语，追寻着那些诡秘的阴谋，整个一生要花上成千上万个

^① 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的简称，1917—1921年。——译者。

小时去收听那些毫无意义的闲谈胡扯（我们的行话把这种胡扯称为“大白菜和国王”^①式的谈话）才能换得点少得可怜的情报。干这种鬼差事，无论是谁也会给憋得发疯的。

我作的第一件事是测验这些女译员的听力。她们许多人已经太老了，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劝那些听力衰退的人去翻译如电话录音等清楚一点的材料，把那些含糊不清的录音交给年轻人。在年轻的译员中安妮·奥尔尤因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她后来调到反间谍部作了我的下手。非电话类录音材料的翻译工作比较难搞，因为经常是许多人同时讲话。我打算设计一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得仪器。去奥林匹亚参观了一个电子产品展览会，在那里买了一个双磁头的磁带录音机。第二个磁头放出的声音要比第一个慢千分之一秒（或者更少），所以声音听起来浑厚多了。实际上这和立体声的原理差不多，它的录音效果即使是很差的磁带经它一放声音比以前也要清楚多了。我把这台录音机搬上八楼，人们都很喜欢它，格里斯特夫人更是感激，我们成了终生的好友。

这是我在科研方面取得的第一个小小成绩。然而楼下几层古董陈列室里的老古董们却丝毫没有为之感动，依旧昏昏沉沉地酣睡着。

其中最急需改造而又最固执保守的是A处四科。战后伦敦街头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外交人员越来越多，四科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从技术上都已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我打算先察看一下跟踪人员的整个行动过程。

我先参观了军情五局的一个观察站，这个观察站设在肯

^① 意为毫不相干。——译者

辛顿园苏联使馆大门对面一幢楼房楼上的卧室里。两个工作人员守在窗子两边，中间三角架上是一台带长镜头的照相机，时刻瞄准着窗外街上。这两个人都只穿着衬衣，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一副疲倦的样子。马上就要到换班的时间了，烟缸里的烟灰满得溢了出来，两人中间的小桌上散乱地放着几只空咖啡杯子。

每当一个苏联外交官走出大门时，他们中的一个就会举起望远镜仔细察看。弄清是谁之后他们就用报话机将他的名字用一个五位密码数字报告给总部，总部再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人报告给准备行动的跟踪人员。追踪车和跟踪人员按照所分配的密码固定跟踪一个人。目标出现时他们可以不作回答就开始行动，以免被发现。观察站里的报话机不时哗哗响着，这是总部在给苏联大使馆附近的跟踪人员布置任务，让他们跟上那些从使馆出来后朝西区走去的外交官。

在这些观察站里工作的监视人员都是一些老手，长期的特殊工作培养了他们对人相貌超凡的记忆力。他们甚至能一眼认出一个多年没来英国的克格勃特务。为了便于辨认，这个观察站搞来三大本所有来过英国的苏联情报人员的照片和身份说明。他们把大使馆新来人员的照片装在塑料袋里挂起来，以便随时参照。他们用照相机将在使馆进出的每个陌生人拍下来，将他们的照片交给军情五局的调查科，随之大海捞针似的辨认工作就从这一点点线索开始了。这是一项非常劳神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献身精神，然而它却十分重要。如果说档案库相当于军情五局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些监视人员就是它的十个手指尖，它们需要随时伸出去，摸清敌人的外部轮廓。

军情五局早在多年以前就认识到，如果将跟踪人员都集中在莱康大楼，他们一出动就会被苏联反监视小组发觉。所以他们把大本营扎在摄政王公园一个优美的高岗上，总部是一幢没有任何标记、十八世纪式的四层楼。楼里中心控制室的一面墙上有一幅巨大的伦敦市区图，参照它即可清楚地了解到各项跟踪行动的具体进行情况，屋子中央是一台无线电报话机，放在一个座架上，通过它总部和各个观察站和流动跟踪小组保持不断的联系。

四科科长吉姆·斯卡登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栋房子里。斯卡登是警察出身，非常爽朗，嘴里整天叼着烟斗。战争年代他曾是军情五局的审讯员，战后一个时期作了主审员，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审讯工作，特别是克劳斯·富克斯一案。斯卡登对自己评价很高，可是人们却喜欢在他手下工作。他有点工会小商店经理的那种味道。他认为他手下的人工作非常辛苦，自己应当保护他们，免得被莱康大楼那帮缺少同情心的办案人员过重奴役。细想一下，他的想法也不无道理。我参加五局时他手下约有一百来人，五局的每项行动都需要他们无休止的协助，但是我不久就发现斯卡登忽视了客观实际，盲目地指挥着伦敦街头的行动。各种迹象表明，许多国家，特别是苏联，为了防止自己的特工人员被盯梢，在各处布下了一些反监视人员。通过几个星期的观察，我开始怀疑像现在这样我们的人能否真正跟踪一个人而不会很快被发现。

当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彻底改进跟踪方法时，他一口回绝了。军情五局的每个科都像一个采邑，斯卡登认为这是对他的能力和权威的怀疑、冒犯。不过最后他还是同意让

我和休·温特博恩进行一次旨在检验现行跟踪技术效果的试验。我们把参加行动的人分为两组，让第一组看了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五局工作人员的照片，吩咐他们去跟踪他。然后我们告诉第二组第一组大致的活动区域，让他们去搜寻他们并侦察他们的跟踪对象。我们一连试验了三次，每次第二组都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我们把第三次行动用摄影机拍摄下来，然后拿到四科总部放给全体跟踪人员看。这个片子至少打破一些人头脑中还残存的认为我们的跟踪行动天衣无缝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到目前的行动确实很容易被发现。

我们向斯卡登建议首先应当雇用一些女侦探。因为行动中在等待或监视间谍们接头时我们的跟踪人员往往要在小酒馆、咖啡馆和公园里坐上几个小时，这时如果一男一女坐在一起就要比一个男人或是两个男人自然得多。斯卡登极力反对这个建议，害怕那样会使一些男女偷情，削弱了跟踪人员的斗志。

他快快地说：“他们的妻子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

休·温特博恩哈哈地笑了。

“怕什么，他们如果接吻、拥抱，不是更有利于掩护吗？”

追踪车暴露出来的却是其它问题。为了弄清他们的工作情况，我花了一天时间实地考察了他们的行动。这些汽车都是些不起眼的杂牌车，但是军情五局设在巴特西的汽车修理厂都给它们换上了第一流的发动机。为了掩人耳目，这些汽车每三个月重喷一次漆，而且每辆车都备有许多个车牌，一星期就要更换几次。

在伦敦大街上追踪苏联外交人员的汽车真像小孩游戏，非常有趣。我们的汽车一会儿在单行道上来回穿梭，一会儿

又闯红灯，真是无法无天。不过我们不用怕，因为司机有警备通行证，不会被罚款。我那辆车的司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一段他的冒险经历。某冬天的一天，他开着车追赶一辆苏联汽车沿莫尔大街朝白金汉宫方向驶去。到了路口环形路转弯处，前面的汽车突然减速，他也连忙刹车。但是由于车速太快，两辆车还是撞在一起，两个车里的人都出来板着脸互相骂了一通。追踪汽车最好的办法是尽量走平行的街道，但是一次行动要真正取得成功，还得要靠总部的无线电指挥，总部及时和埋伏在街道两旁的预备小组联系，告诉他们汽车可能走的路线，使他们能够继续追踪。

追踪行动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每辆车都载三个人，而且经常要在街头巷尾或某幢房子外面停留很长时间，非常惹眼。所以我和温特博恩又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我们了解到追踪车在哪个地区将要有所行动后就出发了，没过半小时我们就找到了所有参加行动的汽车了。有一辆车找起来还特别容易，因为在最近一次换车牌时司机竟只换了前面的，忘了换后面的了！我向斯卡顿建议要减少车里的人数，他却摆出了一副典型的莱兰式^①面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为什么非要三个人不可。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一个人操纵报话机，三个人正好。”他肯定地说道，好像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话听起来多么荒唐。

但另一个问题可不是闹着玩的，它使我非常担心。通讯

^① 莱兰——很大的汽车公司。日本汽车进入英国市场后它的销量大减，但它对外拒不承认这一点。此处意为为了维护自己尊严而强词夺理。

联络问题一般是情报组织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的监视人员每天要在观察站，在追踪车和总部之间进行上百次的通讯联系。最糟糕的是他们对这种潜在的危險一无所知。苏联人要想发现我们并不难，只需打开接收机在各个波段里搜寻一下不明的呼叫信号就行了。这和军情六局在国外的情形差不多。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要想弄清大使馆里谁是军情六局的特工最好的办法是检查一下哪个外交官员的外线电话没有通过使馆总机就行了。尽管后来五局让跟踪人员使用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密码系统，但我告诉他们这和以前也没什么两样，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讯号和警察局、消防队和救护中心使用的明码讯号相差更远。他们不知道苏联人侦察我们的行动并不需要靠了解我们通讯的内容，而多数时候是靠这些讯号本身。只要分析一下截获的讯号他们就可以判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进而查对一下，对我们的意图就十分清楚了。

第六章

在这场冷战的战场上如果A处二科是前沿阵地的话，我和休·温特博恩就是冲锋队员。他在参加五局之前在陆军服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能讲流利的汉语和日语。论温特博恩的才干，他本是个陆军元帅的料子。他在五局里指挥的行动总是规划得十分周密，虽然有点复杂，但每次都毫无差错地获得成功。他人虽谨慎，但不枯燥，除了想要通过这些行动获取情报之外，还想找点乐趣。我们的确也有不少的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伦敦东奔西跑，在政府的授意下，这里安装一个窃听器，那里闯入他人住宅搜索一番。不过白厅那些头戴礼帽、自命不凡的家伙们却装得对此一无所知。

我和温特博恩配合得非常默契，我们俩都坚信目前军情五局各级机关的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技术部门。我主要是出主意，他负责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他把我建议中不切实际的成分删掉，然后想方设法使这些建议化为现实。

我刚和他一起工作时，他经常对我讲起二科刚刚完成的一次代号为“党的样本”的行动。这个行动典型地体现了温特博恩的风格——周全与出奇的好运气自然融为一体。事情

是这样的。F处四科的一个特工控制人从英国共产党内部了解到，所有党员的秘密档案都藏在五月市区一个富裕的共产党员家里。A处二科接到命令，让他们潜入房中，将这些档案拍摄下来。

随后他们便对这所房子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电话、信件、一一都不放过。一天，运气真的来了。房子的女主人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打电话说她要外出一小时，钥匙放在门口的蹭鞋垫下面了。二科在莱康大楼监听到这个电话，三十分钟后他们就来到这所房子门前，用胶泥取了钥匙样。

没过多久，当房子的男女主人到湖区去度周末时，二科终于小心翼翼地开始行动了，温特博恩派了一个监视小组到湖区监视这两个人，以防他们提前返回。军情五局总部大楼里支起一排排脚踏式缩微照相机，随时准备开始工作。二科的一个行动小组进到房子里面，用钢丝捅开了文件柜上的锁。他们先用波罗德照相机拍下了每个抽屉里文件的位置，然后小心地取出文件，在上面编好号码，免得送回时搞乱。最后，他们把这些档案打成捆，用汽车运到莱康大楼，按顺序拍照。一个周末他们一共拍摄了55,000份档案，这对我们了解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

我参加的第一次对付共产党的行动是在五十年代末，我和温特博恩再次成功地在国王街英国共产党的总部里装了一个窃听器。共产党知道我们经常用各种技术手段监视这所房子，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变换一下召开重要会议的房间。共产党总部里一个内线告诉F处四科他的上级说，执行委员会现在是在楼房尽头的一个小会议室开会。这间房子没有窗户，据我们的内线说也没电话，所以我们的特别窃听器不起

作用。到了六十年代我们才弄清他们为什么没安电话的原因。安东尼·布伦特首先向苏联人泄露的机密就是我们的这种特别窃听装置。那时候我们对共产党总部大楼刚刚开始监视，苏联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了英国共产党，并指示他们拆除所有机要部门的电话。不过英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相信，只在讨论绝密问题时才采取这种防范措施。

我开车和温特博恩来到国王街，把车停在共产党总部大楼外面。我们坐在外面一边仔细察看着楼房的外墙，一边考虑着最佳对策。临街这面墙左下角有一个废弃多年的运煤通道，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我们让我们的内线查看一下这个通道通向哪里，他回来说正好通到那间会议室里。我向温特博恩建议我们最好造一个和滑道口上那个小门一模一样的假门，将它卡在原来的门上；两道门中间安一个无线电窃听器，把传音管插在原来那个小门的钥匙孔里。

休立即行动起来。他先设计了一个带有弹簧卡的小门，可怎么涂漆呢？毫无疑问，两个小门看起来一定要一模一样，但是原来门上的棕色油漆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已经剥落了许多。我们去加斯顿向房屋建筑研究站联系，并把休一天晚上佯装过路时用改锥刮下来的一点漆皮一同带去。他们对漆皮进行了化验，然后设法给我们找了一些和原来的油漆生产年代差不多的棕漆。我们用喷灯和污水对髹好漆的小门进行处理，效果很好，它看上去真像经过长期的风吹雨打一样。我在这个小门后面装好窃听器，将一根塑料传音管的一头接在窃听器上，另一头准备插在原来小门的钥匙孔里。我又用电池把空处塞满，这样六个月之内起码不用换电池了。我们把接收机藏在国王街尽头人行道上的一個电话箱里，通

过电话线再将窃听到的声音传回莱康大楼八楼。谢天谢地，这个电话箱刚好在我们窃听器的发射范围之内。

最危险的要说是在国王街的人行道上实地安装这个小门了。我们整个行动都要完全暴露在共产党总部大楼的视线之内，而他们对一些风吹草动往往又很敏感。休制定了一个典型的复杂方案。他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一个星期六晚上，那时考文特广场四周的街道上会有许多看完戏后还在街上闲逛的人群。他安排让所有能够抽出身来的A处二科和F处四科的官员和他们的妻子那天晚上从街的两头进入国王街，按规定时间在共产党总部大楼前会合。按照温特博恩的精心设计我们分为两班人马装作醉醺醺的样子来到国王街。我们在那座大楼外边的人行道上相遇，大声寒暄起来。温特博恩在人群背后迅速跪在地上，开始用手钻在滑道口的墙上钻孔。他一共钻了四个孔，用它们来卡住门上的弹簧卡。他一边钻一边还得用手绢接住掉下来的砖屑，不让它们掉在地上，以免被人察觉。没过多久，我们的吵闹声渐渐平息下来，但温特博恩却镇定自若。他耐心地打完孔后从怀里掏出我们伪造的小门，试着把它卡在原来的门上了。

这个代号为“领带夹”的行动相当成功，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军情五局几个月里一字不漏地窃听了英国共产党所有的重要会议。但是这个窃听器最终还是被发现了。共产党总部一个官员听收音机调台时正好拨到了我们窃听器的频率，收音机发出一种颤噪声，他立刻意识到附近一定有个窃听器。他们为了寻找这个窃听器把整个楼房翻了个底朝天，幸好温特博恩的妻子去了挪威探亲，休正好住在局里。他们刚一发现“领带夹”时他就察觉了，急忙跑去将小门拆下带回

来。那副得意的样子就好像带回一件战利品一样。

但是窃听英国共产党总部毕竟还是我们工作中的小小插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苏联及其盟国。我到五局后参加的第一个对付苏联的行动代号为“合唱队”，其实在我还没有来五局之前，这项行动就开始了。休·温特博恩计划窃听湾水路的苏联领事馆，等了好久之后，机会终于来了。苏领事馆隔壁的房子准备在迎接新主人到来之前装修一下，军情五局的人假作装修工人将这个工作承接下来。这次温特博恩使用了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希尔实验室里研制出的一种叫作“探针窃听器”的新型窃听装置。

这种“探针窃听器”体积大，灵敏度高，专门用在隔壁墙中。他们将“探针”放在与苏领事馆相隔的那道墙中，距离对面墙壁十八英寸。从那里再用一个零点二五英寸的钻头继续往里钻眼，每钻半英寸后停下来听一下对面的动静，直到离对面墙壁还剩下半英寸时再换上一个60号钻头把钻眼打通。60号钻头钻出的眼小如针尖，对面用肉眼很难发现。他们最后又在窃听器和对面墙壁之间接了一根光滑的高纯度有机玻璃传音管。这个窃听器将截获到的声音通过街上的电话线送回五局总部，经过放大，声音相当清楚。

可是六个月后温特博恩的“合唱队”突然变哑巴了。那时军情五局有个特工，时常为苏联人作些房屋修理等杂活。他叫纳特金，所以人人都叫他“松鼠”^①。纳特金告诉我们，隔壁的屋子重新粉刷过。尽管小孔可能是被灰浆堵上了，我们还是

^① 英语中如果将Nutkin（纳特金）一分为二的话，nut意为“坚果”，kin意为“家族”，故有“松鼠”称号。——译者

有些迷惑不解。在安装窃听器之前温特博恩让纳特金在对面仔细丈量了这堵墙，根据这些数据他打算将小孔打在离对面屋地十四英尺高处一道精美墙楣的一个石膏花瓣后面。即使是粉刷房屋也不可能刷得这么细，竟然刷到花瓣后面。不管怎么说，我和温特博恩还是打算把窃听器取出来检查一下。

筹划这次新的行动真让我们费尽了心机。那时那栋房子已经修缮完毕，成了一座办公大楼，来往的人很多，其中还有一些苏联人，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察看安全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夜间行动，而且不能弄出半点声响。要在14英尺高的地方钻眼，堵洞和髹灰没有脚手架不行，温特博恩便吩咐让人把房屋建筑研究站专为五局生产的装配式脚手架和速凝修堵材料分成小包运到这个办公楼，以免使高度戒备的苏联人起疑心。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贾格尔乘出租车到湾东路口。这时正是秋天，街上很黑，但是还有不少上下班的人群。我们疾步朝领事馆方向走去，贾格尔用他那闻名遐迩的“钥匙”打开了那幢楼的房门。我们拉开公文包，拿出工具和一个小型无线电接收机。设在领事馆对面的一个观察站严密监视领事馆大楼的动静，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所以一旦有情况出现我们就能立即停手。

军情五局安装的每个窃听器在A处行动记录上都有记载，这些记录不仅包括各窃听器的技术性能和安装过程，更主要的是还包括它们的确切位置。贾格尔安装脚手架时我一边仔细察看记录中的位置图，一边用三角测量的方法寻找着窃听器的位置。我们确定了窃听器的位置后就开始挖堵在洞里的石灰，这可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为了怕石灰块掉在

地上弄出响声我们得用手把它们一块块地往外抠，然后装进袋子里待离开时一起带走。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将密封在一层粘土后的“合唱队”挖了出来。我松开连线，将有机玻璃传音管也抽了出来。

我们的60号钻头有个很特殊的顶尖，只要轻轻往里钻，一个土星也掉不到对面屋里。我把钻头插进洞里，用手把稳，贾格尔小心翼翼地摇动起手钻的摇把。两分钟过后还是没能打通。借着射过来的汽车灯光，我们困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又开始往里钻。钻了半天还是钻不通。突然间，钻头松了一下，但马上又顶到什么东西上。我慢慢地把钻头抽了回来，贾格尔把它拆下，装进一个小盒里，准备送回总部仔细检查一下。我把传音管插进洞里听了听，听到对面屋里的挂钟咔嗒咔嗒的摆动声。显然小孔钻通了，而且按照原来的设想隐藏在石膏花瓣的后面。

我们马上又把窃听器送回洞里，接好连线，重新用石灰把洞堵了起来。作好这一切后，我们还得在这儿盘桓三个小时，等着石灰凝固后再刷灰浆，免得留下破绽。我们坐下来抽烟，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我们的接收机偶尔发出的沙沙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马路两边的冷战华尔滋仍在继续，伴随着我们的还有伦敦街头追踪苏联外交官员的汽车。领事馆里仍旧没有一点动静。

第二天我和温特博恩来到总部八楼，准备听一下“合唱队”的效果。接收机里传出的声音很闷，但还算清楚。不过屋里没人讲话，只有一台打字机孤零零的打字声。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一下钻头，钻头前端八分之三英寸长的地方沾满了石灰粉。这个苏联房屋修缮工不管是什么

人，看来真够细心的。

“粉刷房屋，胡弄鬼！”温特博恩一面乜斜着眼睛看着显微镜下的钻头一面说。“用抹刀根本就不可能把洞堵得这么深，准是他妈的用注射器干的！”

大约一个月后“松鼠”纳特金便到对面的屋里看了一下，整个屋子都变了样。那道墙外面又多了一道隔音墙，两道墙之间只有一个打字秘书。显然苏联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这种隔壁墙不保险。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探针”，只是在墙上发现了一个小眼，随手将它堵上了。

1955年7月我又参加了一次对付苏联的行动，这次是在加拿大。军情五局接到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请求，要我们为他们窃听渥太华苏联大使馆的行动提供技术援助。以前，座落在里多河畔苏联大使馆的三层大楼前不久在一次大火中烧毁，加拿大骑警队想趁大使馆重建之机在里面设置一些窃听器。由于缺乏最新技术，他们来找英国军事情报第五局帮忙。

到机场来迎接我的是骑警队反间谍处即B处处长特里·格恩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助手詹姆斯·贝内特，一个威尔士人。格恩齐是个瘦高的加拿大人，看起来虽然沉着镇定，办起事来却经常是风风火火的。他是在英国军情五局和六局里受的训，五十年代回到加拿大。他认为反间谍是一项细致的工作，穿警服的骑警队那群人作不了这样的事。于是他开始招募一些便衣特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独自组建了B处，并将它办成西方世界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战斗力很强的反间谍组织。许多后来使我们和美国人受益非浅的想法——例如将苏联外交官在整个西方的活动储存在计算机

里——最先都是由格恩齐提出的。但是他和骑警队中传统保守势力的斗争一刻也没停止过。那些人以为穿警服的军警生下来就比他们这些穿便服的老百姓高贵得多。其实为这个问题斗争不休的不只加拿大情报机关一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是一样。格恩齐认为应当学习英国的正确作法，将两者截然分开，因为刑事侦察和搜集情报根本是两码事。为了确保B处在骑警队中的独立平等地位，他到处争辩着，回击着，花费了一生的心血。因而保守势力一直都很恨他。后来将他发配到英国，作加拿大骑警队和英国军情五局、六局的联络员。最后他由于身体不好退休了。

但是1956年我第一次往加拿大帮助他们准备“蚯蚓”行动时，格恩齐仍在主管特工，第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他向我介绍了这次行动的准备情况。他们先动员这个工程的承建人加入了骑警队，然后把一些骑警队员派到工地上，装扮成工人。格恩齐找到1945年叛逃过来的原苏联使馆密码员艾戈·古森科，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格恩齐确信克格勃和戈尔乌（苏军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秘密房间及其密码室都在大楼的东北角。

在研究了所有的材料之后，我想这次我们不能用“森林神”式窃听器，因为我们的窃听器离安全地带太远，使用微波折射的方法不一定能成功。看来只好用连线窃听器了。连线窃听器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只要安装得巧妙，很不容易被发现。我想最好是将窃听器设置在屋子内侧的铝窗户框里。格恩齐从承建人那里弄来一个窗框，这是一种摩擦起落窗，窗框很轻，把窃听器安在这里面再好不过了。窗子关上时中间有一道通气缝，因此窃听器的声音效果一定会更好。另外，

金属框还可以有效地屏蔽窃听器的磁场，使扫描器很难发现它们。

工程开始之后我就想，把导线藏在什么地方才不会被定期来工地巡视的苏联安全人员发现。最后我们决定将一卷卷的电线藏在那些8英尺长的水泥地基座下面，挤在下面的沥青里。每天晚上停工之后伪装成施工人员的骑警队员就会来到工地，顺着通气层将下面的电线拔高一点。他们一共拉了8根线，每根线上都随便标上一个从1到20的数字，这样即使被苏联人发现了也能迷惑他们。这一手干得很漂亮，苏联人为了寻找其它的窃听器得将整个大楼拆得片瓦不剩，到那时他们才会明白我们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整个行动中最困难的工作要算给窃听器接线了。这时在骑警队一个队员的监督之下大楼东北角的窗户已按要求安装完毕，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电线也拉好了。但是最后的接线工作看来再也无法在暗中进行，因为我们只能在窗子外面接线。我们必须派一个技术员攀上四层楼在脚手架上作业。这项工作交给了格恩齐手下一个年青技术员，他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是个大块头，但他选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冒着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背着焊接工具爬上楼去，把8个线头一个个地接好、焊牢。

新使馆快要竣工时，骑警队的技术人员从大使馆隔壁他们的一个秘密房间下面挖了一个10英尺深、20码长、3英尺高的隧道，一直挖到使馆大楼的地基座下面。他们顺着隧道将地基座下的电线牵回到这边，然后用混凝土将隧道堵死。这8根导线一直拉到这边的一个汽车房里，接在藏在那里的录音放大机上，电源线接在从骑警队总部通到那里的电源输送

线上。我们试验了一下，每个窃听器都很成功。

苏联人刚一搬到这座新楼时我们的几个窃听器就传来了他们的声音。戈尔乌的军官们十分认真地商量着他们的家具怎么放。然而，两天之后他们又把家具搬走了。这时苏联大使飞回莫斯科，紧接着大使馆来了一队苏联建筑工人。从他们运进大使馆的材料来看，我们马上明白了他们是要在楼里为克格勃和戈尔乌重新建一个密室，也许还要用单独的电源。

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在骑警队总部通过窃听器又明显地听到了苏联清除窃听装置人员的工作声音。骑警队几天前曾注意到他们的到来，但那时他们还不敢肯定。这些人在东北角几间屋里的墙上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听听有没有空洞的声音。然后他们又用金属探测器把整个屋顶扫了一遍。他们在这几间屋里一连忙了二十天，好像知道我们在这里设置了窃听器似的。但是他们既没有发现电线，也没有找到窃听器。和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相比，这座大使馆的确小了一点，但是尽管地方小、人员多，而且他们也已经检查过东北角的这几间房间，这些屋子却基本上一直闲着，只用来处理一些日常琐事。八年之后，苏联的清除窃听装置人员又来到渥太华，直奔这几个房间，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就找到了那些导线和窃听器。使馆大楼里总共有四十二个房间，而他们却只检查了这六个装有窃听器的房间，这肯定不是巧合！

像上次“合唱队”行动一样，这次的“蚯蚓”行动使我也很烦恼。当然这种感觉一半是由于失望所致。我们的行动从技术上来看几乎是无可指责，但是几个月的辛苦却没换得半点情报。当然，和古森科一样，他们把窃听目标定在这几个房间的确像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押宝，姑且认定使馆秘密房间还在

原来的位置。但是根据楼内的供电系统来看，我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盲目的冒险。苏联人将密室改建在楼内其他地方避开我们的窃听器这件事本身并不奇怪，因为英国、美国、肯定还有苏联这时已经认识到，要想使大使馆的秘密活动室不遭窃听，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建在楼房的最里面，而且最好使用自己的电源。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苏联消除窃听装置人员在这几间屋里工作时那种满有信心的样子，好像知道里面设有埋伏似的。

没出一年，同样的事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得到许可要在蒙特利尔设立一个领事馆。他们在那儿买了一幢老房，准备先修缮一下再用。1957年1月我飞到蒙特利尔协助骑警队在这里安装窃听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这时已经知道领事馆里一个人是波兰情报局的间谍，并且已经查明他要住在哪个房间，所以我们打算把窃听器装在他的屋里。由于这幢房子的内部需要全部重新装修，我们不能再用连线窃听器，只能使用“森林神”谐振式窃听器。房子里新布置的电线都套在铁管里，所以我想如果把窃听器安装在电线管道旁边就很难被发现，这道理就和金属窗框能够掩蔽“蚯蚓”一样。没想到在窃听器装好的两个星期之后波兰人突然命令承建人将藏有我们窃听器的那堵墙推倒重砌。骑警队闻讯后立即行动，但只找回一只窃听器，另一只落在波兰人手中。以后骑警队通过波兰大使馆的内线得知是苏联人从中捣鬼，他们提醒波兰人领事馆里可能有窃听器。这帮家伙又抢在我们前头了。

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鼯鼠”行动也是一样。这段故事还得从1959年澳大利亚海外情报局（阿西

奥)局长查尔斯·斯普赖勋爵访问伦敦时说起。一天,我接到上面的一个电话,说斯普赖先生要见我。斯普赖当年一定很帅,鼓突眼,小胡子又浓又密。但是他的脸色血红,显然是终日操劳和嗜酒纵欲的结果。斯普赖在1949年阿里奥刚一成立时就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在这之前他是军事情报局局长。他和一伙被称为“墨尔本妖魔”的同事曾经竭力向上级建议成立一个像英国军情五局一样的正规安全情报机构。斯普赖是位铁腕人物,在阿里奥里统治了十九年,成为战后情报界一个颇有名望的人物。他对阿西奥一直统治得很严,直到最后和下面的接触越来越少时才被迫放手。

斯普赖很喜欢来伦敦作客。他以前在印度军队里当过兵,驻扎在开伯尔山口^①。共同的经历以及对于军人、绅士标准的相同看法使他在热情的英国情报圈子里有许多朋友。斯普赖虽然岁数已不小,但仍很有朝气,我们一见面他就向我讲明找我的用意。

他说他不久前才从加拿大回来,特里·格恩奇建议他来找我,商量一下阿西奥准备进行的一次窃听苏联大使馆的行动。他进一步解释道,由于他们的报界对堪培拉苏联大使馆密码员彼得罗夫夫妇的叛逃事件大加宣传,苏联和他们断绝了外交关系,把自己的使馆交瑞士使馆托管。最近苏联又提出同他们恢复外交关系,所以阿西奥决定在他们回来之前在他们的使馆里设置窃听器。我研究了各种情况之后建议斯普赖用我们的“森林神”窃听器,并给他们表演了使用方法。看来最好是把窃听器安在大使馆的木窗框里。我又把我的助手派

^① 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译者

去，指导他们具体安装，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为了以防万一，我又告诉他们在第一年里最好先别使用这些窃听器，以防苏联人在开头几个月对房屋进行微波监视。但是和“蚯蚓”一样，尽管他们的行动很成功，却连一点情报也没捞到。通过窃听器他们可以听到一个克格勃官员屋里的一切响动，甚至连他翻动文件和用钢笔唰唰写字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不过他就是一言不发。“鼯鼠”行动又失败了。

五十年代中来找军情五局请求帮助安装窃听器的单位多得使人应接不暇，结果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A处二科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有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些行动没完没了，一个接着一个。各种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流水般地在我的桌前穿过。哪个行动刚刚开始，哪个行动已经结束，往往一时很难说得清楚。搜集情报这项工作即使在最顺利时也是一件令人非常头痛的事。但是一个真正的情报官绝不会轻易放过一个问题，他会反复思索着那些疑点。“合唱团”、“蚯蚓”、“鼯鼠”虽然以后在我的脑海中已经让位给一些新的行动，但我还是时常想起这些问题。过了许多年之后，一些疑团才终于解开。

但是总的来说，五十年代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乐趣，A处里人们整天笑个不停。正像休·温特博恩常说的那样：“军情五局的生活实在妙不可言，不过你得不怕刺激！”我们有一次在匈牙利使馆隔壁的秘密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时就是这样。我上到楼顶架设天线时被一个邻居看到了，他立刻报警，说看到一个贼正准备偷东西。没过十分钟那个邻居就把警察领到了门口，他们一边敲门一边在外面大喊大叫。这时我们正在屋里工作，新式窃听装置、接收机和电线铺了一

地。温特博恩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慌忙之中他撬开地板，把价值连城的仪器一下推到下面。外面的门越敲越响，他们开始用肩膀撞门了。里面的响声显然使他们确信我们是在偷东西。后来在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我胆怯地开了门，对他们解释说我们是受房屋主人之托夜里来这里修理房屋的。我给了那个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让他查证一下，不过那是当地警察局特别行动处的电话。

更有趣的是我们对波特兰街波兰大使馆采取的一次类似行动。大使馆隔壁的房子那时暂时没人住，A处二科打算趁此机会进去设置一些窃听器。我和休·温特博恩率领一处的一个十二人行动小组摸了进去。我们的行动一定要轻手轻脚，因为我们知道对面墙旁边总是有人在，为了不使没铺地毯的地板上行走时弄出声响，我一再强调所有的人都必须脱掉鞋子。我们冒着严寒一直不停地干了四个小时，二楼的地板整个让我们给揭开了。我在托架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铺设电线时一根电线卡在一个托架的裂缝里了。因为手够不到，我就慢慢下到底下，一只脚踩在托架旁的一个钉子上。我站稳之后刚要伸手去接线，脚下的钉子突然弯了。我身子一滑，掉了下去。下面屋子的天花板咔嚓一下裂了一个十四英尺长的大口子，像是扔了一颗炸弹，整个房子震得轰然作响。待霹雳啪啦的声响和灰尘散去之后再看看吧，腰给紧紧地夹在缝里吊在空中。霎时间人们都给吓呆了。一时没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故。

“幸亏没穿鞋。”温特博恩不露声色地跟我打趣道，人们噗嗤一下都笑了。

谢天谢地没有吵醒邻居，他们可能睡得正熟，不然又要

叫警察了。莱斯利·贾格尔迅速修好了天花板，在天亮之前用他的速凝材料抹好墙皮，刷上石灰。

“好险呀，彼得，”他刷完最后一刷子时说道，“你要是正好掉在屋顶那个圆花盆上可就有我们好瞧的了！”

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毕竟很少发生。在我和休的指导下军情五局的技术工作可以说已经相当正规，和六局的同行们形成鲜明对照。五十年代的军情六局专会捅漏子，而且总是越捅越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们的一次训练演习。他们派一个人藏在六局的一所秘密公寓里，然后向一队新兵介绍了他的情况，要求他们找到他并且审问他。军情六局每逢这种活动时按照惯例要和五局打好招呼，免得出乱子。

一天下午，军情六局给A处二科打来电话，请求我们的援助。六局的那群新兵显然由于一时疏忽，多算了一层楼，跑到上面的单元里去了。他们用钢丝捅开门，立即把里面的那个人审讯起来。这个人自然要争辩说他们是搞错了，但心里又怕这是个什么阴谋。这些人突然想起六局课本里讲的“劝诱”，便以业余侦探特有的热情忙起来。待他们审讯完毕再看那个人吧，光着屁股像鸟一样乱唱个不停。实际上这个人是个珠宝大盗，最近刚弄到一笔浮财。他赶忙把剩下的钻石、戒指一类的小玩艺儿拿出来孝敬大家，显然还以为他们是哪个黑社会组织派来跟他算帐的一群不速之客呢。

军情六局的人打电话问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和这些珠宝，损坏的房屋怎么办。温特博恩听到之后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最后，这个家伙被驱逐到欧洲，限他两个小时内离境。莱斯利·贾格尔到那个单元里把损坏的地方也都修补好了。

1956年4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里加宁乘战列舰“奥宗尼基茨”号来英国访问，把船停在朴茨茅斯港^①。赫鲁晓夫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英苏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军情五局准备窃听克拉里奇酒店赫鲁晓夫下榻的房间。本来我们就用特别窃听装置一直对克拉里奇酒店的电话系统进行着监视，因为军情五局对许多在这里下榻的客人很感兴趣。但是我们知道在赫鲁晓夫到达之前苏联人一定会先派人到他的房间里检查一番，所以我们想这倒是让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希尔实验室里刚为我们制造的另一种特别窃听器初试身手的大好时机。因为这种新式窃听装置不再需要垫圈，扫描器对它根本不起作用。我们在近距离内将几兆周的高频微波作用到房间里的电话机上就可以窃听到房间里的声音。我们把微波发生器安置在克拉里奇酒店附近格洛斯维诺区的一个办公大楼里，试了一下，效果很好。在赫鲁晓夫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一直在监听他的房间，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一点有价值的情报。赫鲁晓夫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在旅馆里从不谈论任何重要事情。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当时在总部八楼上让翻译给我简单翻译赫鲁晓夫谈话的情景。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赫鲁晓夫的谈话，耐心地等待着，希望能够捡到一个金蛋。但他根本就没谈像斯大林最后的日子或克格勃亲信贝利亚^②的命运等事，而是对他的仆人就他的穿戴大发议论。他这个人非常爱好虚荣，常常站在镜子前面几个小时打扮自己，特别注

① 英格兰东南部一海军基地。——译者

② 贝利亚(Lavrenti Pavlovich Beria, 1899—1953)，苏联将军，警察领导人，斯大林死后遭清算处死。——译者

意头发的分缝。我当时想赫鲁晓夫和艾登^①倒是天生的一对儿，两个人都很轻率，唯一的乐趣就是在世界舞台上大出风头。

当军情五局在这边谨慎小心地窃听赫鲁晓夫的时候，军情六局却在那边粗心大意地打起了“奥宗尼基茨”号战列舰的主意。军情六局打算测量一下这艘战舰的螺旋桨，因为海军都不明白它为什么转得比海军情报处估计的速度快得多。这次行动由尼古拉斯·埃里奥特领导的六局伦敦情报站负责。埃里奥特的父亲以前是伊顿中学校长，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潜水组长——可怜的“大块头”克拉布。

实际上军情六局已经不是第一次和这艘主力舰打交道了。一年之前当这艘舰还停泊在苏联的一个港口时他们就想检查一下它的船身。在那次行动中他们动用了布置在斯多克斯湾的X式小型潜水艇，这种潜水艇里有个干燥舱，潜水员进进出出非常方便。而且由于它的体积很小，所以靠近岸边时很不容易被发现。当时一个潜水员想进到港里侦察一下，可是四周戒备太严，他们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在朴茨茅斯进行的第二次行动对军情六局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克拉布本来就不大适合这项工作，因为他身体太重，而且年龄也大了一些。他突然失踪了。后来人们在岸边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经过仔细辨认确定他就是克拉布。六局伦敦情报站技术员约翰·亨利在行动开始前曾向我通报了他们的行动，我立刻转告了卡明。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他们是否

^① 艾登 (Anthony Eden, 1897—1977)，英国政治家，1955—1957年
间任首相。——译者

能够成功。这个行动典型地体现了军情六局的冒险作风：计划不周，行动无力。当时我们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两天以后约翰·亨利惊惶失措地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克拉布失踪了。

“我曾告诉尼古拉斯别让‘大块头’去，他的心脏一直不太好。”他忍不住对我们说。

我们虽然不大相信他的说法，但也没有时间多想了。现在看来军情六局这个丑闻有可能宣扬出去，那可就要给他们难堪了。克拉布和他的助手在当地一个旅馆登记时用的都是真名。

“这事一旦闹出去会捅大漏子的，”卡明疾言厉色地说，“到时候我们都得跟着背黑锅！”

我们一起上了楼，匆匆来到迪克·怀特的办公室，要求立即见他。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脸上没有一点欢迎的笑容，平时的文雅也不见了，又露出以前作小学教师时养成的严肃神态。

“苏联人刚刚照会我们海军部，询问潜水员事件，他们只好装作不知。不过我看这件事很快就得露馅。”他简短地说。

他突然十分生气地问：“约翰，你们到底是怎么搞的，事情弄得这么不可收拾？”

他接着狠狠地批评了亨利一顿，亨利只是辩解说几个月来海军部一直在催他们，要他们尽快搞到“奥宗尼基茨”螺旋桨的材料。

“你们知道艾登的为人，”他愤愤地说，“一会儿说你可以这样作，一会儿又说不行。当时我们想这件事很冒险，但也

很有可能成功。”

怀特仍旧余气未消。他揉了揉太阳穴，手里摆弄起桌子上的文件。房子角落里的挂钟咔嚓咔嚓轻声响着，整个屋里为一种惊恐、沮丧的气氛笼罩着。

“当然，我们还要尽力帮助你。”迪克说，终于打破了这令人烦恼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就去见议员，看看能想什么办法把这事遮掩过去。另外，马尔科姆的A处二科现在随时听你指挥。”

约翰·亨利感激不尽地走出迪克的办公室。卡明给朴茨茅斯国家防务委员会的人打电话，要他们派人去那家旅馆销毁克拉布及其助手的登记卡。温特博恩和亨利立刻赶往朴茨茅斯，去销毁一切与该案有关的证据。他们的一切努力结果还是无济于事，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发表公开谈话，对发生潜水员这样的事件表示不满，艾登被搞得非常狼狈，不得不到下议院对此进行解释。

整个伦敦情报界就像是附近郡里的一个小村，高级军官彼此之间虽不一定都很熟，但都认得，至少可以在俱乐部里坐在一起喝杯酒，聊聊天。在克拉布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个小村里到处都在谈论着此事，等待着无法避免的处分。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事前知情人之一，我照亨利说的，尽量沉着点。

没过几天，约翰偷偷地告诉我：“地板上全是血，我们派爱德华·布里奇斯把整个房间捣了个稀巴烂。”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卡明来到我的办公室，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

“迪克要走了，”他轻轻地说，“他们要他去接管六局。”

我认为把迪克·怀特调到军情六局去作局长是英国战后情报史上一个重大错误。在他的领导下五局正朝着现代化方向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尽管在五十年代中期这一点还不太明显。他懂得改革的必要性，但对那些不妨碍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传统观念和作法也表示尊重，不去触动它们。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熟悉情报工作，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情报专家，而且领导五局的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熟悉他的下属，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对如何把军情五局办成一个强有力的反间谍机构很有远见。然而，正当他的工作刚刚起步时，那些喜怒无常的政客们一句话就要把他调走，去统领一个他完全不熟悉而又对他深怀敌意的新单位。所以以后他在六局再也没有像他在原来五局那样成绩斐然。

然而这个损失也不单是军情五局的损失。战后英国情报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各个部门的作用缺乏清醒的认识。帝国时代以后英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专门处理国内事务的情报机关，军情六局降到了次要地位，特别是在成立了政府通讯总部之后。但是把迪克调到六局无形中等于又提高了它的地位，妨碍了各情报部门之间力量的合理分配，使五局遭受了十年的冷落。如果他不走的话，军情五局一定能够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伤中很快恢复过来，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战。

欢送迪克的工作搞得匆匆忙忙，很不像样。大家很快凑了些钱，准备给他买点礼物。在五局餐厅里举行的欢送会上我们的心情都很烦乱，大家送给迪克一套古英国银茶具作为纪念。我那时和迪克还不很熟，但据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讲他当时拚命挣扎着不想接受这个任职，也许是意识到他毕生

为之奋斗的事业因此将前功尽弃吧。欢送会上大家都很激动，迪克讲话时几乎都带着哭声。他谈起了战前的那些日子，谈起了他在那时和我们中许多人结下的友情。他感谢卡明让他来到军情五局，然后又非常自豪地回顾起军情五局在战争年代立下的丰功伟绩。他最后祝大家万事如意，并宣布了新局长的人选。

“我今天下午见过首相，他让我放心，他以后一定不会忘记军情五局的。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他已任命我们的副局长罗杰·霍利斯为军情五局局长，这充分体现出他对我们五局的信任。我相信大家和我意见一致，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个子高高、有点驼背、身穿一身深色细条西服的霍利斯走上前去同迪克握手，军情五局美好的改革时代至此结束了。

第七章

罗杰·霍利斯在局里一直没有什么威信。他很严厉，不会鼓动人心，只知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摆官架子。我必须承认，我一直都不喜欢他，然而就是那些对他有好感的人也怀疑他是否能够肩负起这个重任。和卡明一样，霍利斯也是在战前和迪克·怀特结下深厚友情的。尽管迪克才华出众，但他总是喜欢结交一些能力比他低的人。也许是想有这些人作陪衬他的才能会显得更为突出，不过我总觉得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險。霍利斯和卡明相比的确技高一筹，特别是搞起官僚那一套来，但是我觉得即使迪克也会认为他不是个精明、有远见的人。

霍利斯认为军情五局始终应当是一个很小的安全组织，他的职责是收集档案、细致地审查政府人员和安全保卫，不应当跑去管什么反间谍一类的闲事。那些工作要想搞出个名堂需要花大力气，冒大风险，这就难免出乱子。我从没听霍利斯谈过他想让军情五局奉行什么样的方针策略，没见他考虑过军情五局怎样才能赶上情报战高速发展的步伐。他这个人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在他一生中他所顽固坚持的只有一个简单目标，那就是上则讨好白厅领导，下则逢迎五局官

员。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什么成绩，也千万不要出乱子。

霍利斯生长在萨默塞特，父亲原是汤姆顿的主教。他读完中学（克利夫顿中学）后先到中国各地走了走，三十年代末期来到军情五局。战争期间他是F处的处长助理，专门负责共产主义事务。后来西利托提拔他作了C处处长，负责各种各样的审查和安全保卫工作，例如文件保密和在所有政府机关里建立安全制度等。因为他在C处干过，所以他当了局长后对这些工作特别重视。

1953年迪克·怀特接任西利托作了局长后，他任命霍利斯为副局长。表面看来这个决定倒也很合适，迪克出谋划策，霍利斯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措施，而在这方面迪克却很不擅长。我到五局后霍利斯作为副局长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心满意足，从来没有什么奢望。升到这个职位已经是他作梦都没想到的事，所以他看上去十分满意，情愿一辈子作迪克的谋士和伙伴。这位唯唯诺诺的副局长唯一惹人注目的是他和女秘书之间长期不正常的关系。这位姑娘倒不像他那样安于现状，迪克突然离任后她便来到局长办公室，那股高兴劲儿可比罗杰·霍利斯强烈得多。我觉得霍利斯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弱点，所以一上台后便乱施淫威，企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不足。他这样作的结果只能很快打消了人们刚开始时对他抱有的殷切期望。

霍利斯上任时英国各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尽管军情五局和六局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第一次像两个伙伴一样在情报领域开展合作。和他们一起合作的还有新成立的政府通讯总部，它专管各种形式的通讯和信号情报。（详情请见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

《秘密机构》一书)但这种紧密积极的关系没过十年就几乎彻底解体了。军情六局变得十分仇视五局,因为他们认为五局对菲尔比一事的干预非常无礼。另外整个六局的人都认为艾登让迪克·怀特取代辛克莱作六局局长是对他们的一个莫大污辱。

和五局联系最少的当然还应说是政府通讯总部。在战争年代,军情五局在“双十字”行动中联系最紧的是它自己的通讯情报机构——无线电安全科。这个科截获和破译了许多德国情报部门的密码,从而使五局能够在德国间谍刚登陆时就顺利地将他们拿获。无线电安全科属于军情六局,但主要为五局工作。B处当时负责审查这些德国间谍,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便被派回去向德国人传递假情报,不愿与我们合作的就地正法。然而这种行动要取得进展,我们就需要了解敌人到底相信了多少我们的假情报。当时无线电安全科截获并破译了德国空军使用的密码——“谜码”,所以“双十字”委员会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的把戏对德国军事策略的影响。

当战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纷纷离去以后,军情五局好像失去了对保持这种通讯情报联系的兴趣。这场冷战刚开始时他们对无线电安全科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落到了军情六局的手里。但是对我们工作影响最大的还是政府通讯总部。出于嫉妒,它对我们封锁了他们的讯号和通讯情报,1955年我参加五局时我们之间的工作联系已减为每半年五局的一个官员只和他们的一个高级人员会晤一次。1956年2月我第一次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晤。这次会晤非常让人失望,双方似乎都没意识到正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政府通讯总部在目前这场冷战中在协助军情五局进行其主要的反间谍工作仍

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也没有认识到，随着军情五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五局也可以反过来在某些方面帮助政府通讯总部。我一开始就提了一连串的建议，其中之一是让他们帮助检查一下，看看苏联人是否在监听我们跟踪人员的通讯。但是通讯总部的代表比尔·柯林斯听到我这积极友好的建议后一下子便和我打起官腔来。

“这事我还得请示一下。”或者是：“我的确认为我们没有时间顾及这样的事。”

我对卡明抱怨了一通，可是他似乎对此也不感兴趣。

“那是他们的事，最好让他们看着办吧。”

军情五局负责与政府通讯总部联系的是弗雷迪·比思，他是D处一个精力充沛的间谍领导人，其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西班牙人，所以他对橄榄球喜爱得发狂，并且生就一副反复无常的拉丁性格。他能讲流利的德文，战时参加了“双十字”行动，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领导过双重间谍。比思与通讯总部的联系最初开始于他指挥的“暂停”行动。五十年代初通讯总部问军情五局能否帮助他们搞到伦敦外交人员使用的密码情报，比思随即开始了“暂停”行动。他命令D处发展的所有隐藏在使馆里的间谍人员尽量设法接近密码室。通讯总部希望比思的间谍能够窃得一些废旧的密码带，好让他们以此作为突破口。

但是尽管比思使尽了浑身解数，工作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使馆的密码室都被视为禁地，派间谍打入到里面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比思的“暂停”行动还是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他的一个隐藏在捷克使馆里的间谍弄到了密码室的钥匙。按照莱斯

利·贾格尔所说的他用胶泥取了保险柜的钥匙样。这是一种高级的查布锁，但是由于使用的是高质量的塑胶，贾格尔用测微计精确地量了每个钥匙齿的尺寸，终于配出一把钥匙。那个间谍用这把钥匙成功地打开了保险柜，复制了里面还没有用过的捷克外交人员的密码册。在以后半年的时间里国家通讯总部依靠这些密码册一直监听着捷克外交人员的通讯。但是后来捷克人突然变换了密码，那个暗探也被无缘无故地解雇了。

从那以后比思的“暂停”行动便毫无进展。我来五局后发现，我们除了人力之外，还可以用自己的技术设备协助通讯总部。但是正像比思自己也承认的那样，他不懂技术，听不大懂我的意思。看来要想使政府通讯总部悉心听取我的建议只有我亲自出马了。因为比思是唯一得到允许可以与通讯总部联系的人，所以一天晚上我请他出去喝酒时间问他，如果我亲自去一趟切尔特南政府通讯总部和他们当面谈谈这些事他是否介意。

“没问题，老兄，”弗雷迪高兴地说，“你只管去好了。无线电这玩艺我不大懂行，我对人的恶行倒是更在行一些。”

我首先约好去见以前海军里的一个老朋友弗雷迪·巴特勒，他现在是政府通讯总部一个高级管理人员。我对他说我觉得军情五局和政府通讯总部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

在巴特勒的安排下我越过比尔·柯林斯，去见两位密码破译专家休·亚历山大和休·德纳姆。

我告诉亚历山大和德纳姆我已经了解了“暂停”行动的详情，我觉得军情五局能够在更多方面帮助他们。我对他们讲了自1949年布伦德里特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在科技方面取得

的重大进展，特别是在研制新型窃听装置方面。我向他们建议也许我们应当借助于先进技术手段，而不是依赖几个特工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人工的方法只会屡遭失败。

“这倒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想出我们能肯定在哪些方面帮助你们，我们需要试验一下。”我继续说，“但是我确信，我们灵敏度很高的窃听器应该能探听到密码机的一些秘密。密码员每天早晨都要重新调整它们，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窃听器监听他们调整密码机时的声音。这有用吗？”

两个破译专家默默地听着我略带紧张的发言，显得非常好奇，显然他们这是第一次见到情报界里还有吃这碗饭的人——军情五局的科学家。

“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帮助，”亚历山大说，“不管怎么说，和你们相比我们还是小弟弟。我们甚至连自身的建设还没完成。”

他用手朝窗外指了指，远处一些建筑工人正在总部房屋后面建造一排尼森^①小屋。

他接着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麻烦是计算机能力太低，跟不上理论的要求。”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许多密码的规律，知道该怎样去破译它们，但就是因为缺少高效能的计算机，许多工作才开展不了。当然我们很快就会得到这种计算机，不过在这期间，外来的帮助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条捷径。”

我问亚历山大他们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他听到我

① 一种半圆形简易房子，由英美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使用。

这直截了当的发问犹豫了一下。

“嗯，当然，我们有许多目标，不断更新。都是联合情报委员会要求布置的那类事情。”

“当然。”我追问道：“不过要是让你选择一项眼前最重要的目标，你怎么说？”

亚历山大在座椅里挪动了一下身体，和德纳姆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想那算是对付埃及佬吧。”亚历山大终于说道：“外交部已经催了我们几个月，让我们搞到他们的密码。我们虽然搞到了一点，但只是偶尔才碰到的那么一点儿，而且都是过时货。”

1956年春天，由于纳赛尔^①采取了一些行动，英埃关系急剧紧张，没过几个月终于导致苏伊士危机^②。

“他们用什么密码机？”我问。

“哈格林。”德纳姆回答说，指的是瑞士AG保密器材公司生产的一种密码机。五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都很喜欢这种片子。

我让他们帮我在通讯总部里借了一台哈格林，把它装在汽车的行李箱里带回了伦敦。我在摄政公园军情五局一个秘密公寓里同莱斯利·贾格尔一起装好了这台密码机，并开始按照我的想法试验起来。这是一台带有键盘的密码

① 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埃及军事领袖，1954—1956年任埃及总理，1956—1978年任总统。——译者

② 1956年在中东历史上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引起的严重危机。英国最后终于让步。——译者

机，打好的密码带从一边送出。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机身上有七个小轮子，由于电压不同它们的转速也不同，打字时这些轮子自动转动，密码带上就会出现一組组任意组合的数字。每天早晨发报之前密码员都要重新调整这些轮子的速度。如果我们通过窃听器可以听到他们调整这些小轮子时的声音，我坚信政府通讯总部就能够确定所谓的“核心位置”。找到了核心位置也就等于找到了破译密码的突破口。亚历山大和德纳姆告诉我，如果我们可以侦听到三个或是四个轮子调整时的声音，他们就能找到这些密码的奥秘。我把一系列灵敏度很高的窃听器按照远近不同的距离放在这台哈格林的四周，还在它后面的墙面装了一台探针式窃听器。我又把每个窃听器依次连在一台示波器上，这样声音就变成了图像。莱斯利·贾格尔在示波器前摆好了一台摄影机，用来拍摄屏幕上的波纹图像。我打开哈格林上面的盖子，小心翼翼地开始调动机子上的轮子，调整前后都作了详细纪录。当我打字模拟发报时，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密码带上出现了一串串数字。我把结果送到切尔特南德纳姆处，问他行不行。

胶卷冲出来后我立刻发现，通过这些波形图我们完全能够找到调整哈格林密码机的一些线索。另外根据这些图形我们起码可以推断出三个轮子的调整情况。我决定再用“森林神”试试，尽管它灵敏度不是很高。我们听到了调整轮子时的声音，但声音失真得厉害，但是我还是派人将试验结果送到了德纳姆处。第二天德纳姆通过防窃听专线给我打来电话。

他说：“太妙了，彼得。”我听得出来他很激动，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失真，听起来简直有点发狂。

“谐振式窃听器效果最好。根据它的图像我们可以推断出两个，也许是三个轮子的速度。无线电窃听器稍差一些，但只要再多花点时间我们也许能搞出个结果。”

一阵静电干扰使电话断了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它？”他在那头高声地喊道。

“大臣同意后马上就可以。”我说。

第二天政府通讯总部派计划室的雷·弗劳利来伦敦找我。弗劳利此人很精明，非常务实。他这使亚历山大和德纳姆杰出的智慧与管理通讯总部这样庞杂的机构所需的实际工作能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一切活动都会和计算机直接联系在一起。到那时一切危险的非理性行为都将永远被消除。在阴霾密布的冷战年月里，一个人居然抱有这种幻想真有点孩子气，但我们后来成了很要好的同事，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我一直是个非理性主义者，解决问题时相信的是突发的灵感，靠的是直觉。

我、温特博恩和弗劳利坐在一起商量怎样对埃及使馆采取行动，我们选定的最佳方案相当简单。我通过邮局调查部查了一下档案，找到了埃及大使馆所有电话安装情况的一览表。看起来其中一台电话不是在密码室就是离它不远。所以我们决定就从这部电话下手，用特别窃听器侦听密码机的声音。

邮局故意将埃及使馆的电话系统搞乱，我们等待着他们给邮局打电话，请他们前去修理。我让邮局安排我和另一名五局官员一起去，他负责在电话听筒里安装窃听器，我则假扮成工程师，趁机看看能否在屋里顺手捡点废密码带。

第二天一早邮局的一行人员到圣保罗教堂前来接我，我

们坐着邮局的小面包车来到埃及大使馆。使馆门前戒备森严，警卫人员放我们进去后一直跟在后边。密码室在主楼的边上，里面传出哈格林噼噼啪啪的打字声。三个密码员正忙着发电传和外交电报。我仔细察看着四处有没有废密码带，但是这地方显得非常整洁。一个密码员走出屋来和跟着我们的一个警卫聊天，过了一会儿他回到屋里把机子关上。他出来后走到我身旁，用手对电话机比比划划了一番。他不会讲英语，但通过他的手势我明白了他是要我把电话机挪得离他的椅子近一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飞来的好运气，我一边拉线一边慢慢地用背挡住他，我们的技术员就在这时候把特别窃听器需要的一个小垫圈放到电话听筒里。我把电话机安置在这个埃及密码员的桌子上面，离他那台哈格林机不到两英尺。他拍了拍电话，咧着嘴冲我笑了起来。我也冲他笑了笑，不过我俩发笑的原因完全不一样。

从埃及使馆出来后我马上来到总部八楼，急切地想听一下窃听器的效果如何。刚开始时声音不很清楚，好像给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我又仔细地调了一下微调，接收机里终于传出哈格林清晰的打字声。军情五局给通讯总部接了一根专线，每天早晨当埃及大使馆的密码员调整密码机时，通讯总部H分部数一下拨动轮子声响的次数便能很快破译出密码。我们把这叫作“密码机前导”，而利用密码机破译密码的这种新技术被称之为“吞没”。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军情五局和通讯总部这个联合行动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危机期间都一直能够通过埃及使馆的密码电报来掌握他们的动向。埃及在国外主要使用了四种密码，由于我们对他们在国外的其它使馆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其余密码大部分也让我们侦破了。对于

军情五局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因为当时六局的情报工作正明显地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早在危机刚开始时，埃及情报部门按照纳赛尔的指示就一举破获了军情六局在埃及的情报网，逮捕了他们的特工人员。军情六局唯一的业绩就是那个拙劣的准备刺杀纳赛尔的计划。

对于霍利斯来说，这个胜利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上任时正值苏伊士危机达到顶点。这个成绩使他在当政关键的头几个月里就打响了惊人的第一炮。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来都觉得很滑稽，使他旗开得胜的竟然是我。

我们在埃及大使馆刚装好窃听器后就闹出一场虚惊，差点断送了整个行动。当苏伊士危机逐步加深时，苏联急于向埃及表白他们坚决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派了一个清除窃听装置小组来到伦敦，帮助埃及人检查他们的大使馆。苏联非常喜欢摆出这种友好的姿态，因为他们同时也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情报。这群苏联人刚一到来时我们设在埃及使馆对面的观察站就发现了他们，我被叫到八楼去监听他们在密码室里的行动。我听着他们走进密码室时心里怦怦直跳。他们先检查了保险闸盒，然后开始扫描墙壁和屋顶。他们用的仪器听起来很大，像是金属探测器。窃听器里传来咔嚓一声响，灾难临头了。一只苏联大手抓起了电话机，开始拧上面的盖子。突然一下没声了，我们紧张地屏住了呼吸。过了一会才又传来电话机的响动声，休·温特博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我们知道那时苏联人已经知道我们有特别窃听器，一旦发现，准会立即将它拆除，可是这次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既然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特别窃听装置，而且像在苏联大使馆里那样对它百倍提防，这次在埃及使馆里怎么可能没有发

现我们的窃听器呢？也许他们是怕打草惊蛇，好让我们继续使用这种窃听器。毕竟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密码将情报发到伦敦，再由专人送到埃及使馆，这样就会万无一失。但我相信其中还有别的原因。苏联人是想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对于苏伊士危机的态度，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在讲空话。然而要想使我们对于他们的态度深信不疑，最好的办法是让我们通过一个诸如密码电报一样的可靠渠道得到消息。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苏联干扰情报的复杂性。

苏伊士危机消除之后，我又缠住政府通讯总部，向他们提出了一些能够使我们进一步合作的建议。但是他们好像希望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到以前那种冷漠的状态。他们对“吞没”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欣然领受，却不愿反过来为军情五局作点什么。总而言之，他们倒是不反对军情五局为他们作事，只是这种帮助必须是单方面的。

“吞没”行动结束后不久，我来到加拿大，协助他们准备“蚯蚓”行动。在我即将回国之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队长特里·格恩齐请我帮他们研究一下一个新结束的十分奇怪的案子。我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使我相信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必须改变以前的想法。格恩齐把我领进他们的一间密室，里面的桌子上摆着三大本上面标着“拱顶石”的档案。“拱顶石”一案开始于1952年，一个化了名的苏联克格勃地下间谍来到加拿大，他打算到这里来混个假身份。他的最终目标实际上是美国，但是克格勃在这些地下间谍去美国之前经常要把他们先送到加拿大，让他们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为自己制造一个保险的“背景”或假身份。但是这个骑警队称为吉迪恩的地下间谍刚到加拿大不久就爱上了一个女

人。这是克格勃条规中所绝对不允许的，果真没过多久他就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怀疑。

最后莫斯科总部命令他准备移民去美国，他回答说目前情况太危险，千方百计说服他们让他留在加拿大。不过克格勃却委任他为加拿大地下间谍代表，负责领导整个加拿大的地下间谍。吉迪恩是个懒人，这项新的使命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艰巨了。他每天收报抄报要花很多时间，还得不不停地东奔西走，到下面各地去收集情报。慢慢地他有点力不从心了，上司因此把他大骂了一顿。最后他决定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的情人。和她商量过后，他决定来骑警队自首。

特里·格恩齐凭着自己的直觉感到这个案子非同一般，马上决定让吉迪恩充当他们的双重间谍，而没有接受他叛逃的请求。这样作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吉迪恩手下还有一名苏联地下间谍，正在搜集加拿大阿芙罗火箭工程方面的材料。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连续监视了吉迪恩一年，把他当成他们的试验品。西方世界对于苏联地下间谍的活动情况这时还几乎是一无所知。格恩齐详细记录了苏联克格勃同吉迪恩联系时使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如他们命他搜集情报的方法、他使用过的无人交接处等。最重要的是骑警队还监听了他所有的密码电报。

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工作进展得都很顺利，但1958年苏联突然要召回吉迪恩，向他详细布置新的任务。吉迪恩开始很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可是他一去就没再回来。骑警队一等就是几个月、几年，老是盼望他不会出事，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又过了些日子，骑警队截获了一个用吉迪恩使用的密码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地下间谍的代表已

经换人，新代表已经到了加拿大。骑警队搜索了几个月，结果一无所获，没能找到这个新来的代表。这个开头显得很有油水的案子把格恩齐拖得精疲力竭，最后只好让它不了了之了。他确信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但他们却插不上手，更不敢调查。他的助手贝内特确信吉迪恩的投诚是受克格勃指使的，整个案子是一个骗局。

我刚回到伦敦就向政府通讯总部提出，要求他们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他们听我讲话时倒很耐心，只是没有任何反应。军情五局和通讯总部一样，对我的想法也没有多大热心。尽管我最后说服了通讯总部再多调拨几台测位仪，但这也还是差得很远。我建议通讯总部应当不遗余力地查寻苏联大使馆里的接收机，正像以前我们的追踪车作过的那样。但他们说我的想法不实际，一口回绝了。就这样，我的建议再一次被浓重的官僚主义扼杀了。

到了1958年，一个新的案子彻底改变了军情五局和通讯总部之间的关系，使我上边所提的那个问题终于有了结果。这个案子也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后院起火的危机，并且引出一个谜，这个谜后来一直伴随着他。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里思考着一些安装窃听器计划，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他坐在会议桌一头的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些打开的档案。他绷着脸，脸色很难看，摆摆手让我坐在他的对面。

“我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个难题。”他一边说一边将一份档案递了过来。我迅速扫了一眼目录。这是一个名叫弗兰蒂塞克·蒂斯勒的间谍写的一些报告，他显然是华盛顿捷克使馆的一个密码员。蒂斯勒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联邦调查局

把他的一些有关英国的情报转给了军情五局。据蒂斯勒讲，他1967年夏天回捷克时恰巧碰到了一个老朋友普利比尔上校，他当时是捷克伦敦大使馆的武官，也是回来休假的。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时两人都喝多了一点，普利比尔告诉蒂斯勒他现在在英国领导着一个名叫林尼的重要间谍，林尼正在为皇家空军设计导弹工程中所需要的模拟器。五局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很快就找到了林尼。同蒂斯勒的报告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五局档案库提供的林尼个人的材料，他是苏塞克斯郡肖拉姆城迈尔斯航空发展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对我们导弹的工作原理和机械性能了如指掌。

“我看不出这事有什么难办的，先生。我们盯住他，下次在他和普利比尔接头时逮捕他不就行了吗？”

“难就难在这里。”霍利斯神情严肃地说，随手将附在档案里的一张纸递了过来。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一封信，是用他自己的斜体打字机打的。这封信透露了蒂斯勒提供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他说普利比尔还告诉他伦敦的军情五局里有一个苏联间谍。普利比尔说他在伦敦街上开着车向另一名重要间谍下达指示时发现这一情况的。当时他发现后面有一辆汽车在跟踪他们，他断定这是军情五局的一辆追踪车，想方设法把它甩掉了。因为害怕英国发现了他的间谍，他决定向苏联大使馆武官罗格夫上校求援。罗格夫说他们得花一两天时间查一下才能知道。后来罗格夫很有把握地告诉他，尽管军情五局的追踪车跟了他一会儿，最后还是放了他，因为他们以为他正在教一个同事学开车。罗格夫还说他应该注意到军情五局已经改变了跟踪方法，不是像以前那样外交人

员刚一出大门就跟上去，而是当他们到了泰晤士河上的各个大桥时才开始跟踪，使他们更不容易进行反监视。

我读到这信时马上意识到普利比尔说的是真话。主要是由于我的百般倡导，军情五局终于改变了追踪方法，这也是我们现代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现在正在试用这种方法，收效很大。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后卫”行动，没想到情况竟然这么严重，难怪胡佛坚持要让他的全权代表阿尔·贝尔蒙特亲手将这封信交给霍利斯。贝尔蒙特拒绝到莱康大楼来见霍利斯，他们的会面最后安排在军情五局的一个秘密公寓里。贝尔蒙特把这封信交给霍利斯之后立刻用化名直接飞回华盛顿。

霍利斯说：“彼得，你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如果我们逮捕了林尼，蒂斯勒就会暴露，而联邦调查局希望他隐藏得时间越长越好。如果我们自己调查，就会惊动我们内部的间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得把这只鼯鼠挖出来。”

霍利斯告诉我，三个月以来马尔科姆·卡明和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考特尼·扬一直在跟踪人员和他们的后勤部门中进行广泛调查，因为他们觉得漏洞一定会出在那里，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休·温特博恩建议卡明让霍利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你有什么办法吗，彼得？”霍利斯问。

“先生，非吊死切尔特南那群没用的家伙才行！”我说。

霍利斯说：“对不起，我不大明白……”

我向霍利斯解释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苏联人很可能通过截取和分析我们跟踪人员的通讯联络来获取情报。

“我和我父亲1940年在苏塞克斯草原上干过和这差不多

的事。我们通过监听敌人的通讯来计划英国舰队英吉利海峡中的航线。我相信罗格夫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情报。这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难的事，先生。只要用测向仪找一下我们的信号，再查一下他们的人的去向就足够了。可以肯定，我们跟踪他们时他们基本上都知道。”

我告诉他我一再催促通讯总部详细侦察一下，看看苏联大使馆里有没有监听我们通讯的接收机。

“恐怕他们从来没认识到这个问题多么紧迫，先生。”

霍利斯哼了一声。

“你自己能干吗，彼得？”

“我想能行，我们只需要搜寻一下接收机的声波就行。”

霍利斯开始收拾文件，把这些材料摆在一起。

“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案，”他说，“随时和我联系好吗？”

他神态严肃地看着我。

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刻给考特尼·扬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把他收集的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在伦敦买的或是从国外带来的各种电子仪器的材料给我送来。看过这些材料之后，我对苏联使馆接收机的功能和型号有了一个十分清楚的了解。我算出他们本机振荡器发射的声波半径大约是两百码，达不到我们固定观察站的位置。不过A处近来正在试制一种塑料外壳的小面包车，电磁波能够从中顺利穿过。我催促温特博恩尽快结束这项工作。两个星期之后汽车完工，我们在里面装上电池和两台接收机——一台用来寻找苏联接收机的声波；另一台用来查证苏联接收机和我们跟踪人员通讯的联系。

1958年8月，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助手托尼·塞尔驾驶着这辆汽车开始了第一次侦察。我们事先已经

安排好，装作为苏联大使馆旁边一个单位运送东西，在肯辛顿园苏联大使馆门前穿来穿去。我和托尼坐在车里，中指钩住食指祈求着能交好运^①。我们头上带着耳机，两眼死死地盯住放大器上的刻度表，只怕放过表针一丝一毫的变化。我们走了两趟，什么也没发现，只听到静电引起的嗡嗡声。我们又驱车来到湾水路的苏联领事馆，把车从他们一栋栋的楼边上开过。当我们接近五号楼时刻度表上的指针轻轻摆动起来。我立刻调了一下接收机，它突然发出嘀嘀的声音，这说明我们收到了苏联接收机的声波。我们在这座楼房门口放慢了车速，刻度表上的指针立刻大幅度地摆动起来。在我们朝着大理石拱门街渐渐远去的时候，指针的摆幅也越变越小了。可以肯定地说苏联领事馆里有一台正在工作的接收机，不过它是不是冲着我们跟踪人员的报话机来的呢？

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又在不同时间来这里走了几趟，想看看这台接收机究竟在什么时候工作，和我们跟踪人员的通讯有没有关系。看起来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笨拙而且非常耗费时间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运气很好。一次我们在苏联领事馆前正巧碰到一辆正在用报话机向总部汇报的追踪车，从反方向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车里的接收机突然尖叫起来。

我问托尼：“这是怎么回事？”

他抬起头，脸上一副迷惑不解的神色。然而我们俩忽然都明白了，那部追踪车终于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因为追踪车报话时离领事馆的距离太近，使正在监听它的苏联接收机的输入功率超过负荷，刚才我们听到的尖叫就是接收机超载频

^① 西方习俗，将中指钩在食指上以求得好运气。

率失真时发出的噪声。换句话说，这证明了苏领事馆的接收机在监听我们跟踪人员的通讯。

这个代号为“筏夫”的发现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仅确切地证实了我们的猜疑，而且还能用这种方法找一下苏联使馆还有没有其它接收机，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被他们窃听。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我们只需在苏联使馆四周检查一下本位振荡器的反射波就行了。我在阅读“拱顶石”材料时就开始酝酿的计划今天终于得到实现，有了“筏夫”我们还可以通过苏联使馆的监听频率发现莫斯科发给地下间谍的信号，很有可能使我在不久的将来彻底解开苏联地下间谍通讯这个谜。

我们证实了跟踪人员的通讯是苏联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付林尼那个导弹间谍。很明显，我们在对林尼进行调查时不能让跟踪人员的报话机暴露我们的行动意图，但是又不可能不用报话机，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大幅度地改变参加行动的报话机的频率。我来到国防部，问他们能不能让我们借用一下部队的通讯频率。部队的频率和我们跟踪人员的频率相差七十兆周，行动时我们的信号在附近波段那些部队信号的掩蔽下很难被发现。不过要改变频率首先得更换报话机的晶振体。每个报话机里都有一个晶振体，用它来控制收发话的频率。因为害怕通过军情五局来办这事不保险，我私下找到过去的一个老同事，马可尼公司研究部主任R.J.肯普，问他能不能为我们在他大巴多的实验室里赶制这种晶振体。为了保险起见，我给了他一个样品，并反复强调这个新频率除了他和他的助手之外要对所有人保密。为了进一步防范，我们商定在新晶振体上标上一个假频率，使实际频率和标出的频率相差甚远。三个星期之后

肯普就生产出十二部报话机所需的晶振体。晶振体的更换工作还是交给了五局检修跟踪人员报话机的技术员，以免引起怀疑。

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情鸟”，关于它的内情我们对军情五局上下一律保密，只有我和温特博恩知道报话机的真实频率。新报话机的试用都在离苏联大使馆很远的地方进行，所以他们的接收机收不到我们的信号。我们用“筏夫”一直在监视着苏联领事馆里的那台接收机，这样在对付林尼的行动中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观察苏联人的反应。D处经过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后了解到，林尼和他的上司普利比尔通常是在布赖顿附近的南丘陵草原接头。我通知了警察局特别行动处，让他们在林尼和普利比尔下次接头传递情报时将他们抓获。

我们手持新报话机的跟踪人员尾随着林尼来到接头地点，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可普利比尔却一直没有露面，他只得回家。普利比尔这时呆在伦敦一直没动。后来我们还是传讯了林尼，没想到他立刻就招供了，他被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

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还算成功，但有一点使我、温特博恩和D处负责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迷惑不解。为什么普利比尔没有来？当然这也许有很多原因，但他以前从没失误过一次。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准备逮捕他，那这情报肯定不是通过我们的报话机得到的，一定有人告密。

我和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考特尼·扬详细讨论了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我们内部有苏联间谍，我们猜他不是跟踪人员当中就是在他们的后勤人员当中，所以，用我们的行话讲，我们准备来一个“领餐”行动。换

句话说，我们准备抛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作为诱饵，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两条腿的鼯鼠，他一定会把这个情报转交给苏联人。

考特尼·扬当时正操纵着一个双重间谍，为我们工作的间谍代号为“莫罗”，和苏联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卢拉科夫直接联系。我们的方案很简单，我们把“莫罗”告诉给跟踪人员，假称他是一个苏联间谍。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已经通知了警察局特别行动处，第二天当“莫罗”在汉普斯特德向卢拉科夫转交一些秘密文件时逮捕他。我们要跟踪人员密切注视“莫罗”和卢拉科夫两人的行动。这样一来如果跟踪人员中有叛徒，他一定会去通知苏联人，那么他们要么取消这次接头，要么就会想办法通知“莫罗”。

然而事实是卢拉科夫按时前来接头，在离汉普斯特德荒原的一条僻静的街上钻进了“莫罗”的汽车，迅速和他交换了一包文件。两个人立刻被逮捕了，卢拉科夫在亮出了他的外交官证明后被释放了，不久就被驱逐出境，对“莫罗”的起诉后来悄悄撤销了。

乍看起来卢拉科夫—“莫罗”一案似乎证明我们中间根本就没有苏联间谍，但是从以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前后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前我们监视卢拉科夫时发现，他在接头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前几次他在与“莫罗”会面时总要花上几个小时在伦敦兜圈子，一会儿坐出租汽车，一会儿坐公共汽车，一会儿又钻进地铁和商场，最后才去见“莫罗”。但这一次却不同，他从办公室出来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径直来到接头地点。他们交接文件时竟然连汽车的前灯都没关。对于任何一个熟知苏联情报机关的人来说这些都是

无法解释的，和他们惯常的作法大相径庭。

1958年底，我就蒂斯勒所说的军情五局渗透案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交给了霍利斯。在报告中我逐条分析了蒂斯勒从他那饶舌的朋友普利比尔上校那里得来的情报，向霍利斯阐明我对苏联人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看法。

我在报告中介绍了“筏夫”的性能、原理。通过它所观测到的情况，我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关于军情五局的大部分情报都是我们从跟踪人员的通讯中获得的，而且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用这种方法截取我们的情报。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详细分析了普利比尔所说的“教同事开车”这一情况，而且“后卫”行动的泄密肯定也和这有关，尽管我们的通讯专家们十分怀疑只是从我们的通讯中苏联人是否就能那么迅速地推断出我们要从泰晤士桥开始跟踪他们。但是对普利比尔为什么没有去见林尼以及卢拉科夫——“莫罗”等一系列情况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总的来说，苏联人的情报是通过监听我们的通讯得到的，在我们内部可能没有两条腿的鼯鼠，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在我把报告交给霍利斯的一两天之后，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埋头审阅一份档案，用自来水笔在上面批划着。我进来时他头也不抬，继续作着自己的事情。我站在那儿像是个作错了事等待挨批的小学生。这间屋子自从迪克走后变化不大，只是墙上又多了一张历任局长威严的肖像。霍利斯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还有三部电话：一部通到内阁办公室；一部通到国防部；一部通到军情六局。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够反映他性格的东西了。

“谢谢你的报告，彼得。”霍利斯头也不抬地说。他的声

音与这一年前些时候在他交给我蒂斯勒的档案时截然不同了。显然危机已经过去，他又开始稳坐局长宝座了。他继续写着。

“我已经给胡佛写了信，向他通报了蒂斯勒所说的军情五局间谍案的调查结果。”他继续说，“不过我想最好你还是亲自去一趟，给他们的技术人员讲讲这个案子的背景，讲讲你的‘筏夫’等等。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多交些朋友。”

他突然抬起头来向我笑了笑。

“我真高兴这次我们走在他们前边了，你干得真漂亮。”

他又低下头去看他的档案，也就是说这次简短的会见到此为止。我转身准备离去。

“喂，还有，彼得……，”我走到门口时他叫住我，“只谈些技术方面的发现好吗？我想我们不应该让胡佛觉得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一定，先生，我懂得您的意思。”

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真正用意，这是他打出的第一张牌。

第八章

国会大厦好像一幅巨大的壁画，由粉红色的花朵、蓝色的天空和白色大理石拼成。上面是一个金光闪烁的圆顶。我总是喜欢去华盛顿，尤其是在春天。伦敦死气沉沉。军事情报第五局里等级繁多，机构臃肿，每件小事都得精打细算。像战后到秘密情报机构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我亦感到美国是西方情报机构的一颗巨大希望之星。对此优势我深感欣慰。

可悲的是，五十年代末英美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低潮。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军事情报第六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协作关系实际上完全破裂。他们发现彼此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多，不仅在中东问题上，而且在远东问题和非洲问题上也是如此。许多军情六局的老前辈难以接受的是，战争时期他们对英美情报机构的支配关系慢慢降到了一个小兄弟的地位。

军情第五局同中央情报局关系的恶化有着许多原因。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新的机构，正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次显示出它的实力。其主要目的是搜集情报。尽管它不会撇开军情五局在伦敦进行活动，但是霍利斯和迪克·怀特都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他们是持一种轻视态度的。

霍利斯上任局长后，竭力改善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素

有“包天胆”之称的威廉·斯蒂芬森是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头面人物，该处当时在纽约成立的时候遭到了胡佛的反对；胡佛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是一名著名的反英人物。英国的该机构设在美国，其主要任务是对付德国。但是胡佛竭力反对由外国人控制的任何机构在美国的领土上搜集情报。数年来他一直拒绝与斯蒂芬森的人合作。伯吉斯—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了他的偏见。有段时间军事情报第六局的官员甚至不能进联邦调查局的房子。联邦调查局对军情五局严格封锁情报。

1956年霍利斯去拜访了胡佛，试图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劝胡佛把军情五局再纳入他们的行动行列。出人意料的是霍利斯与胡佛的关系极为融洽。他们对各自帝国的兴亡都非常关注。霍利斯性格软弱，面对胡佛的横蛮无理表现出他的谦诚和温顺。胡佛同许多美国人一样有一种谄上傲下的特点。这名英国的高级情报官员见到胡佛时脱帽致敬，这极大地满足了胡佛的自傲。

我成为一个重要的和平媒介。霍利斯宣布我为军情五局的第一科学家，以此作为他实现该机构现代化，进行反苏间谍战的保证。在霍利斯的拜访后，胡佛邀请我去联邦调查局总部参观一下他们的技术设备，我对此行很感兴趣。自从我进情报五局的第一天，我就深信与美国人恢复关系是保证我们长期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并且在技术方面我们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但是我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大英帝国的偏见在莱康大楼还是占上风。以卡明为例，虽然他负责军情五局技术部的工作，但从未访问过美国，他认为毫无必要。联邦调查局有相当规模技术基础，这是我的第一印象，规模之

大是军情五局难以想像的。但就他们的先进设备来说，我总觉得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他们几乎全部依靠市场上所出售的设备，而忽视了发展他们自己的专业设备。尽管他们有一个连接美国各地联邦调查局各联络站的微波通讯网，但他们的无线电都是用于警车和出租车上标准的莫特罗拉设备。联邦调查局的技术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他们在反谍工作中应用了指纹档案进行调查。而在军事情报第五局的档案库里却没有指纹的记录。我觉得这是联邦调查局特别警察身份赋予它的一大优势。

迪克·米伦是负责联邦调查局技术工作的官员。他称不上是一个地道的科学家，他的专业原是法律，因此他对这种工作并不在行。但是他在我面前却显示了一番。他带我到了联邦调查局总部地下室的射击场向我显示了他的射击技术。米伦自豪地对我讲，甚至“老人”（胡佛）也常到此地练习射击。后来我又到了座落在马里兰海滨的联邦调查局训练场。这里有一名美国印地安教练在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特技射击方法。他显示了他的技巧。面对镜子打身后的靶子。隔着肩膀打漂浮在泉水上的乒乓球。真是些粗俗的美国人。三十年代的美利坚联邦调查局那种无视法律的恶习至今也没有多大改观。我怀疑这对现代化的反谍工作究竟有多大意义。

陪同我的是驻华盛顿军情五局的联络官哈里·斯通。哈里和蔼可亲，遇到他非常荣幸。他曾是一名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他同霍利斯都酷爱高尔夫球，也是一名出色的障碍赛跑选手。他的人缘很好，这是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一种社会工作来做。但是在当今卫星计算机情报时代，

他的性格和智力就不太合适了。这种先进的情报时代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华盛顿诞生。

哈里不喜欢见到胡佛。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总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

“听我的，彼得，我的老伙计，让他自己讲，不要打断他。要记住，当他讲完时要说‘多谢，胡佛先生’……我订了一桌很像样的午餐。”

我们穿过庄严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前的圆顶走廊。来迎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情报的阿尔·贝尔蒙特和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

几乎整整一天我一直与这两位官员谈论蒂斯勒事件和“筏夫”行动的技术性能，后来胡佛又会晤了我们。我们走进了这迷宫似的走廊，在一长列年轻联邦调查局官员面前走过，他们衣着整洁、合体，短发，那样子看上去有些发呆，面无表情。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总使我想起诊疗所。到处都是洁白的消过毒的墙瓦。清洁工在不停地粉刷、清洗。这里清洁的环境与联邦调查局官员那不清洁的脑筋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胡佛的房间是这四间联接着的办公室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进了办公室。胡佛站在办公桌后，身着显眼的绿制服。他看上去比照片上瘦高一点，布满皱纹的两腮有点下垂。他稳重而无表情地跟我握了握手。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解释我来访的目的。但胡佛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看了你们A处一科的报告。我想听听赖特先生对此报告的看法。”

胡佛那双乌黑的眼睛在盯着我，我开始概括介绍“筏夫”

行动的发展情况。他立刻又打断了我。

“我想你们局对我们捷克特工所提供的情报该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打断了我。

“赖特先生，你们的安全机构在我们华盛顿享有许多方便。”

他的话里有点威胁的味道。

“你们在此所享有的方便如果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麻烦的话，那我就必须向我们的总统提出我的建议。我个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鉴于近来你们英国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麻烦。因此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非常明白，先生。”

哈里·斯通双眼盯着自己的鞋帮。阿尔·贝尔戴特和比尔·沙利文躲在胡佛办公桌一边，一半人藏在阴影里。我只好孤军奋战对付胡佛。

“我想你已在我的报告里了解……”

“赖特先生，我们的官员对你的报告已做了仔细研究；我对你们所吸取的教训很感兴趣。”

没等我来得及回答，胡佛就开始大发雷霆，指责西方情报机构面对共产党进攻麻木不仁。话题不可避免地又转到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胡佛说这两人名字的时候，话语里充满了恶根。

“赖特先生，在我们机构里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的官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我们须吸取教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

哈里·斯通胆怯地答道：“当然了，胡佛先生。”

胡佛的眼睛突然又盯住了我。

“要提高警惕，赖特先生，提高警惕。我们总部总是高度戒备的。”

他突然站了起来，示意我们的会见到此结束。

在与胡佛不愉快的会见的第二天，我见到了中央情报局负责反谍工作的詹姆斯·安格尔顿，与他共进了午餐。在我1957年第一次来华盛顿以前我们曾见过面。他的精力是那么充沛，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他的思路敏锐，不仅很乐意迎接这场冷战，并且对此战的胜利信心十足。这种错综复杂的反谍工作极大地吸引着他。他老谋深算，我很欣赏他。他给我好多暗示，鼓励我与他一起合作。

我乘出租车到了乔治敦^①。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华盛顿政府官员住在这里——优雅的红砖瓦房，树木成行的街道，书店、咖啡店。当我到达哈维酒店时，安格尔顿已经到了。他坐在桌前，身穿灰制服，看上去有点削瘦憔悴的样子。他一手抱着一大瓶杰克·丹尼尔啤酒，一手夹着一支香烟。

我坐下来后，他有气无力的问道：“胡佛怎么样啊？”

我回答说：“吉姆，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啊。”

他死尸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与他那葬服般的制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试探我。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事件和他的情报一概不知。我们早已商定好向联邦调查局

^①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内的住宅区。——译者

讲解“筏夫”技术，但对蒂斯勒一事必须守口如瓶。

“谈谈日常工作，跟他们联络联络感情。你知道这在伦敦正是个时髦的事。”

他回答说：“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在我印象中你一直在努力与他改善关系。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最讨厌你们英国人。”

我有点生气，尽管我很清楚这是他的意图。

“是啊，他们的态度没有多少改变。”

安格尔顿倒了一杯酒，然后说：“这十年来，你们在华盛顿的信誉彻底完蛋了。”

他接着说：“像胡佛这样的人只会把眼睛盯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盯住军情五局现在的悲惨现状，然后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叫来了招待员，我们点了菜。

最后我对他说：“吉姆，一切都是在变化着的。十年前他们不会让我作科学官，可我现在就呆在这个机构里，他们还在吸收新成员。”

他冷嘲热讽地说：“我的中学是在英国读的，我也了解你们那些人的水平。”

“没有必要揪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不放。那都已经过去，这世界太小了，我们又在一起工作啦。”

他哼哼唧唧地说：“要想得到胡佛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他也没说到自己。

这顿午餐吃了很长时间。安格尔顿一点不让步，每喝一杯酒都要问好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苏伊士事件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甚至到1959年仍然如此。可安格尔顿想知道所有的内

情。他甚至问我是否能在军情五局搞到美国西部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的档案。由于哈默与苏联频繁的业务来往，他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机构的注意。

接近五点钟，安格尔顿站起来朝他的汽车走去。这是一辆很漂亮的“奔驰”牌轿车。尽管他外表看上去一副寒酸的样子，可我后来才得知由于他家在国家现金注册公司有股份，他养成了许多奢侈的生活习惯。安格尔顿发现他把汽车钥匙锁在车里了，十分焦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钢丝，用莱斯利·贾格尔方法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赖特，不错。”安格尔顿高兴地说。他知道我此刻很得意。

我对他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如果你不答应在华盛顿帮我的忙，那我就再找别人了。”

“让我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他钻进已经启动的汽车，头也不回，飞驰而去。

尽管华盛顿对英国情报机构极为蔑视，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末开始，英国情报机构在技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军情五局花了很大本钱来扩大新技术——“筏夫”及“吞没”行动。

尽管“吞没”行动计划使我们基本上已经掌握了各种型号的哈格林密码机，但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用这种机器。库珀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试图寻找途径将“吞没”原理应用到侦破较为先进的机器上去，在这方面政府通讯总部缺乏计算机侦破的能力。我的意见很简单，我们一定要广泛实验，尽管一些实验从理论上讲也许没有什么效果。

我说：“我们必须科学地考虑这些问题。正因为我们对这些新技术毫无把握，所以需要实验。虽然可能会走些弯路，

不过这仍可使我们学到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任何一种密码机，不论其结构多么复杂，都要先将清晰的文字变成一串串任意的数码。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就是将电文输入到连接着一台密码机的电传打字发报机中去。输入的密码电文将从另一台密码机里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就在于对该系统完全屏蔽。如果这台密码机没有经过电磁屏蔽，发报时打字员读电文的声音就有可能随着密码一起输出来。如使用适当的扩音器就可将这明码电文分离出来，获悉其内容。

当然我们很难了解哪些国家的密码机房是完全屏蔽的，哪些不是。我设想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花一两年的时间即可取得成效。我们深知苏联的密码是进行了严格处理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苏联人身上花费太大力气，现在的问题是对准主要的目标，这样我们就会有成功的机会。

我们用“吞没”计划对付法国人的密码比对其他国家更为合适。外交部催促军情六局和政府通讯总部，急于想得知法国阻止英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用意何在。政府通讯总部已经在伦敦研究了法国的密码体系。他们使用两种密码。一种是低级的。它是沿电传系统发送法国外交部。另一种高级密码是为大使馆的通讯所用，为了更加安全。这套密码是由独立的密码机使用。休·亚历山大认为高级密码是不可破译的，而用我所设计的方法或许可以对付得了那种低级的密码。库珀同意后我们的“栅栏”行动开始实施。军情五局和政府通讯总部两家的协作行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先对法国大使馆的布局进行技术侦察，尤其是密码室的位置。我设法搞到当地政府所提供的关于法国大使馆的建筑图纸。

我们要求邮电局故意给法国大使馆的电话设制障碍，我们借故进法国使馆对其密码室进行现场考查。法国使馆的警卫人员不像埃及人那样，他们密切注意着我们的每个举动，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我们需要的情报。

第一天早上我们接到了低级密码，与帕尔默街线路上所接到的相同。我们把窃听器接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窃听到的法国密码咔哒咔哒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很清楚，许多信号在我们的窃听线上传来。我坐在那里用铅笔从密码信息上标出明码，然后即可读出。

我开始翻译，同时在电传打字发报机上又发现另一种信号的痕迹。为了证实我没有搞错，我立即又检查了声纳器，并叫来了政府通讯总部的电器工程师。

这位政府通讯总部官员自言自语地说道：“上帝！我们又找到了一种高级信号。我们一定是隔着那层塑料墙接收到的。”

我立刻与帕尔默大街联系，请他们将所监听到的高级信号传送过来，以便我们加以比较。政府通讯总部的电器工程师将扩大机打开，扩大机的信号很强，十分清楚地印在纸带上。我们用帕尔默大街所提供的信号作为线索，标出了它的密码电文。不到十分钟，我就把驻英国的法国大使给戴高乐私人办公室的电报译了出来。

从1960年至1968年，在这接近三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局和政府通讯总部一直监听到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高级密码。在我们企图挤进共同市场的那段时间里，法国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中。外交部有效地利用了我们所提供的情报。一字不差的戴高乐的电文副本按期送存到外交部秘书的

红色文件夹里。

实际上，“栅栏”行动以文字的形式说明了情报的局限性。戴高乐决心拒绝我们加入共同市场的请求，我们不论得到多少高级密码信息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但是我们为美国详细提供了法国考虑建立自己独立的核打击力量的方案，从而加深了美国佬对戴高乐的不信任。

然而“栅栏”行动在外交部内部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是受外交部的一位秘书之托对法国使馆进行了这次“栅栏”行动。这次他见到我，对我的精明大为赞赏。

他微笑着说：“无价之宝，无价之宝。”我相信，这次“侦破法国佬的密码通讯”无疑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是继阿让库尔战役^①、火烧加来港^②后对历史上一贯背信弃义的法国佬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① 1415年百年战争中英法在法国阿让库尔的战役。——译者

^② 法国北部靠近英国的港口。——译者

第九章

“‘狙击手’说苏联人在英国安插着两个重要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另一个在英国海军。”

1959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百老汇街六局情报站五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局和六局的官员们说。当时他们正在研究一个高层人物叛逃案。“狙击手”是一位匿名的内线，1959年年初开始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用德文写的信件，详细地报告了波兰同苏联的间谍活动。

罗曼说：“几乎肯定他曾在波兰情报机构中工作过。他的德文很蹩脚，但波兰语却是超一流水平。”

“狙击手”——军情五局给他的密码代号是拉维尼亚，他给这间谍命名为拉姆达甲和拉姆达乙。拉姆达甲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了。他于1952年在华沙工作，由于波兰情报机构发现他在搞黑市交易，就勒令他从事间谍活动。而对拉姆达乙我们还寄托着一线希望。“狙击手”在他的一封信中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详情，使我相信他的确见过三份军情六局的文件。

第一份是波兰跟踪对象的名单，其中详细列出了军情六局认为最有希望发展为间谍的波兰人。第二份是军情六局波

兰分部的“R 6号”文件。这是在军情六局给各分部内部传阅的年终报告，包括军情六局在各国各地区搜集的直接情报。第三份文件是“RB”的一部分。“RB”是军情六局传发国外各分部的年终报告，包括军情六局最新的科技成果。

最有可能泄密的机构就是军情六局驻柏林和华沙的情报站。我们圈出十名看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对这十名官员的经历进行了调查。可我们认为这十个人都不可能泄密，包括在“柏林隧道”行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六局很有希望的年轻情报官乔治·布莱克。由于我们找不到可疑的对象，对此事件最好解释只能是布鲁塞尔军情六局情报站的保险柜被盗，这事是两年前发生的。但是不巧，在被盗前保险柜里的文件没有确切的记录。很显然在被盗时保险柜里有一份或者两份文件被“狙击手”的间谍看到，但是否三份文件都在保险柜里却难以肯定。1960年初，对这十名嫌疑者查清后，军情五局同六局正式向美国做出解释，这次被窃案是由“狙击手”的拉姆达甲干的。

1960年3月狙击手突然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拉姆达甲的信息。拉姆达甲的名字好像叫做什么修顿。狙击手认为修顿在英国海军情报机构工作后一定是被苏联人收买过去从事秘密间谍活动的。我们仅发现一人与狙击手的信息相符。这就是哈里·霍顿，他在多塞特郡的波兰海底武器研究中心工作。在加入英国海军情报机构前，1962年曾在华沙工作。当我们去军情五局查阅霍顿的档案时，D处大吃一惊，发现他们早已将此人列入嫌疑名单。几年前，霍顿的妻子就找到了波特兰的安全官员说她丈夫已跟她离婚。找了一位在海军基地工作的女人。她声称霍顿常与外国人来往，并定期去伦敦会晤。

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她对这位外国人的身份一无所知。她还说她丈夫在他们花园的一个铁盒子放着一大笔钱。

这位安全官将这份报告交给海军安全部，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对原丈夫的可耻诬告。海军又将这份报告转到了军情五局年轻官员邓克姆·韦格手里。他去档案库查找了霍顿的档案，但却没有找到。然而他肯定了原安全官的结论是正确的，并否定了这份控告。然后将此人做了档案记录并转给了C处处长。由处长负责对波特兰的海军部做了适当的答复，打那以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霍顿间谍嫌疑一事败露后，霍利斯和弗尼福尔·琼斯（后者曾是C处处长，现为五局副局长）非常恼火。因为势头已过，再进行反诉难以奏效。对此控告只好由负责波兰事务的D处二科负责调查。很快他们就发现霍顿与她的女友埃塞尔·吉每个月去一次伦敦。于是他们就派出暗探对霍顿的七月伦敦之行进行密切地监视，并发现他在滑铁卢大街与一个人会面。他交给那人一个旅行包，那人给他一个信封。然后注意力就转移到了与霍顿会晤的那个人身上。暗探一直跟踪他的车到了一家学生面包店，并认出了他是一名驻伦敦的波兰情报官。后来我们查对了这辆车的登记号码，车主是在本地经营出租自动唱机业务的加拿大人，名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暗探又去了波兰使馆试图再核对一下那个波兰官员。但他们悄悄地回来了，他们说他们搞错了。

他们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广泛的监视。他在沃德尔大街（伦敦古董店街）有一个办公室，并在白宫街靠近摄政公园处有一所住宅。他们对这两处都进行了监视并在周围安插了固定的监视点。朗斯代尔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频繁出国旅行，

非常与一群群看重他的钱财及相貌妖媚女郎鬼混在一起。

霍顿与吉在8月初又去伦敦与朗斯代尔会晤。这次的地点是在靠近老维克剧院的一家咖啡馆里。暗探密切监视着他们的行踪，甚至跟踪坐在他们旁边的桌子旁。朗斯代尔对霍顿和吉说九月份不再见面了，因为有公事要去美国。但他充满信心地说他将于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赶回来与他们会晤。如果他不来的话，将有另外一位他们都熟悉的人来接头。

8月27日朗斯代尔从白宫街他的住宅里出来，我们沿街跟踪他到了大波特兰街的米德兰银行。他在那里寄存了一个手提箱和一个棕色纸袋。他走后，我们找到该银行的董事长请求打开朗斯代尔的保险箱。星期一晚上（9月5日）我们将手提箱同其行李从银行转移到了靠近圣保罗大教堂军情五局的实验室。我们将里面的东西都摊在一张折叠桌上。我和温特博恩仔细地研究着。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得到了新东西——职业间谍的完整的工具袋。里面有一架米诺克斯和一架普雷克蒂纳照相机。这是一种专门用来拍摄文件的微型照相机。米诺克斯里面有一卷已曝光的胶卷。我们将胶卷处理复制后又重新放回相机里面。这些照片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全都是朗斯代尔与一个面带笑容的女人一起在某个城市里照的相片。通过大量的分析我们断定这个城市是布拉格，同时还发现了一本介绍打字技术的书。我们立刻意识到这一定与密信有关。我们用一束平行光沿着每一页的边沿照去，立刻发现了许多小凹痕。朗斯代尔这个本子里每一页都是碳纸，用来传递秘密情报。这本打字教科书送到了福克兰·摩根博士的手里，他是原子武器研究所研究员。这

本书倒成了摩根的无价之宝，对他研究密信侦破新方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有趣的是在一个装在木球里的打火机。我们用摩根的方法对打火机进行X光透视，发现底部有几个条纹状的东西。我们用橡胶吸气器和镊子将这些东西取出来。这是两套一次性微型密码簿，有一套正在使用。在一张折叠的纸条里我们还发现了一系列地形参考图，这正是根据我们暗探使用的伦敦地图设制的。

自从“筏夫”工作以来，我对我们发现的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一直都在认真地研究。当我发现了朗斯代尔的密码后，我立刻认出这是苏联密码。朗斯代尔绝不是波兰情报官。这个百分之百地是克格勃的行动，对朗斯代尔与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我们很清楚，如果能对密码进行处理并跟踪其信号我就可以破译。不巧，我们在朗斯代尔的手提箱里没找到具体收报时间表。莫斯科每周发出的电报成千上万次，我们没有搞清他们究竟什么时间用什么频率收报。“筏夫”技术使我们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决定在白官街朗斯代尔的房间隔壁进行监视，积极地使用“筏夫”，这样我们认为一定能搞清其发报的时间和频率。

既要对朗斯代尔的密码带进行复印，又不能引起他的怀疑，这确实是相当困难的。不接触每张密码纸，就无法搞清其内容。我从通讯行动委员会获悉，最近瑞士情报机关发现了一卷克格勃抛掉的一次性密码本。因此我们就请军情六局出面借用该密码本。他们同意借给我们使用。我开车去伦敦机场迎接这架专程为我们而来的皇家空军飞机。瑞士人提供的这套密码本与朗斯代尔的很相似。每页的边上都用一层薄

薄的胶水粘着，一页一页连在一起。我们把它撕开，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这绝不是我们西方所使用的胶水。而我们邮电局的工程师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能够仿造这种胶水。

9月17日，星期六晚上我们又去了米德兰银行，将朗斯代尔的手提箱再一次送到了圣保罗教堂边上的实验室。我们将这套密码簿小心翼翼地拆开，然后又将一页一页的密码纸夹在特制的模具里，这样就可以利用我们制造的新胶水把这些散页重新粘在一起。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将手提箱放回了银行，等待着朗斯代尔的归来。

几天后，我接到托尼·塞尔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非常不安地说：“有件事你应该来看看。‘狮须’行动的录音……”

“狮须”是用“筏夫”继续监视苏联使馆的密码代号。我叫了辆出租车朝肯辛顿园驶去。在苏联使馆旁边的一条街上下了车，走进了我们的监测室。托尼·塞尔在大厅里遇到我，递给我一张“狮须”行动记录单。

“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的是苏联使馆九月份突然进行的两次无线电接收行动。

“是哪天？”

他回答说：“好像是9月6日，星期二一次，另一次是9月18日，上个星期天。”

我大吃一惊：“唉呀，我的上帝，这正是我们进银行行动的那两天。”

在我们两次银行行动期间，我们的暗探对苏联使馆放松了警惕。我当时的心情是惊慌和失望，我将这份材料带回了莱康大楼，针对我们跟踪人员的行动记录核对了苏联接收机

工作的确切时间。“狮须”的记录与A处四科的记录完全相符。苏联人可能已经猜测到我们正在跟踪朗斯代尔。

我查阅了两年半以来“狮须”行动的记录，试图搞清以前苏联人是否也有在星期六或星期一夜间收报的先例。两年半的记载上没有这种先例，苏联人的这两次行动都是在半夜至凌晨五点这段时间内进行的。

我将这份电文材料交给了弗尼福尔·琼斯。然后我们又直接找到了霍利斯。听到这消息时他表现得很冷静，认为这次肯定是有人泄密。他要求弗尼福尔·琼斯再次对跟踪机构进行一次彻底调查。因为几乎可以肯定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一名秘密间谍，因此霍利斯将这一案件由负责捷克波兰问题的D处二科转交给负责苏联问题的D处一科的马丁处理。

在目前情况下，朗斯代尔的外出将会证实我们的疑点。如果他一去不返，就说明他已得知我们注意上他了。如果他按时返回，那就一切正常。朗斯代尔临行时对霍顿说他将于10月1日回来与他会晤。弗尼福尔·琼斯对跟踪人员进行的调查又是毫无结果，这样莱康大楼的气氛便日益紧张起来。霍顿去了伦敦，但没有人来和他接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没有朗斯代尔的任何行踪。甚至弗尼福尔亦为此倍感焦急。10月17日，位于华多尔大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测站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栋大楼。于是在我们内部日益增长的疑点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立刻集中精力跟踪朗斯代尔。

朗斯代尔很快就恢复了他原来的生活。经营起唱机出租业务，与霍顿会晤，出入于花枝招展女人的门庭。到十一月初他才回到他的住宅。这段时间他在哪里对我们来说还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华多尔办公室向西边走去。在朗斯代

尔从国外回来后，我和阿瑟对他进行了严密的暗中监视。我们力求万无一失。我们决定不采用较明显的跟踪和无线电跟踪。吉姆·斯卡顿对我们侵犯了他的职权极为恼火。他不知道“筏夫”行动，所以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采用无线电。对此他向弗尼福尔·琼斯发了一通牢骚，但琼斯对他说采取新对策自然有其道理。

我和阿瑟都意识到跟踪朗斯代尔这样有经验的情报官迟早会被他发现。于是我们设计了一套半静态的跟踪方案。每天晚上有一组监视人员对他进行分段跟踪，第二天另一组又接着跟踪。就这样，从他华多尔街办公室开始一段一段地跟踪着他。这次行动延续了两周。我们还利用了许多五局官员的妻子和其他自愿帮忙的人来帮助我们进行跟踪。每一段跟踪都用上不同的人。最后我们将他跟踪到了位于伦敦西部的雷斯利普克兰利园四十五号。朗斯代尔肯定是与这家的主人呆在一起。彼得和海伦·克罗格，是一对新西兰夫妇，在这里经营着一个专卖美国古书的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籍文献。我们在这家书店对面布置了固定观察点，等待着他们的行动。我们深信这对夫妇是不会发觉我们的。

11月中旬朗斯代尔先去米德兰银行取出了手提箱，接着就搬回了他白宫街的住所。我们立刻派政府通讯总部的工程师阿瑟·斯潘塞搬进了他隔壁的房间并开始了“筏夫”行动。三个月来斯潘塞一直呆在那间小房里。我们在朗斯代尔的收报机电源上安装了窃听器，另一头接在一个警报器上。这个警报器可以惊醒斯潘塞。警报器一响，他就打开“筏夫”机调到朗斯代尔的收听频率。斯潘塞将窃听到的信号通过帕尔门大街的政府通讯总部分部传送到切尔特南的总部。总部

有一位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分析专家，他用我们搞到的朗斯代尔的一次性密码本对所有的情报进行破译分析。然后再将侦破的密码情报通过密码电传输送到莱康大楼，由我和阿瑟再进行分析。

朗斯代尔第一次收到的密码柯林斯没能破译。在电讯中没有发现“标志组”。“标志组”是一组明码标志，换句话说在一次性的密码本上就不再需要附加说明了。收报人用这种标志来确定密码在密码本上的位置，然后再进行破译。后来我们逮捕朗斯代尔后才发现他是用自己的生日来作密码标志的。

我和阿瑟猜想是不是朗斯代尔已发现他的密码本暴露了，又使用了另外一套从国外带来的新密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摸进他的房间，核实他打火机里的密码簿是否已经用过。有一天，我和温特博恩趁朗斯代尔去萨福克^①做生意之机进了他的房间。这间房子小得可怜，仅仅能放一张床。我们打开打火机，发现密码簿还在里面，好几页已被撕去。这说明他仍在用这本密码簿。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用了许多行数对他从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进行密码翻译。多用几行查对，电文就显而易见了。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我们成功地监听到朗斯代尔每周从莫斯科收到的情报。这些情报大多是有关“伊朗国王”（霍顿的克格勃匿名）。朗斯代尔应如何使用霍顿，向他了解些什么？他在波特兰应搞到些什么文件？莫斯科都一一下达了特别指示。其他的信息都是有关他个人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到苏联后的情况。他们要求朗斯代尔在英国秘密服役五年

^① 英国的一个郡。——译者

后回国。

1月2日，星期一，由霍利斯主持审查了这个案件。阿瑟竭力主张应该放长线钓大鱼。他清楚地意识到朗斯代尔是一名极有价值的间谍，可能仅控制着霍顿一人。我们对克罗格夫妇与他的房间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仅仅看到在朗斯代尔呆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克罗格房间门窗上锁，就连顶楼的小门都上了锁。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我不认为朗斯代尔可能仅是秘密联络网里的一个成员。我和弗尼福尔·琼斯都赞成阿瑟的分析。霍利斯同意与海军部交涉（霍顿泄露了该部的军事秘密）在三个月之内暂时不要惊动霍顿。海军部接受了这一建议。阿瑟考虑到监视人员容易被朗斯代尔发现，决定仅用无线电窃听以进一步寻找间谍网。

两天后我们的计划就破产了。美国驻伦敦使馆负责与军情五局联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克利夫·克拉姆给霍利斯送来了一封信，信中提醒军情五局，说“狙击手”通知军情五局他将于第二天，即一月五日投诚美国。我们又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会议。当时我们只有霍顿和朗斯代尔这一条行动线索了。克罗格夫妇的线索将会被“狙击手”这次叛逃捣乱。我们必须在他们转移之前逮捕他们。很凑巧，1月7日星期六正是霍顿与朗斯代尔会晤的时间，并且我们知道那天清晨是朗斯代尔接收莫斯科电讯的时间，因此我们能即刻得知莫斯科方面是否警告他。

逮捕行动经过周密的计划安排。这三天我们几乎没有睡觉。负责霍顿案件的查尔斯·埃尔韦尔被派往波特兰待命。一旦逮捕行动顺利完成，他即刻搜查霍顿的住宅。比尔·柯林斯从切尔特南来到帕尔默生镇，准备侦破朗斯代尔的密码。

警察局的特别行动处在朗斯代尔住所周围布下了埋伏。一旦莫斯科来电指示他转移，我们就立即逮捕他。

星期五一整夜我都与阿瑟呆在莱康大楼的四楼行动室里，焦急地等待着，这是一间很小的工作室，像所有政府机关一样，墙壁粉刷成褐色，简直就像一间牢房。房间里有一张木床靠墙放着，中间是一张小桌子，地板上拖着一团团乱七八糟的电线。房里还装有直通特别行动处、政府通讯总部和局长的电话。我们监听着朗斯代尔在他白宫街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阿瑟弯着腰在桌前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休·温特博恩此时此刻又紧张又激动，很少讲话。弗尼福尔·琼斯也在那里穿着他的背带裤躺靠在床上，没有穿鞋。尽管他是D处处长，但我们大家都感到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到“牧羊人商场”的酒吧间为我们买回许多三明治。深夜里我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烟灰缸也渐渐堆满了烟头。

我们听到朗斯代尔自由自在地从城里返回，时间已是深夜，还带了一个女人回家。我谨慎地减少了接收机的音量。待房间里安静下来后我问阿瑟：朗斯代尔会被判多少年徒刑。

他答道：“至少十五年。”

休·温特博恩表现出了忧虑的神情，他是位教徒。想到这个人的一生就要被毁了，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我无可奈何地说：“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后可……”。他们都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像我一样，他们都看过朗斯代尔的通讯内容：有关家庭、家庭困难、生日问候、孩子思念父亲等

等。就他的职业来说，朗斯代尔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间谍。像所有远离故乡工作的人一样，他很想家。因此他只好在其他女人身上寻求点安慰。

“他绝不会作叛徒。与霍顿那种人截然不同，仅仅是像我们一样在做着自己的工作。”

弗尼福尔·琼斯在床上气愤地说：“够了，这种职业是他自己睁着眼找的。他可以作为一名外交官来这里的。他自己很清楚这种职业的风险。与他可得到的相比他也值得了！”

我默默地呆在那里。但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同样的感受。因为这两个月来，我们对朗斯代尔太了解了。

临近清晨朗斯代尔叫醒了那个女人并让她马上离开，说他有要紧的事。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话也不假。女人离开后，他立刻拿出收报机，准备好密码簿接收莫斯科发来的情报。收报机嘀嘀地响了几分钟，朗斯代尔立刻用铅笔将密码译成了可读信息。然后他自由自在地哼着俄国小调走进了浴室。看他那样子我们敢断定，苏联方面并没有向他发出任何警告。几分钟后，我们房间里的绿色电话响了。是比尔·柯林斯通过这条秘密电话线给我们送来了刚才的电文内容。这只是一份日常工作报告。没有任何警告，更多地报道他家庭情况。

特别行动处接到指示，那天下午当朗斯代尔从霍顿那里收到包裹后，就立刻逮捕朗斯代尔。下午五点，特别行动处打来电话“最后行动已经完成”。“最后行动”是逮捕朗斯代尔行动的代号。从此他的铁窗生涯即将开始了。

休·温特博恩立刻驶往白宫街，对朗斯代尔的住宅进行搜查。我和阿瑟在等待着逮捕克罗格夫的消息。晚上七点钟

我和阿瑟同车驶往雷斯里普。虽然我们很疲劳，但心里还是得意洋洋。当我们抵达克兰里园时，那里一片混乱。到处都布满了警察，正对克罗格夫妇的房间进行搜查。我试图控制这一混乱的局面，但毫无效果。阿瑟在徒劳地抗议着。有一位侦探从房间里拿出一袋化学药品。

他说：“对不起，先生，我想这就是证据。这无疑是一次犯罪行为。你们要想了解详细情况，那得通过官方渠道……”

这次警察行动是由特别行动处的侦探长官乔治·史密斯指挥的。史密斯在军情五局里是以他具有的个人晋升才能而闻名。在逮捕行动以前，我们一再向他强调，逮捕行动结束后，我们需要对此消息封锁四十八小时，以便收到莫斯科的下次发报。可是在行动后的仅仅几小时内，破获一起重大间谍案的消息就传到了舰队街。史密斯就开始向选派来的新闻报遣员夸耀自己在此行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莫斯科就关闭了电台。

尽管这次警察行动非常愚蠢，但我们在房间里也发现了不少间谍设备。在一个与朗斯代尔打火机相同型号的火机里发现了两套密码本，接收莫斯科三套不同密码通讯的信号，密写材料，还有用铬酸和赛璐珞带制造微点拷贝的设备。克罗格夫人试图将装在手提袋里的间谍会议的详细资料丢进厕所，将其毁掉，但被一位机敏的女警察拦住。最有趣的发现就是莫斯科特别高速信息信号计划。我们在一个装炊具的坛子里发现了一瓶磁性氧化铁，用它可将高速电讯的摩尔斯密码直接印到磁带上，即可得知电文内容。这就不必将高速电讯先通过复杂的录音机再放慢收听了。这是项新技术。这项发明使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逮捕行动前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

未能发觉克罗格夫妇房里的电报通讯。

晚上警察全部撤走了，只留下两名机智的警察与我们一起继续搜查。我们整整在这里搜查了九天。最后一天我们在厨房地板下的凹槽里发现了一台发报机还有照相机和其它无线电通讯设备。这一切都放在一个防潮的袋子里。这套设备很显然是打算长期储存的。

霍利斯请我详细地报道一下新技术在破获朗斯代尔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以便鼓励今后的工作。

我着手对朗斯代尔案件进行分析。首先我请求政府通讯总部向我提供几份重大的克格勃间谍案的档案，尤其是像朗斯代尔这种涉及到秘密通讯的案件。他们给我送来的材料差不多有一百份。首先是每个间谍的详细介绍——他何时开始工作，何时结束，工作目标，及所服务的机构等等。然后他们又向我提供了一份该间谍信号计划的总结报告，最后还列出了他接收苏联信息的频率。还有些情报，如收发密码组的次数，详细的密码系统及密码更换的时期。

朗斯代尔肯定是一名苏联在英国的地下间谍。我对他在10月份回到英国后的莫斯科通讯仔细地做了一份图表进行分析。在这段时间里，他平均每月收发三百至三百五十组密码。其他地下间谍一般每月收发五百至一千组密码，大多数接近一千组。朗斯代尔的其它信号哪里去了呢？朗斯代尔的呼号有三位数，如果莫斯科的呼号里有“1”，就是有指示，如果没有“1”也就没指示。我们已经掌握了朗斯代尔十月份返回后所收到信息的波长。我向政府通讯总部求援，希望他们能帮我找找八月份在朗斯代尔临行前那段时间里有没有和他用的波长相似的通讯。经过大量的搜索，政府通讯总部发现

所谓的“持续”这个通讯是六年前出现的，大概是朗斯代尔进入英国的那段时间。

这个通讯的密码组收发次数正好是每月500至1000组，但它却在1960年朗斯代尔返回莫斯科的同时消失了。如果我们没有密码册，肯定是不能搞清其信息内容的。而如果这个消失的通讯频率真是朗斯代尔原来使用的频率的话，那为什么当朗斯代尔返回时就即刻消失了呢？

我将注意力又转到了克罗格夫妇的通讯联系上。这是一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的通讯面好像很广，但他们又好像控制着许多其他间谍，而仅仅是作为朗斯代尔的后盾。很显然有许多信息情报克罗格夫妇都是为朗斯代尔保存。我又仔细地计算了克罗格密码册上的收发密码组的次数，全部次数与十月份朗斯代尔返回后所消失的通讯密码次数完全一样，好像是在朗斯代尔返回苏联后取消了他的通讯频率，仅仅保留了我们可以监听到的“伊朗国王”（霍顿）通知频率，并将包括其他间谍的通讯网与克罗格的通讯一起转移到安全的通讯频率上。他们使用高速发报机来传送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情报，对此我们束手无策。无线电通讯方式的明显改变说明朗斯代尔或许已得知他在白宫街住宅使用打火机密码册所接收的莫斯科信息已被人发觉。而如果他害怕被发觉的话，为什么不换一个密码册呢？如果苏联人害怕他被发觉的话，那为什么又把他派回英国呢？

我观察了在逮捕行动的那个周末，我们所掌握的几名克格勃情报官的行踪。星期天晚上当逮捕行动在电视上报道时，克格勃地下间谍科罗文同苏联使馆地下间谍代表尤皮科夫共进了晚餐。我们用探针窃听器听到他们的谈话。我们听

到他们在收听广播，未加评论，也没有与大使馆联系。

自从“狮须”技术应用以来，军情五局对所有暗探的无线电通讯都录了音并存了档。我用录音带做了一次实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是阿瑟的情报员。我把D处二科监视人员用报话机跟踪朗斯代尔第一次送去银行的录音带交给了她，并给她一本伦敦交通图，这个交通图与我们跟踪人员使用的差不多。我要她仅仅依靠录音来辨认出监视人员跟踪朗斯代尔的路线。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辨认方向的能力并不强，而且过去一直没有接触过此案，可她只用了三个半小时就搞清了其跟踪路线。既然她都能搞清路线，那么对研究我们监视人员行动录音长达数年之久的苏联人来讲就更不成问题了。从开始他们就肯定知道我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朗斯代尔身上。

在我忙于写分析报告的那段时间里，“狙击手”正在靠近华盛顿中央情报局的一间密室里。他自称迈克尔·高尔涅夫斯基，是波兰情报局的人。高尔涅夫斯基的情报节外生枝，使我们加深了对朗斯代尔案件的怀疑。他向中央情报局交待在七月份的最后一周内有一名波兰秘密警察中的老官员对他讲苏联发现在波兰秘密警察局里有“一头猪”（间谍）。据他讲，起先是派他去协助追查这名间谍，可后来到了圣诞节他才知道他自己已成了被怀疑的目标。于是他就投奔美国了。

“七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狙击手”的汇报中看到了他的投诚日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从表面上看，这是个无关紧要的日期。我往后查阅了日期。军情五局第一次见到朗斯代尔与霍顿会晤的时间是7月2日。我们7月11日查明了朗斯代尔，17日开始跟踪他。假设一周的时间这消息

传到苏联人那儿，还有一天的时间传到波兰秘密警察局。这就到了7月最后一周！

朗斯代尔案件的报告写起来真让人头疼。我们取得的胜利立刻化为泡影。我还记得1961年5月，在我提交报告前的那个周末，我去埃塞克斯靠近我住所的黑水湾划船。一片乌云掠过水湾，狂风吹得我喘不过气来，而使我疲劳混乱的脑筋清醒过来。通过无数次深思熟虑，我还是得出了这个结论：苏联人开始就知道我们已经注意上了朗斯代尔。他们将他召回，又将他重新派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仅有一种解释能解开朗斯代尔案件的疑团。这就是军情五局内有人泄密。假设苏联人在军情五局里有内线，那他将提醒苏联人“狙击手”的存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七月的最后一周里他们将注意力引到了高尔涅夫斯基身上，显然像我们一样，苏联人也能猜到“狙击手”的真实身份。同时这也说明了苏联人是怎样得知了我们的跟踪行动的。当苏联人得知朗斯代尔将被逮捕时，他们就将他召回莫斯科。但是当我向军情五局首脑提供了我们利用“狮须”技术得到的信息并且弗尼瓦尔·琼斯开始了调查时，军情五局的内线恐慌地去与苏联人联系。因此苏联人只有一个选择：是牺牲朗斯代尔，还是军情五局的内线？要保住内线只好将朗斯代尔再次派回英国，希望在朗斯代尔被捕前从霍顿那里得到最后一次信息。苏联人在将朗斯代尔派回之前，也采取了防范措施，关闭了其它间谍通讯，通过克罗格的安全通讯方式与他们联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苏联人就低估了我们D处的能力。尽管他们的技术设备优于我们，可我们还是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并破获了他们另一个重要间谍网——克罗格夫妇。至于

军情五局中的内线，肯定不会潜藏在监视人员中，而是在情报五局中，而且是几名首脑人物当中的一个。苏联人决不会以牺牲朗斯代尔为代价来保住一名低级内线。加上我们在办理朗斯代尔案件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干扰亦证实了内线就在组织的最高首脑中。

1961年5月我的案件分析报告交给了弗尼福尔·琼斯，他又将报告转交给了军情五局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并在报告中加了批注：“在阅读这份分析报告时应记住朗斯代尔案件的胜利应归功于彼得·赖特本人。”

在后几个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对我的报告提出质疑。我与米切尔和霍利斯就其它问题开了几次会。我常常故意很晚才离开，希望他们叫我一起讨论一下那个让人不安的假设。可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工作踌躇不前。我期待着与他们共同分析这件令人不安的事件。但上面对此案没有任何批注，函件，没有任何恐惧感，也没有人再谈论此案，就好像我的分析报告完全不存在似的。后来终于在十月份的一个下午，霍利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是米切尔。

霍利斯态度冷漠地说：“格雷厄姆将主持这次讨论。”他用手指着我的报告显出了厌恶的神情。我转头看了看米切尔。他紧张地出了汗，尽量避开我的目光。

他说：“你的报告我看过了，我要说的是这个报告已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以我的经验，我认为间谍案没有这么复杂……”

这话激怒了我。

“先生，如果需要的话，我很乐意对此案中我所列举的现

象做些解释。我们难以将技术问题用通俗语言表达出来。”

米切尔对我的话置之不理，继续着他的讲话。

“道理很简单，我们逮捕了三名苏联职业间谍，这对数年来第一次将苏联人送上法庭。我们挖出了埋藏在我们海军研究机构里的两名最危险的间谍。这在任何意义来讲都是一个胜利，苏联人将他们的间谍送上门来让我们抓，究竟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开始列举报告中的疑点，但尽量不做任何结论。米切尔对我的每个问题都做了反驳。我怎么能知道？怎么能肯定？银行可能只是个巧合。就算苏联人监听到我们监视人员的通讯，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跟踪朗斯代尔。

“你知道，彼得，他们并不比我们高明到哪里。”

然后我叙述了他们无线电通讯方式的更换。而米切尔根本不理睬，说什么他对此一窍不通。

“你说在英国还有更多的间谍。苏联人故意将朗斯代尔派回英国，可是彼得，你并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

“可是先生，你也没有证据证实此案就像你想像那样，起码我们都是假设。”

霍利斯插话说：“对，是这样。可我们现在已将他们关进了监狱。”

“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自蒂斯勒索案以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这个问题。每次一放松，他们就又出现了……”

“我和副局长已仔细研究了此案，我认为你应该理解我们的心情。”

“让我理解那就是放弃对此案的继续调查吗？”

“对，是这样。你应该对此案的处理充满信心。我也会为

你高兴的。我们军情五局、还有你彼得，由于侦破了此案而美名远扬。我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这毫无根据的猜想给我们的胜利投上阴影。”

霍利斯奇怪地朝我笑着，开始削起铅笔，我猛地站起身，愤然离去。

第十章

尽管在军情五局内部普遍存在着朗斯代尔案件的怀疑，可是美国情报机构里却对此案的侦破大加赞赏。华盛顿对通讯行动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极为感兴趣，因为这标志着新的侦破技术的诞生。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政府通讯总部得知了通讯行动委员会所做出的巨大成就，并且十分羡慕政府通讯总部与其兄弟机构——军情五局和六局所建立的良好协作关系。尽管在英国我们面临着许多问题，而在华盛顿问题却更加严重。二次世界大战后胡佛竭力反对组建中央情报局。整个五十年代他对此机构一直持敌视态度。中央情报局内的老官员们大多是“常春藤联合会”^①学校的毕业生。他们这些人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非常瞧不起。这两家机构能够协作的唯一基础就是他们共同抵制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都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不安全的机构。1959年该机构中的两名密码分析官投奔了苏联并泄露了重要的机密，因此证实了他们对该机构的指控。

^① 美国东北部八所名牌大学中的一个联合会。

路易斯·托德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近二十年来他的辛勤耕耘使该机构兴旺发达（该局的正职由陆海军三军轮流执掌），他很清楚遭到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非议的关键是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了通讯情报。这两家机构正对这项技术展开挑战。中央情报局已开始了代号为“D参谋部”的高度秘密的通讯情报行动。联邦调查局在此领域也不甘落后，积极开展研制工作。1960年5月，正当我们着手于朗斯代尔案件之时，阿尔·贝尔蒙特来伦敦访问。我陪他到了切尔特南并向他讲解了对付埃及密码的“吞没”行动技术，和对付法国密码的“栅栏”行动，当时这些技术还处在幼年。他对此案有感触，回国后立即派来了迪克·米兰。他在英国呆了两周的时间跟我学习“栅栏”技术。在华盛顿他们很快就利用该技术侦破了法国使馆的密码机。

托德拉急于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展一个自己的通讯行动委员会。在1961年10月，我、休·亚历山大、休·德纳姆、雷·弗劳利，还有军情六局情报站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应邀一同去了华盛顿，在那儿，我们出席三次特别会议，主要讨论了我们在密码破译方面的研究成果。托德拉也邀请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代表共同听取我通讯行动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希望以此改善他们之间的协作关系。

最初我就意识到这次会议是一次绝妙的机会，在美国情报机构内部，我们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威望将会大大提高。1961年在华盛顿威望最高的是中央情报局。尽管该局的几位要人把英美情报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视为是当今越来越无情的冷战中的一种无用的摆设，可我坚信如果我们向他们展示了我们1956年以来在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就会

引起他们的重视。

休·亚历山大和我都认为这次是在赌博。美国人在此会议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他们的技术，这也难以保证。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自然也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我们的收获总的来说是很大的，至少我们消除了从菲尔比、伯杰斯和麦克莱恩事件以来我们英美情报机构关系中的阴影。更为重要的是休·亚历山大已计划进一步发展通讯行动委员会的密码侦破技术。我负责反间谍的工作。这两项工作与美国人在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原子武器的诞生，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说服美国人为我们提供财力，将我们的设想变为现实。

这次会议是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举行的。会议室是总部大楼内的一间经过特别处理的防窃听房间。总部大楼四面都是宽大的玻璃窗，周围布满了电网。楼顶上接着数百根天线和抛物线天线，通过这些天线国家委员会与分散在世界各地数百个监听站时刻保持联系。

路易斯·托德拉和他的密码分析专家阿特·莱文森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席了此次会议。联邦调查局派来了迪克·米伦和利施·惠特曼。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尔顿和比尔·哈维。这人长得像牛一样壮。原负责柏林方面的情报，最近刚刚调回华盛顿负责“D参谋部”的工作。

哈维以他的嗜酒和牛仔风度而闻名于中央情报局。最初他是在联邦调查局负责反苏间谍工作，后来胡佛因他酗酒的恶习将他解雇。他很快就将在联邦调查局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工作中去，并在与克格勃的秘密战争中与安格尔顿一起成为美国赫赫有名的技术官员。在五十年

代，他多半在柏林负责间谍工作，想方设法打通各种渠道对付苏联人。尽管哈维性格有点粗暴，但他非常机智，嗅觉敏锐，善于识破间谍人。在伯杰斯和麦克莱恩叛变之后，是他第一个在美国识破了菲尔比，他有一个惊人的记忆力，他甚至对几十年前伯杰斯、麦克莱恩、菲尔比的叛变案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第一个将菲尔比这位军情六局官员的各种复杂经历串在一起的也是哈维。当时所有官员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他就在毫不留情地追踪着菲尔比，这一事件使他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的反英心理。

五天的会议一开始就不是个好兆头，托德拉很希望相互自由地交流一下。我们讨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进行的用于侦破驻华盛顿国外使馆的一两种实验，托德拉指出鉴于与联邦调查局的协定，他们仅限于讨论技术问题。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代表一声不吭，双方都不愿意在另一方面前或是在国家安全局面前谈论自己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在我们面前透露中央情报局办案的技术情况。安格尔顿在不停地做笔记，而哈维却显得有点敌意，坐在那里，有时大声地打呼噜，特别是午饭后。

在第一天上午的会议上他说：“我们的公司（中央情报局）今天在此仅是旁听，我们不愿在公开的会议上讨论我们的秘密。”

我宣读了我的长篇报告，在此报告中我介绍了我们对付埃及人的“吞没”行动，并且介绍了从那以后我们在无线电侦破密码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利用先进窃听技术的工作。我开始介绍“栅栏”行动的详细情况，后来气氛活跃起来，甚至哈维也开始认真地听了起来。

不出我们所料，中央情报局关于他们的技术情报一点也没有向我们透露。他们认为我们不可靠，但我们怀疑他们对我们采取这种严谨态度其中必有其他原因。英美协议中规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双方应相互交流电子通讯情报，而哈维的“D参谋部”肯定不受这项协议的约束。

无论怎样，这次会议在英美情报史上可以说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十几年来这是六个情报机构第一次坐下来就广泛的合作前景进行讨论。

我在离开伦敦以前，阿瑟·马丁委托我向中央情报局介绍我们在办理朗斯代尔案件中的技术成就，特别是“筏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我们一开始就向联邦调查局报道了我们“筏夫”技术的进展情况，但中央情报局对此是一无所知。霍利斯认为在朗斯代尔案件刚结案时，我们应该将“筏夫”技术立刻告诉他们，尤其是因为靠着他们所提供的“狙击手”情报，我们才捕获了朗斯代尔。这次报告是在中央情报局临时占用的一间靠近华盛顿市中心水池的尼森房间里进行的，因为该局的兰利总部正在建设中。吉姆·安格尔顿带我到一间大会议室，并请我上了讲台，对面坐着两百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

我小声问道：“你敢肯定所有这些人都是可以接触通讯情报吗？”

他回答说：“你只管讲你的，彼得，我们会保守机密的，他们都想听听你的报告。”

我非常紧张地站了起来，一开始我尽量有意地讲慢一点，这样来掩饰我紧张时的口吃。我开始叙述了朗斯代尔案

件的始末。一小时后我转向黑板开始给他们图解“筏夫”技术的详细情况。

“毫无疑问，我们认为‘筏夫’将成为一种反间谍的新式武器。一旦苏联人在这个地区秘密接收莫斯科的通讯，我们马上就可以确定其位置，我们还能用这一技术来探测他们的通讯频率……”

这些人对“筏夫”技术报告的反响并不令人满意，一阵骚乱之后，我注意到了两位官员在前排座位上异常激动地相互谈话。我看了坐在旁边的哈维一眼，意识到自己的报告出了什么纰漏。他弯腰坐在安格尔顿的前面指着我，看起来有点气愤的样子。

我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我问道：“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坐在后排的一位官员叫道：“有问题，你们是什么时候发明‘筏夫’的？”

“1958年春天。”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这话立刻使我目瞪口呆。

他叫道：“我来告诉你，现在是1961年啦！”

另一位叫道：“就这样与我们合作吗？”

我一下就站了起来。人们开始退场了，也没有人再提问题了。

然后，安格尔顿和哈维朝我走来，哈维并没有发火。

吉姆轻声对我讲：“彼得，这项工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讨论。我觉得这样的会议再继续下去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和贝尔希望今晚你能与我们共进晚餐。找个安全的地方我

们好好地谈谈。”

哈维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把我送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尔顿的技术官乔·伯克来到我的住所接我。他几乎一言不发，我觉得可能这是上级给他的命令。车子驶过乔治·华盛顿大桥、阿林顿墓地然后驶向弗吉尼亚的郊区。

伯克向右指着说：“这就是新的总部。”

车外只能看到树林和一片黑暗。

行驶了一小时后，我们抵达了一间远离公路，用圆木搭起的房子。在房间的后部是一个大厅，摆着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窗子上钉着防蝇窗纱。它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脚下，这里到处散发着松木的气味，蟋蟀叫声不绝于耳。安格尔顿出现在走廊上，冷冰冰地迎接了我们。

他说：“今天下午的事我们感到很抱歉。”但他没有做任何解释。我们坐下来，还有一位中央情报局西欧部部长也来了。他很有礼貌，仅此而已。几分钟后又来了一辆车，随着一阵急刹车声，车子停在了门前。房门开后，我听到哈维进屋问我们在哪里。他关上纱门，走进大厅，手里握着一瓶杰克·丹尼尔香槟酒，显然他又喝酒了。

他把酒瓶用力往桌上一摔叫嚷起来：“你这个混蛋，今天你要讲出这个案件的真情！”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他们布置好的圈套，通常都由哈里·斯通出面作陪，与我认真地商讨军情五局的问题，可他这次却因心脏病住院疗养了。

我转身对安格尔顿说：“吉姆，我是来参加宴会的，你看这算怎么回事！”

他给我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说道：“彼得，这就是宴会。”
我坦白地说：“我可不吃这套。”

安格尔顿平缓地说：“不会，不会。我们是想从头再听一遍你的报告……我们应该直来直去，不要兜圈子。”

我又叙述了一遍朗斯代尔案件的经过。刚讲完哈维就发起火来。

“你们这帮王八蛋，你来这里是让我们支付你们的研究经费，可你直对‘筏夫’技术躲躲闪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个屁！”

哈维又打开一瓶杰克·丹尼尔酒。

安格尔顿开腔了：“彼得，问题就在我们的技术上。我们相当大的一部分间谍都使用着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如果苏联人掌握了‘筏夫’，那这些间谍就完了……”

安格尔顿接着又问：“苏联是否已经有了‘筏夫’？”

我答道：“起初没有，现在我想他们已经有了。”我对他们讲述了最近的一个案件。波兰情报局中我们六局的内线提供了波兰和苏联的一次联合反谍调查的情况，调查到最后他们对一个间谍产生了怀疑，克格勃就开了一辆车停在那个间谍的楼下。据军情六局的那名内线讲，克格勃不允许波兰人进入车内，不过他个人猜想车内肯定装着无线探测仪器。

哈维说道：“上帝！这就是说我们波兰的内线全完了……”

我接着说：“我们已将这些报告交给了你们的波兰分部了。不管他们要抓的这个人是谁，他肯定不会是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认为他肯定是你们的内线，这起码可以警告你

们与波兰方面的通讯联络是靠不住的。”

西欧部部长涨红了脸说，“明天早晨我再核对一下。”

哈维问：“还有谁知道‘筏夫’？”

我告诉他我们还给联邦调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介绍过“筏夫”的进展情况。

“加拿大人！”哈维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你们告诉他们，不如告诉那些该死的巴布亚人呢！”

“对不起，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觉得加拿大是英联邦的可靠盟友。”

哈维说：“你还应该告诉他们再换一部密码机。”安格尔顿害怕哈维一气之下冲口说出“D 参谋部”的机密，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

我们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很明显，他们是精心密谋好来威胁我的。他们想让我感到欠他们的债，并希望我失口说出我不应该说的机密。他们说：我们给你提供了“狙击手”，而你们又有什么表示呢？你们搞新技术研制，我们也同意为你们支付数百万美金，可又得到什么回报呢？哈维大发雷霆，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看来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件件抖出来：菲尔比、伯杰斯、麦克莱恩，还有什么领导不善、缺乏专业知识，大英帝国的倒退，受社会主义的侵蚀等等。安格尔顿却暗示我们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此联盟中就必须尊重他们。

哈维大叫道：“你要记住，你他妈的是来这里要饭的！”

我开始反击。是的，我们的反间谍工作做得差，可现在阿瑟已经回来了，侦破朗斯代尔案仅仅是我们一个开端。我们没有义务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筏夫”的进展情况，这是我们

自己的秘密，我们觉得这样做很正常。

“我来此地正是要向你们介绍我付出毕生精力所研制的‘吞没’、‘栅栏’及‘筏夫’和我所知道的一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你在我对面坐了五天，你对我讲了什么？这哪里有什么交流？我们悄悄地超过了你们，你们便恼羞成怒，这就是事实真相，问题的所在！”

哈维气得像只火鸡，脸色发紫，直喘粗气，满头大汗，他的夹克衫敞开着，露出他那擦得锃亮的手枪套和手枪。他这是借酒撒野。这时已经是清晨四点钟了，我起身离去，并告诉了安格尔顿第二天的约会取消。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很失望。他们不能温和地谈就算了。

第二天安格尔顿来我住所看我，这次他倒很聪明，满口都是道歉的话，把前一天晚上的闹剧都归罪于哈维。

“他喝得太多了，他认为你没给他讲实话。他现在非常情不过你了。他已把你视为对我们美国人有威胁的人物。”

他请我出去吃晚餐，开始我不愿意接受他的邀请，但是他说理解我的想法，说他也希望我理解他。他兴致勃勃地谈论了他们援助我们设备的计划，紧张气氛很快就消失了。他主动提出要带我去见路易斯·托德拉，说服他为我们通讯行动委员会的反谍工作提供援助。第二天他派车接我到米德堡总部。从技术的角度上讲，没有政府通讯总部的陪同，我是不应该独自拜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因此我走边门直接上到了顶楼托德拉的办公室。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用膳间，我第三次叙述了朗斯代尔案件的经过。

最后托德拉问我他可以为我们的做些什么，我向他介绍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我对莫斯科发来的秘密通讯分

别做了归类，使我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政府通讯总部没有能力全面监视苏联人的通讯。我们现在只有十二至十五个监听站，只能说仅对所有的秘密通讯进行抽样检查。我们至少需要对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通讯进行监听才会真正使我的归类分析取得进展。托德拉同意这种可能性，并同意在全球范围内为我们提供至少两年的通讯情报。他说话算数。不久各种信息就源源不断地流到政府通讯总部。在这里各种信息情报通过反谍部的一个分部进行加工处理。

在驶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很得意。此次华盛顿之行不仅保证美国人对我们通讯行动委员会“吞没”技术的支持，而且他们还将赞助我们的反谍工作。当安格尔顿向我提起哈维时，我几乎都忘记了与他那天晚上的不快。

“哈维想再见到你。”

我显出有点吃惊的样子。

“别这样，他在古巴方面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给他讲你可能帮得上他的忙。”

我问他：“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呢？”

“噢，不必顾虑，他想看看你是否靠得住。你的行为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安格尔顿是个典型的不乐意讲话的人。他拒绝对我进一步作出解释。他说他已为我和哈维预定了后天的午餐，到那时我就会清楚了。

两天后我到了我们事先约定好那家餐馆。哈维站起来与我热情握手并问候了一番。他看上去服装整洁，也不像平时那样傲慢。对两天前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提。他是个强人，决不会在别人面前示弱。他对我讲他现在正在研究古巴问题，

并希望听听我对付塞浦路斯骚乱的经验。

他说：“我没有听到你关于1959年的介绍。”他态度认真，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

我第一次卷入塞浦路斯事件是在刚刚进入军情五局的时候。起先是军情五局E处（负责殖民地事务）处长贝尔·马根送来几份关于塞浦路斯局势日益升级的文件。在希腊政府，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由格里瓦斯领导的埃奥卡（为塞浦路斯独立而斗争的全国组织）游击队的支持下，希腊籍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诺斯发动了一场争取全面独立的运动。英国为了继续使塞浦路斯作为英国的军事基地开始了反攻。1956年前方告急，几百名格里瓦斯游击队竟牵制了四万英国部队。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政策是一次巨大的失败。英国殖民部靠军队维持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谈判进行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先找到格里瓦斯并将他控制起来，虽然英国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踪影。通过资料分析，我深信干这种事，军情五局要比部队强得多。我对马根讲我有信心在一定的时间内用我们对付苏联无线通讯跟踪的方法确切地搞清格里瓦斯在哪里。

马根立刻带我拜见了杰拉尔德·坦普勒勋爵。他曾在马来西亚成功地领导了反叛乱行动，并且处理殖民地事务时最善于利用情报。坦普勒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并且同意去说服殖民部将此事转交军情五局。可是殖民部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希望通过安全的谈判方式来了结此事，而不希望五局介入。而情报五局也不想卷入这急剧恶化的形势，尤其是霍利斯，他说没有部里的指示，军情五局决不参与此事。他

认为情报五局是一个负责国内事务的机关，他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向部队提供一名防务联络官，仅此而已。

1958年格里瓦斯加紧进行游击队的活动，阻挠塞浦路斯新任总督修·富特勋爵寻求政治解决冲突的努力。部队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搜捕。这次是在帕福斯^①山区进行的，但是格里瓦斯这次又漏网了。尽管富特这时仍在竭力推行他和平解决的政策，但鉴于日益恶化的形势他同意让军情五局干预此事。我们首先面临一场竞争，即我们能否在殖民部对此事作出妥善处理之前捕获格里瓦斯呢？

马根认为在当地警察特别行动处分部的档案里肯定能找到有关格里瓦斯所在的情报，只是没有确切说明。当前的问题是搞到这些情报，因为当地的特别分部里几乎都是埃奥卡的人。我们的身份一旦暴露后再去研究这些档案是很危险的。已经有一位我们的官员在尼科西亚的马路上被杀了。

马根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曾在西北前线及伊朗工作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自己与当地人在同一个帐篷里，讲他们的语言，并且烧牛粪做饭。起先，他就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他坚持自己亲自去执行这次危险的使命，而不是将这个主要任务交给低级官员。由当地的联络官菲利普·柯比·格林上校帮助。菲利普身材魁梧，正直勇敢，还是位著名的业余画家。他让我随后就去，为他们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我们将这次行动代号命名为“日光”。

如果说这次“日光”行动是一次谋杀行动未免有点太粗鲁，不过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的计划简单，确定格里瓦斯的

^① 塞浦路斯地名。

位置，调兵包围。我们很清楚他是不会投降的。就像我们最近包围他那两名忠实的军官一样，他宁可死于乱枪之中，也决不会投降。

1959年1月17日，我抵达了尼科西亚^①，然后直接去特别分部的总部，开始研究马根对这些档案的分析。很显然，格里瓦斯的这场骚乱是经过周密安排的。有计划的恐怖行动接连发生，与此同时，在整个岛上民众的骚乱一浪高过一浪。因此他肯定与他各地的官员保持经常的联系。看起来，埃奥卡不会用电话和邮政通讯方式与格里瓦斯联系，尽管各个部门都渗透着他们的人。他们之间的联系肯定是通过信使联系。从档案分析看来，这些信使多数是女人，乘坐公共汽车、火车、轮船等到处传递消息。我们在周围布置了一些观测站和侦听站，最后发现利马索尔（塞浦路斯地名）是埃奥卡通讯网的中心。在离利马索尔仅有几公里处的埃拉萨和洛德西亚的村庄里我们也布下了许多观察站。最后我们猜测格里瓦斯在这些村庄都设有指挥部。

第一步我们要在马卡诺斯的总部里装上电话窃听器。我们认为马卡诺斯或许在一些时候还有埃奥卡都会用安全的电话进行通讯联系，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这条线上装上了窃听器，他们渗透在邮电局的间谍自然会提醒他们的。

我们决定在通往马卡诺斯总部的电话线上装上一个秘密窃听器，窃听器使用电话线电源，将窃听到的信号发回我们设在一两公里以外的接收机。军情六局技术高超的约翰·威克和我一起执行这次行动。他曾经在德国警察的鼻子底下成

^① 塞浦路斯首都。

功地将窃听器安装在柏林隧道里。这次行动危险性极大。威克在夜里爬到了电线杆顶上，在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卡诺斯的警卫和埃奥卡游击队不断地在巡逻。他在电线杆的顶部钻了个洞，将电子窃听设备藏了进去，并且在电话线上接上了秘密接头。我在下面为他递送工具。每隔五分钟，当巡逻兵走过时我们都要屏住呼吸。随时都会暴露目标，发生枪战。两小时后，心中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窃听装置成功地安装完毕，从此打通了监视马卡诺斯的主要渠道。

而“日光”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找到格里瓦斯。我敢肯定格里瓦斯也在监视我们部队的通讯联系。每次发动大搜捕时他都事先得到了情报。我制定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首先是要查明他的接收机天线，然后我们准备再给他提供另一种接收机，接收机里带有一个信号机，根据它发出的信号，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了。我们知道格里瓦斯从埃及人那里购买了大批军事通讯设备。这些设备都是埃及人在苏伊士战争中从英国人那里没收过来并将其低价出售的。军情六局收买了一名希腊籍塞浦路斯军火商，他从埃及购进了一批接收机。我对这种接收机进行了改进并装在一个无线电信号机上。我们准备设法将这台改进的接收机送到格里瓦斯的总部。

“日光”的第一方案进展顺利。我同K.G（局里都这样称呼柯尔比·格林）和马根开始在清晨对利马索一带进行侦察，目的是想找到格里瓦斯的发射天线。此次行动风险较大。我们先沿着一条灰蒙蒙的小路，穿过阳光曝晒的市场。我们三个都装扮成漫无目的的旅行者，当我们走过时，路旁棚子的老人都盯着我们，孩子们也用多疑的目光看着我们，然后很快就在小巷消失了。我觉得浑身冒冷汗，并产生了一

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在身后的某个土房顶上或是老石墙后面有人用枪瞄准我们。

在埃拉萨，我在一座尖顶教堂的顶部注意到一节细长铁签。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是避雷针，固定在横穿房顶的一个绝缘物上，再通过一根金属丝与接到地上。可是当我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时，却发现这根金属丝没有接到房顶的那根长铁签。显然那是一根改装的天线。我们异想天开，试图靠近这座教堂。可是不知从什么地方闯出一大群愤怒的孩子，用石头向我们袭击。我们连忙撤退，没想到在波洛德西亚又遭到孩子们的攻击。看来我们的设想是正确的，这两个村庄就是格里瓦斯的活动中心。

我开始着手对那台无线电接收机进行无线电跟踪。据我估计“日光”行动半年后即可见分晓。但是在1959年2月底，正当我们即将成功的时候，殖民部克兰开斯特大厦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草草了结这次塞浦路斯事件。因此我们马上即将取得的成就在这样一夜之间化成泡影。当马根得知格里瓦斯从我们预测到的地区逃到希腊时，非常恼火。格里瓦斯不会善罢甘休，将会在希腊变本加厉地继续煽动塞浦路斯的骚乱。马根认为这次会议什么重大问题都没有解决，这种草率的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从他看来，殖民部这种缺乏远见的作法将会留下永久的祸根。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离开塞浦路斯之前，我和马根遇到了总督休·富特勋爵。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一直是把我们的“日光”行动作为在外交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最后的一个补救措施。似乎他不理解有效的情报工作应当自始至终地以外交形式作掩护。回顾一下此次事件的经过，我坚信如果1956年我们第一次要求参

与此案，并开始“日光”行动的话，拟定和约条件的就不是埃奥卡，而是殖民部了，这个漂亮的岛国三十年中也许会选另一条道路。

整个塞浦路斯插曲给英国殖民政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处理殖民地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从殖民地撤回自己的军队，同时又保证当地部队不会趁机起来重新暴乱。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扶植一个稳定的地方政府？殖民部好搞复杂学院式和民主的那一套——这里一个宪法，那里一个议会，可是成功的机会却微乎其微。塞浦路斯事件过后，我写了一篇报告交给霍利斯，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向布尔什维克学习，因为它是我们值得仿效的唯一成功的榜样。列宁很聪明，他懂得怎样夺取政权和怎样维持政权。列宁认为一个政治集团首先要控制军队和情报机构。这样就会防止军队或另一个政治集团篡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当时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建立“契卡”（肃反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的。他在“契卡”中设了三个处——第一处主要负责对付来自国外的颠覆活动；第二处负责对付国内的颠覆活动；第三处把势力渗透到军队里以防止兵变。

霍利斯以及情报五局的其他官员看了我的报告后很害怕，他们说我的报告有点“冷嘲热讽”的味道，所以没有把报告送殖民部。回顾一下二十多年的历史，凡避免军事专政的新国家都是采取了列宁的原则。

1959年我在中央情报局做报告时，这些观点也引起激烈的反对。赫尔姆斯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在宣扬第三世界要施行

共产主义。他认为我比他们的情况优越，我们是殖民地的统治者，而不像他们在远东和古巴那样什么也不是。他说他们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军事干预，正是这种思想最终使他们发动了越南战争。

说近一点，这种观点也使他们又卷入了古巴的“猪湾”事件。当事故发生两年后哈维听到我给他讲述塞浦路斯事件的经历后，感慨不已。两个事件的同样问题在于它们都是岛国，都是由所谓超凡的游击队领袖发动的骚乱。我认为如果没有格里瓦斯的话，埃奥卡就会崩溃。这个观点竟使哈维吃了一惊。

他问我：“如果是英国，你们怎么处理古巴问题呢？”

我有点紧张，不愿被扯入这次古巴事件中去。在我来华盛顿之前，霍利斯与我商讨了古巴事件。他毫不隐瞒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央情报局正在加勒比海作茧自缚。他认为对此问题最好是避而不谈。我害怕如果我对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我的意见，很快就会传遍华盛顿，而中央情报局也会把我的讲话当作英国官方的态度。这样，消息很快就会传回莱康大楼。因此，我首先向他们声明我的谈话仅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代表官方。

我说我们将继续发展我们在那里已经取得的成就——加紧扶持新的地方领导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道：“这些我们已经做过了，但是这些人都在弗罗里达，自从‘猪湾’事件以来，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在古巴国内的一切……”

哈维开始试探我是否能透露一点英国在加勒比海几个殖民地的活动。

我对他说：“我不相信我们在那儿会有什么活动。伦敦明确指示我们不要管古巴的事。六局也许在那里有活动，不过这事你得去问他们。”

安格尔顿问：“你们将会怎样处置卡斯特罗呢？”

“我们可以发动该国人民去反对他，使他孤立无援……”

哈维插话说：“你们会不会刺杀他？”

我停了一会，将餐具叠起来。招待员不作声地从这里去到那里。我现在才意识为什么哈维需要了解我是否可靠。

我回答道：“当然有这种可能，可是我认为我们现在不会那样做。”

“为什么不会？”

“我们不会再参预这样的事了，比尔。苏伊士事件到现在我们已经脱身好几年了。”

苏伊士事件发生时，情报六局通过伦敦分部计划用神经性毒气谋杀纳赛尔。这个行动艾登先是同意的，后来商定要与法国和以色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他又否决了这项行动。当联合行动失败，他不得不撤军时，他再次批准进行刺杀行动。这时军情六局在埃及的官员都已被纳赛尔逮捕，我们策划一个新的行动计划，准备启用一些谋反的埃及军官，结果这次行动又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我们藏在开罗市郊的武器出了故障。

哈维问：“你当时参加了吗？”

我诚恳地回答说：“我仅仅就技术方面的问题做了点工作。”

我向他们解释说六局伦敦分部计划这次行动的两位技术官员约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逊曾就他们的计划来征求过我

的意见。后来，我同狄克逊和亨利一起出席了由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联合举行的研讨会。在五十年代，整个化学研究领域是个大热门。我与军情六局对波尔顿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主要调查了使人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胺在审讯中使用程度及其范围。甚至我有一次主动要求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也想了解一些有关高级毒剂的研制情况。我们需要的是解毒剂，目的是为了防止苏联人在英国用毒药刺杀叛逆者，而情报六局要求毒剂的目的主要是在国外的行动使用。

亨利和狄克逊与我一起讨论了如何用毒剂刺杀纳赛尔的计划。他们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认为最佳方案是使用神经性毒气，主要是它操作方便。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局的伦敦分部在埃及有一个内线，他可以接近纳赛尔。他们计划将一罐神经性毒气装在纳赛尔的通风设备里。但我指出这个方案一是需要大量的毒气，二是会使大量纳赛尔官员丧命。军情六局的行动都是这样——一点也不实际。后来亨利私下告诉我，艾登取消了这次行动，对此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因为我早就认为这次行动是完全不现实的，毫无成功希望。

哈维和安格尔顿详细地追问了苏伊士行动的每个细节。

哈维解释说：“我们正在发展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目前很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哈维一认真起来时，说话就像那些华盛顿官老爷一样，语言单调僵硬，令人很不舒服。哈维知道，五十年代期间他们曾用小型天文卫星在苏联边境上用其接收机搜寻苏联火箭的信号（这时还没有新一代卫星）。上面命令他们不要给敌人抓住，为了逃脱搜捕，可以使用武力。

我对哈维讲：“贝尔，这些人可不是随便就能为你效劳的。你可以在他们那些退休的人员身上打主意。不过这事你最好请教一下军情六局。”

哈维看上去有点生气，好像我故意在搪塞他。

我问他：“你是否找过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战时他在纽约专门干这种事。听说他雇了一些意大利人，当然那时对付德国海上间谍只有这个办法。很可能是黑手党的人，我就知道这些……”

安格尔顿把我的话记在笔记本上，抬起头来，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计上心来：“法国人！你们有没有找过法国人？他们善于干这种事。譬如在阿尔及尔。”

安格尔顿又记了下来。

哈维问道：“在技术方面，你们有什么新设备吗？”

我对他讲在毒气行动破产后，军情六局又发展了新的武器。有一次我到波尔顿参观了由爆破研究发展中心设计的一种烟盒毒针。这种毒针是从烟盒里发射出来。我们都穿上白大褂，由专门负责军情五局和六局技术工作的拉德尔博士把我带到波尔顿后面的一个动物实验中心。他用绳子牵着一只羊。这只羊半边身上羊毛都被刮得干干净净，露出了粉红色的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拿出烟盒上前去。这只羊就立即挣扎起来。但被绳子拴着动不了，我正想是不是这种武器出了差错，这时羊四肢弯曲，眼球转动，嘴里吐沫，慢慢地倒在地上，立即死去。一群身穿白大褂的专家围上前来，对这种新式毒药的作用讨论了一番。我喜欢动物，也喜爱情报工作，但有生以来，才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两种爱好会相互冲突，此

时此刻我更可怜这个无辜的动物。同时我也很清楚和平时期不应该采取暗杀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提供这些了，这样我还是觉得我给他们透露得太多了。安格尔顿的笔记本使我感到有点紧张。他们看上去决心很大，好像真要用这种手段对付卡斯特罗了。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对我所提供的信息还有点不满足。

分手时，我对他们讲：“你们可以去问问约翰·亨利和狄克逊，他们比我知道得多点。”我打算第二天就飞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吗？”此刻我注意到了他上衣下面那鼓鼓囊囊的手枪。我想他可能是指“筏夫”。

我叫了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已经给你说了，我们的戏已经收场了。我们在联盟中只是个小弟弟，不是吗？现在要看你们的了。”

哈维没多少幽默感，安格尔顿也一样，两人听了我的玩笑后都没笑。

第十一章

1961年在伦敦的街头巷尾，人们依然谈论着破获朗斯代尔案件的巨大胜利；与此同时在华盛顿一位年青的新总统^①正在为美国的繁荣昌盛勾画着宏伟蓝图。而在我们秘密情报的地下王国里，不平静的十年已经成为过去。整个五十年代里英美情报机构以明确的目的和奋勇献身的精神来赢得了这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这并不是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也没有什么极其复杂可贵之处。但是在六十年代，大批的情报官从苏联情报中心投奔了西方。几乎每人都带来了一些足以使西方安全机构受到威胁的情报。他们的情报通常自相矛盾，极为混乱，英美情报机关对他们这些情报渐渐麻木了。

第一个投奔西方的情报官是在1961年12月，这时我从华盛顿回来已有几个星期了。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于手头上的事情，阿瑟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手拿着一支香烟，一手拿着一打《泰晤士报》，他把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递了过来，他指着一名苏联重要间谍克利莫夫照片说：“很有意思……”克里莫夫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到了驻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要

^① 指肯尼迪。——译者

求避难。

很快我们就得到了情报，克里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1962年3月D处的官员们异常兴奋，阿瑟的娃娃脸红润发光，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我知道他们盼望已久的克里莫夫的情报终于到了。

一天，我问他：“是不是已经得到他的材料了？”

他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开始对我讲述克里莫夫的经历。他说：“克里莫夫”实际上就是阿纳托里·戈里金，去赫尔辛基任职前因曾当过克格勃第一分部的高级官员，专门负责对付英国和美国的工作。后来他又在莫斯科的情报总部任职。其实，戈里金早就被中央情报局纳入海外间谍的名单。只是他在赫尔辛基自首前一直隐姓埋名，使我们未能搞清他的真实身份。除了这些材料外，中央情报局又向军情五局提供了十分详细的介绍。每份介绍都列举了戈里金提供的苏联对英国安全机构渗透的证词。阿瑟掌握所有的这些介绍资料。D处三科（负责技术研究）代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些介绍资料做了初步分析，并列出了嫌疑者名单，然后D处一科负责详细调查。我是这些调查的技术顾问。

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这十份介绍中有三份引起军情五局的震动。戈里金说他知道在军情五局有一个著名的“五人帮”间谍网，它是克格勃三十年代在英国发展的。这五人互相认识并都了解彼此的身份。可惜戈里金对这五人一个也不认识，此外他还知道，其中有一名代号是斯坦利，这人与最近克格勃的中东行动有关。他所讲的斯坦利就是金·菲尔比，

对此我们确信不疑。菲尔比曾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讲的五名中的其他两名肯定是伯杰斯和麦克莱恩。我们猜想第四个人可能是安东尼·布伦特，他曾先后担任女皇名画监察，二次大战时期他是军情五局一名军官。1951年伯杰斯和菲尔比叛变后，他是重点怀疑对象。但是第五个人是谁仍然是个谜。由于戈里金的这三份介绍都涉及“五人帮”间谍网，我们只好对菲尔比和布伦特一案再次进行调查。

十份介绍中的第三份和第八份最新，简明地介绍了埋伏在海军内部的间谍线索。从这些情报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间谍像霍顿一样，极力在刺探英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海底攻击及反击的能力方面的情报。第三份介绍说到克格勃在驻莫斯科英国使馆海军武官的办公室里招收了一个间谍。这项行动是在戈里巴诺夫将军监督下进行的。戈里巴诺夫将军是苏联克格勃负责国内情报活动的一个副处长。一位名叫米克海尔斯基的在英国使馆内工作的苏联雇员参加了此次行动。这个间谍把送到他手中的文件抄下来，再送到苏联人手中。戈里金说，后来在1956年这名苏联间谍返回伦敦到海军情报部工作，而他的控制人随之调到国外行动部。根据戈里金的第八份情报，这个第二名海军间谍级别更高。戈里金声称他见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份带有编号的手抄文件，其中有两份是特等机密文件。他说他在克格勃情报部负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的办公室里工作时偶然见到了这三份文件，这些文件对他们制定北约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这三份文件从伦敦送来的时候，戈里金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军战略报告。通常到戈里金手里的文件都是经过删改的，换

句话说，到他手上的文件都通过重新打印，去掉了信息的来源。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就给他看了这三份文件的原件。中央情报局对他的供词进行了核实。需要核实的这三份文件中叙述了扩大克莱德北极星潜艇基地及在地中海重新调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军部署情况。中央情报局将这三份文件与其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文件混合在一起让他辨认。他立刻辨认出这三份文件。另外他还说所见到的那份有关克莱德基地的文件有四套数码编号，但我们给他辨认的这些材料有六套编号。我们又核对了传阅单，证明确实有这样一些文件，只是目前我们无法找到。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分析了这三份文件的传阅情况。通过分析，唯一有可能泄密的人是一名现已退休了的海军高级指挥员。我们把这案子转交给D处一科。

在戈里金投奔西方的后几个月里，又有三名苏联情报中心官员投奔西方，在两名官员中，一名是克格勃官员，另一名是格尔乌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他们投奔联邦调查局后，主动要求以原身份为西方提供情报，他们在联邦调查局的代号分别为“软帽”和“礼帽”。第三位投诚者是尤利·诺森科，他是克格勃的一名高级官员。他1962年6月在日内瓦与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并主动提出愿为西方情报机构效劳。

诺森科很快为我们搜捕英国海军里的间谍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他声称戈里巴诺夫征募的那名间谍是用同性恋敲诈的方式得到的，被敲诈的这名间谍将从海军大臣那儿搞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机密透露给了克格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文件的泄漏和戈里巴诺夫的间谍案使军情五局对中

央情报局提供的第三份和第八份文件进行了综合分析。经过分析，我们开始怀疑一名在卡灵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他叫约翰·瓦萨尔。起初约翰被斯图尔特列为四名泄露第三部分文件的嫌疑犯之首。但是当我们将此案转交给负责调查的龙尼·西蒙兹后，西蒙兹对斯图尔特的推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瓦萨尔是名天主教徒，本人品德修养较好，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因此他就没有把瓦萨尔列为重点怀疑。后来我们根据诺森科提供的线索，又将注意力重新移到他身上。不久得到证实，他正在搞同性恋，并在海豚广场有一幢豪华的住宅，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这样一来军情五局又遇到令人头疼的老问题。间谍案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它没有任何作案的痕迹。证据就更难查找，除非作案者自己供认或是当场被抓获。军情五局找到我，他们想请我提供些必要的技术来证实瓦萨尔从海军部偷出文件一案的罪证。我与弗兰克·摩根一直在实验一种新技术，将少量的放射性物质标在秘密文件上，这个实验的道理是将一台盖革计数器①放在间谍可能出没的楼门口，一旦他将文件带出来时我们就能发现，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成功。因为海军部大楼有许多门，我们无法肯定瓦萨尔要走哪道门。再者，放射性物质易受手表之类的发光物质的干扰，效果不十分理想。此外海军部领导认为这种方法会对人体有害，所以我们只有作罢。

我只好再用其他的方法了。中央情报局对戈里金进行测验，证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我决定再对他进行一次测验。我想了解他是否还能记得那份偷拍的文件上的一些纲

① 一种用来监视射线的仪器。——译者

节。因此我们即可知道瓦萨尔提供给苏联那份文件是否原件。我用二十五种不同方法拍摄了克莱德基地北约文件的第一页，这二十五种方法都是苏联间谍和其使馆里惯用的。然后我把这些照片通过中央情报局转给了戈里金。他一眼就认出用两边带有闪光灯的普拉克蒂纳照相机拍摄的照片。知道这一消息后，我们趁瓦萨尔上班的时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我们在他办公桌的底层发现一台普拉克蒂纳反拍机和一台米诺克斯照相机。当晚我们就逮捕了他。我们经过批准又对他的住宅进行一次彻底搜查。在一个桌角底部的抽屉里发现了好几卷35毫米的胶卷。胶卷冲出后露出176份绝密文件。瓦萨尔很快承认了1955年在莫斯科因搞同性恋被苏联人敲诈而被迫加入克格勃。后来他被判处了18年徒刑。

在戈里金所有的介绍中，我们最注意的是有关克格勃对军情五局的渗透情况。阿瑟从华盛顿回来后我就了解到这些情况。戈里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里见到一个专门存放来自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制保险柜，并见到这些情报的索引。他确信军情五局最近的情报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机构获得了一份文件，据他们讲是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技术的一本很薄的文件。戈里金没能对这份文件仔细研究，因为克格勃只是让他翻译其中的一段。然而很显然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不然的话他们不会那样着急要戈里金把它翻译出来。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里有一套不同的安全措施，那里没设特别安全官员，因为克格勃对军情五局已经全面渗透，对其情报了解得一清二楚。例如当时的克莱布文件，苏联人事先得到了情报，克拉布要侦测苏联“奥安尼基兹”号巡洋舰。

1962年8月正当军情五局忙于研究戈里金的材料时，我

们在研究菲尔比的三份原材料上取得了新的突破。维克多·罗恩柴尔德在以色列韦茨曼举办的晚会上遇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从苏联流亡到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对维克多讲她对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发表反犹太人的文章感到极为愤慨。她说她很清楚菲尔比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担任秘密间谍工作。维克多费了好大力气才使她同意去伦敦与阿瑟当面谈谈。这次会晤安排在维克多的住所进行，我奉命对会晤进行窃听。我决定使用临时性的特别窃听器，但这使维克多有点紧张。

他对我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们这些家伙会把窃听器拆掉。”他让我向他保证由我亲自监督窃听器的安装和拆除工作。维克多总是认为军情五局对他一直进行秘密监视，目的是想了解他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他平时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成了办公室里谈话的笑料。我向他做了保证，并在会晤的前一天下午找到了邮电局的技术人员，我当场检查了他们改装的电话听筒。后来在会晤结束后，我对他们拆除窃听器工作也进行了认真检查。

我在莱康大楼八楼上对这次会晤进行了监听。弗洛拉·所罗门是一位非常怪癖的女人，令人难以相信。虽然她对菲尔比充满怨恨，但她对三十年代她与菲尔比这类人的真正关系避而不谈。她说二次世界大战前她就与菲尔比很熟，并曾经喜欢过他。当菲尔比作为《泰晤士报》记者在西班牙工作期间，有一次在他返回伦敦后邀她一起吃了顿午餐。当时他对她说：他正在为和平事业而努力工作着。工作极为危险，需要帮忙。她能不能帮助他？他正在为第三国际和苏联工作。如果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他们能一起奋斗就太好了。

她拒绝了他。但是她对他讲如果他遇到紧急情况时随时可以找她。

阿瑟没有进一步向她提问。这仅仅是她自己讲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真的仅仅扮演了一个被动角色，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在这次会晤中，她时时激动得难以控制自己。

“我决不会公开作证的，”她高声嚷道，“那样太危险了。你们可知道自我给维克多讲过此事后托马斯的遭遇吗？”她是指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一位油画商，他最近在西班牙一次莫名奇妙的车祸中身亡。

她恐惧地叫道：“这会泄露出去的。我知道会泄露出去的。那会毁了我们一家的！”

虽然她对苏联人感到恐惧，而对菲尔比却现出复杂矛盾的心理。据她讲，她至今还爱着菲尔比，后来她谈到菲尔比怎样虐待他的情妇等等。尽管她对她与菲尔比的关系只字不提，但我猜想三十年代他们肯定有段浪漫史，许多年后菲尔比另有所爱，所以所罗门开始对他进行报复。

在掌握了戈里金及所罗门的情报后，军情六局代表迪克·怀特与霍利斯一致同意在贝鲁特再次对菲尔比进行讯问。从1962年8月到年底这段时间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为这次讯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在开审前他们又改变了计划。原定要赴贝鲁特的阿瑟突然被撤换。阿瑟从1951年开始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对此人的情况他比任何人都熟悉。然而上级却委派尼古拉斯·埃利奥特替他前往贝鲁特。埃利奥特曾是菲尔比的挚交，是军情六局贝鲁特情报站的站长，从贝鲁特回到伦敦。现在他已对菲尔比的罪行确信无疑，因此上

面觉得派他去对付菲尔比比较合适。但是，我们几个五局的高级官员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吃惊，我们觉得这决定只是简单地考虑到人性至上的因素。我们一直确信菲尔比的罪行，现在我们手里掌握着证据，他根本无法抵赖。但以埃利奥特为首的菲尔比的朋友一直都为他开脱罪责。现在看来菲尔比罪责难逃，但他们想把此事遮掩起来，不向外张扬。派埃利奥特去调查此案，在情报机关里引起了很大风波。他是前任伊顿中学校长的儿子，有一种傲慢贵族风度。然而已经决定的事只好照办了。埃利奥特于1963年1月正式以外交人员的身份飞抵贝鲁特。

一周后他顺利归来，菲尔比承认了自己自1934年以来一直从事间谍活动。他很想回英国，自己还写了一份自白书。十几年来这个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结束。

我们这个秘密世界里的许多官员在听到菲尔比招供的那天晚上都觉得一夜之间自己变老了许多。我已近45岁了，这究竟是不是事实，说出口来真让人难以相信。突然之间这场激烈的战斗平息下来，一座坚城终于被攻破了。菲尔比案件非同朗斯代尔案件。对付朗斯代尔我们派警察即可将他抓获，可菲尔比却是那样和蔼可亲，受人尊重。而恰恰是这么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出卖了。想想这惨痛的教训，我们为此牺牲的情报官员及设备！我们的青春年华随之而去；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

几天以后我在走廊里遇到了阿瑟。他异常沉默，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头，就好像他刚刚看到一次悲惨的交通事故一样。

他悄悄地说：“金逃跑了。”

“我的上帝，这怎么可能……”

阿瑟露出了一丝苦笑：“就像1951年那两个家伙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极大地伤害了军情五局的官员。直到那时克格勃渗透到军情五局中这件事一直还在保密，事情公开后把军情五局搞得人心惶惶。很明显，像1951年麦克莱恩叛逃时一样，这次肯定有人事先给菲尔比报了信。这个人就是仍埋藏在军情五局的第五个间谍。当然这完全可能就是戈里金证词里所提及的五人帮情报网的第五个人。伯杰斯、麦克莱恩、菲尔比、第四个几乎可以肯定是布伦特，还有这第五个人。这个人度过了1951年的难关，至今仍隐藏在军情五局内部，正在注视着我们这场还没了结的危机。

我与温特博恩常常谈起这个问题。他认为克格勃对我们的渗透肯定是在军情五局的领导机构。

他常这样讲：“我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无能。”

我们的“合唱队”行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上了我们探针窃听器的小洞），事过8年后温特博恩仍旧经常提起此事。另外还有一些其它事件也引起了他的怀疑。我们在中国使馆的电话上安装特别窃听器，可很快就被苏联人拆除了。后来又出现了福尔伯事件。在我们完成了“党的样版”行动之后，军情五局一直寻找着苏联人向英国共产党提供秘密经费的档案材料。我们怀疑他们会把这些材料存放在鲁宾·福尔伯的住宅里，因为最近是他负责苏联经费的调出工作。法布勒是一名共产党高级官员，后来他登广告要将他住所的第一层向外出租，我们趁此机会安插了我们的人。在我们准备对楼上进行搜查时，法布勒毫无道理地把我们派进去的这位房客赶走了。

我决定亲自对这一切做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研究从档案库借来的许多档案。首先是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安装窃听器的档案记载——伦敦的“合唱队”行动，加拿大的“蚯蚓”行动和“猪筋”行动。这些行动的失败却使我感到莫名奇妙，还有澳大利亚的“鼯鼠”行动。对此我一一做了认真的研究。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作出许多解释，但是军情五局内部有一名间谍告密这一点也不能排除。另外还有那些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的案子，同样也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也许我们太笨，也许是福尔伯自己猜出了我们那位特工房客的身份，可是我又觉得这不大可能。很可能是军情五局内部有人泄密。后来我又调出了五十年代我经手的双重间谍档案，一共有二十多份，但没有一份是有价值的。当然这些行动的失败多数是由于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平不高和跟踪人员的通讯被窃听的缘故，但是蒂斯勒案件使我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我们对卢拉科夫——“莫罗”试验也不能排除我们内部有隐藏着一个鼯鼠的可能。然后还有朗斯代尔案件，菲尔比案件，好像都是一个模式。

所有的迷雾最后终将被冲破。1962年底至1963年初，我在那几个令人压抑的月份里研究了许多档案，反复思考着我在近8年的工作中遇到的那些问题，突然一切都明白了，那时的猜测终于成为了事实。军情五局里隐藏着一个间谍，现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查阅这些档案的发送日期，只涉及到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还有我自己。我知道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卡明，我一开始就没怀疑他，因为搞这种事他的智力不行。因此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难道会是霍利斯？他待

人冷漠，专横独裁，我对他总是敬而远之。或是我们的副局长米切尔？他这个人难以捉摸，看起来是那么狡猾，与你讲话时总是避开你的眼光。但他是个聪明人，他的智力作一名间谍绰绰有余，我知道我可能对他有偏见，但我总觉得很可能是米切尔。

在我开始进行秘密调查时，我故意把档案都放进保险柜里，在档案材料下面用铅笔做了记号，这样一旦档案被移动的话我就会发现。一天上午我去上班发现档案被人动过。只有两个人能打开我的保险柜，一个是局长，另一个是副局长。他们有保险柜的所有钥匙。一时间我觉得阴云密布，叛逆活动竟悄悄来到了自家廊道里。

自从菲尔比招供以来，阿瑟变得出奇地沉默。我能看得出他很忙，但当我问他在做什么时，他总是回避我的问题。连续几个晚上，我都到靠近尤斯顿站他的住宅拜访他。尽管我们一起谈论戈里金案件的进展，但当我问起他对此案的打算时，他却沉默无言。我心里很清楚我很可能会被解雇或是调离现任工作，所以下班后经常借故到阿瑟的办公室里去找他，随身带去自己暗地研究过的38份案例。

我故意拿过去我们在双重间谍行动或窃听中遇到的那些模糊不清的问题来问他：“你看这值得注意吗？”阿瑟毫无表情地看着我给他的材料，只是对我表示感谢，其它什么也不讲。最后有一天晚上阿瑟对我说：“彼得，你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吧？”

我说：“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姆。”

他说他正对米切尔进行调查，他认为菲尔比叛逃一定有人告密，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

姆，可是他也难以肯定究竟是谁。因此菲尔比叛逃后，他立刻找到了迪克·怀特，向他诉说了他自己的想法。迪克曾是阿瑟的老师，四十年代他曾为阿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此阿瑟终生难忘。迪克让他明天再来，他要仔细地考虑一下再给他答复。阿瑟第二天找到了他，迪克一直以其理智见长，他认为罗杰不会是间谍，但米切尔有可能。迪克建议阿瑟将此事汇报给霍利斯。结果霍利斯立刻让阿瑟调查米切尔。在我们这次谈话之前他已经调查了一段时间。

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自从蒂斯勒案发后……”

阿瑟打开抽屉拿出了一小瓶苏格兰威士忌，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咖啡杯。

“你对罗杰讲过吗？”

我对他说，这事以前我已经给罗杰说过两次了。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后，另一次是朗斯代尔案件后，两次他都否决了我的看法。阿瑟似乎有点惊讶。

“你已猜到我在干什么了吗？”

“在调查米切尔？”

他避开了我的提问：“金的逃走并非偶然，幕后肯定有人帮忙，仅有格雷厄姆那样的人才能帮上这个忙……”

阿瑟告诉我菲尔比逃走后他去找迪克·怀特，告诉他自已怀疑霍利斯或米切尔是间谍。阿瑟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

阿瑟让我亲自再找一下霍利斯。

“你对他说我们一起谈了这件事，我建议你去 找他，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我给霍利斯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没想到他要我立刻就

去。我乘电梯上到六楼，站在他办公室外面等待着门上的绿灯。他的秘书把我带到里面，霍利斯笔直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上面是一个凸窗，正在翻阅一份文件，旁边有一排削得尖尖的铅笔。我走到他的办公桌旁，他仍在低头看他的档案，我在那里呆站了几乎一分钟，霍利斯办公室墙上军情五局前任局长的画像，似乎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盯着我。我在耐心地等着。霍利斯还是在忙着翻阅文件。

最后他说：“彼得，什么事？”

刚开始，我有些紧张，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到了这关键时刻我却觉得有些难以开口了。

“先生，我与阿瑟·马丁谈过了。”

“是吗？”他的声音里没有一点惊奇。

“我对他讲了我的担心……”

“我明白……”

他还是继续干着他的事。

“先生，我又搞了份分析报告，他让我给您看看。”

“把它放在那边桌子上，你……”

我转身走到那个硕大光滑的大会议桌前坐下。霍利斯走了过来，默默地开始看我的分析报告，偶而提两个问题。不过我意识到他今天不会反驳我，相反他好像正希望我来找他。

他看完后问道：“他知道他半年后就要退休了吗？”

“米切尔？”我惊奇地问。据我所知他至少还要再干上几年。

“他刚刚提出了申请，现在已经改变不了。我要求你半年之内把这事搞清楚，你可以与马丁一起调查，我和威利斯作你们的后盾。”

他把分析报告又递给了我。

“对此事我不必多说了，你肯定知道我的态度，这次调查一定要守口如瓶，明白吗？”

“完全明白，先生！”

他走回办公桌，拿起了铅笔，然后又说：“你要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我让阿瑟先把他的工作档案给你看看。”

“谢谢，先生。”

我出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写了起来。

第十二章

我期望得太高了，米切尔调查实在进行得令人窝火，事情从吵架开始，以吵架告终，其间几乎没什么效果。我清楚，要想在米切尔退休之前想方设法确定这个案子，就必须依靠窃听，使用一切我们可用上的技术设备。霍利斯强烈反对我们提出的室内电话窃听以及充足的监视设备的任何要求。他说他不准备再调更多的军情五局军官投入这项调查，而且也绝对不打算去请求内务大臣允许对自己的副手的住宅进行窃听和夜间搜查。

阿瑟对这一挫折反应强烈。他的脾气此时是一触即发。在霍利斯办公室开的一次会上，当他明确地、平心静气地提出需要设备而被局长断然拒绝时，那股怒气终于爆了出来。阿瑟说，在如此严重的问题处于危急关头时还要限制他进行调查实在让人无法容忍，他威胁说要去找首相本人提醒他注意事态的严重性。

霍利斯对任何威胁的反应，态度总是很圆滑，他只是说阿瑟的话他记着了，但他的决定仍然不变。

“无论如何我不会授权扩大这项调查！”

阿瑟愤然走出办公室，显然他完全是要去实现他的威胁。

那天晚上，我和弗·琼斯去了我的俱乐部——牛津剑桥俱乐部，想找个法子避免灾难。从卡明被委派到D处任处长后，霍利斯与阿瑟的关系就急剧恶化了。而且现在米切尔案又这样危险地僵持着，任何一点组织内部的骚乱都会带来灾难。

弗·琼斯所处的地位非常尴尬。他也和我一样明白，过不了几个月他自己就会是霍利斯的副手了，但我看得出他觉得霍利斯的确是在阻挠调查。

“如果阿瑟做出蠢事的话，那就意味着五局完了，”弗·琼斯对着杯子阴郁地说。

我问他难道他不可以独自去找迪克·怀特谈谈，看能否给霍利斯施加点压力，而让他放宽点吗。弗·琼斯看着我，显得非常苦恼。他明白自己正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两种对抗力量同时慢慢挤逼着他，逼他作出选择，是忠诚于霍利斯，还是忠诚于那些正在进行一项艰难而又牵扯到同事间感情问题的内部调查的人们。

直到深夜一点我们才作出明确决定。弗·琼斯答应，如果我去阻止阿瑟的任何轻率行动，他就去约见迪克·怀特。我从俱乐部给阿瑟挂了电话。夜已很深了，但我知道他不会睡，一定正在守着瓶苏格兰威士忌喝闷酒。我说我必须当夜就见他，于是我坐了出租车到了他的寓所。

阿瑟显得很好斗。

“我想你来是要告诉我你也决定退出不干了！”他尖酸地说。

那晚我又第二次坐下来，喝酒，长谈，试图说服阿瑟。他看上去精神过度紧张疲劳。从朗斯代尔案子开始以前起他

一直严重劳累过度，而且体重还急剧增加。他面色灰暗，青春活力正在消失。他抱怨横在他面前的阻力。我可以看出，1951年的幽灵还在作祟。那时他被撇开到马来亚去，而他本人也接受了。

“我那时应该斗争的，可我却同意了。当时看来最好是不干，但这次不一样。”他说。

最后他终于明白了弗·琼斯的意思。公开与霍利斯不和会给我们的调查带来不利后果。况且至少还有希望，迪克会说服他同意我们需要更多设备的部分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了弗·琼斯的电话。他说他与迪克说了，要我们都于下星期日下午在他的安妮女王门的寓所里集中。

“他想要一份案子的情况介绍，然后决定怎么办。”

迪克·怀特的寓所背靠百老汇街上的军情六局总部。我正好按指定时间到达。迪克开了门；他穿得挺随便，敞领衬衣里打着领带。他把我们引进书房。这是一间雅致的，书籍排列整齐的房间，装饰得具有十七世纪的风格，沿墙挂着来源于国家美术馆藏画中的作品，一面装饰镜闪闪发光地立于壁炉之上。

“我们喝点茶好吗？”他问，急欲打破明显地表露于每人脸上的紧张情绪。

“现在，”他看着阿瑟说到，“我想你最好把你那案子……”

阿瑟解释说带来了根据掌握到的38件案子的材料作出的分析图表，所以他建议若先由我介绍情况可能更好些。因为图表太大无法摊在那张小巧玲珑的茶几上，一时弄得众人手忙脚乱的，迪克立刻发现了这点。

“没关系，没关系——摊在地上好了，”他说。没过两分

钟我们就都散坐在地毯上，我们再次详细摆了情况，于是那优雅的星期日下午的静谧也随着我们枯燥重复的话题而消失了。我解释说：对五局渗透的问题我已两次上交过书面意见，一次是根据蒂斯勒的情报，另一次是根据朗斯代尔案件，但两次均被驳回。迪克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但没说什么。

“总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这个问题，”我对迪克说，“所以这些图表的根本目的就是试图通观全局，看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俄国对这些案子的干扰……”

“听起来像是个不高明的归纳，不过，说下去吧。”迪克怀疑地说。

我把案子逐个说了一遍，而且说明了怎么最后总是归结到那相同的五个人身上。

“你在得出这一结论前是否在任何阶段上与阿瑟讨论过？”他问我，目光直射我的眼睛。

“我怎么会呢？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科学处那边。”

迪克转向阿瑟。

“你想告诉我你们两人都得出这个结论吗？”

他显然是发觉这很难让人相信。

阿瑟接着介绍情况，解释有关设备问题。迪克又问弗·琼斯态度如何，他一直没开过口。他停了会儿，然后作了明确的表态。

“罗杰拒绝扩大调查。我个人意见认为这是个错误。当你既缺乏人手又缺乏技术援助，两者加在一起时，要想找出这个案件的答案的确没什么可能。”

弗·琼斯明智的评价引起了迪克的重视。

“这里有两个因素，”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必须进行调

查，而且还必须让人理解我们要进行调查，而这几乎同样重要。

他说当然得做一些变动。他认为应从一个非官方地点而不是从政府机构大楼对调查进行协调。于是他提供帕维里恩路上靠近斯隆广场的军情六局秘密活动点让我们使用。

“今晚我要想想对罗杰说什么，你们会从他那里听到决定的。”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我们，霍利斯允许给我们配备一队军情六局的监视人员，不过仍然不允许他们在跟踪米切尔时越过伦敦火车站，以免被发觉。我们还得到允许吸收温特博恩参加调查，并且有权在米切尔办公室的两面镜后安装闭路电视装置。那天下午我们将急速增多的案卷从伦敦的一头搬到了另一头的帕维里恩路上那座马店小楼上一套破旧的空房里。那里以后就是我们办这案子的总部。

米切尔的履历中几乎没什么有用的材料：生于1905年，求学于牛津，还做过记者，后来在保守党中央办公室当过统计员。这着实令我感到意外，我回忆当我与米切尔在对朗斯代尔案件发生争论时，他声称因为他“根本不是统计家”所以听不懂我的意思。他是通过托利党的关系加入军情五局的，在战时站在反法西斯一边，后来也和英国共产党有过联系。从那以后他晋升很快：四十年代后期成为F处（对付国内颠覆活动）处长，1953年成为迪克·怀特的第一位反谍报处处长，然后1956年霍利斯又委任他为自己的副手。米切尔的生涯中只有两件事真正引起人注意。一件是他的经历与霍利斯的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牛津的同时代学生，大约同时加入军情五局，又交替地爬上互补的位置。第二件事是米切

尔似乎是个潜力未得到发挥的人。他是个聪明人，被迪克·怀特挑中去改革D处。但在他三年的任职中，他明显地未能完成这项任务，而且的确，当联系到“维诺纳”下马的决定时，似乎他差不多是有意失败的。

对米切尔办公室的集中细致的监视收获甚少。我每天晚上用密写药处理他当天用过的吸墨水纸，这样我们能核对他写过的所有东西。但除了他通常在工作上写的文件外什么也没有。军情六局监视人员通过闭路电视不断地监视他。这差事挺烦人；每天早上米切尔进办公室后就用牙签对着双面镜剔牙，而且午饭前午饭后又细致地重复这一过程。到了下班前，还要做一遍。案子快结束时我都开始觉得在米切尔身上我们唯一熟悉的部分就是他的扁桃体后部了！

我给他喂了“钡餐”资料。我将那几册我对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分析报告，连同所有的通讯分类和分组计数一览表都送到了他桌上。那些都是我刚替政府通讯总部整理出来的。如果米切尔是间谍，这可是他不应忽视的无价情报。我注视着监视器上的米切尔，他有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报告。后来，詹姆斯·罗伯逊进来了。他在五十年代曾一度主管过反苏间谍工作，是我的老对手。他开始谈论起我。罗伯逊因为我对当时他所在的D处作了改变而从不原谅我。他认为我是个新来的暴发户，应该在擅自发表建议以前先学会尊敬比我年长的和更强的人。他和米切尔讨论了我的无线电分析报告。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举动的目的。

“那个混蛋赖特，”罗伯逊刻薄地说，“他自以为无所不知。他是想让人治治他怎么的！”

米切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真忍不住要笑，这真有点

讽刺意味。

但除了这点轻松之外，干这种冷酷无情的监视差事可远远别想有什么愉快的时刻，成天从镜子的另一面盯着他，等着他的自我暴露。只有一次我认为可拿到他的可疑之处了。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开始在一张纸片上画了起来。他全神贯注地画了大约二十分钟，一边参看他从皮夹子里拿出的小纸片上的记录，然后突然撕掉了那张纸，放进了废物箱。从案子一开始，我每天晚上都在霍利斯的安排下搜查他的办公室，霍利斯的秘书负责将米切尔那些待烧的作废机密文件袋保留下来，以便可以查对。那天晚上我从废物箱中找到了那张纸的碎片，将碎片重新拼了起来。那是一张伦敦郊外乔布汉姆公地的地图，就在米切尔的住处附近，图上标着些点和箭头，箭头指着不同方向。图的中央是字母“RV”和两辆车的位置，两车各在同一条路的两端，那条路穿过一片公地，公地上是一个会合地点。

好几天帕维里恩路上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因为案子的整个焦点转移到了米切尔地图上指出的那个公地上的孤立的一点。但米切尔一直未接近那地点，也没有其他任何人出现。

当我最初开始搜查米切尔办公室时，霍利斯特别紧张。

“里面有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彼得，我要你保证它们不被泄露出去。”

霍利斯尤其担心的是人事方面的报告，以及其他那些与其说是机密不如说是令人窘迫的材料。他没有必要担心。我在米切尔办公室里看见的东西没一点让人感兴趣的，依我看这只是向我证实：在一个像霍利斯这样独断专行的人手下做副局长一定是世界上最坏的差事之一。

几个月来，每天晚上工作后我都要和霍利斯见面。起初他表示，对他这样不得不打听一位亲密同事的情况的做法感到厌恶。但我从来不觉得这种感情是真的。当我告诉他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频繁剔牙时，他笑得那么开心。

“可怜的家伙应该去找个象样的牙科医生！”他笑道。

至于我，我是坚决的，甚至是无情的。我等了几年了，想找机会尽力解决这个间谍渗透问题，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顾虑。

就是通过那些晚上的接触我才开始对霍利斯这个人有所了解。尽管我跟他工作已将近8年，我们还极少谈及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我们也有过关系紧张的时候，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只有一次我们有过一场大的冲突。那是五十年代后期当我在A处二科与休·温特博恩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一个阿根廷代表团来伦敦就肉类合同问题与英国政府谈判。霍利斯接受商务部的请求，要搜集任何可能的情报。他指示我们窃听阿根廷人。温特博恩和我都感到气愤。这明显地违反了芬得勒特—斯图尔特备忘录中对五局的任务所作的严格规定。五局只负责国家安全问题。A处二科中其他成员对此事的反应与我们的完全一致。于是霍利斯的指示被我们拒绝了。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等着被集体免职，但霍利斯撤销了他的指示，以后又再没提起过。这是军情五局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罢工者全胜而告终的罢工斗争！

在对米切尔办公室进行搜查的期间，霍利斯偶尔也和我谈起他早年的情况。他讲了他三十年代的中国之行，他曾在中国为英美烟草公司工作。

他极少谈到他的家庭生活，尽管局里许多人人都知道他长

期与人私通。只是偶然地，他谈起过他的儿子艾德里安，他是个有天赋的象棋手，这对霍利斯来说显然是非常引以自豪的。（艾德里安那时常去苏联参加棋赛。）

一次我们谈论这案子时我大胆地提出我的看法。我认为无论案子结果如何，它都表明我们保安工作的虚弱。霍利斯生气了。

“你指什么？”他问。

我告诉他对新进入军情五局的人员的审检程序明显地不如五局在白厅其他各部门制订的程序严格。

“你看我吧，”我说，“从1955年进来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受到审检呢。”

第二天表格就送到我手里，以后这问题就再也没提起过，不过事后不久审检制度就改变了。申请人今后必须提供更多的鉴定人，其中一个可以由五局指定。

前不久我决定要搜查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我问霍利斯要钥匙。

“那是盖·利德尔的桌子，”他说，“我接管时他就这么留在这儿的，在那儿放了好几年了……”

我征求他同意撬开两个锁着的抽屉。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拿来了开锁工具。我们检查了两个抽屉。两个都是空的，但一个引起了我的注意。在积尘中有四处小痕迹，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久前才被从里面拖了出来。我把霍利斯叫来，指给他看那些痕迹。他似乎和我一样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当我检查了锁心并发现了划过的痕迹时。好像抽屉最近被打开过。

霍利斯走过米切尔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之间相通的那扇

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独自检查完了抽屉。

“只有霍利斯和我才知道我要开那个抽屉，”我自己想着，“肯定有东西被拿走了。甚至可能是个录音机。为什么不是米切尔呢？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这是盖·利德尔的桌子。霍利斯从他那儿接管了副局长办公室。没钥匙？像利德尔那样的人是不会把桌子留下，又拿走钥匙的。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头来。霍利斯正从门里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盯着看，然后便又埋头于他的卷宗。

整个1968年夏天的几个月，随着米切尔退休日期的临近，调查在全力进行。但整个调查不可挽回地遇到了危机。事情全都太仓促，计划性太差。由于跟期限争时间，又缺乏霍利斯的支持，这行动的安全保障不可避免地遇到裂缝便会崩溃。米切尔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开始，他注意到文件到他那里变得不规律了。因为霍利斯试图限制他对文件的接触。以后他又采取回避策略，提防监视，夹紧尾巴退缩起来，表现出标准的反侦察行为。无疑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正在被跟踪。从闭路电视上看出，米切尔身上现出一个精神极度紧张的人所有的一切迹象，他像是给埋进了抑郁之中。他年轻力壮时又瘦又高，但到最后却明显地变得面色灰白，两眼深陷、暗淡无光。当他办公室有人时，他努力使自己谈笑自若，但人们一走，他便显得很痛苦。

“他们为什么对我搞这个？”一天他自言自语悲叹道，眼睛盯着霍利斯办公室的门。

在最后的一个月里，这件事竟成了一场闹剧。在那种条件下是不可能有任何发现的，所以阿瑟和我便敦促霍利斯批

准对米切尔进行讯问。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解决这个案子。霍利斯拒绝表态，但几天后，他突然来到了我们帕维里恩路的小房子。

“我去见过首相了，”他对在场的我们五六个人生硬地说，“恐怕讯问是不可能的。”

从眼角看过去，我觉得阿瑟又要发火了。

“这个时候要再来一个叛逃可是会造成灾难的。”他说。他三言两语对我们的努力表示了一下感谢，然后便消失在等候在下面的汽车里了。这就是典型的霍利斯对部下的错误态度。这里都是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都在拼着命地工作，而他几乎都抽不出两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谈。

这事也做得幼稚。霍利斯的决定使那班在既性急而又敏感的年轻人斯蒂芬·戴莫布雷领导下的军情六局监视人员很吃惊，而且他们马上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内部压制，——恰恰是军情五局指责军情六局在菲尔比事件上的做法。再者，停止调查推翻不了米切尔案已被立案调查这一事实。一份全面的调查报告已由龙尼·西蒙兹——一个被指定处理此案文书工作的D处一科高级军官写好了。西蒙兹的报告概述了历次有关军情五局渗透的各种说法，结论是，在我们五局高层人员中极其可能隐藏着一个间谍。这报告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是否要通报美国人。西蒙兹的报告送到了霍利斯和迪克处。两个头头私下交换意见后又召集我们开了一个星期日下午行动计划会。这次是在坎姆登广场的霍利斯家中。只要比较一下霍利斯和迪克，就能明显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霍利斯的市区房子内既脏乱又没什么书，他来开门时还穿着那身深色细条纹的工作制服。他把我们带进又脏又暗的

早餐室，并且立即开始谈工作。他想听听我们的意见，我猜想是有关同美国人的意见。霍利斯从来不是商量事情的人。现在逼到头上了，他话里就至少带着一种气恼的口吻。

阿瑟尖酸地说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对美国人说，以防米切尔案一旦得到证实而影响更不利时必须告诉美国。霍利斯完全反对。他说那会毁掉联盟的，尤其是在菲尔比事件以后。

我提醒霍利斯说，“或许，美国人也可能有消息来源或情报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件案子。但如果我们不提出来，就永远得不到这些情报。”

接着的一小时里霍利斯就跟我们俩辩论这个问题，双方都吵得怒气冲冲。房间里其他人——龙尼·西蒙兹、休·温特博恩、还有弗·琼斯——都竭力给我们降温。西蒙兹说他不想把话说死。也许米切尔应该接受讯问，但另一方面，也完全有可能认为问题已经结束了。至于美国方面，他说他对那边的情况不够了解，因此谈不出看法。温特博恩是个慎重且能看出问题的人，他支持阿瑟的观点，认为更大的灾难将是现在沉默而以后却发现案子得到了证实。弗·琼斯最后终于发怒了。

“我们五局不是什么公立学校，知道吗。我们没义务要向美国人‘坦白’。我们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我希望你们一些人要注意这一点！”

但甚至弗·琼斯也承认存在着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说：总的说来他认为通知美国是慎重行事的，问题是如何去做。霍利斯看得出自己是少数派，于是突然宣布自己要亲自去华盛顿。

“这事由下面调查组去办不是更好吗？”弗·琼斯问他，但霍利斯紧绷着脸，毫不松口。虽然阿瑟还试图说服他，但显然是浪费时间。

“理由我都听过了。我已经做了决定，”他厉声叫到，怒视着桌子对面的阿瑟。

第十三章

到了1964年初阿瑟和我都相信，霍利斯才有可能就是我们怀疑的一直在军情五局高级官员活动的间谍，而不是米切尔。只有这个假设才有可能解释米切尔在调查中出现的矛盾现象。霍利斯长期拒绝接受五局可能被渗透这一判断，在米切尔案子中他不愿批准技术设备，后来又拒不同意对米切尔进行讯问，也不同意向美国通报，直到不得不如此时，这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表明一种倾向。

后来当我们等候西蒙兹的第二个米切尔报告时，突然一宗旧案又落到了我们肩上。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女王藏画的鉴定官，国际艺术史学家、以及前军情五局战时高级军官——1964年供认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充当苏联间谍的事实。这事是1963年后期慢慢开始的，当时军情五局从联邦调查局得知，一个叫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的美国公民告诉他们布伦特30年代与他同在剑桥大学时曾吸收他替苏联人工作。阿瑟飞去美国与斯特雷特谈了话，他肯定了事实，并且同意在需要时愿在英国法庭上作证。

对如何处理布伦特案子的问题我们在霍利斯办公室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布伦特问题在局领导看来是一

件令人难堪的事。在长期不断的谍报机构内部的竞争中，五局迄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军情六局隐匿证据确凿的叛徒这种事。这对五局在白厅中的声誉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霍利斯，他渴望得到内阁及内政部官员们的尊重，担心布伦特案子会影响军情五局的地位。除此之外，还有造成丑闻的可怕阴影。霍利斯和他的许多高级部下敏锐地意识到了对布伦特活动的任何公开揭露将给他们自己、军情五局、以及上面的保守党所造成的损害。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连串保安问题的丑闻出现后终于辞职。这一系列丑闻的顶点便是普罗富莫事件。霍利斯几乎不掩盖他对工党的敌意，工党当时在公众舆论中很有威信。霍利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由对布伦特的起诉而可能惹起的丑闻肯定会使已经动摇不稳的政府垮台。

阿瑟和我的动机很单纯。我们想尽快能够着手办布伦特案子，看是否布伦特能给军情五局深层渗透的问题提供点线索。使斯特雷特牵扯进来的审判无论如何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而且也会耽误我们取得与布伦特合作的机会。

对布伦特免于起诉的决定也许在关系到五局渗透的问题上是唯一引起重视的决定，整个五局内部意见一致，于是经首席检查官通过后，阿瑟便去找布伦特谈话。布伦特几乎马上承认了他是苏联间谍，并为苏联做过发展间谍的工作。

布伦特的供认对阿瑟的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多年的艰苦工作后，现在终于证明了他一直是对的。一开始他就怀疑布伦特，但局里许多人，像迪克·怀特（他二次大战中与布伦特是好朋友）起初就不相信。阿瑟变得更呆不住了，甚至更难对付。他像是在猎取象征性胜利的猎物，能嗅到生肉，现出一副贪馋的样子。

布伦特的招供戏剧性地使人们对渗透的态度顿时明朗化了。军情五局内部有间谍这种不可想像的事忽然变得真实得多了。阿瑟相信只要我们能保持这个势头，那么D处这支新队伍就可直捣三十年代阴谋集团的心脏。他认为，趁事情正顺着我们的路子发展、并趁叛逃者和他们的招供正迅速地汇集到我们这里来时，他满有把握地能解开那个最大的谜——挖出今日军情五局内的那只鼯鼠。但当阿瑟极力要求工作必须有速度、有紧迫感、有实际行动时，他遇到了D处的新处长卡明，他是喜欢那种缓慢而谨慎的工作方法的。

1964年早期，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心地恶化起来。阿瑟眼中没有卡明：他认为他的方法过时了。从1959年起阿瑟基本上负责反苏部的重建工作，而且由于他的声誉，他的影响扩展到了D处一科以外。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不够圆滑。他觉得他才应该是D处的处长，而不是卡明，并且对他要当处长的思想几乎毫不掩饰。在他看来，卡明正在胡乱处理这一渗透问题。卡明对阿瑟侵犯他的职权感到很忿恨，还有他的不加掩饰的态度。他还为在米切尔调查问题上一直被拒之门外而耿耿于怀，而且还怀疑阿瑟暗地里对霍利斯怀有疑心。显然，摊牌是不可避免的了，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布伦特刚刚招供不久，事情就发生了。1964年5月，我去了华盛顿，试图说服中央情报局对我们刚刚搞起来的“活动分析”予以帮助，我要求情报局提供计算机技术力量，帮助处理该项工作所产生的大量资料（一年有七百万次活动）。我向中央情报局提出的这一要求是得到霍利斯同意的。安格尔顿完全支持我们，赫尔姆斯同意派人来，不只是一两个，

而是一支二十人的技术队伍，并且对该工作所需的全部计算机使用时间予以保证。我刚一回来（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技术队将在下星期到），阿瑟就告诉我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要调走，这令我气极了。

“那叫我们怎能制订计划呢？主要力量刚刚熟悉工作就被调走！”我发怒了，“哈尔和我花了四年时间发展这项工作，而恰恰在快要产生结果时就调走他！”

阿瑟和我一样生气。他精心挑选了许多D处一科的成员，而且谁要调走他的人他都很不满，尤其是正当现在反苏谍报活动的工作处于最高潮时期。阿瑟像一阵狂风似的卷入卡明的办公室，认为他早应反对这一调动。争吵声传遍了整个走廊，他憋了几个月的闷气都发泄了出来。卡明指责阿瑟粗暴无理干涉处的工作，这是越权行为。而阿瑟，并不隐讳他认为处领导差劲的意见。争论的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尔案件上来。卡明指责阿瑟是钻到死案子里不肯出来，而且，他认为这案子极大地破坏了五局的声誉。阿瑟回答时指出，他认为这案子远没有结束。卡明向霍利斯汇报了这次争吵，霍利斯立该要求将这件事从头至尾写出书面报告。第二天，卡明交给阿瑟一份他起草的准备交霍利斯的报告复印件。

阿瑟看了报告很吃惊。卡明的报告没有提到将多伊恩调离“活动分析”工作对这次中央情报局之行带来的影响。报告只是明显地攻击阿瑟，最严重的就是认为阿瑟不愿向处长公开他个人对谁是军情五局内的可疑间谍的怀疑。

这时阿瑟与卡明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危险地步了。

“一点不真实，混蛋！”他在空白处涂上这几个字，并且接着对卡明报告的每一行都涂改一番，然后将报告交还原主。卡明悟出他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便抓住机会，立即将这个一塌糊涂的报告送交霍利斯，霍立即以违犯纪律为理由停止阿瑟工作两周。

当我接过布伦特案子之后，我先停止了与他的所有会见，我要考虑一个新的方针。对质显然绝不会有效，首先因为霍利斯激烈反对任何会引起布伦特叛逃或使他发表公开声明的做法，其次因为布伦特自己知道我们对掌握他的材料实际上是无力的，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摸索，而且是在并未掌握材料的情况下讯问他的。我决定我们必须采取微妙的方式，在他的性格上作文章。我可以看出布伦特想让我们认为他是合作的，即使我们很清楚他并非如此。除此以外，他最不喜欢撒谎被人抓住。我们必须以慢慢地逐步施加压力的方式从他身上榨取情报，一点点向前进攻，而不求一举攻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30年代有更深入的了解，军情五局当时掌握的情况还远远不够。

我还决定，我们必须将面谈地点移到他的住处。他到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的住所来时总是带着对抗的情绪：防卫、不安、紧张、敏感，他意识到录音机在录下他说的一切。我觉得到他那里谈话会缓和紧张空气，也可使我们之间发展一些朋友式的关系。

以后的6年中每隔一个月左右我和布伦特都要在他的书房见一次面，他住在考特尔德学院。布伦特的书房面积很大，装饰华丽、风格奇特，上楣有金叶装饰，是他在考特尔德的学生们画的。每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画幅，包括壁炉上的普

桑的作品，那是30年代在巴黎用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借给他的18英镑买的。（本来这幅画是要留给维克多最大的女儿埃玛的，但他没能做到。那幅画作为他的遗产值50万英镑，后来归了国家。）这是谈论背叛行为的最好的背景。每次谈话我们都坐在同一个地方：壁炉边，普桑作品的下方。有时我们喝茶，吃着切得很薄的三明治；更多时我们喝点酒，他喝杜松子酒，我喝苏格兰威士忌；我们的话题总是30年代、克格勃、谍报活动、友谊、爱和背叛等。这些对于我来说一直属于我生活中最生动的经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那种最高雅，最有魅力、有教养的人。他会说五种语言，他的知识之渊博使人非常难忘。他的知识面不单单限于艺术；其实，正如他很自豪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拿到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且他一生中一直对科学哲学很着迷。

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一方面明显地很有性格，而另一方面却又令人难以理解地脆弱。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才使得男性和女性都对他产生爱恋的情感。他明显地是同性恋者，但其实，正像我从他本人那里得知的，他至少与两个女人恋爱过，她们始终同他很亲密。布伦特有着一身兼扮各种角色的本事；一会儿是艺术史学家和学者，转眼又变成情报机构的官僚，变成间谍，变成感情激动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但这些众多的角色对他是一种折磨，使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开始谈话后不久我就意识到，布伦特远远没有因为给他以豁免而感到轻松，而是继续背着沉重的包袱。这不是犯罪感的包袱，因为他不觉得有罪。他是因为欺骗了特恩·罗斯柴尔德以及其他像迪克·

怀特和盖·利德尔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很痛苦（在盖的葬礼上他哭了）。但这种痛苦是那种由于不得已而为之所感到的痛苦，而不是那种对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却又未能避免的事所产生的懊丧的痛苦。他感到沉重的是他对那些朋友、同谋、以及恋人所担负的责任。他知道他们的秘密，认为他有义务保密。

我们在他那儿的谈话一开始，我就看得出布伦特放松了。然而他还是很小心的。我很快注意到他把电话远远地放在房间的那一头了，因为他完全知道“特别窃听器”的事情。那是第一次在那里见面时他出去倒茶时我注意到的。

“把茶壶保温罩盖在电话上。”我喊道。

他笑了。

“嘘，不，彼得，盖着那玩意儿你们在那边就听不到我们谈话了。”

起初我用小笔记本记录，但那样不容易记下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不得不采用秘密监听的办法。终于隔壁的房屋要添装现代化设备了，我就安排将一只探针窃听器从隔壁墙壁中插到布伦特的书房这边。这是一件细心的事儿。尺寸必须精确，以保证探头刚好对着壁炉旁布伦特坐着的那一边。A处二科预先布置好布伦特的一位艺术家朋友在我去与他谈话时打电话给他，就在他去厅里接电话时，我拿出卷尺测量了所需的尺寸。窃听器装得很成功，而且一直工作得很象样。或许，那个装置现在仍留在那儿呢。

在开头的几次谈话中我有意使他放松。尽量不逼得他太厉害，只要谈谈记忆中的事就行了。他谈了他是如何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的。吸收他的是当时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盖·伯

吉斯。谈起盖，布伦特仍然很痛苦；他刚刚在大厅里一个人。他那强健的躯体被过度的劳累摧残坏了。

“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让人相信的，”他一边倒茶一边说，“但任何很熟悉盖的人，真正熟悉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

“哦，我能相信，”我说，“他只是要让英国也成为共产主义的。他死以前你有过他的信吗？”

布伦特紧张地呷了口茶，茶杯和托碟在他手里有点震颤。然后他走到桌前拿给我一封信。

“这是最后一封，”他说，“这并不是你们的疏漏，只是这信是直接传送的……”他说着便走开了。

这是封哀婉动人的信，漫谈中充满了软弱、伤感的话语。伯吉斯谈到莫斯科的生活，尽量说得听起来仍像以前那样好。不时地还提起从前的日子，以及“改革”俱乐部，还有他们都认识的人。最后他谈到他对布伦特的感情，以及他们30年前共享的爱。他知道他快死了，但直到最后他仍努力表现出一种愉快轻松的态度。我读完信后，布伦特回到屋里。他有些心绪不安，我猜想更多是因为他知道我可以看出伯吉斯在他心目中仍占着一定的地位。我赢得了关键性的第一个胜利。他第一次撩起了面纱，使我得以窥见他们“五人帮”结合的秘密世界。

冷战的出现和麦卡锡主义的扩展使布伦特更加确信他80年代所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他仍然完全忠实于那些继续坚持其事业的人。1951年他选择了继续留下并混着干下去这条路，而没和伯吉斯与麦克莱恩一起叛逃。这时莫丁（彼得）要他叛逃。他告诉我，到莫斯科去过流亡生活他会受不

了。他曾在30年代去过苏联。那是个美丽的、令人赞叹，但又非常悲惨的国家。不过那里最吸引他的地方是列宁格勒的那座宏伟壮丽的美术馆。

1951年后只有布伦特一人和菲尔比一起留下。他与菲尔比没像与伯吉斯那么亲密。菲尔比是个性子强烈、有权威的人物，但他又绝对少不了布伦特。布伦特还能从菲尔比从军情五局以前的朋友那里探听到一星半点的消息，注意他们对菲尔比的调查进展情况。他们常在一起谈论他们是否能幸存。甚至当那张网向他们两人收拢来时，菲尔比仍觉得如果不在军情六局干下去，他的人生就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而且他不怎么理解艺术与学问对布伦特的重要意义。

“金与我对人生有不同的观点，”布伦特告诉我，“他一生中只有一个抱负——做间谍。我还有其他的追求……”

布伦特很钦佩菲尔比，但也有点被他的绝对信仰和他那种无情的直线式人生观所震慑。布伦特需要爱和艺术，而且，最终还需要那种在政府机构中的安逸生活。而菲尔比却相反，他对男女关系随便，对女人抱有阿拉伯式的态度，他只需要间谍工作的刺激。艾赛亚·伯林曾对我说过，“安东尼的问题是，他在政治上的‘狗兔赛跑’游戏中，既想与社会中的猎狗一同追猎，又要与共产党的兔子跑在一起！”

“金从不动摇，”他说，“他总是忠贞不渝，直到最后。”

一天上午，大约是离1964年10月大选前两个星期，霍利斯的秘书交给我一厚叠卷宗，并告诉我当天下午到局长办公室报到，准备讨论这个报告。时间紧迫得几乎不允许我去读一遍，更不用说研究了。西蒙兹是积极地按霍利斯的指示去做的，而且在他准备报告的8个月中，从未与阿瑟或我讨论

报告内容。但报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四家法庭根据布伦特的供述重新分析米切尔的案子。

阿瑟那天上午也收到了西蒙兹的报告，他知道他们是在迂回，想绕过他，而且这么晚才将报告送来是有意避免任何反击。他告诉我他想在这个会上声明，如果不给足够的时间研究这个报告，他就无法表示意见。会上的前半段，他坐在会桌的一边一言不发，压着火。

霍里斯语气轻松地开了场。

“我不想浪费大家更多的时间，”他开始说。“我读了这份报告，它使我觉得非常可信。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再做决定。正如你们所知，先生们，大选很快就要到了，所以我认为如果现在能够解决这个案子，这对我们五局来说会好得多，我也就不必向哪一位新任首相汇报了。”

谁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那位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汇报。威尔逊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在将要到来的竞选中击败保守党了。霍里斯的态度很简单：布伦特·朗、凯恩罗斯的招认结束了一些关系较大的无着落案；米切尔案子也不成立了；一切都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他想结束这一案子，并就这样记录在案，写上渗透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霍里斯征求大家的意见，起初出乎意料地没什么人发言。米切尔调查案已经被弄得如此一团糟以至于我们几乎谁都不认为还有足够的优势能将它挽回，尤其是因为阿瑟和我现在都极其怀疑霍里斯就是那个罪犯。我明确地说，如果西蒙兹的第一个报告是作为对米切尔的指控的话，那么这新的报告就是一份辩护词，我说如果不进行讯问我不接受“无罪”的定论。我要求将我的意见写进会议记录。霍里斯在面前的

小本子上记了一页，然后转向卡明。卡明在会上做了一番关于在米切尔调查过程中出现无纪律现象的演讲。我们所有的人都清楚，将他排除在这次调查任务之外的决定损伤了他的自尊心。弗·琼斯只是说在米切尔案上能说得上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尚未得到证实。

“你呢，阿瑟……？”霍利斯问。

阿瑟从那份报告上抬起头来。

“这个，”他说，“还有第三种可能。有人可能是在将米切尔作为掩护用的假目标。”

会桌上一片沉默。他和霍利斯互相对视一眼。谁都十分明白阿瑟话里的意思。

“我想这话应该讲清楚，”卡明在会桌的另一边发了言。西蒙兹紧张地翻动着他的报告，好像他在查看阿瑟的假设是否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他的报告。

霍利斯还是接着他原先的话题讲下去，不理睬阿瑟的言论，好像他刚才没听见。

“我说，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因此我建议，停止这案子的调查，就这样在案卷上记下……”

他的笔在卷宗上停下了。阿瑟再也沉不住气了。

“凭理智论，你绝对不能这样做，”阿瑟以他最明确的态度冲口说道，“你事实上是忽视了所有戈里金关于渗透的揭露。这里有克拉布行动被泄露的问题，有戈里金说的‘技术文件’问题——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文件。无论米切尔案的情况如何，忽视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对的。”

霍利斯试图转移攻击矛头，但阿瑟继续逼进。他知道霍利斯已经弄巧成拙了。西蒙兹承认他对戈里金提供的材料

了解太少而不能发表权威性的意见。弗·琼斯倾向于赞成进一步研究戈里金的揭发，认为这是慎重的。霍利斯可以觉察出会议的精神与他的意图相悖。他恼怒地丢下笔，指示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主持将所有未清的戈里金的连续报告全部最后复查一遍。同时他命令米切尔案停止进行。

会后我找到弗·琼斯。我说这令人无法容忍，因为局长未经与我这个负责调查研究工作的人商量就将一项研究任务交给另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开始对付那些大量来自投奔华盛顿的叛逃者以及来自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的那一大堆材料了。

“事情照现在这样已经够困难的了，”我说，“但如果我们将整个工作分开处理势必又会造成混乱！”

弗·琼斯看得出这个问题。现行的制度负载过重。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现在需要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减少。我建议我们试验建立一种五局内部的工作组，专门全面完整地研究来自供词以及叛逃者报告的有关英国情报机关被渗透的材料。弗·琼斯说他会考虑的。

事后没多久，他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与迪克·怀特商量过了，怀特同意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迪克去说服了霍利斯，最后使他终于不情愿地答应了。委员会将由军情五局D处的人员与军情六局反情报处的人员联合组成。它将向局长、D处以及军情六局反情报处处长汇报。这部分的工作将由我主持。委员会的代号为“流畅”。

霍利斯利用西蒙兹报告上的争论作为压制阿瑟的借口。他将当时正急速发展的D处一科这个“帝国”分成D处一科及新D处一科（调查科）。老一科处理行动方案及行动实施；

新一科处理间谍报工作中的调查任务。阿瑟留下负责那个半截子的老一科，而罗尼·西蒙兹作为助理科长被提升为同阿瑟平级的一科（调查科）负责人。

这对阿瑟是个残酷的打击，对他来说调查工作自从40年代起就是他的命脉，而且自从1959年他回来工作后，他的大部分心血全都灌注在这里了。他因为没有被派任负责“流畅”委员会而感到不快，尽管他懂得这实质上是D处三科的任务。但他在自己的科里被他以前的下级、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将他视为指导人的西蒙兹所排挤，这实在是一片难以咽下的苦药。阿瑟觉得他被西蒙兹那份报告出卖了。他理解不了西蒙兹怎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写出两份相互间似乎有些矛盾的报告。他认为军情五局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阿瑟变得轻率了，似乎那股总是潜藏着的自我毁灭性的冲动突然涌了上来。他相信是由于他对渗透问题的起劲追查而使自己正在成为受害者。事情被霍利斯搞得更糟的是，他规定尽管两个部门互相间是独立管理的，但阿瑟多少两头都要照管着点，因为他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这两个人不断地争吵。阿瑟确信，所谓全面照管，意味着他一方面负责，而西蒙兹另一方面却要照他自己的意图办。最后当阿瑟突然命令西蒙兹带他的办案人员来开会而西蒙兹拒不理会时矛盾终于激化了。阿瑟对他说，他这样做使得他不可能一起合作了；西蒙反驳说阿瑟是在干涉他，而且将一份抱怨书交到了卡明的面前。卡明将抱怨书交到了霍利斯那里，并建议开除阿瑟。对这个建议，霍利斯是十分赞同的。

在下一次的领导成员会议上，他们讨论了这件事。阿瑟在头头中没有同盟者，不支持他的人太多。他们都觉得他的

强硬，狂妄的作风威胁性太大。在头头中他唯一的朋友，一直坚决替他辩护的比尔·马根在会议做出决定时却没在场，这正给他们提供了方便。

我记得阿瑟在事情发生的那天到我办公室来，铁石般地沉默寡言。

“他们开除了我，”他只这么简单地说到。“罗杰给我两天的功夫清理办公桌。”其实他被军情六局直接要去了，这是迪克·怀特坚持的，也没理会霍利斯的反对。但是尽管这个调动救了阿瑟，但他的事业却在最盛期被断送了。这么做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反间谍能手，一个当时由于他的技术和经验而真正享有国际声誉的反谍报军官，却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官僚间争吵而被开除了。就是这个人从1959年开始将一个全无成效的D处一科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作风泼辣的、战斗力强的反谍队伍，这支队伍人员配备仍然不足，这是真的，但这根本不是阿瑟的过错。

阿瑟最大的缺点是天真。他从不明白他这几年树敌的程度。他的错误就是：他以为成绩与先进成正比。他是个有野心的人，这十分自然，无可非议。但他的野心不是那种狭隘的勾心斗角，他要降龙伏虎。但他从来理解不了他的上级中就只有那么几个人支持他这简单明白的事实。他容易冲动，有股钻劲儿，他常常瞪着眼琢磨着一些古怪的念头。但军情五局没能掌握利用他的脾气，也没能发挥他的了不起的才智，这是它一个长期的过失。

“就我个人来说，离开这里更好。”他被开除的那天晚上他对我这么说。

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试图使他振作起来，但他确信霍利斯为了保护自己，一手策划了这件事，我也没什么办法。被免职这一污点对他这个有二十年工作成就的人来说是个很惨痛的代价。他知道他的事业已经没指望了，而且，正像1951年那样，所有他为之辛苦的工作也将被毁掉。那晚阿瑟离开办公室时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伤心过。他跟我握了握手，我谢谢他为我所做过的那一切。他看了一眼办公室。“祝你成功，”他说完便走出办公室。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我这里。

第十四章

还有一个问题在60年代始终没有解决，大概这是所有问题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是否军情五局内部暗藏着一个间谍？D处三科在80年代进行追踪调查的同时，“流畅”工作组也在对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的历史进行调查。霍利斯对“流畅”没多大兴趣，主要因为调查要等到他于1965年12月退休以后才提交报告。他仍以为，那次1964年10月的西蒙兹第二个报告讨论会后渗透问题的调查已经结束了，他还命令凡参加过米切尔案调查的人都不应在互相之间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个办不到的要求。第一，霍利斯1968年向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队通报米切尔问题的那次美国、加拿大之行引起了一阵不出所预料的愤怒和惊慌。霍利斯的访问刚过不久，我又亲自去了加拿大。从1956年开始一直平安地躲在苏联使馆墙壁中的“蚯蚓”窃听器突然被一队苏联清除窃听器人员挖了出来。苏联人事先并没有搜寻，但他们准确地知道窃听器的位置，我们在信号完全消失以前听到了他们拆除的声音。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怀疑是否米切尔泄露了这个窃听行动。当时的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反谍处负责人詹姆斯·贝内特

向我探听过此事。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将存在于高层人员中渗透的迹象扼要地告诉了他。事实上，我有自己的理论根据。我肯定使馆墙中装有“蚯蚓”窃听器的秘密，苏联人早在1956年就知道了，所以他们除了偶然在那里讨论使馆事务外，一般不使用那些房间。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侦听装置的准确位置是在1964年。这与米切尔调查是个巧合，调查时曾仔细地考虑过“蚯蚓”是否在1956年被米切尔泄露的可能性。米切尔和霍利斯1956年都收到过详细的材料，其中包括“蚯蚓”如何工作的细节。这行动无疑在那时泄露了。无论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泄的密，苏联人当时是无法拆除窃听器的，因为清除人员不知道准确的安装位置。尽管他们知道了准确的窃听范围，但他们搜查了20多天还没能找到。

弗·琼斯知道我在加拿大谈了五局渗透问题后大骂了我一顿，但我告诉他霍利斯的访问失败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谈论此事。无视这一问题只能在我们盟友的眼里显得更糟糕。

华盛顿方面的兴趣也同样很浓。我还记得迈克尔·麦考利的别墅招待会。此人1964年接替哈里·斯通成为驻华盛顿的联络官。会上安格尔顿和我离开众人时，他拼命盘问我有关军情五局内部的情况。

“你们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不断地问，“霍利斯带来了一个有关米切尔的荒唐报道。他似乎连这案子的最起码情况都不知道。没经过讯问他现在就说没问题了！……”

我尽量对他把这件事从头至尾说清楚。我对他说，我们认为米切尔现在无罪，但我表示就我和阿瑟来说，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可疑目标。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报可以帮助我们揭开盖子。他说他会考虑帮点什么忙的。当时中央情报局

正遇到麻烦。肯尼迪刚被行刺，沃伦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会议又正在进行，而且安格尔顿还有他自己的急迫问题。

1965年，英国安全机构再次在美国人面前丢尽了丑。仅仅四年中接连不断的间谍丑闻和灾祸已把军情五局和六局都卷入了漩涡。首先是霍顿被揭露，他泄露了北约组织水下侦查系统关键部分的情报。尽管霍顿案子对军情五局新的反谍报能力来说是个胜利，但它在美国海军中引起了义愤，他们一直对英国海军怀有敌意。这种憎恨在审判霍顿后不久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暴露了。会上美国海军提出要彻底中断英美情报和机密交流。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阿尔·贝尔蒙特制止了海军的这种企图。

“我们与他们的唯一区别，”贝尔蒙特不带偏见地说，“就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

但贝尔蒙特的话也不可能缓和一连串接踵而来的灾难。布莱克于1961年被审判定罪，他使包括柏林隧道在内的实际上每一项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行动措施都令人产生怀疑。第二年——1962年瓦萨尔被抓获；这又是一宗北约重要海军机密被英国间谍泄露给东方的案子。1963年1月菲尔比叛逃，英国当局没什么好说，只表现出十分无能。同一年还出了普罗富莫事件，这事件表明，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从普罗富莫处取得了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对此非常关注。1964年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先后作了招供，而其它案子都在法庭上也耻辱地败下阵来。1964年的柯达案就是一例，但在美国人眼里还要糟糕得多的是1965年初的马特利案子。

马特利案是1968年开始的，当时菲多拉说克格勃在英国核研究机构内有一个搜集外国新思潮情报的间谍。他只是在

近一两年间开始活动的。这就意味着戈里金并不知道此人，从而严重地局限了怀疑对象的范围。走了几次弯路以后，调查范围收拢到了吉乌塞普·马特利身上，他是1962年秋从“欧洲原子能联合机构”到卡尔汉姆实验室的。但马特利是不知道秘密核情报的。尽管如此，调查还是继续进行。事情可能像朗斯代尔案件中的霍顿那样，马特利是从一个确实接触机密的女友那里得到机密情报的。我们发现马特利确有一个接触机密的女友，那么，他当然有可能也接触到他本人不能接触到的机密了。

进一步的调查没有查出任何证据能证明马特利获得了机密。经过对他和对卡尔汉姆办公室的搜查，我们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找到了他曾有约会的证据。当时马特利正在欧洲度假。他返回时，立刻被从南部机场接到了特别行动处，在那儿对他进行了审问。他说卡皮科夫是他认识的苏联人。他还有一张标明约会地点的地图。结果我们搜查了他在艾宾顿的住宅，发现了一个隐蔽装置，里面藏有同类似朗斯代尔使用的一次使用的小型密码本，其中一本的某页上显然有一部分被使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其中有详细的用于电文——密码翻译的一次性使用密码本所需要的字母——数字转换表。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讨论决定如何行动，当时米切尔也在场。关键是没有找到马特利取过机密文件或将情报交给外国人的证据。《公务机密法》中确有一条规定：准备进行谍报活动属犯罪行为。但要证明马特利有这种行为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与外国人进行秘密通讯。政府通讯总部可以证明他的密码本同那些与苏联主子通信的间

谍使用的密码本相似，但与于朗斯代尔案不同的是：他们证实不了马特利有实际行动。我们没意识到，正是政府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明才使我们能给他定罪。如果没有这个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同伙就会逃脱惩罚，或被从轻处置。

作为军情五局通讯情报专家，我在会上向领导指出军情五局所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马特利有向国外传送机密的企图。军情五局法律处认为，马特利的行为与《公务机密法》中的“预备作案”一条相符，于是试图以此为正当理由对他进行起诉。同时令在场的反谍报专业军官惊讶的是，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催促要对马特利起诉。结果是，首席检查官的确照此办了，但军情五局却落得个惨败的下场。

直至今天我还很难理解为什么马特利案要继续进行，除非人们还记得审判的日子——1968年7月2日。这正是米切尔案的最高潮。显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使军情五局的反谍报处跌了一跤。这正是苏联人和霍利斯的意图。

另一个要考虑的案子是弗兰克·博萨德案。1965年初，联邦调查局——格尔乌的两面间谍“礼帽”出示了来源于军需部的导弹武器方面的最高级机密文件的照片复印件，这涉及美国的高级机密。要将怀疑对象的范围缩小到几个人并不很难。我们对可疑分子进行了各种监视。结果发现怀疑对象之一博萨德在午饭期间曾到滑铁卢车站行李寄存处取出一个手提箱，然后到布卢姆茨伯里区的一间旅馆，用化名登记一间客房。他曾在那儿独自呆了半小时左右。离开旅馆后他又将箱子拿回行李寄存处，然后回去工作。军情五局在适当的时候从滑铁卢车站取出他的箱子。在箱中发现有拍摄文件的照

相机和几盒胶卷，两张灌有大约8首苏联歌曲的唱片。我们将歌曲详细复制了下来。将箱中全部内容拍下照后又放回箱内，最后又将箱子放回滑铁卢车站。我给政府通讯总部打了电话，然后将复制的歌曲全交给政府通讯总部。他们不到一小时就鉴定出其中五首曲子是由苏联的一个发射台播放的，该发射台经测向仪测定是在莫斯科地区，是苏联情报机关格尔乌的发射台。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一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拿到旅馆时逮捕他。1965年3月15日我们进行逮捕。他是在拍摄绝密文件时当场被抓住的。当我们将军情五局已掌握他唱片上的曲子的所有内容这一事告诉他时，他承认自己为了钱一直通过“无人交接点”，即密藏点向苏联提供机密文件的照片，并以同样的方式取回酬金。自从他被发展为间谍以后的近五年间他只与一个苏联人见过一次面。他说他从广播歌曲中得到指示，哪个交接点可用，哪个不用。军情五局掌握了博萨德犯罪的充分证据，并按照法律第一章的条款于1965年5月10日，判处博萨德21年监禁。

“礼帽”出示英国最高保密级文件照片这一举动不仅使人难以相信他是打进来的间谍（人们不禁要问：苏联会浪费这样一个情报来源吗？），而且这一举动还将引起美国人再次对英国保安部门的不信任，美国方面还叫嚷要禁止英国再接触他们的机密。如果苏联不得不再要找一个间谍来冒险的话，博萨德是理想的人选。他实际上与苏联人没有任何直接接触。莫斯科对他的无线电控制也只是通过单纯的唱片而已。如果不是政府通讯总部细致的电信分析，我们便不会知道那些唱片的重要性，因而也不会证明苏联情报机构与博萨

德之间的通信关系，他也只会因非法复制保密文件罪而被起诉，根据法律这样的小罪是不会受到很重处罚的。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局以其专业技术能力又一次战胜了苏联。这一成功有两个重要意义：它使美国情报机构能够维护英国在美国政府中的利益，而且能增加而不是消减了我们对“礼帽”的怀疑。

但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苏联人认为他们必须提高“礼帽”的可信程度呢？他从1962年底开始活动，如果没有来自军情五局、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高层的情报是不会有有什么迹象使苏联人警觉到他已受到怀疑的。1964年底军情五局已对他起了很大的疑心。在联邦调查局内只有国内情报处的处长沙利文对“礼帽”不放心，这么说沙利文当然不是苏联间谍了。中央情报局里只有安格尔顿和一两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怀疑“礼帽”。军情五局中少数几个知道“礼帽”的人也不相信他是真间谍。

在英美情报同盟中还存在着其它紧张因素。美国情报系统内对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和他的工党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反工党偏见，部分则由于工党政府放弃“北极星”的许诺。（这决定不久又被他们推翻了。）

从1968年底霍利斯的华盛顿之行以后表现最突出的问题是米切尔案件，以及对军情五局本身在最高层或接近高层的人员中有深藏间谍的担心，但我们情报机构又明显地无力对付这一问题。而对阿瑟·马丁的除名更增加了美国人的疑心。他们知道他在专心追猎隐藏于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国人”。

1965年中期，问题激化起来了。约翰逊总统授权外国情

报顾问委员会对英国保安工作作个调查评论。委员会是由退休的情报机构要员、银行家、实业家、以及政治家所组成的，它为总统提出有关加强国家安全防卫的建议。主持这项绝密调查的任务的有两个人——一是戈登·格雷，他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国防部长，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其次是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任杰拉尔德·科因，他是前联邦调查局的一名高级军官，主管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已有15年的历史。

格雷和科因1965年秘密来到伦敦开始检查英美情报关系，尤其是军情五局的实际能力。这项工作微妙之极。他们不打算让英国情报部门中任何人知道这项检查工作已在进行。在任何其他国家里这种检查会被认为是一种赤裸裸的间谍活动。格雷和科因需要的大部分材料是由克利夫·克拉姆提供的，他是中央情报局常驻伦敦与军情五局联络的负责人。克拉姆是个出色的、头脑冷静的中央情报局军官，在伦敦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他对军情五局的弱点了解得实在太清楚了。克拉姆好几次将格雷和科因带进莱康大楼和军情六局总部，只将他们作为同事介绍给大家。因此，这两个具有与克拉姆同样身份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便毫无障碍地进出所有英国情报机关，他们的任何托词也容易骗过我们。

我第一次听说格雷和科因的检查是在我于1965年访问华盛顿时。安格尔顿向我简单通报了检查报告的内容，这使我大吃一惊。格雷和科因对军情五局作了毁灭性的评判。他们指出，英国反谍报机构的规模不适当，并说许多有才能的人由于不合理的编制和财力物力的限制而没有发挥作用。报告特别批评了军情五局领导的素质，尤其是霍利斯和卡明的领

导水平。卡明当时正负责反谍报工作。格雷和科因的结论是：霍利斯明显地在他的高级军官中失去了信任（这是真的），也使他在白厅中的朋友失去了信任，这也是真的。

这报告使安格尔顿很激动，他告诉我，这将成为新的英美反情报工作关系的基础。他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算与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大卫·布鲁斯一起直接向哈罗德·威尔逊报告他们的发现。

“一切都要改变，”他说，“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情报局伦敦站，其中一半人要直接在军情五局工作。我们要知道一切，并且在我们力所能及之处帮助你们。”

我一听说格雷——科因报告这件事心里就产生反感。安格尔顿是出于信任才告诉我的，但我有义务向上级报告他们所搞的这样一份材料，而且还打算告到威尔逊那里。安格尔顿的野心很明显：他想让中央情报局一口吞并军情五局，并用它作为驻外分站。我回到伦敦便将所知道的一切告诉给霍利斯和弗·琼斯。霍利斯表现出少有的一副让人能够察觉到的震惊状。他下令检查记录，于是没过几小时就证实了格雷和科因确实在丝毫不说明真实目的的情况下参观了英国情报机构的每一个部门。

事后那天下午，我见他们两人出了大门便急步向等在莱康大楼门前的一辆车走去。

“谢谢你的帮助，彼得，”弗·琼斯神色严峻。“绝不能相信混蛋的美国人会遵守协议！”

我认为这有点装作神圣的味道，但我觉得还是不介入这场急速激化的谩骂为好。弗·琼斯和霍利斯要去见外交大臣，对这种如此露骨地践踏英美协议的行为提出抗议，但这

场争吵何时能够休止还很难说。

可怜的克利夫·克拉姆遭到了谴责。他反对去见威尔逊，但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坚持要他去试探威尔逊的安全顾问乔治·威格的口气。霍利斯也无心辩解，他已在伦敦和华盛顿整个情报系统面前丢尽了脸，而对克拉姆来说，如果再出现任何进一步的越轨行为，他就有被驱逐的危险。几天后我在莱康大楼的六楼见到他躲躲闪闪的，一副很羞怯的样子。

“你们差不多要把我驱逐了，”他苦笑着说道。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不顾脸皮地在这样干，而且又无法抵赖地给我们抓住了。格雷——科因报告是对霍利斯作为军情五局局长的严重挖苦，这点他自己知道。但美国人对此事的处理表现出他们典型的鲁莽作风。他们这一计划的实质是好意的——提供军情五局所缺乏的人力和财力。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动机。他们想使军情五局作为有求于他们的依附者，而不是一支配备精良和独立自主的同盟者。

这个报告也确实带来了军情五局的改进。军情五局的领导第一次答应了大规模扩大D处的要求，而像E处那些老的殖民附属部门便枯竭了。从那以后，D处便享有要求一切人力物力的优先权。为适应这个翻新了的D处的情况，不可避免地要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亚历克·麦克唐纳，前殖民地的一个警察被提拔上来，而马尔科姆·卡明由于意识到他再也不会被提升为副局长而趁早退了休。

由这份报告引出的另一个重要开端是它使我们认清了有必要为保证英美之间在西方反情报工作上进一步密切合作，并建立一个有机的整体。根据英美协议的条款，政府通讯总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有了正式的交流。军情六局和中央

情报局要定期通过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同华盛顿的国家安全理事会交流对外国情报的分析报告。但反情报方面基本上仍是特殊的。安格尔顿和我以前常谈到有必要召开定期的反情报材料交流会。反情报材料如此之多，尤其是范围跨越不同国界的材料由投奔者原地源源流入，而且若想取得最佳成绩的话，那么各个国家之间互相交流各自的掌握情报档案内容是很有必要的。但安格尔顿是个专制的人：他想利用格雷——科因报告迫使情报单向流动。但最终他还是认识到互相交流情报的益处，并且在他的敦促下成立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的高级反情报军官组成的协商会，并大致商定每8个月开会一次。协商会的名称为“卡扎博”，并于1967年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第一次会议。

格雷——科因报告并不是霍利斯事业上唯一的墓志铭。当他临近退休时，“流畅”的结论也变得清楚具体了。“流畅”工作组的成员有军情六局反情报处的特伦斯·莱基和杰弗里·欣顿。阿瑟·马丁于1965年中期调去六局后就到了这个工作组。军情五局派去的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安妮·奥尔尤因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我负责主持这项工作。工作组整理出的文件直接送到D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以及反情报处处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那里。我们每周四在莱康大楼内我的办公室或六楼的一间会议室碰头。

工作一开始大家的情绪是很紧张的，因为每人都意识到手上这项任务的重大意义。这项任务是要细致地分析每一份有关英国情报机构遭到渗透的报告。“流畅”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改变阿瑟和我在米切尔案子中所采取的对付渗透的方法。1963年当我们将案子提交迪克·怀特时，我们很大程度

上依靠的是在技术性方面以及在双重间谍案例中对怪异现象的分析方法，用行话说就是“异常表象”。“流畅”决定撇开这一切表面现象，而集中分析原始证据，即叛逃者所提供的那些具体情况。

第一项任务就是核对这些具体线索。这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因为大量的工作已在米切尔调查中完成，后又在我的鼓动下作为三科的全面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继续得以进行。

6个月后我们已整理出一大本材料，完整地列出了有关情况的揭发材料——总共有二百条以上，有些回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我们将这些材料分派给不同的人去处理。那些来自波兰的材料，如高尔涅夫斯基的，就分给特伦斯·莱基；伊芙琳·麦克巴尼特处理军情五局的老材料；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负责戈里金的材料；我就看克里维斯基、沃尔科夫和“维诺纳”的材料。

当这些材料再度集中时我们便开始分析评价。每一条情报都要经过仔细研究，然后决定它的有效性——就是说我们是否相信它是真实的。在有些情况下，譬如说，某个叛逃者或许曾说过军情五局或六局中有一个间谍，但我们却能说服自己他们弄错了。凡是遇到能使我们相信揭发真实的材料我们就以反情报专业的行话称该材料为“受理起诉状”，亦即真实的叙述。然后我们便核查每一条揭发材料是否属于哪个已知间谍，例如菲尔比、伯吉斯或布伦特；如果是，就再细致研究，看它是否仍有可能导致新情报的产生。

对这些情报的评价取决于我们存档材料的质量，而军情六局的档案就有大问题。那些档案乱得一塌糊涂。他们各个区域处和反情报处的档案都各自保存。军情六局各部门的

情报天天增加，却没人对它们研究整理，而且对如何有效、系统地存档也几乎不予考虑。的确，这就是为何许多揭发问题被搁置一边而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流畅”调查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普遍认识到军情六局档案室有必要改进。1967年阿瑟离开了反情报处，接管了军情六局的档案室。到任后他对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对英国情报工作作出了最后一大贡献。

第十五章

我们首先根据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在清单上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为了追查他提到的两名外交部间谍中的另一个，D处三科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决定请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①行动的杰弗里·萨德伯里重新翻译与沃尔科夫情报有关的全部文件。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最关键的是，通过“维诺纳”密码破译工作，他熟悉沃尔科夫叛逃以前苏联情报机关使用的术语。相比之下，第一次翻译这些文件的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官员对此却一窍不通。

沃尔科夫清单中的一条尤其使我迷惑不解。在这一条里，沃尔科夫就他所知介绍了渗入伦敦要害部门的苏联重要间谍的档案和文件。其中几句话第一次是这样翻译的：“根据所使用的匿名判断，共有七名重要间谍。五名在英国情报部门，两名在外交部。例如：我知道其中之一正担任英国反间谍机关一个部门的领导职务。”

第一次立案审查菲尔比是在1951年。当时军情五局以为沃尔科夫所指的间谍就是菲尔比。的确，1945年他是军情六

^① 西方情报组织联合破译苏联间谍密码行动。

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主管对付苏联的间谍活动。我参与“维诺纳”行动时所掌握的俄语足以使我发现，俄语原文中的两个单词第一次翻译时未被译出。单词otdel，意思是“处”。跟在后面的是upravlenie，意思是“局”或“高级部门”。无论如何，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确认沃尔科夫所指的就是菲尔比。在英国情报部门获悉有五名苏联间谍，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给我打电话兴奋得一时竟忘了接上扰频保密器。

“第一次翻译错了，”他说，“这些都是克格勃前身，苏联内务委员会使用的行话。写这份材料的人显然资历很深。他写得非常仔细，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专业技巧和知识颇为得意。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例如：我知道其中之一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一个处的领导职务。’”他接着说。

“其实，我倒认为这个人的职务是临时的。他是‘正担负着领导职务。’就是说，他谋其政而不在其位。他是临时负责人或担任类似的职务。”

“翻译错了，真抱歉。”我不动声色地回答。

“但是你注意到了没有，”杰弗里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英国反间谍局不是军情六局而是军情五局！”^①

意义十分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没说错的话，“临时负责人”既不是菲尔比，也不可能是布伦特，因为他没负责过任

① 英国军情六局执行在国外搜集情报或其它战略任务；军情五局则在国内侦查、抓捕外国间谍，以及防止颠覆、破坏活动的发生。故萨德伯里在此说：“英国反间谍局不是军情六局而是军情五局。”

何部门。只有一个人曾经在1944至1945年间代理英国反间谍机关一个处的处长职务，此人就是：罗杰·霍利斯。

我们调查的第二个目标是艾戈·古森科指控的“埃利”。古森科透露军情五局里隐藏着一名代号为“埃利”的苏联间谍。我从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里第一次见到有关“埃利”的材料，当时我正调查米切尔案件。在“流畅”行动中，我们再次深入细致地剖析“埃利”一案的案情。异乎寻常的是：古森科揭发“埃利与沃尔科夫指控“临时负责人”两件事情都同在1945年9月发生。恰恰也在这个时候，我们对“维诺纳”密码的破译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

古森科提供的情况其实很简单。他从一位名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听说“军情五部”中有名间谍。这位朋友曾是他1942年在莫斯科格尔乌的总密码室工作时的同事。莫斯科通过无人交接点与“埃利”联络。在一块墓碑上的石缝选作递送情报的无人交接点。古森科说“埃利”与苏联人接触并非没有背景。他到过苏联且会讲俄语。“埃利”是个非常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从军情五局的档案库里窃得有关在伦敦的苏联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还给古森科看了“埃利”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森科讲，只要“埃利”的电报一到，总有一个女人等在密码室先译密码，如有必要，就直接送斯大林。伊林梅尔·阿克米多夫是格尔乌的前高级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为了弄清那个女人的身份，我邀请他访问英国。他告诉我此人叫维拉。她控制着格尔乌在西方的整个地下间谍网，直接在阿克米多夫手下工作。但出于遵守保密纪律，维拉从未向他暴露其地下间谍的身份。亚历山大·富特四十年代末

叛逃到西方。战争期间他曾是格尔乌驻瑞士的一名地下间谍。在他写的《间谍手册》这本书里，富特也提到了维拉。1945年富特去莫斯科受训时，负责接待他的就是维拉。

我们无法完全相信古森科的情报。首先，自1945年他第一次提供情报以来，他叙述的某些细节前后不一致：“军情五部”变成了军情五局。这个区别至关重要。从理论上来说，“军情五部”可指军情五局第五处，而毋庸置疑，菲尔比1942年在军情六局第五处工作。其次，到了60年代中期，古森科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酒徒。他的记忆再好也不可能清楚地记得2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我请求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准许我再次询问古森科。但是我们被告知，由于古森科不停地酗酒和纠缠不休地要钱，加拿大当局已对他十分头痛。他们担心进一步跟他接触会使情况更糟；还会冒很大风险。因为，古森科很可能把我们与他会见的目的公诸于世。

我问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是否还保存着询问古森科的详细原始纪录，因为这些材料是古森科在叛逃之初所提供有关“埃利”情况的最精确的证据。皇家骑警队负责古森科的官员早已去世。他的笔记未存入档案，几乎可以肯定已被全部销毁。

我们查阅了英国情报机关保存的档案，从那里找出的证据使古森科情报的可靠性变得更加复杂。古森科叛逃后不久，军情六局的彼得·德耶尔从华盛顿去加拿大参加对古森科的询问。德耶尔每天打电报给伦敦的军情六局总部，概述古森科的情报。收报人是六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金·菲尔比。几乎与古森科在加拿大叛逃的同时，沃尔科夫在土耳其与英国情报机关的人取得了联系。菲尔比请了在军情五局中

的同行罗杰·霍利斯代替他去加拿大见古森科。这是巧合吗？还是一种默契？我们不清楚菲尔比是否认为霍利斯是可以信赖的同伙，才没法叫他去把水搅混，使我们弄不清古森科情报的真相。通过破译的“维诺纳”密码电文，我们了解到，当霍利斯去加拿大见古森科时，克格勃并不知道格尔乌已有人打入了军情五局。有关古森科的情报，最具体、最重要的档案记载莫过于一件事：即一些有间谍嫌疑的人参与了原子武器发展项目。霍利斯的报告在这件事上喋喋不休，而“军情五部”里的间谍“埃利”仅在注脚中一笔带过。霍利斯断定古森科不清楚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把事情搞错了。从此，“埃利”的问题被掩盖起来，再也无人过问。霍利斯的判断是错误的。

然而，当时反间谍处处长盖伊·利德尔却把这件事都记在心里。在日记中，他反复琢磨推测“埃利”可能是谁。令人奇怪的是，霍利斯指示利德尔的前任秘书销毁利德尔的日记。当秘书把日记交给我保存时，我才得知此事。我又在考虑，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还是由于其它某种原因霍利斯要隐瞒利德尔的日记。

1965年，我们设法通过破译“维诺纳”获得新线索。结果，新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原来对“埃利”是否确有其人的估计。我们破译了截获的从1945年9月15日开始的那一周的“维诺纳”无线电信号。那周开始时莫斯科打给克罗托夫的电报没有显露丝毫惊慌，只是提醒他在加拿大的“邻居”出了麻烦，要他注意保护宝贵的“秘密情报员”。“麻烦”显然是指古森科的叛逃，因为古森科就是上周从加拿大叛逃的。我们也早已获悉，“邻居”是克格勃称呼“格尔乌”的行话。古森科

是格尔乌的人，格尔乌不了解克格勃的秘密，所以克格勃没有必要担心古森科的叛逃会危及他们在伦敦的任何情报人员。况且，克格勃有菲尔比在那里应付每日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

但是到了9月22日那个周末，莫斯科的电报语气已不轻松。克罗托夫接到详尽周密的指示，克格勃总部要求他谨慎从事，使用“擦身而过接头法”，接头次数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可能，一个月只接头一次。

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莫斯科的克格勃中心对古森科的泄密变得如此担心？古森科的叛逃实际上发生在两周前的9月5日。格尔乌几乎立刻就能对所受损失程度作出估计。同时对那些他们认为因古森科的背叛而可能暴露的苏联间谍采取保护措施。9月12日以前，在军情六局总部的菲尔比就能陆续收到德耶尔发回伦敦的古森科的情报详述。然而，一个星期以后，克格勃才突然变得忧虑不安。

我们在那个时期军情六局的档案中找到了答案。9月18或19日，菲尔比收到的电报第一次详细描述了化名“埃利”的间谍。这可能是菲尔比第一次意识到古森科欲指“军情五部”中有苏联间谍。当我们在60年代检查电报原件时发现，电报摺成四折，沾满污迹，似乎被人在衣服暗兜里装了很久。菲尔比在收到这封电报两天后才在上面签名。很显然，他在这两天里把电报拿给在伦敦的苏联控制人看。而档案中其它有关古森科的电报都没有这样动过。这就不难得出结论：就是这封电报在那个周末突然引起了苏联人的恐慌。

我请求政府通讯总部查出我们截获的伦敦发给莫斯科的所有克格勃通讯联络讯号，可是无一能够读懂。我们破译的

这一时期的“维诺纳”讯号来自相反的方向。萨德伯里告诉我，政府通讯总部发现：从截获的伦敦至莫斯科的无线电信号来看，特别引人注意的是9月19至20日从伦敦拍发的一封电报。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一封最重要的电报，因为它把同一波段上的其它讯号都淹没了。意义很清楚，这封电报发自菲尔比收到德耶尔那封通报“埃利”详情电报的第二天。尽管我们对电报内容尚不得而知，但政府通讯总部运用组数计算法分析了电稿后得出结论：这封电报与9月18日德耶尔从加拿大发给菲尔比的电报，句子结构相同，长度一样。菲尔比正是把德耶尔的这封电报从档案中取走送给苏联人过目的。

我们一旦发现伦敦给莫斯科发了重要电报，就竭力寻找莫斯科的答复。从莫斯科到伦敦的电讯，有一条尤其惹人注意。电报是那周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络时拍发的，因为特别重要，伦敦方面收到的时间比平时稍早。我们过去一直未能准确破译这封电报。1965年底，萨德伯里和我决心攻破这封密电。我们假定它是对菲尔比所提供情报的答复。我们终于成功了。电报内容如下：“经上级批准，对斯坦利提供有关加拿大事件的情报与邻居进行了核对，情况属实。”

我记得我和萨德伯里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眼前的翻译，感到难以置信。开始，我怀疑是否我们译错了。但是，萨德伯里对照那些使用“维诺纳”密码拍发的非情报目的用的无线电报检查了译文，没有发现差错。例如商业电报译得完全准确。毫无疑问，菲尔比在收到这封密电之前，已经是克格勃的一名高级间谍。那时，他已经当了差不多10年军情六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不过，好像克格勃怀疑他的情报。不然，为什么要核实呢？为什么斯坦利提供的消息

使克格勃如此大惑不解呢？

对于这些奇怪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克格勃以前轻视了格尔乌渗透进“军情五部”的间谍。因此，当菲尔比把这个间谍的消息告诉克格勃并且指出古森科的叛逃对此人构成了威胁后，克格勃不得不首先征得政治局里大头目的允许，然后到“邻居”格尔乌那里核实情况；证实他们是否在伦敦有这样一位渗透极深的“宝贝”。在得到格尔乌的肯定答复后，克格勃才意识到伦敦方面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回电，证明斯坦利提供的情报属实，接着发出注意安全的紧急指示。

但是，谁是化名“埃利”的间谍呢？他隐藏在何处？我们知道布伦特和菲尔比从未受格尔乌控制，显然“埃利”既不会是布伦特，也不会是菲尔比。我问遍了所有在西方的苏联叛逃人员“军情五部”指的什么。他们一致认为“军情五部”就是军情五局，而不是军情六局的第五处或其它机构。无论“埃利”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能接触到有关苏联人的档案。这就无可非议的说明他是F处的人，因为F处负责档案管理。当时F处的负责人是罗杰·霍利斯。这一怀疑结果与沃尔科夫关于“担任着领导职务”的指控不谋而合。

沃尔科夫揭露“临时负责人”，古森科告发“埃利”以及一周之内的“维诺纳”讯号中出现了8个身份不明的人，这三件无头案在1949年9月的一周内同时发生。米切尔和霍利斯与这个谜有关系吗？他们两人都是被指控的间谍吗？两人都是或者都不是？三件案情实在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共同之处。“临时负责人”和“埃利”两个被指控的情况相同，都指向同一个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第一个指控里，沃尔科

夫说“临时负责人”是克格勃的人；在第二个指控里，古森科称“埃利”是格尔乌的人。在1949年9月那一周来往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维诺纳”讯号联络里，出现了八个匿名者。沃尔科夫在清单上写明伦敦有7个苏联高级间谍。两个在外交部，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麦克莱恩已经在华盛顿呆了一年，所以他大概不是外交部两名间谍之一。伯吉斯过去一直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他可能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最有可能是克里维斯基所说的化名为“伊顿和牛津”的间谍。1951年，军情五局对麦克莱恩撒下的网越拉越紧。菲尔比曾经利用此人把军情五局对麦克莱恩的注意力诱开。

但是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的五名间谍是谁呢？一个是菲尔比，另一个是布伦特，第三个是凯恩·克罗斯。从理论上推测，朗可能是第四个。但是他当时并不在伦敦，1949年9月他在德国，不可能成为“维诺纳”讯号中出现的八个匿名者之一。这样，仍然剩有四个匿名者和沃尔科夫的“临时负责人”身份不明。我们揣测剩下的四个匿名者中包括“临时负责人”和沃尔科夫提到的两名外交部间谍中的另一个。至于“埃利”，则查不到丝毫踪迹。

“流畅”计划拟定调查的第三项是由尤利·拉斯特沃罗夫提出的斯克利普金案件。拉斯特沃罗夫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实际上，他是一名克格勃中校。一九五三年秋天，英国海军情报处的人与拉斯特沃罗夫取得联系，开始就他的叛逃进行磋商。他最后同意投奔西方，先决条件是直接把他送到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而不是去英国。他解释不愿意来英国的原因是，他知道苏联人已经打入了英国情报组织，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

海军情报部计划用一架皇家空军的飞机把拉斯特沃罗夫从东京送到新加坡，在那儿把他移交给军情五局和六局的联合机构——远东情报局。英国人没有把这项计划告诉这位前克格勃中校，但事不凑巧，飞机滑到跑道尽头准备起飞时，一场暴风雨袭击了东京，飞机起飞推迟。在等待风暴减弱时，拉斯特沃罗夫从机组人员的闲聊中得知，他们不是飞往澳大利亚而是新加坡。他惊恐万分地逃离了飞机，立即去了美国大使馆，继而叛逃到了美国。

一段时间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告知英国人，拉斯特沃罗夫进一步解释了他认为苏联人已经打入英国情报部门的理由。他说他有位朋友叫斯克利普金，曾是克格勃的一名中尉。1946年在远东与英国人接上了头，并提出叛逃西方。斯克利普金计划先回莫斯科接他妻子，然后等待下次出国机会叛逃。然而回到莫斯科后，不知为何他被克格勃发现。克格勃的两名军官冒充英国军情六局的两个人跟他接头。他中计暴露了自己，遭到逮捕后被枪决。

我们在档案库里找到了有关斯克利普金的文件。其中包括英国海军情报处从远东送来的两份报告，记载着为斯克利普金叛逃制定的方案。一份的时间是1946年5月；另一份是同年7月。两份报告订在一起。8月上旬，远东安全情报处将两份报告送来供军情五局参阅。当时任F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和另一名一般官员经手处理他的报告。霍利斯指示那位一般官员将报告登记在案，即告了事；在1954年拉斯特沃罗夫提起之前，无人知晓此事。然而，复审时，文件又被军情五局按部就班地送到菲尔比手里。

“流畅”行动开始后，我们再次复审斯克利普金案件，结果

有所发现。首先，戈里金1961年叛逃西方后，问我们对斯克利普金的情况知道多少。他说1946年他参与处理了这一案件。当时他是克格勃中心第一总局反间谍处的一名下级军官。他记得报告是于1946年底从伦敦送来的，决不是从远东。莫斯科的街道已披上银装。戈里金主动叙述了两名克格勃军官是如何冒充军情六局的人骗了斯克利普金。我们请戈里金回忆他见过的两份文件。他的描述令人吃惊地准确。他说，第一份记载了对斯克利普金的试探和他价值的估计；第二份是叛逃计划摘要，其中包括在莫斯科与他接头的地址。戈里金还说，他可以肯定克格勃间谍偷拍两份文件时，他们是在一起的。

第二个新发现是：尼古拉·艾略特在贝鲁特问过菲尔比是否向苏联人出卖了斯克利普金。菲尔比坚决否认。甚至对他透露了事件的一些细节，他仍表示对此一无所知。这一点最令人奇怪。我们原以为菲尔比会承认这事是他干的。也许菲尔比没有撒谎，出卖斯克利普金的不是他。

我全面地组织调查两份报告的递送和传阅过程。调查结果极其说明问题。在远东的英国海军情报处把五月份的报告分送至海军香港情报处，在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在伦敦的海军情报部。他们把它列入一本海军部的文件汇编后在内部传阅。按常规，还有一份送到情报六局的R处海军科。海军科的人阅后送交五处存档。我们查阅了军情六局的大量文件，证明菲尔比不在可以参阅此报告的人名单内。

除了远东安全情报处，上述几个部门又都收到了七月份的报告。只是这一次英国海军远东情报处决定把两个报告订在一起，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局一份。伦敦的军情五局8月8

日收到这份文件。这是军情五局第一次获悉斯克利普金的情况；并且，军情五局是收到两份文件合订本的唯一地方。这一事实和戈里金的回忆完全吻合。无论是谁出卖了斯克利普金，这个人必定在军情五局，而不在六局，这就排除了菲尔比。布伦特也已于前一年离开军情五局。疑点再次集中在罗杰·霍利斯身上。当时他是F处副处长，负责处理斯克利普金的档案。

“流畅”调查初露端倪，我便开始了我所从事过的最危险的工作。未经上级批准，我自作主张开始私下调查霍利斯。我必须对此慎之又慎，因为，我知道稍有不慎走漏半点风声，我将不可避免地遭到解雇。我到牛津的波德里安图书馆去，在那儿的校志中发现，尽管霍利斯20年代在牛津上学，他从未得到学位。五个学期后，他未说明原因即离开了学校。这对一个像他那样循规蹈矩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异常。我还走访了霍利斯以前求学的武斯特学院，试图从档案中查出谁和他住在一起。在第四学期，霍利斯搬到惠灵顿广场附近居住。为了弄清谁和他同住一幢房子，我又不厌其烦地查阅了记载着学生住址的牛津校历。我甚至还跑去研究牛津大学高尔夫球协会的档案，希望由此能窥见霍利斯的内心，了解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在没有霍利斯履历表的情况下进行调查，我感到很盲目。从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曾访问中国。我追踪到护照签发处，查明了他离开和返回伦敦的时间。霍利斯去中国之前，曾在标准特许银行工作。我非常谨慎地向银行调查情况，但是，除了有个用于转交信件的北京某家银行的地址外，其它任何记载都没有。

我设法寻找有助于了解霍利斯隐私的形迹。譬如，一个随便交上的朋友或参加政治活动的迹象。俗话说人以群分，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朋友身上了解他的为人。我把在二、三十年代和霍利斯来往密切的人都勾画了一番。有两个在牛津的人值得研究，他们是克劳德·科伯恩和莫里斯·里查森。他们两人都是左派。我查了霍利斯的档案，发现他违反机关规定一直隐瞒战争期间这段历史。在履历表中，他只字不提与科伯恩的友谊。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回避他与一个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关系。

霍利斯到中国后所处的环境与牛津有些相似。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是共产国际发展成员的活跃地方。休·温特博恩曾告诉我，他在日本曾结识一位老中校。此人在中国时认识霍利斯，曾同他合住一套公寓达一年之久。温特博恩为我安排拜访这位老中校。他叫托尼·斯特布尔斯，是个脾气暴躁、思想守旧的军官。他对霍利斯记得很清楚。他说他从未问过霍利斯的政治观点，但觉得霍利斯是左派，因为他常和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阿瑟·尤维特这样的人来往。前者是左翼记者和共产国际的天才密探^①；后者是个国际社会主义者。

阿瑟·马丁拜访了另一个人，珍妮·西斯梅尔。是她战前把霍利斯介绍进军情五局的。她后来从军情五局调到六局，与那里的一名军官结婚，改名珍妮·阿切尔。珍妮是位很有头脑、不容易对付的女性，曾经领导军情六局的一个科。

^① 这是由于世界观的根本不同，作者对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女作家史沫特莱形象的歪曲——译者

这个科专门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由于D处三科的调查工作，我从前经常找她，她总是很帮忙，并且表示我的调查工作几年前就应开始。一天下午，我把话题扯到米切尔和霍利斯身上。他俩在战争期间和她在一起工作。珍妮是个机灵鬼，马上知道我在试探她。

“你觉得他俩有可能是间谍吗？”我问她。

“他俩都不可靠，”她对我说，“但是，如果要让我挑出谁更可疑的，我倒认为霍利斯更像。”

1965年11月，霍利斯打电话通知我上楼去他的办公室。以往都是由秘书通知，他很少那样随便的。不仅如此，霍利斯还站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

霍利斯满脸堆笑地说：“进来坐吧。”

沙发很干净，他还为我掸了几下灰尘，然后坐在我对面的安乐椅里。这也不寻常，往日他都坐在直靠背椅上。霍利斯尽力使我们的见面显得随便些，不自然地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情。

“日子不好过啊，退休金少得可怜，每点钱都很宝贵。”

“你有什么打算？”

“噢，到乡下去，我在那儿有一小块地。离开这里的一切，打打高尔夫球，散散步……诸如此类的活动吧。”

霍利斯咯咯地笑起来。

“一想到再过几个星期，我的照片也要挂到那儿的墙上，就觉得滑稽。”他说着抬头朝俯视着他的那几幅照片望去。他们的仪态真是如此大相径庭。凯尔一副笔直的军人风度，皮特里一副超然的样子，塞利托像个耸着肩膀的警察，而迪克风度潇洒，温和迷人。

霍利斯转过脸来，身体前倾，双手放在膝上，龇牙咧嘴地笑着。

“彼得，惟有一件事想在我走之前问问你。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是间谍。”

我必须立即作出抉择。如果说谎，瞒不过他。那天我别无选择，只得将真情和盘托出。

我没想到霍利斯竟能这样自然地把问题提出来。自从和他在一起讨论蒂斯勒事件，已有十载。从那时开始，我们彼此之间在暗中的猜疑和不信任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今天这场面对面的交锋。既然眼下事情已经挑明，就像暴露无遗地摆在我俩之间桌子上的一件静物，为自己的任何开脱都显得不合时宜。

我说：“先生，所有这一切都根据以前人们的指控以及我们的行动总是无端出错。你了解我对战后我们的工作屡遭失败的看法。我一直搞内部清查，开始是米切尔，现在是你。”

“噢，是这样。但是你一定调查出了新情况。”

“是的，先生，从过去的揭发材料里。……”

我花了一个小时给霍利斯叙述沃尔科夫的清单，我们重新翻译他的材料，古森科所说的化名“埃利”的间谍和有关斯克利普金的报告。

霍利斯轻轻笑着对我说：“彼得，你差不多快抓住我了，对吧？……”

我想插话，他用手示意我听下去。

“我所能对你说的就是：我不是间谍。”

“但是，先生，你能否为我提供确凿的证据，使我能在‘流畅’调查小组的会议上证明你不是呢？……”

“大概我能从古森科提供的材料里找到。”他的话听起来没有把握。“说实话，我的确回忆不起来斯克利普金是谁，还有沃尔科夫……”

他用削尖的铅笔敲打着椅子边，轻轻地叩着牙齿。

“我认为你对沃尔科夫的话解释得不对。为什么菲尔比千里迢迢地去土耳其？他事先调查过了。”^①

他叹了口气，似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流畅’行动很有成果，对吧？……”他突然问。

“是的，先生，我是这样认为。我想我们早该开始调查。”

“没错，我觉得你会这样想……麦克唐纳^②不那么肯定，我想这大概你也知道。”

“先生，他收到了报告，可能已经看过。”

“没错，我肯定我们每人都看过，”霍利斯答道，“报告写得耸人听闻才吸引人，历来如此。不过，总还是有助于把厨房煤气管上的蜘蛛网打掉几根的吧。”^③

霍利斯说完又龇牙咧嘴地笑开了。

“哎，彼得，谢谢你的坦率，”他说着站起来，“我该工作了。这次谈得很好，尽管……”

他步履僵硬地走回桌前，继续工作。我们就像两个演员，

① 此处霍利斯意指，菲尔比经过调查确认沃尔科夫指控的“临时负责人”就是他自己，所以才亲自去土耳其，使沃尔科夫在那里被克格勃暗杀，消除了对自己的威胁。作者则认为“临时负责人”不是菲尔比，而是另一名高级间谍。——译者

② 麦克唐纳是当时D处处长。——译者

③ 原文即如此。霍利斯开玩笑讥讽彼得，暗示他们写的调查报告只会使问题更复杂。——译者

完成各自的演出任务后分别从舞台两侧退场。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罗杰·霍利斯。没过几天，新局长马丁·弗尼福尔·琼斯上任。他做出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把全部前任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挂到办公室的前庭。

当我问他为什么把照片取走，他喃喃地说：“工作时不需要观众。”

弗·琼斯是个寡言少语，工作专注、意志坚决的人。他相信自己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苏联在伦敦的间谍数量大大超过了手下人员的数量。弗·琼斯在任期间竭尽全力发展壮大军情五局的力量，同时设法削减苏联驻伦敦的外交人员。前一项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后一项终于大获成功。

弗·琼斯认为首要任务应是对付苏联的间谍活动。他一上任就改变了过去的工作作风。以前，我做什么工作总得一再请求才能得到许可，而现在我可以给弗·琼斯打电话，直接上楼去办公室找他，并且当即得到答复。他毫无保留地支持三科的调查工作，毫无异议地批准进行各次重要讯问。他处理问题明智果断，例如对沃森和普罗克特一案的处理。弗·琼斯襟怀坦荡，外柔内刚。举止谦恭的英国绅士外表使刚直不阿的内在气质不易被人察觉。他的倔强使他在白厅中朋友甚少。然而，他的职业却恰恰需要他具备这种品格。

弗·琼斯上任不久，“流畅”调查组给他和六局局长迪克·怀特送去第一份工作报告。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列出了二十八个指控。我们肯定这些指控能够通过调查得到证实，但其中所指控的人都不可能是现已知道的间谍。第二部分采取叙述形式。从1942年古森科提出的“埃利”到1962年戈里

金的情报为止，我们逐一介绍，或多或少地说明英国情报机关不断被渗透的实质。直到报告送上去六个月以后，局里才对其进行讨论。然后我们得到指示重写报告，只汇报我们的发现，即列出可以进行调查的指控，并就谁的间谍嫌疑最大阐明我们自己的观点。

“流畅”调查组决定：应该首先调查谁是“埃利”和“临时负责人”。由于两者在时间上离得很近，应把他们联系起来分析。我们认为罗杰·霍利斯最有可能是“埃利”和“临时负责人”，他的嫌疑最大。他的名字被去掉头衔和级别，只有姓名：罗杰·霍利斯，被清楚地写在报告上。

我们在报告中列出的第三个指控是高尔涅夫斯基提出的“中级情报员”。这个间谍对我们构成的潜在威胁与霍利斯涉嫌的前两个间谍构成的威胁相差无几。“中级情报员”一案始于1962年。素有“狙击手”之称的高尔涅夫斯基终于同意与我们见面，解释他们提供的情报的某些细节。他曾在波兰以寄匿名信的方式为我们提供情报。以前，由于我们未能抓到化名：“兰姆达甲”的乔治·布莱克，高尔涅夫斯基一直不愿直接接触军情五局的任何人。直到布莱克被捕入狱，高尔涅夫斯基才同意会见有着一半波兰血统的军情五局波兰科的负责人。

军情五局的人终于得以见到高尔涅夫斯基。在此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他患了精神病，他开始出现幻觉，感到自己是沙皇后裔。即使这样，他对昔日的情报生涯仍记忆犹新。在一天上午的会见中，他宣布他将说出从未透露的一个情况。由于英国人在侦破布莱克案件时表现拙劣，他也就从未提起此事。他声称军情五局里有名“中级情报员”。

高尔涅夫斯基解释事情的由来。他的上司，他的一个朋友和他三人曾合谋一起叛逃西方。对于去英国还是去美国，他们权衡再三，难下决断。鉴于英国有大批波兰移民，日后的生活较容易维持，三个人同意去英国。因为军情六局有个代号“兰姆达甲”的间谍，他们显然不能与军情六局联系。高尔涅夫斯基向另外两人建议通过波兰移民团体与军情五局联系。他知道这个团体受控于处。他的上司表示这项计划同样危险，因为他知道苏联在军情五局内也有间谍。这名间谍是由克格勃第三总局的人发展的，负责搜集军事情报。这个情报员对克格勃至关重要，以至他们打破常规没有将他移交给第一总局，而仍置于克格勃第三总局的控制之下。“中级情报员”曾在英国军队服役，被招募时是名军官。高尔涅夫斯基说出一名克格勃中校的名字，认为是他在东欧发展了“中级情报员”。这个间谍为苏联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反波兰间谍活动的情报。大概此人就在军情五局波兰科工作。

高尔涅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中还有一个细节。50年代中期，英国人成功地使波兰总理汉克出逃到西方。这导致了克格勃在华沙进行调查，并由当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塞罗夫将军亲自主持。由于某种原因克格勃事先未能得到有关出逃的警告。高尔涅夫斯基得知这是由于那个“中级情报员”正在“冬眠”。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他受到怀疑，他正出国执行任务而无法联系，或是他害怕了。“冬眠”状态持续了两三年。直到50年代末，才又恢复了在波兰科的工作。高尔涅夫斯基于以后的1959年回莫斯科时曾问他在第三总局的一位朋友，是否“中级情报员”仍在为克格勃工作。这位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朋友非常吃惊，想不到高尔涅夫斯基竟了解此事，告诫

他千万不能再提一个字。

“这事绝对保密，”他说，“我劝你把它忘了。”

自1963年底起，反间谍工作变得纷乱繁重，加之我们怀疑高尔涅夫斯基的话是否可靠，尽管他提供的情况十分详细，我们一直未做认真调查。在“流畅”行动中，我们着手澄清“中级情报员”一案。调查组根据高尔涅夫斯基所述，将“中级情报员”的全部特征归为七条，然后使每个可疑的人对号入座，即符合哪一特征即在那一栏内他的名字下打上记号。军情五局里有八人符合部分特征，只有一个人符合全部七个特征。他叫迈克尔·汉利，C处处长，亦是弗·琼斯最有希望的局长继承人。

因为汉利“完全符合”高尔涅夫斯基所说的“中级情报员”的特征。“流畅”调查组一致建议对汉利进行审查。给他规定的代号是“哈里特”。

又过了六个月，局里才讨论“流畅”调查组的第二篇工作报告。讨论会在局长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我、安妮·奥尔尤因、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伊夫琳·麦巴克尼特、安东尼·西姆金斯和弗·琼斯。这完全是军情五局内部的一次讨论。“流畅”行动调查的三个主要案件所涉及的人都在军情五局而不在六局。

会议平静地开始。桌上放着瓶苏格兰威士忌。灯光打在墙上，产生着戏剧效果。弗·琼斯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嘴里衔着烟斗，一脸怒气。

他发言了。

“你真怀疑这些人吗？你知道你所说的这些意味着什么吗？”

“当然清楚。”我答道，他责备的口气使我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简直是耸人听闻，”他敲打着有关霍利斯那几页报告，喃喃地说，“你别指望我会相信这些……”

弗·琼斯把报告扔在桌上。

“彼得，什么时候算完啊。你打报告就是告诉我，我的前任和我最有希望的继任人都是间谍。你仔细考虑过吗？你冷静想过吗？如果按照这上面的建议去做，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即使最后证明事情不是这样，我们也会元气大伤，十年都难以恢复。”

“弗·琼斯先生，我坚持我们在报告中阐明的意见。‘流畅’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亦会如此。我敢保证如果还有其他可疑的人，你也不会放过。”

西姆金斯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我能感到他已怒不可遏，正跃跃欲试向我进攻。但此刻弗·琼斯正在质问我，他不便插嘴。

“你和阿瑟几年来一直想立案审查，对吧？你们可曾想过这么干会给霍利斯带来什么后果？”

我告诉弗·琼斯，“在霍利斯即将离任之前，我和他谈过。他很冷静。”

我描述了我和霍利斯的最后一次会面，弗·琼斯听了惊讶不已。

“他一定是个坚强的人。”琼斯低沉地说。

终于，西姆金斯看到时机来了。

“简直是无耻至极！”他扯着嗓子尖叫。不愧是公立学校毕业出来的。“人人都知道你和马丁把不实之词强加于霍利斯。”

你们到处指责外交部，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散布流言蜚语，恣意放毒，如此无组织无纪律。如果说霍利斯有缺点，唯一该受到批评的就是太放纵你们了。”

“安东尼，我想做的是澄清事实。”我对他讲话时，竭力克制，不失礼貌。

“事实！你知道什么是事实，你需要学会尊重人！那是诽谤！霍利斯为我们的事业效力30年，他还没有踏出办公室，你就败坏他的名声。他为我们事业做出的贡献你永远望尘莫及。”

值得庆幸的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站在我这一边。

他说，“安东尼，充分发表意见没有什么不好。你不是刚刚这样做了嘛？”

斯图尔特紧紧抓着椅边，手的关节变得煞白。

他接着说，“我们的一些人为了查清事实真相，在不利的条件已经辛苦工作了几年。很不容易！尽管调查一起工作的同事令人不快，但是我们都感到必须进行。如此艰巨的调查报告完成后，我们至少应该理智地讨论一下。”

然而，西姆金斯决意压下这份报告。

“你还去美国放毒。我到了那里，他们只想和我讨论该死的渗透问题，实在令人不能容忍。我们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我反唇相讥道：“你不以为在菲尔比叛逃到苏联时或布伦特承认是苏联间谍时，我们就已经成了笑柄吗？”

弗·琼斯使劲抽着烟斗，不时停下来用火柴点一下，似乎没有听我们时冷时热的争吵。过了半小时，他突然打断我们。

“好了，我宣布同意彼得的意见：我们首先应该查清谁是‘中级情报员’。如果确有其人，他仍隐藏在我们内部。”

我点点头。

“那么，我想让汉利看看这个，”琼斯用手背拍打着报告，“他太符合上面的条件了。美国人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我想让其他几个嫌疑很大的人也看一看……我要求这个案子要查个水落石出。然后把结果告诉美国人。至于另一个嘛，”弗·琼斯这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还是原来的意见，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弗·琼斯宣布散会。人们走出办公室，只剩下他自己，肩负着工作的重任和烦恼。他是“教皇”，在分裂的教会之中斡旋调解。

第十六章

汉利体魄魁伟，面色红润，外表咄咄逼人，其实很腼腆。自1960年他升任C处处长后，人们普遍认为他有可能成为军情五局未来的局长。他四十多岁，年富力强，办事灵活，处世有方。这使他和白厅的人关系密切。粗犷的军人气质使他在军情五局的局委会中颇得人心。“哈里特”调查开始时，他是军情五局的“王储”。毋庸置疑，他将接替将在70年代初退休的弗·琼斯，出任局长。

一般来讲，对同事进行审查会令人很难堪。但是，调查霍利斯和米切尔则不然。他俩和我关系疏远，而且在对他们的怀疑加深时他们即将退休。可是，我和汉利彼此很熟。我们是同龄人。虽然谈不上关系密切，但我们在工作中和睦相处十几年。他前程远大，此刻却由我主宰命运。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D处一科（调查科）和我共同负责这次审查。第一项任务是全面调查了解他的生活经历。我们开始追查他的家庭背景以及进入军情五局前后的经历。我们向熟悉他的几十个人了解情况。所有工作都是在例行公事的调查掩盖下秘密进行的。

我们遇到了“哈里特”一案中最棘手的问题。调查人员很

快发现，汉利童年时代父母离异，生活十分凄楚。痛苦的童年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汉利的档案中记载，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他在1950年接受过精神治疗。当时他是军情五局的年轻军官，没有向组织隐瞒这一情况。

汉利接受精神治疗并无异常之处。军情五局的许多高级官员任职期间都曾接受过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治疗，以帮助他们减轻从事保密工作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但是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和剖析他过去的心灵创伤，目的在于了解可能激发背叛动机的任何因素。弗·琼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商量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弗·琼斯先以私人名义写信给汉利的心理医生请他保证决不泄密。然后我去哈雷大介拜访这位医生。他了解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指出汉利是个意志坚强、身心健康的男子汉，并且学会了如何克服过去的创伤，生活下去。我问医生是否会认为汉利是间谍。

“绝不可能。”他完全有把握地回答。

汉利的青少年时代也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战前在牛津，他是典型的左翼温和学生。战争打响后继续在牛津呆了一年，获得了学位。此后，加入国防部探照灯团当了一名少尉，直到1945年。虽然他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对像汉利这样多才博学的人来说，有点大材小用。可那时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总是过分自卑，缺少抱负。

汉利的经历中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于1945年做出的一项决定：进入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俄语速成班学习。我们工作的经验和戈里金提供的情报都说明学俄语是克格勃发展间谍的第一步。（但是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汉利和克格勃有瓜葛）学俄语是他第一次接触苏联人。从此以后，他的职

业经历令人不可思议地符合高尔涅夫斯基描绘的“中级情报员”的情况。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与汉利一起工作的克格勃军官正是高尔涅夫斯基道出姓名的招募“中级情报员”的人。返回伦敦后，他成了陆军部与苏联大使馆武官之间的联络官，主要处理遣返人员的问题。在这期间，汉利开始与军情五局打交道，40年代末复员后正式申请加入该局，研究苏联问题。他的第一项任务是编撰“红色乐队”成员的档案索引。几十年后在D处三科工作时，我发现这部索引很有价值。

不到两年，汉利即被调去负责波兰事务，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先在香港呆了两年半，继而返回伦敦在E处工作（E处专门负责殖民地事务），后升任D处二科科长。1960年跻身于局委会领导成员之列，出任C处处长。纵观其经历，汉利官运亨通。然而，他的历史背景确实存在着促使他变节的因素。童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以后他逐渐摆脱了个人思想上的羁绊，开始走向生活。恰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汉利与苏联人的接触频繁。或许他像布莱克一样易怒。苏联人煽动起他压抑着的怨恨情绪，使他落入圈套。

尽管调查出的事情与高尔涅夫斯基所述十分吻合，我和帕特里克·斯图尔特都不相信汉利是间谍。与霍利斯的情形正好相反，我们直觉感到霍利斯甚为可疑，但是调查结果却是证据不足。

“易怒”理论很难解释得通汉利的情况。他加入军情五局后一直青云直上。尽管有时喜欢虚张声势，他仍受到同事的青睐和上司的赏识。汉利工作全心全意，夫妻生活和睦。另

外，那位心理医生自信地断定汉利不是间谍。

间谍活动是一种很难抓住证据的罪行。这就是为什么直觉在成功地破案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几乎每个从事反间谍工作的人都会产生这种直觉。当他掌握的线索，例如一段背景，作案后留下的蛛丝马迹，事情的巧合等会有不同解释时，直觉往往能使他茅塞顿开，引导他选择正确的破案途径，最终找到符合案情的唯一结论。迪克·怀特过去多次谈到直觉的这一作用。但是，调查结果表明汉利很可能是间谍，直觉却竭力否认这一指控。最后我们认为，只有对汉利本人进行讯问，才能澄清事实。弗·琼斯批准了我们的讯问计划。

提起讯问，多数人都把它想像为折磨人的场面：在刺眼的灯光下，被讯问的人受到穿衬衫的讯问人咄咄逼人地连续进攻，没有喘息机会，直至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人瘫倒在地，苦泣着承认全部事实。其实，我们进行的讯问比人们所想像的和缓得多。军情五局的讯问安排得井然有序。一般上午九点半开始，下午五点结束，午餐时暂停。

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间谍招认呢？奥秘就在于以势压倒对方——坐在桌子对面等候讯问的人。这是斯卡登取得讯问成功的诀窍。尽管几年以后我们嘲笑他，因为他竭力想证明是清白无辜的人最后被确认为间谍，他的方法确实奏效。布伦特和“五人帮”的成员都很怕他。不过，斯卡登的优势并不产生于他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阿瑟·马丁和伊夫林·麦克巴尼特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使被讯问人产生一种错觉：斯卡登比他们本人更知情。斯卡登利用这种心理战术镇住了富克斯。不仅如此，监听人员也为斯卡登的成功发挥了作用。他们善于发现破绽，将被讯问人回答中的漏洞及时告

诉斯卡登。在讯问富克斯之初，斯卡登认为他是清白的。只有在监听人员指出他何处撒谎以后，斯卡登才相信他有罪。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斯卡登迫使富克斯招供。不过，斯卡登本人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被讯问人面前，他的行为处处体现出显而易见的英国中产阶级信奉的价值观。例如，他在挂着花边窗帘，布置典雅考究的房间里进行讯问。如果到了午茶时分，即备有茶点。他的这种表演如此奏效至使被讯问人感到斯卡登不可能是资本主义邪恶的化身。因此，讯问一开始，他们之间的平衡即被打破。

即使汉利真是间谍，在对他讯问时所有这些计策丝毫不起作用。他是军情五局的人，对此一清二楚。就像菲尔比一样，他能看穿这些把戏。讯问内部人员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掌握证据，使他面对事实。我们绘出一份汉利的完整详细的履历表。在讯问时，他要回答每一个细节。如果他的回答与我们掌握的实际情况不符，或者他避而不谈某段经历，我们就要深究下去，施加压力。倘若他心中有鬼，这种压力会导致他露出更多破绽，直至假面具被戳穿。

军情五局使用的讯问方法虽不完善，但就像法院的陪审团制度，是迄今为止的最佳选择。如果一个清白的人受到怀疑，我们的方法给他留有余地承受压力，并有机会洗刷自己。但缺点是，有些人虽被证明无罪，但他们也许曾有失检点，干些丑事，并不为人所知。在详细的讯问中丑行被揭露，使他们难以在局里继续工作。这有点像中世纪的正义观：清白有时要以丧失事业为代价才能得以证明。

弗·琼斯决定由他亲自主持对汉利的讯问。他知道这将是一项令人难堪的工作，而最终他主宰着汉利的命运。他感

到把这项任务交给其他任何人都不公平，但是他一定要求我和帕特里克在莱康大楼D处一科的工作室内监听整个讯问过程。

一天上午，琼斯在办公室召见汉利，通知他本人受到怀疑，需要立即接受讯问。讯问在局长办公室进行，桌面上摆着话筒，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室内录音。汉利认真坦诚，有时显得很痛苦。他不回避问题，不隐瞒生活细节和自己的真情实感。第二天，他知道了高尔涅夫斯基指控的详情，可他一点不惊慌，他承认自己非常符合“中级情报员”的特征，但他镇静地声明自己不是间谍，从来不是。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时一星期至少和苏联官员会晤一次，他在任何时候从未受到苏联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试探拉拢。可是指控中说，那个苏联人做过试探。

对汉利的讯问证明，秘密情报工作是种专门玩弄诡计进行欺骗的职业。干这一行的都是许多了不起的人。试想，一个人对自己已取得的成绩非常自豪，而且希望未来更好。突然一天早晨他被叫去接受严酷的审问。他的所作所为被剖析得淋漓尽致，灵魂出窍。他恍然大悟同事们在背后追查了他过去的一举一动，监视他的家庭和办公室，此刻正对他进行讯问。恐怕大多数人都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凡是听了对汉利进行的讯问的人，都坚信他是个诚实的人。他很坚强，用自己的行为证明我们的讯问方法行之有效。他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最后安然无恙。

那天晚上弗·琼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走进牛津和剑桥俱乐部，讨论讯问情况。弗·琼斯拿着瓶苏格兰威士忌坐进一个角落。这两天的紧张工作使他的眼睛又凹了进去。

“你对结果满意吗？”他干巴巴地问。

“他是清白的，”我答道。

帕特里克默默地点点头。

“你将把讯问结果告知‘流畅’调查组的其他成员，对吧？……”琼斯又说。

“哈里特”调查全部结束后，弗·琼斯指示我访问美国中央情报局，通知他们英国军情五局确认汉利不是高尔涅夫斯基所指控的间谍。这是项极其敏感的任务。中央情报局对米切尔和霍利斯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对军情五局存有戒心。他们知道高尔涅夫斯基指控的详情，而且知道汉利嫌疑最重。使英美两国情报组织间的协作能够继续下去的关键是让美国人相信我们的结论准确无误。

弗·琼斯与美国人的关系不好，他愿意把这项工作交给迈克尔·麦考尔和我。他这样做，一是出于讨厌安格尔顿；二是出于英国中上层社会仍持有的蔑视美国文化的态度。迪克·怀特也抱有相同的偏见。琼斯和狄克两人都不富有，而他们的美国同行、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收入却相当可观。对此，他俩在英国同行面前不仅不加掩饰，反而有点故意炫耀。

琼斯和狄克不相信美国人，原因由来已久。在格雷和科因的问题上，弗·琼斯永远不会原谅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在战争末期，狄克领导在欧洲的反间谍工作，曾多次与美国军事当局发生冲突，从未能取得对方谅解。当1956年西利托退休时，美国人竟愚蠢地阻挠狄克出任军情五局局长。

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分歧源于思想方法的不同。琼斯和狄克都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的仆人。他们的组织是稳定有序

的政府机关的一部分，他们则是政府内部的人，即局内人。而赫尔姆斯、安格尔顿和胡佛都是局外人。美国情报组织有时表现出的无视法律态度和采取不择手段方法使许多英国同行中的高层人士深感不安。他们害怕以后万一出事追究法律责任时受到牵连，不愿与美国人过多交往。所以，联络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像我这样的人的肩上。

1968年我到华盛顿向安格尔顿通报“哈里特”案件结果。我们的会见非常正式。首先我简明扼要地介绍调查经过，阐明我们一致认为汉利无罪。然后他带我去见迪克·赫尔姆斯。安格尔顿说明了我华盛顿之行的目的，赫尔姆斯表示他不想再听更多的解释。如果我说汉利是清白的，他无条件地接受。而实际上他并没有消除疑虑。

离开赫尔姆斯那里以后，安格尔顿想和我讨论高尔涅夫斯基是否是苏联人派来的假叛逃者。高尔涅夫斯基提供的有关“哈里特”的情况如此精确以至于连疑心不重的人都会怀疑是否对汉利进行调查是克格勃导演的一出戏。安格尔顿和赫尔姆斯早已猜测高尔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又落入苏联人的控制。经过多次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情报从波兰问题转向苏联问题。似乎苏联人有意露出一些“钨餐”情报以确保其它机密不被泄露。军情五局同意这种分析。主要出于这个原因，“中级情报员”一案搁置了很久。证明汉利不是间谍以后，我们对“中级情报员”是否存在并对高尔涅夫斯基的情报，尤其是他叛逃后提供的情报的可靠性提出质疑。高尔涅夫斯基1961年1月叛逃。他供出“中级情报员”却是于1963年9月。那么，克格勃要编造详细的故事，就要得到汉利在局里的档案。身为军情五局局长的罗杰·霍利斯是唯一不必授权就能

查看档案的人。

但是如果高尔涅夫斯基又重新受控于苏联人或者是不知不觉地被他们利用，他的活动对英国军情五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的间谍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波兰一直是西方攫取东方集团情报最有收获的地方。在“哈里特”事件调查过程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我的发现令人极度不安。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所有受军情六局控制的间谍都去过一套公寓。在由军情六局华沙站的一个秘书租的这套公寓里，召开过九十多次会议。波兰情报局和克格勃竟没有发现。这是假象，我们上了混入内部的假情报员的当。如同潘柯夫斯基事件一样，这件事使军情六局大为恼火。

60年代初，叛逃西方的人数突然猛增。其中不乏有受到派遣的假叛逃者。他们的目的旨在扰乱西方反间谍组织的视听。我们全都为此忧心忡忡。戈里金一再宣称克格勃已经在系统地进行反情报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向西方透露假情报。戈里金说为使西方丧失对他本人的信任，克格勃可能派假叛逃人员。几乎在戈里金说这番话的同时，尤里·诺森科找到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对英美两国情报组织的渗透问题上，他的情报与戈里金的出入很大。

诺森科使中央情报局乱作一团。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他曾见到过李·哈维·奥斯瓦德的档案。此人被认为刺杀了肯尼迪总统。诺森科声称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事件。尽管奥斯瓦德叛逃到苏联以前曾在美国绝密的U—2侦察机基地工作，克格勃也没有与奥斯瓦德联系。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诺森科的情报有过分编造之嫌。特别是发现他没有如实交代

他在克格勃的官级和头衔，美国人对她更加怀疑了。但是为什么苏联人要派诺森科来呢？为了迫使诺森科交代实情，中央情报局对他施行囚禁和肉体折磨，军情五局决不允许使用这样的方法。到1967年为止，中央情报局为解开此谜所做的努力未取得很大收获。

联邦调查局亦愈来愈怀疑他们的两个情报员：“礼帽”和“软帽”。当时他们仍在提供情报，但拒绝披露情报来源。他们好像竭力要使美国人相信诺森科不是假叛逃者，居然提供情报为诺森科的谎言作证。然而，如果“礼帽”和“软帽”提供的是假情报，他们提供的关于英国安全机关遭渗透的情报是真是假呢？

“软帽”的一条消息导致马特利被起诉，蒙受灾难后，又被无罪释放。“礼帽”则送来了几本详细记载英国武器防御系统的文件，声称这些文件是苏联人从在英国的一个间谍手里得到的。经过调查，我们抓住了弗兰克·博萨德。他是航空部火箭导弹研究所的一名军官。他于1965年被捕，被判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软帽”和“礼帽”是苏联培养的双重间谍，苏联人为了使他们得到信任不惜牺牲非常重要的间谍。值得一提的是，多亏政府通讯总部的巧妙工作。否则，我们不可能获得确凿事实，证明博萨德正在为格尔乌工作。

我们处在被安格尔顿称之为“镜子的原野”上。在这里，叛逃者是假的，谎言成了真理，真理成了谎言。我们被照得眼花缭乱，是非难辨。你若未从历史书籍中了解过军情五局在整个战争期间如何使用“双十字系统”，你很难理解什么是假叛逃者。现在“双十字系统”已不是时髦的理论。在六十年代从事过情报工作的官员几乎没有人不相信，在那一时期苏

联曾派间谍投奔西方，我们成了他们玩弄的欺骗术的牺牲品。

人们在二十年以后仍无法澄清当时的事实真相。高尔涅夫斯基，潘柯夫斯基、诺森科，“软帽”和“礼帽”都有迹象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干扰我们的视线。我并不意味所有叛逃者全是假的。但是“软帽”和“礼帽”肯定是，因为联邦调查局不得不在70年代做出同样的结论。那时我早已退休。我毫不怀疑苏联人指使他们扰乱我们的视听，利用潘柯夫斯基干扰我们对苏联火箭技术的了解，利用诺森科影响美国对刺杀肯尼迪事件的态度。我相信苏联人利用高尔涅夫斯基，“软帽”和“礼帽”，有计划地离间英美两国情报组织间的重要协作关系，而且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还利用他们欺骗西方有关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情况。

下面让我们分析一下三名叛逃者提供重要情报的时间。高尔涅夫斯基1963年底才说出“中级情报员”，几乎是在他叛逃三年后。恰逢此时，霍利斯去美国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通报调查米切尔的结果。若想促使英美两国情报组织间的关系破裂，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告诉美国人，英国军情五局里有名苏联间谍仍未查出来。幸运的是要格尔顿怀疑高尔涅夫斯基的所述是否可靠。这一举动未能产生它原来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实际上，反倒增强了我们双方对高尔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怀疑。

似乎是有预谋的联合行动。几个月以后，根据“礼帽”的情报，我们追查出了博萨德。他向苏联人泄露了美国的武器技术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军方会对英国保安工作的软弱无力产生强烈不满。我们对博萨德造成的损失程度进行估计后确定，整个美国先进的导航系统已被泄露。帕特

里克·斯图尔特给安格尔顿送去一份损失报告的样本，同时附带只有两个字的备忘录。上面写着：“救命！”

对于英国人来说真是够幸运的。安格尔顿救了我们，使我们免遭攻击。但是像这样的友好协作转瞬即逝。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在60年代初两国情报组织的协作关系比战后任何时候都糟，几乎濒于破裂。

在我通报了“哈里特”案件的调查结果，准备返回伦敦的前一天晚上，安格尔顿和我到亚力山大区一家中国小餐馆共进晚餐。那是他儿子经常光顾的地方。当他感到需要谈话时，那里是他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安格尔顿告诉我在那里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话。

虽然当时形势已开始有点紧张，安格尔顿仍处在权力的巅峰时期。几年来，为了扩大他的反间谍独立王国，他和中央情报局苏联处的官员暗中进行权力之争。实际上，他能左右局里的行动方案和人事变动等重大决策。他控制着以色列情报网，使中央情报局特拉维夫情报站不信任。他要确保所有与英国情报机关的重要联络都必须经由他本人，而绕开中央情报局的伦敦站。他甚至以安全为借口，成功地建立了独立于中央情报局的自己的密码系统。

“卡扎博”^①会议是安格尔顿的突出成就。西方情报组织中最优秀、最著名、最有权威的人士每十八个月聚会一次，讨论由安格尔顿提出的议事日程——苏联的威胁、反间谍任务、为充满荆棘的未来制定策略。在安格尔顿的心目中，

^① “卡扎博”为英语原文CAZAB的音译。其中每个大写字母分别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英国。——译者

“卡扎博”会议是向建立统一的西方情报领导机构，与苏联集团抗衡而迈出的第一步。

在“卡扎博”会议上，安格尔顿如鱼得水。在这种安装着电子扫描装置、高度安全的环境里，他研究那些斩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显得最轻松自若。我完全支持召开这类重要会议。

赌博是“卡扎博”会议的一大特色。每天的会议通常是在用扑克赌博的游戏中结束的。安格尔顿擅长赌博，尽管有时我也能把他赢得精光。我们偶尔也赌赛马。我记得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一次“卡扎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开幕的当天下午，华盛顿国际赛马比赛正在进行。这次比赛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赛马好手。安格尔顿做登记赌注人。开会之前，我请安格尔顿为一匹英国马下一百美元的赌注。它的驭手是上一年的冠军莱斯特·皮各特。这匹马未必受到青睐，只是英国军情五局和六局的代表迫切希望能看到英国国旗飘扬在这幢最秘密的大楼里。赌注很快升到五百美元。

那天下午，当安格尔顿就苏联使用的长期反情报技术发表演说时，大多数人的心思，至少在场的英国人的心思都在赛马场的跑道上。一个小时以后，安格尔顿的秘书走进来不安地递给他两张纸条。第一个写着：“杰姆，你的房子卖多大价钱？”^①第二个写着：“那匹英国马赢了。”

“不公平的上帝！”安格尔顿诅咒道，“我忘记打那个赌了，那匹该死的英国马赢了。你们十一个对我一个，太吃亏了。”

^① 此处秘书在与安格尔顿开玩笑。言外之意是：你输了，卖掉房子还债吧。——译者

那天晚上，我们来坐中央情报局的一架小型直升机回华盛顿。安格尔顿在大肚子机舱内爬来爬去，用很厚一迭百元美钞还债。

“这是我为西方做出的牺牲……”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赢那份钱给我。

然而，玩笑未能掩盖住他在中央情报局上上下下树敌甚多的事实。在苏联处里，在其他嫉妒他的权力的同事中间以及在那些因他而影响了提升的军官中间，安格尔顿受到敌视。不过，只要赫尔姆斯当权，他的地位仍然十分巩固。但是，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希望缓和的政治空气开始清除冷战期间产生的怀疑，使中央情报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冷战专家比尔·哈维已被迫退休，终日酗酒。安格尔顿嗜酒成癖，也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看上去不仅苍白而且憔悴。他的性格变了。越来越多地反省自己，也不像从前那样谈笑风生。他显得抑郁、爱寻畔，疑心越来越重。这激起了人们对他更大的反感。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清晨四点。我们像导演分析电影脚本一样分析了叛逃案件的各种可能。谁是真叛逃者？谁是假的？谁是自愿的？谁是被派来的？我们如坐针毡。对于他，正确的分析事关刺杀总统事件的破案；对于我，则关系到“鼯鼠”行动采取的下一步骤。后来，我们穿出亚历山大区朝四十四号桥走去。安格尔顿的车停在国家公墓附近冲绳纪念雕像的下面。安格尔顿的爱国精神以其独特的美式方式表现出来。他崇敬国旗和像冲绳纪念雕像这样的国魂象征。看见它们，便会如醉如痴。他停下来，注视着远处的

国旗。

如果60年代初苏联利用假叛逃人员愚弄西方，我们极易成为这一阴谋的牺牲品。那个时期伦敦和华盛顿默默地奉行着一种政策，即尽一切可能吸收叛逃者。我们不断策划苏联间谍叛逃，内疚之情亦由此而生。像古森科和冯·比得罗夫这些最早叛逃的人得到的报酬与他们所做的贡献相比少得可怜。他们对受到的待遇感到愤懑。当初，我们付给他们一点报酬就对他们再也弃之不理，期望他们依靠自己谋生，结果许多人无法生活下去。沃尔科夫和克里维斯基之死也引起了我们的自责。因为我们的保安措施不够稳妥而使他们丧命。我们担心倘若再不向人们显示叛逃的好处，叛逃者境遇不佳的消息传回东方便会抑制希望叛逃的人与我们接触。

戈里金叛逃时，这种政策已经完善起来。任何策划叛逃的行动都必须得到上级批准，付给叛逃人员的报酬亦愈加丰厚。不过，也包括其它形式的报酬。一个名叫格里高文·瑟奇（化名）的克格勃高级军官得到的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报酬。我特别清楚地记得60年代初的格里高文·瑟奇事件。这桩案子进行了很长时间。格里高文曾被派驻丹麦，我们早已了解他的底细。丹麦情报局按惯例向我们通报了他的真实身分和其它一些有关他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他喜欢玩女人。这份报告传阅后送至D处四科——情报员控制科。获悉格里高文把妻子留在了莫斯科，D处四科奉命密切监视格里高文以便发现他的任何不轨行为。

任何苏联人、尤其是克格勃军官只要被克格勃安全科发现在西方与女人来往，都会遇到很大麻烦。格里高文很可能与女人胡搞。几天之后，D处四科的一位官员第一次收到

了这方面的情报。他手下的一个情报员是《每日镜报》的一位高级职员，时常在晚宴上见到格里高文。这位报社人士的一位女朋友告诉他，格里高文正和一个女人幽会，是她介绍他们认识的。D处四科在与D处一科（行动科）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提出这件事。他们决定密切注视这一动向，并叫D处四科的那位官员敦促他的情报员秘密监视这一桃色事件的发展。

格里高文终于玩腻了那个姑娘。当他再次见到介绍他们认识的那位妇女时，他问她是否能介绍他认识其他女人。D处一科立刻意识到我们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人介绍给格里高文，我们将能取得绝对主动，诱使他上钩。弗·琼斯批准了我们提交的行动计划。基于外交部很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这次行动对外交部保密。D处四科奉命找一个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女人。他们有一批可供美人计用的高级妓女，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召来。终于在一次宴会上，我们派去的姑娘成功地认识了格里高文。他完全上钩了，很快和她发生了关系。

这一事件开始向高潮发展。格里高文完全处在我们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分析了事件发展的各种趋势。通过观察不难看出格里高文的信仰没有发生危机，我们无法使他心甘情愿地背叛。他对那个姑娘感兴趣完全出于性欲。我们只能靠圈套，迫使他就范。

叛逃计划非常复杂。制定计划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的周密研究。首先，租一套房，并装上双向镜和照相机。然后，妥善准备好秘密活动点和交通设施，一旦格里高文决定叛逃，要确保其人身安全。因为他在莫斯科有家眷，我们还要为他

们准备一笔钱，以防万一他的家眷也要出逃，格里高文为他们讨价还价。

采取行动的时机到了。D处一科科长亲自负责这项行动。格里高文和那个姑娘进了房间。我们相信已经拍了足足有十分钟他们在床上的镜头后，D处一科科长和两名军情五局的彪形大汉用莱斯利·贾格尔的万能钥匙打开房门。

当那个姑娘被迅速带出房间时，D处一科科长说，“不瞒你说，她是我们的人……”

格里高文一时惊呆了。一科科长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军官望了一眼照相机，立刻恍然大悟。

“我是外交官。”这个苏联人说，“我要求与大使馆通话……我有护照！”他企图伸手去拿裤子。此刻，我们的小伙子正踩着他的裤子。

“这难道也是外交官的行为吗？”D处一科科长说着把内裤扔给了赤身裸体的苏联人。然后他们谈到正题。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格里高文。你已经完了。如果你被发现，他们将送你回去……”

他开始考虑了一下。

“你看上去好像更适合呆在西方。我们调查过了，对你的情况很熟悉。你在美国呆了四年、丹麦三年，目前在伦敦。你不想回去，对吧？为什么你不到我们这里来呢？我们会照顾你。每年给你数量可观的一笔钱，保证你的安全。”

这位苏联人挥手拒绝，仍然要求与他的大使馆通话。

一科科长花了两个小时试图说服他，叫他想想将来。他将被剥夺所有特权，很不光彩地送回莫斯科，到西伯利亚的某个穷乡僻壤服役。再也得不到外汇，再也没有神气的出国

机会。

“我是外交官，”格里高文坚持说，“我要与我的大使馆讲话。”

他像一名二次世界大战时被俘虏的飞行员，只说出自己的姓名、官阶和军号。他是个过硬的战士。终于，我们认识到他绝不可能叛逃。我们将衣服还给他，用车把他带到肯辛顿园花坛附近，抛在人行道上。几个月的精心策划，几年的耐心等待全是徒劳。

第二天上午，一个要大使亲启的匿名褐色包裹送到大使馆。里面装着格里高文和那个女郎在床子厮混的照片。当天晚上，特别行动处的人看见这名克格勃军官在别人的陪同下被送上一架苏联飞机。我们给军情六局莫斯科站送去一份报告，请他们注意格里高文的动向。只要他回心转意，就设法与他取得联系。可是，我们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信。

叛逃常带有悲剧色彩。但是没有任何人的叛逃比纳迪安斯基的更悲惨。这位年轻人中途改变了主意。他在贸易代表团船运处工作。我们早已查清其真实身份是克格勃军官。他沉默寡言，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是苏共政治局一位大人物的亲戚。他在伦敦一个公园与姑娘幽会时，被我们的密探发现，从此以后引起我们的注意。

开始，我们全面调查了那个姑娘。特工人员跟踪到她家，查清她是政府一个小机关里的秘书，接触不到机密文件。迈克尔·麦考尔走访了姑娘，问她为什么与一个苏联官员约会。姑娘向他保证纳迪安斯基对她感兴趣完全不是出于间谍目的，他们在恋爱，她全然不知纳迪安斯基和克格勃有瓜葛。她说，他完全不是她原来想像中的苏联人。纳迪安斯

基很浪漫，也很胆小，总是说他要在西方开创新生活。

D处一科（行动科）和二科开会讨论了策动纳迪安斯基叛逃的最佳方案。我们决定让那个姑娘继续和纳迪安斯基保持来往。与此同时，我们设法接近他。很显然，整个行动不能拖得太久。姑娘的精神已经很紧张，好像过不多久就会露马脚。然而姑娘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虽然纳迪安斯基是名下级军官，将他争取过来长期呆在伦敦无疑是要制造影响。事件本身的舆论宣传作用极其重要。此时正值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到西方，我们明白，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的亲属要求在西方避难会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

在下一个星期天，纳迪安斯基因有事去哈尼治。他将陪着一些苏联船员上船。那艘船预定在当天晚上起航。按手续他向外交部申请获准超过东方集团外交人员必须遵守的八十公里的限制。麦考尔的车停在哈尼治码头外，周围散布着一队特工人员。麦考尔坐在车内等待纳迪安斯基的出现。当他从汽车旁走过时，麦考尔轻轻叫住了他。他犹豫了片刻。

“我们熟悉那个姑娘……”麦考尔的声音低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们知道你想留下。快上车！我们可以谈谈。”

纳迪安斯基环顾左右，然后抓住时机钻入汽车后座。麦考尔直接把车开到我在艾塞克斯的住所。我们请他喝茶，尽量少讲话。我们提到一只小鸟，眼下重要的是别让它受惊。

“我听说你想加入我们……？”等他稍微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后，我开始问道。

他开始很拘谨，然后很坚决的点点头。

“我们相信你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我用询问的口气说。

他呷了口茶。

“你是指克格勃吗？”他用标准的英语问。

“我们认为你是。”我继续说。

“你没有选择，”他突然痛楚地讲，“如果他们想让你为他们工作，他们只管发号施令。你没有选择。”

我快速把我们的安排介绍了一遍。他将受到保护，不必担心安全，并可得到养老金。以后或许能找到份工作。他可以先和那个姑娘见一面，然后必须辛苦工作几个月。

“为英国保安机关……我懂，”他微微笑着说。无论纳迪安斯基叛逃与否，他熟悉这些事情。

当天晚上我们开车把纳迪安斯基送到在温布尔登^①的秘密活动点，并派武装警卫保护。十二小时以后外交部收到了苏联大使馆的询问：苏联一名下级军官例行公事去哈尼治，回程途中失踪，英国外交部是否知其下落？

先是副局长，然后是局长弗·琼斯已将纳迪安斯基叛逃一事告知了外交部北欧司。外交部对待此事的态度与以往相同，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伤害苏联人感情的事件发生。他们立即派了一名官员到秘密活动点会见纳迪安斯基。问他是否是自愿叛逃，是否愿意同任何苏联人讲话。外交部将他叛逃的消息通知了苏联大使馆。

人们看见纳迪安斯基的妻子被立即送回莫斯科。第二天苏联大使馆要求英国外交部做出安排。使纳迪安斯基的妻子从苏联与他通话。开始纳迪安斯基不愿与她讲话。他已经承受着巨大压力。显然苏联方面企图对他施加更大的精神压力。对这样的电话我们很不欢迎。然而外交部却坚持要遵守

^① 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市，以举办国际网球比赛而闻名。

外交礼节。

这次电话仅仅是开始。在苏联人的坚持下，在以后的四天里，这种电话不断打来。大多数电话是纳迪安斯基的妻子打来的，但是其他亲属也在电话里轮番哭着请求他再三考虑自己的决定。

“替我们想想吧，”他们说，“想想毁灭和丑闻将会落到我们头上。”

看得出来纳迪安斯基的精神开始崩溃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局实际上陷入对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允许他们打电话。当我们的人处在这种境地时，例如格雷维尔·温在莫斯科被捕时，苏联人从不允许我们跟他们联系。可是我国外交部却丝毫不考虑我们的要求，也不替纳迪安斯基着想，一味强调外交关系的微妙之处。

“我们不能不讲人道主义，拒绝家人的请求。”他们说。

到了第四天纳迪安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他的事件给家人带来太多的麻烦。麦考尔试图给他指出回国的危险，但是已无济于事。他就像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死之间徘徊，此刻我们感到他在悄然逝去。

他马上就要走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我问，

“你肯定想回去吗？”

“我再也不想纠缠了。”他麻木不仁答道，“我这样做已对我的家庭尽责。”

纳迪安斯基惟有依靠命运之神了。在众多无名的冷战牺牲者中，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生活被卷入了东西方两大秘密营垒面对面地对抗之中。

第十七章

“流畅”行动的调查报告表明罗杰·霍利斯是间谍的嫌疑最大，但谁是混入高层的间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自1936年以来，我们全力以赴寻找“中级情报员”。当汉利是“中级情报员”的可能性被排除后，我们已束手无策，不知何去何从。是假定高尔涅夫斯基有意递送假情报从而放弃寻找呢？还是继续调查其它可疑的人？其中有几个人涉嫌程度和汉利相差无几。如果高尔涅夫斯基递送的是假情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故意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另一名中级或高级间谍身上引开。两者都存在？还是都不存在？置之不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犹如古希腊悲剧中的演员没有其它选择，只得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在局里再次开始这项令人窒息的工作。

下一个最受怀疑的对象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他有才华、性格外向，喜欢用恶作剧逗人发笑。史蒂文斯的情况有百分之六十与高尔涅夫斯基所描述的“中级情报员”的特征吻合。他的波兰家庭背景比汉利更深。他母亲是波兰人，有一半波兰血统。他已升任波兰科科长——汉利过去担任的职务。对波兰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丰富了解使他工作得非常出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也是不祥之兆，正

是史蒂文斯1963年前去会晤了高尔涅夫斯基，是他最早听到有关“中级情报员”的情况。正如霍利斯去见古森科一样，这又是一个巧合吗？

与汉利相同，史蒂文斯也曾在军队服役，也和那个高尔涅夫斯基声称招募了“中级情报员”的克格勃军官有过联系。两人都出席了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作为军事翻译，史蒂文斯奉命作斯大林的助理翻译，直到斯大林抱怨他讲的俄语带着波兰腔。

与汉利相同，史蒂文斯也接受过心理治疗。我又一次小心谨慎地走访了哈雷大街的心理医生。不同的是汉利将他职业的性质告诉了医生，而史蒂文斯丝毫没透露他从事国家安全工作。

“我不认为他精神稳定得足以胜任那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以信赖吗？”我小心地问。

“他很聪明，”医生答道，“但我觉得他有时可能会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话怎讲？”

“他的性格有点像詹姆斯·瑟伯小说中的瓦尔特·米蒂^①。我认为你不能全信他的话。”

我越看案卷越觉得最先受到调查的应是史蒂文斯。他的情况似乎很难说清。他工作优秀，是局里难得的人才。倘若

① 瓦尔特·米蒂是美国幽默小说家詹姆斯·瑟伯（1894—1961）的短篇小说《瓦尔特·米蒂的秘密世界》中的男主人公。现实生活中软弱无能的米蒂时时幻想自己是聪明、果敢、能战胜一切困难的强人。——译者

当时审查出问题，他决不会被军情五局接纳。心理治疗还仅仅是个次要问题。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他的波兰背景。根据局里档案记载，他被批准定期回波兰探亲。与他关系密切的叔叔是波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们有时在伦敦见面。按照规定，如果申请人的家庭背景与英国共产党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联系，军情五局都拒绝接纳。因此，史蒂文斯的情况显然非比寻常。他本人又牵涉进调查“中级情报员”的工作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他的亲属有一半生活在铁幕另一边，他决不适合参与调查。为了避免嫌疑，他应该完全回避这项工作。

调查工作不再有任何进展后，我们通知史蒂文斯接受讯问。我和吉姆·帕特里克主持讯问。帕特里克是位独眼的廓尔喀族人^①，D处三科的专职讯问官员。

显然，自从史蒂文斯听说我们内部有个波兰背景的中级间谍，就隐约预感到会有这一天。在讯问过程中，他时攻时守，紧张地盯着我，似乎以此使我相信他没有撒谎。史蒂文斯承认他很符合“中级情报员”的特征，也承认像他这样的人被军情五局接纳实属异常。

他说：“我经常想人们在什么时候会醒悟到我的波兰背景。……这次审查我是通不过了吧？”

“我不知道，”我答道，“即使结论是令你放心的，也不是由我而是由弗·琼斯来做。”

史蒂文斯感到无论调查如何进行，他都难以顺利度过这一关。与汉利不同，他不真正指望安然无恙地经受考验。

^① 廓尔喀族人居住在尼泊尔北部山区的穷乡僻壤。“廓尔喀兵”是尼泊尔士兵的统称。他们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雇佣兵，以勇敢善战而闻名。

——译者

讯问进行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史蒂文斯沉着脸走进房间，坐在桌子对面。

“是该我向你坦白的时候了。”他说，“我决定承认……”

我瞟了吉姆一眼，他立即准备记录。整个讯问都录了音，做记录只是备用的防范措施。

“是的，”他继续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说出来。你没猜错……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间谍。”

他弯着腰，肩膀不停地抽搐，好像哭了。但是过了一两分钟，他抬起头来，直盯着我。

“格里戈，你的话当真吗？”我问道。

“你有证人，对吧？”

“你知道何必向处里正式声明。”

他点点头。我凑近吉姆，叫他通知局长的安全顾问汤姆·罗博特，并通知特别行动处立即来人。史蒂文斯和我面对面坐着，我面前的材料和问题突然成了多余的了。

“一切都是事实，彼得。”他又清楚地说了一遍。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博特到来以前他最好不要讲话。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沉默地坐着。几分钟以后，我觉得他又在抽泣。大概他快支持不住了。这种时候，人经常会这样。

“妈的，”我心里想，“我早该把局里的医生叫来。”

就在这时，他突然大笑起来。

“你真的相信我，对吗？”他叫道。

一时间我感到脸上发烧，非常难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个间谍，不是吗？”他说着，脸唰地红了。玩笑

已经结束，再开玩笑已不合时宜。“我能为你提供一个。我知道，我反正逃不过去了。”

“我认为我们现在谈论这事不合适，”我答道，“汤姆·罗博特一会儿就到，你可以向弗·琼斯解释一切。”

当时我感到史蒂文斯的坦白是真的，但此刻又想反悔。对他的了解足以使我相信他又在捉弄人。不过，这样做很蠢。对他来说，蒙混过关的希望已不复存在。

弗·琼斯听到这一事件后极为震惊。他是律师。出于职业信仰，他非常珍视军情五局工作的严密准确性。

“你意见如何？”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他的坦白是假的，还是他想反悔？”

“你知道我的看法，”我答道，“尽管他的坦白当时听起来似乎是真的，但我敢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中级情报员’是捏造出来的。我刚才想到，他在接受讯问时准是精神失常了……”

弗·琼斯哼了一声。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从不愿意接受假情报的说法。

“会不会是他编造了整个故事？我是指高尔涅夫斯基的故事。”

我告诉琼斯，讯问之前我们检查了当时的录音带。“我甚至叫史蒂文斯核对当时的译文。没错，是高尔涅夫斯基说的。”

“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用他这种人，”弗·琼斯叼着烟斗嘀咕着，“一个精神不稳定，还有可怕的波兰背景的人。这事新鲜得简直可以登报纸了。”

他用手示意我出去。

没过一小时，格利戈里·史蒂文斯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他和弗·琼斯在一起谈了十分钟后，汤姆·罗博特把他送到莱康大楼外的便道上。他甚至没来得及清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

几天后，阿瑟来找我。自从他离开军情五局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仍然对往事耿耿于怀，但已不像从前那样气势汹汹。他想知道史蒂文斯是怎么回事。从前在D处一起工作时，他们是朋友。年龄大得多的阿瑟对待史蒂文斯犹如父亲对待孩子。

“你必须那样做吗？”他问我。

我给他介绍了“中级情报员”一案，史蒂文斯坦白后又反悔，以及纠缠着我们的困惑和怀疑。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问他，“我们怎么能叫白厅进行清查而我们对自已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阿瑟知道我们做得对，可又感到为此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我们都受影响了。”他平静说道。

格利戈里·史蒂文斯与同事相处得很好，他的去职引起了对他的同情和对我的不满。除了几位高级官员，没有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怀疑军情五局高层中混入间谍的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布伦特的坦白交代，绝密的“流畅”调查行动和其结果可怕地暗示：罗杰·霍利斯先生十分可疑。

办公室里开始议论D处三科正在内部进行大清洗，格利戈里·史蒂文斯就是牺牲品。人们把我们比作盖世大保。较年轻的官员在内部餐厅里开始躲着我。许多同事很少像过去那样与我随便聊天。我们这些参与消除渗透工作的人受到孤

立和不信任，令人望而生畏。

军情六局也是一样。经过数年的忽视以后，内部安全工作又重新受到重视。克里斯托芬·菲尔波茨在60年代中期被任命为反间谍部门的主管。那时，“流畅”行动正在顺利进行。实际上，菲尔波茨看上去就像昔日英国人狂热崇拜的大侦探。他爱喝杜松子酒，喜欢扎领结和蝶形领带^①。但是，他坚决主张严肃内部纪律，相信自菲尔比叛逃后，英国情报组织像奥金国王的牛棚^②需要清洗。他认为彻底检查安全制度和审查内部人员是恢复一个情报组织自尊的先决条件。有关菲尔比、苏和克拉布的三宗事件给我们造成了严重创伤。尽管迪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仍有待于继续恢复创伤。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并计划在“世纪大楼”内部进行审查。在菲尔波茨上任以后至少有八百高级官员被迫辞职。其中一位官员被迫去职，因为经调查发现他没有向组织交代他曾和里奇·弗里德曼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可以肯定是她介绍菲尔比投身于苏联的事业。另一名遭受同样命运的高级官员在30年代曾是一名共产党。几名曾在三军联合语言学校学习过的官员也因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他们档案里的某些细节与调查结果的不符之处，自动离职。甚至埃利奥特也不例外。在他亲自去贝鲁特听到菲尔比的坦白交代之前，他曾长

① 这些都是昔日英国侦探的典型装束和嗜好。

——译者

② 古希腊神话中，艾利斯国王奥金的牛棚里有牛三千头、三千年未曾清扫，赫克勒斯引河水在一日之内清洗干净。清扫奥金国王的牛棚喻义是彻底消除污垢，消除积弊。

——译者

期支持菲尔比。由于怀疑菲尔比是否曾设法从尼古拉·埃利奥特那里获得情报，我们对尼古拉进行了长时间的讯问，尼古拉使主持讯问的阿瑟·马丁相信他是清白的。

采取这些措施决不是背叛行为。可是，整个情报机关的审查制度长期松懈，以致开始纠正这些弊端时，人们觉得唐突和痛苦。人们把军情六局的清洗归咎于军情五局，特别是归咎于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些人身上。许多人认为军情五局利用菲尔比叛逃事件大做文章，以致使人们相信军情六局的内部安全状况并不优于五局。

60年代末期，抵制审查的狂风越吹越猛。我迫不及待地想在两局内部更大范围内通报“流畅”调查的部分结果。我感到这是我可以赢得人们的同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的唯一途径。那时，人们对“流畅”调查行动一无所知。在他们的眼里，我正在情报机关内部推行麦卡锡主义。D处三科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它负责“流畅”行动和组织复查30年代的遗留问题。其他高级官员不可避免地嫉恨我们在使用档案和人员方面的特权。由于他们对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不得而知，他们的嫉恨愈来愈深。我被指责为怀疑一切。有人公开攻击我时，弗·琼斯站出来为我辩护。一次他转身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干的工作就是要怀疑人。”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感到敌视我的人日益增多。真叫人不可思议，作了许多年猎人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被追踪，心神不得安宁。

1969年，在波克夏郡森宁代尔文职学院召开了军情五局高级官员会议。会上，矛盾终于爆发。一些人猛烈攻击我和其他参加D处一科的调查以及我们目前工作的人。他们质问D处三科取得了哪些成绩？声称怀疑割断了同事之间信任的

纽带，抱怨无辜的人在受苦。

“哪个是无辜的人？”我反驳说，“撒谎。谁？你们说出姓名！”

我紧握双拳。真是欲详说不能，欲简说又解释不清。为了给自己辩护，我只得推出弗·琼斯，强调我的每项行动都经过他亲自批准进行的。但是，如果不给他们解释渗透问题的来龙去脉，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工作。

事后，我请求弗·琼斯签发一份对“流畅”行动作出评价的文件。我拟定出能够在七十名高级官员中传阅的材料；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战后有关渗透的情报不断增多，对凡是已经确认的间谍直接点名道姓，并且暗示仍有相当一批指控有待于调查澄清。对签发这份文件，弗·琼斯根本不予考虑。

“彼得，如果把这些事情公开出去，我们的组织就会元气大伤，从此将一蹶不振。”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他们一点不了解内情，怎么可能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之见，没人知道更好，”他说，“永远不知道！”

“那么，我们如何继续开展工作？每年都有年青人加入我们的组织，他们听录音，看档案，可他们一点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这些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蒙在鼓里。你若不能正视这项工作，还不如当初不做。对我们的人说出真相，对他们说，‘看吧，这些就是尚未解决的疑团，这就是为什么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弗·琼斯仍拒绝接受我的请求。说真的，他很少固执己见，不过，这是一次。

“我怎么办？人们对我怀有敌意，我怎么开展工作？”我最后无可奈何地问。

弗·琼斯突然严肃地对我说：

“这就是你从事这项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968年排除了“中级情报员”之嫌以后，汉利很快被任命为反间谍处处长。自从前一年的痛苦事情发生后，汉利和我几乎没说过话。他从未说过什么，但我能察觉到他把受到审查的责任归咎于我。汉利一上任就立即削弱我的力量。起初是公开压制。

“唉，彼得，”他嘲弄地说，“这又是你的谬论吧。”

但是没过多久，他的报复愈演愈烈。他尽一切可能把人力物力从D处三科调走。起初，我为维护自己的一隅反击，找到弗·琼斯要回他们。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考虑这样斗下去是否值得。D处三科的复查工作已近尾声。只有高层渗透问题仍无眉目。此案已沉睡了三年，仍不见有复苏的可能。长期的紧张工作损坏了我的健康。我开始考虑退休，想到了我的第一爱好——耕作。

我决定在放弃斗争之前至少应该找汉利推心置腹地谈谈。我去找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企图把我从局里撵走。他否认他的所作所为是报复行动，说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为D处三科机构臃肿和人们怨声载道；因为其它部门人手不足有些工作被忽视了，譬如，对大臣们的安全状况没很好作出估计等。

“那好，给我一个人负责日常文书工作。”我针锋相对地要求。

但是，汉利又拒绝了。

“我知道我不善于理政。”我承认道，“但是你敢否认真正的原因是你对这项工作怀恨在心吗？”

汉利的脸唰地红了。他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但是不承认他的遭遇使他的决定带有感情色彩。

“大概你知道对你的调查工作由我负责？”我问他，“你看过档案了吗？”

我们之间关系的僵局终于被打破。我回到办公室抽出有关“哈里特”调查的档案，向汉利讲明了一切：“流畅”调查引出寻找“中级情报员”的工作，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D处三科进行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调查和拜访汉利的心理医生等等。

“我从未想到。”他一边翻看档案一边说。

“我们是奉命做这种难以见人的工作，而又被迫背黑锅的人。”我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已做了绝大部分工作，他们想把它捂起来，忘掉我们所做的一切。”

汉利得知这些鲜为人知、令人受压抑的秘密后，思想震动极大。他意识到他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从50年代到波兰科工作，他才开始了解D处的一些工作。为了在D处取得成功，他不得不要别人指导。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了他的困难。我佩服他的直率。他仍想解散D处三科，理由是它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不管怎样，他正计划调整D处的组织结构，要求我做他的私人顾问。我将用十五年来积累的知识协助他做好工作。为此，我还将浏览D处的每份文件和卷宗。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我从未离开过D处。我加入军情五局时，迪克·怀特答应我既不要提升，也不能强迫我调任的请求。我不喜欢像乐团演员变奏一样，每两年换一个地方。D处就是我的生活，我熟悉它的每个案件和每份档案。汉利的建议是公平的，我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

但是渗透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谁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呢？我们不能对于这种问题听之任之。否则，问题会越积越多。”我对汉利说。

一年多来，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有正式的机构来全面审查内部存在的渗透问题。60年代时的问题是局里没有常设机构负责调查涉嫌间谍的人或事件。“流畅”调查组不是个正式机构，仅是临时成立的专案组。把这项工作交给D处一科（调查科）也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正确职责是调查局以外的外国渗透活动。正是缺少了这样一个专门机构才使我们被局里的一些人指责为“盖世太保”更有甚者，我们被视为是依靠不正当手段专整黑材料的人。

我还考虑到另一个问题。我知道要解决高层存在的渗透问题，只能不断地起用新人。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问题过分与个人感情纠缠在一起，主要是我和阿瑟的。人们认为我们俩对霍利斯怀恨在心，不能自制，除了认定他有罪外，不可能做出其它结论。我竭力说服汉利和弗·琼斯成立一个机构，其成员必须与我和阿瑟毫无瓜葛，也从未插手前十年的棘手案件。汉利表示怀疑。弗·琼斯立即采纳了我的建议并说服汉利列入他的整编计划。1968年底整编工作完成。D处改为K处，下设两个部。在以前的D处三科里，这些工作均由我负责。

邓肯·瓦格是K处七科第一任科长。他是合适的人选。他明智、冷静、尤其善于推理。一旦决心下定，他会正确合理地完成行动计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年前霍顿夫人控告她的丈夫，邓肯为霍顿洗刷罪名犯了错误，并使他在事业上不应有地遭受挫折。但是扎实艰苦的工作，其中包括在

我领导的驻苏使馆的安全检查组里的工作给他带来了转机。K处七科科长无疑是机会来了。他还有一个叫约翰·戴的有势力前海军陆战队军官作后盾。我坚持认为凡是以前参与过消除渗透工作的人都不能进入K处七科工作。

在一次正式会见中，我把一切由我保存的“流畅”计划的档案移交给邓肯·瓦格，其中包括我私下对霍利斯所做的调查材料，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和针对“中级情报员”所进行的一些工作。当我把那些带暗码锁的绿色盒子递给他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只有此刻，我才意识到这些年来它们对我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给，”我说，“现在都是你的啦，感谢上帝！”

起初，我与K处七科没有来往。因为怕使他们产生偏见而影响正确决策，瓦格和约翰·戴也不希望我去打扰他们。我理解他们的顾忌。但我还是让约翰·戴去找布伦特，询问为什么1945年苏联人同意布伦特离开军情五局。布伦特一直也觉得很奇怪。

尽管布伦特知道我们特别关心是否有人取代了他，可他提供不出线索。我们给他看了“维诺纳”密码电报中出现的八个匿名。他一无所知。他提到的唯一线索是他曾与盖伊·伯吉斯和格雷厄姆·米切尔共进午餐。显然，这事值得一查，但至于盖伊是否真的与米切尔接过头，布伦特说不知道。不久我听说约翰·戴讯问了米切尔。他们相信米切尔是清白的。正如我一直怀疑的那样，焦点集中到霍利斯身上。

很久我没听到任何消息。一天约翰·戴来找我。他带来了K处七科第一份关于高层渗透的调查报告。结论明确指出霍利斯嫌疑最大。

“我过去一直以为你太神经质，怀疑共产党无处不在。”我看完报告后戴对我说，“但我想告诉你，现在我认为你一直是对的。”

这次是回避不了了——对我自己、对弗·琼斯或对于那个穿着黑西服，打高尔夫球，在索美塞得郡考尔科特村过着宁静退休生活的人。我们都将面对事实。

第十八章

我追求的事业若能成功，千头万绪的疑团若能解开该多么好啊！倘若能证明霍利斯清白无辜，毋需继续挂心也好。可是，秘密世界并非如此简单。至此，阴霾依然密布，真相难以大白。

1969年的一天早晨，我走进一个很小的工作间，这里曾是D处三科的一间办公室。在南奥得利大街的秘密活动点内，A处二科的技师们正在试调录音机。桌子上的耳机滋滋地响着。对于他们这只是新的一天，而对于我，则是上演了十年的戏剧的最后一幕。讯问纲要放在桌上，大小犹如一个很厚的电话号码本。一个怪词：“讨厌”印在封皮的里面。那是霍利斯的代号。几年前我暗中进行调查时，文件代号设计室通知我使用这个代号。当时我一听这么滑稽的名字就禁不住笑了。可我所始料不及的是它日后给我带来那么多的痛苦。

实质上，K处七科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与我在1965至1966年间私下进行的调查结果一样。当然，他们现在的结果具体得多。他们有权查阅霍里斯在局里的档案，会晤了他在牛津时的同代人。他们还查阅了上海特别处的档案，但是没有突破性的发现。结果仍然如故；只是直觉感到霍利斯是间

谍而已。

在讯问前几天一个白色小信封寄给霍利斯，邀请他回局里一趟。虽然出现了争执，行动方案终于定稿。我们认为在整个讯问期间霍利斯应该受到严密监视。当初讯问布莱克时，他一旦被惊动即与他的控制人取得联系。万一霍利斯也有控制人，我们应采取防范措施以免类似布莱克的情况发生。可是，弗·琼斯不同意。他不做什么解释，但从他的表情看出没有商量的余地。甚至汉利对他的这种做法也提出抗议，抱怨他太武断。弗·琼斯则感到他是迫不得已才批准对霍利斯进行讯问，他不愿再使他的前任丢脸。

约翰·戴奉命主持讯问。为了协助他，我和奥尔尤因在一旁监听。弗·琼斯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感情用事，不适合主持对霍利斯的讯问。他意识到延误了许多年之后，他必须让人们看到他已解开疑团的机会给予下级。

讯问室的门开了，霍利斯走进来。

“你们哪里需要我？”他大声问道。过去这么多年，他说话的口气没变，似乎仍然是这里的主人。

约翰开始给他解释讯问程序。

“行了，我都熟悉……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想要支铅笔和一张纸。”

我试图想像出南奥得利大街房子是什么样的情景，仿佛见到霍利斯笔直地坐在那里。我倒想他准怀念他昔日的办公桌，少不了还像从前那样拿着根铅笔，龇牙咧嘴地笑着。他感到羞辱还是害怕？我怀疑他是否有羞辱或害怕之感。霍利斯是个冷血动物。我记得过去他总对我说，“彼得，你太爱动感情了。”

我尽量控制着兴奋的心情。

首先约翰·戴详细地讯问霍利斯的工作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

霍利斯略显愠怒。

“如果你不在乎我直言，我想说接受讯问是件苦差事。你要了解的情况我的履历表中不是都有了么？”

但约翰·戴不受要挟。

“如果你不介意，我认为我们最好遵守规矩。”

霍利斯讲了一段经历。为了摆脱家庭的宗教环境，他离家出走到了牛津，可那里也不例外，同样让他想起在家受到的宗教熏陶。

“我想到大千世界里闯一闯，我唯一的抱负是当高尔夫球冠军。但我在牛津很快发现，我不是打球的料。成名无望后，我决定外出旅行。”

远东一直吸引着他。起初他打算跟朋友们一起去，比如莫里斯·理查森。但是，计划夭折了。在回忆时，霍利斯很高兴与朋友一起旅行的计划落了空。他们的性格相去甚远，决不可能成为理想的旅行伙伴。

中国令他着迷。毋庸置疑，他在那时结识左翼人士极其正常。每个人都知道史沫特莱是左派。在牛津时也是这样，他与莫里斯·理查森和克劳德·科伯恩关系甚密。这两人被人们视为左翼分子。

他解释那时健康欠佳，肺结核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不得不途经莫斯科返回欧洲。

霍利斯说：“我想看看莫斯科是个什么样。那儿真是个可怕的地方，肮脏、压抑、没有笑容，知识分子们大肆吹捧莫

斯科，我却不喜欢那个地方。”

“你在那儿见到什么人了么？”约翰·戴问。

“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仅此而已。与俄国人打交道可跟其它国家的人不一样。譬如，中国人。”

午餐时，安妮·奥尼尤因、约翰·戴、弗·琼斯和我在莱康大楼碰头讨论。我们都感到霍利斯接受讯问时表现沉着冷静，回答无懈可击。

“如果他表现一直不变，他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安妮·奥尔尤因说。

午饭后，我们接着讯问他返回伦敦后的经历。内容清晰准确的回答嘎然而止。尽管霍利斯回答问题时的口气仍然坚决，但是内容空洞。他记不得住在何处、遇见何人，有何打算。而我们则对这些细节了如指掌。例如，据我们所知，他曾和一个叫阿奇莱尔的军情六局官员作邻居。此人与盖伊·伯吉斯过从甚密。大概他们见过数次面。但是，霍利斯对此一概想不起来。他卡壳长达一小时。直到跨过这段时间，突然丧失的记忆又突然恢复了。对战前加入军情五局的情况，他又能详细、准确地作出解释。

那天晚上，参加讯问的几个人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再次碰头，讨论白天讯问的情况。

“空白的这一年怎么办？”我问道。

弗·琼斯面带倦容，把烟斗放在桌上。

他向我们解释，霍利斯从中国回来后处境艰难：健康极差，没有职业，前途渺茫。弗·琼斯好像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利处境更容易使霍利斯接受外国情报组织的招募。弗·琼斯认为霍利斯长期以来想忘却那段漂泊不定的痛苦经历，即使

记不得在何时何地生活，也不足为奇。

“是啊，一个人在那种心境时申请加入军情五局或六局也不奇怪吗？”我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意欲认真，但听起来却像挖苦人。弗·琼斯发火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彼得！”他话一出口即立刻收住。讯问仍未结束，做结论为时尚早。

第二天，霍利斯重新坐下。

“开始吧？”霍利斯盛气凌人地说。约翰·戴一言不发。此举太妙了，霍利斯第一次得到暗示：他已不再是这里的主人。

戴变换了策略，开始发问。

“我想请你重新解释与克劳德·科伯恩有关的档案这件事。……”

前一天上午曾谈到这件事。在牛津时霍利斯主动与科伯恩交上朋友。在前一天讯问时，戴要求霍利斯解释在处理科伯恩案件时他为什么不说明这一事实。照例，任何军情五局的官员在经手熟人的案件时都必须声明，霍利斯对问题避而不答，只说那时并没有要求将私人友谊写进档案。

这是谎言，尽管不大，但是谎言。讯问纲要中一个详细的附件证明：在登记表中写清朋友关系战前就是军情五局的规定。霍利斯应该知道。

戴开始质问霍利斯前一天对这个问题的辩解。他为什么要撒谎呢？霍利斯从不口吃，也不慌张。停了片刻，他承认犯了错误，同时表示他撒谎另有原因。科伯恩是著名左派和共产国际成员。他知道局里对科伯恩非常注意。他刚加入军情五局并急不可待地在此干一番事业。担心与科伯恩的关系影响他的前途。霍利斯决定违反纪律。

“我肯定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违反这项纪律的人。”

“与其他朋友的关系如何？”戴加紧攻势，“与菲尔比怎么样？你与他关系密切吗？”

“不怎么样。他嗜酒成癖。我们之间工作合作得不错。仅此而已。”

“布伦特呢？”

“更是如此，尤其在战争期间。我认为他很有才华，但自从他离开军情五局以后，我们难得见面。偶尔在‘旅行者’俱乐部碰上，随便聊几句。他好说闲话。”

对有关古森科、沃尔科夫和斯克利浦金的提问，他对答如流。霍利斯不相信古森科，他仍怀疑是否确有埃利其人。至于他的加拿大之行，他说菲尔比把文件交给他并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时我是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菲尔比很自然要听取我的意见，尤其是因为事件发生在一个英联邦国家。”

“对沃尔科夫的情报，你怎样看的？”

“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对菲尔比是沃尔科夫所指控的高级间谍这一观点产生怀疑。他认为自己是沃尔科夫所说的那个人。否则，他何必千里迢迢跑去保护别人呢？”

只有一次在回答有关60年代初发生的问题时，这位前局长露出点破绽。约翰·戴问他为什么要解雇阿瑟·马丁。他尖声叫道：

“他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我从来不知道他干些什么。譬如，我们同意赦免布伦特1945年以前所犯的罪行，马丁见到他，当面允诺了完全豁免权。首席检察官愤怒至极，我也十

分恼火。他肆无忌惮，并和怀特在一起极尽盖世太保之能事。我必须采取措施。对我的决定我从不后悔。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的所作所为绝对正确。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就是我早该制止他们。”

约翰·戴又问霍利斯：在1968年他为什么不同意对米切尔进行讯问。

“文件中已经说明了，首相不批准。”

“你果真请示首相了吗？”

“我当然请示了。”霍利斯暴躁地说。

“但是，首相回忆不起来。”戴反驳道。

“岂有此理！当时情况很严重。普罗富莫事件正闹得不可开交。我们不得不需要慎重考虑与美国交换情报。再发生丑闻很可能导致政府倒台。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请示首相的缘故。”

这是一场和假想敌手进行的拳击较量。戴移动、出击，但决不可能真正击中对手。不知为何戴从未能接近对手，近到足以进行巷战、格斗的地步。未能戳穿他的真面目，迫使他坦白交代。岁月流逝，一切都拖得太久，使问题无法查个水落石出。

到了下午结束之前，只剩下几个一般问题。

“你有无在什么时候擅自向他人泄漏国家机密？”

“没有。”霍利斯坚定的回答。

“有无他人向你索取过情报？”

“从来没有。”

霍利斯站起来时，椅子咯咯作响。他道再见，心里想着返回索美塞得郡，返回他的高尔夫球场，返回他的乡间小

屋。他悄然而来，默然而去。霍利斯一贯小心谨慎，偶尔也开个玩笑。他既专横拔扈、又惶恐不安。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那天晚上，弗·琼斯再次与我们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见面。桌子周围的人们显得无可奈何。我们知道事情并未查到水落石出，但同时我们也感到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立案侦查。弗·琼斯默不作声。他感到讯问结果证明了他对霍利斯的信任。

“我希望这个案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步开展其它工作。”弗·琼斯表明了态度。

霍利斯一案再次不了了之。我们现已掌握的任何证据，包括对霍利斯的讯问结果，都不可能使两种意见统一起来。我们坚持认为高层渗透确实存在而对像弗·琼斯这样的人则持怀疑态度。我不禁想起被浪费掉的岁月。当时一些人害怕揭露真相，阻止我们调查。问题尚未解决即令搁置。文件弃之不用，长年尘积。倘若我们当时抓紧，疑团可能被解开。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靠偶然的突破，诸如叛逃者的供述或破译密码，我们才有希望解决这一陈案。绝望之情缠绕着我。因失败而产生的愤怒使我想离开和忘掉周围的一切。回首往事，从那天晚上登上艾塞克斯的火车，我的退休即已开始。我的情报生涯的最后几年大多是在奔波中度过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情五局70年代伊始形势喜人。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相信的叛逃者。他叫奥列格·利亚林。是被军情五局中两名最出色的官员招募的。他们一个叫哈里·沃顿，是个直爽的约克郡人；另一个叫托尼·布鲁克斯。布鲁克斯胆略超群。他曾在军情六局专门执行秘密任

务。一次，他伙同妻子在法国成功地执行了一项这类任务。整个行动是由K处Y部的部长、冷静可靠的克里斯托芬·赫伯特领导。利亚林与一个姑娘关系暧昧。当沃顿和布鲁克斯与他见面时，他提出叛逃。他们设法说服他继续呆在克格勃。在六个月里，利亚林为军情五局提供了克格勃在伦敦的详细行动计划。他仅是与克格勃破坏行动部有接触的一名下级军官，但是，获得克格勃间谍人员部署的情报，数量哪怕很少其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从利亚林为我们工作之日起，我们就意识到，若想检验军情五局里是否仍有高层间谍，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利亚林能继续潜伏下去，则证明我们内部没有间谍。从1966年至1976年间，没有迹象表明苏联人在事先得到情报后破坏了我们的行动。在这期间，我们处理了五宗间谍案。其中招募利亚林并令其为我们提供情报和策划驱逐苏联一百零五名外交官两个大案至少历时六个月。然而，到1965年底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的每个案件仿佛都有苏联人插手。值得注意的是霍利斯于1965年底退休。在军情五局里，只有十个人知道这些机密。除了外交部常任秘书丹尼思·格林希尔，局以外的其他人均不知情。格林希尔与军情五局关系密切。我与他尤其过从甚密。

由于过双重生活，利亚林很快显出精神过度紧张迹象。布鲁克斯和沃顿选了合适的秘密活动点让利亚林可以在那儿寻欢作乐。为他安排这种消遣十分麻烦。每次都要有人在房子外监视里面的一举一动，观察他是否有焦躁不安甚至背叛的迹象。利亚林开始酗酒。当他接到返回莫斯科的通知后，我们决定结束他的使命，将他从精神重压中解脱出来。

利亚林倒雄心勃勃地打算返回莫斯科，潜伏下来继续为我们提供情报。但是我们断定他逃不出克格勃的手心。利亚林是商务代表团成员，不享有外交豁免权。我们决定在他走过伦敦西思罗机场的海关时逮捕他，迫使他留下来。

我们的计划几乎立刻破产。我那星期住在伦敦。1970年2月的一天夜里三点钟，值班官员的电话将我吵醒。

“快来，”他在电话中说，“我们需要你打开保险柜。”

我穿上衣服，坐出租汽车到了办公室。托尼·布鲁克斯正在等我。

“我们需要解毒剂，”他告诉我，“利亚林呼吸困难，像是中毒了。他在几小时前因酒后开车被捕，眼下正在马博罗大街的牢房里！”

我打开保险柜，取出像工具箱式的一小卷东西。十年前，我决定不再担任首席科学专家。离任前，波顿唐实验所的拉德尔博士把这盒东西送给我，里面装着所有已知的克格勃使用的毒药解毒剂。每当叛逃者外出，药盒二十四小时不离其左右。不用时即放在我的保险柜里，这药对其他人也没有用。

我迅速向布鲁克斯说明神经毒气中毒和麻醉剂中毒的症状，告诉他如何使用解毒剂。他急忙赶往监狱保护利亚林。我则把特别行动处的副处长从床上拉起来，请他提醒马博罗大街监狱他们地下室里那醉汉的真实身份。同时军情五局的法律处向内务部和首席大法官解释，利亚林在法庭前受审将有遭到暗杀的严重危险，因而要求他们对利亚林的酗酒行为给以赦免。

利亚林的叛逃为军情五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自从

弗·琼斯担任局长以后，大批驱逐苏联外交官的计划酝酿已久。弗·琼斯决心彻底改变在力量对比上他所处的劣势地位。他明白军情五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在伦敦的苏联间谍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英国的反间谍人员。整个60年代，他不遗余力地争取财政部增加拨款以扩大军情五局的反间谍能力。但是他们一直反应冷淡。虽然通过内部调整扩大了D处，使我们的反间谍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我们仍以高于一比三的比例处于劣势。爱德华·希思任首相后，弗·琼斯向他列举了利亚林为我们提供的克格勃行动方案上苏联情报人员的数字，要求首相批准大量削减他们的人员。当时利亚林仍在暗中为我们提供情况。希思的反应是：“破釜沉舟”地干吧。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并不急于行动，因为我们需要时间确定人数以回敬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尽管如此，在1971年8月我们和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制定出行动计划。一直等到利亚林事件公开后我们才开始实施。因为，在利亚林叛逃或回国以前我们不想打草惊蛇。

在利亚林接受询问时，他确定了数十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克格勃间谍。其中大部分人的真实身份我们通过《活动分析纲要》早已了解。这个纲要是在60年代初期，阿瑟·马丁、哈尔·多伊思·迪特玛斯和我共同创立的。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这个数字到今天可能增大到多少。“活动分析”的结果暗示，到了60年代末期活跃在英国的苏联间谍大约在450到550人之间。可是，控制人占其中的百分之多少呢？即使我们假定控制人的数量保持不变，约在25人左右，其他人负责掩护、反监视、内部安全和情报分析，我们仍然面临巨大的问题。这意味着在伦敦执行任务的间谍约达

200人。如果我们假定控制人与他们手下的间谍同步增长，数量则更大得惊人，那就是说在伦敦的间谍有1000多人！

每当我要把这些分析写进给内务部的危险估计例行报告时，总有争吵。约翰·艾伦反复驳斥我的观点。他曾当过律师，进入K处后升迁极快。

“你不能那样写，伦敦不可能有那么多苏联情报官员。内务部决不会相信！”

不过，利亚林叛逃以后再也没有人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利亚林证实了“活动分析”的结论。驻伦敦的苏联情报官员约有450人左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控制人。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活动分析”法行之有效，我统计的数字也相当准确。显然并不只是一般间谍的数量在增长。我从未见过弗·琼斯办事决心如此之大，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请求驱逐大批苏联外交官。外交大臣霍姆要求与苏联外交部长阿列克塞·柯西金进行磋商，建议苏联秘密撤走他们的部分情报官员。这个建议遭到断然拒绝后，首相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终于同意驱逐大批苏联外交官。

在整个西方情报世界里，这次驱逐行动被誉为壮举。我们收到所有西方情报组织的首脑发来的贺电。这是弗·琼斯取得的空前胜利。更令人欣喜的是整个计划事先未被泄漏给苏联人。这证明了，无论过去情况如何，军情五局内部的高层渗透问题无疑已不复存在。

对于英国情报组织来说，利亚林的叛逃和驱逐105名苏联外交官并不意味着七十年代的新开端。1970年爱德华·希思当选为首相后，任命维克多·罗斯柴尔德为中央政策评审委员会——智囊团主席。再也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工作。

他头脑灵活、观点激进。这使他能按照希思的意图提出具有挑战性的政策。这项任命对于维克多正是时候。我看得出来，到60年代末他愈来愈讨厌哈罗德·威尔逊。他得不到在公共事务中抛头露面的机会。但是，他始终与英国情报组织保持联系，为迪克·怀特控制在远东的情报员。其中的里波特先生在50年代军情六局的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维克多还利用他与伊朗国王的友谊在情报工作中一显身手。这些工作固然令人兴奋，但他渴望真正的挑战。领导智囊团正合他意。

维克多为军情五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确保汉利在弗·琼斯退休后接替局长职务。弗·琼斯历来不受白厅青睐。他个性太强而且极其内向。在一些问题上，他甚至对内阁也严守秘密。一般来说，即将离任的局长有权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但是1972年弗·琼斯退休时，内务部特别是艾伦决定施展他自己的权力，任命局以外的人担任新局长。他不信任军情五局，害怕他们闹出丑闻。其实他只对军情五局内部的“鼯鼠”行动及其影响略有所闻，但他了解布伦特和朗的案件，其了解程度足以使他担心。他批评军情五局滥用豁免权，深信局里的管理混乱并且为此大惊小怪。艾伦想为军情五局选一名可靠的舵手——一个使他信赖、对他言听计从、向他汇报一切的人。

在弗·琼斯任职期满前一年，西姆金斯终于退休。这使我大为欣慰。迈克尔·汉利升任副局长。艾伦认为汉利既不经验丰富又缺乏独立见解，胜任不了局长工作。艾伦选中了内务部负责警察和安全事务的助理秘书詹姆斯·沃德尔。沃德尔办事可靠，可不知为何至今仍未取得常任秘书一职。他

忘心耿耿地为艾伦工作，希望这次能被任命为军情五局局长。

军情五局内部的人非常关注沃德尔的任命。他很难对付，若得不到任命不会善罢于休。沃德尔缺乏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难以赢得高级军官的尊敬。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任命他纯粹是白厅耍弄权术。这只会导致局的工作倒退十年，重蹈任命伦尼的复辙。

当然军情五局不欢迎沃德尔的任命还另有原因。在过去他们未将许多秘密禀告政府要员们。那时军情五局最忌讳的是白厅上下大惊小怪地议论他们内部的“鼯鼠”清洗行动。

我第一次听说有关人选的争执是在1971年底。弗·琼斯跟我提起这件事，告诉我他将阻止沃德尔的任命。他找迪克·怀特帮忙，但是形势并不乐观。一个由内阁大臣领导，隶属于高级人员任命委员会的最高常任秘书委员会已经推荐了沃德尔。弗·琼斯举荐汉利，但他们未予理睬。汉利年轻、资历浅。这些大人物们对他不熟悉。

“能让你有权势的朋友帮帮忙吗？”弗·琼斯以他的习惯方式问我能否请维克多帮忙。

那时我每周拜访一次维克多，有时去他在内阁的办公室，更多时候去他家。再次见到维克多后，我提起了局长人选问题。我用尽浑身解数，敦促维克多机关算尽也要阻止沃德尔的任命。

维克多告诉我迪克·怀特已经跟他说过此事。迪克表态支持汉利。起初迪克曾认为莫里斯·奥德菲尔德是合适的人选。出于个人目的约翰·托尼先生也提出奥德菲尔德作候选人。因为奥德菲尔德实际上控制着军情六局，使他成为有名

无实的主管，所以他急于把奥德菲尔德从身边铲开。但是，奥德菲尔德明确表示他情愿退出竞争，等待其它机会。比如在伦尼退休后出任C处处长。（伦尼在他儿子因贩毒而被判有罪的消息披露后提前退休，奥德菲尔德接替了他的职务。）

“你们局里的人欢迎汉利吗？”维克多问道，他经常把我作为我们局的共鸣板，通过我这条渠道了解与政府相反的观点。

“当然啦，”我答道。

我对他叙述了“哈里特”一案的调查情况，尽管维克多已经知道我怀疑军情五局存在着渗透。我以前也跟他讨论过霍利斯和米切尔的情况。汉利曾受到调查，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告诉他，调查结果使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不怀疑。我对维克多明确表示军情五局的人会坚决抵制沃德尔。毫无疑问，如果他被任命，将会引起很大麻烦。

“让我们想想怎么办，”他喃喃地说。片刻，他叫我安排他与汉利见面，而且越快越好。

那时我和汉利之间已建立起一种理智的工作关系。“哈里特”案件的阴影阻止我们之间产生友谊。但是，他坦诚待我，我则尽力帮他。我像一个出色的司机，带着他在过去二十年的秘密世界中遨游，指出那里是壮观，那里是沟壑。我知道告诉他我见了弗·琼斯和维克多，他会生气。汉利有点社会主义者的味道，声称他得到局长一职只凭本事，不凭关系。不过官瘾还是占了上风。我告诉维克多想见他后，他同意跟我走一趟。一天晚上，我带他到维克多在圣詹姆斯大街的典雅寓所。喝过一杯饮料以后，我借故去俱乐部，有意

让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谈。第二天维克多给我打电话。

他说：“汉利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我们俩晚上必须见面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维克多和我研究了所有可能考虑的人选，甚至一度曾想让维克多做候选人。我知道他心中多年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即使他的任命会非常荣耀和受人尊敬，但他明白自己年事已高，就他的能力而言，智囊团的工作已足够他应付。

我们商量到科技委员会寻求支持。维克多决定去找像维廉·库克先生这样的人，争取他们支持汉利。维克多还对我表示，他将谨慎地找希思私下谈谈。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没有用。”他对我说，“只要罗博特·阿姆斯特朗闻到半点风声，都会传到那些该死的常任副秘书长耳朵里！”

罗博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第一私人秘书（现为内阁大臣和国内文官部大臣）。他是权力斗争的关键人物，因为没有人比他能长期不离首相左右。维克多有事请求首相时，他若听出哪怕一点暗示，肯定会捅到常任秘书委员会。维克多认为只能乘阿姆斯特朗不在之机，出其不意地向希思提出这个问题，最佳时机该是定于数周内首相乡间别墅举行的智囊团周末会议。

“我把特德叫到花园中散步，在那儿罗博特听不见，我就凑到首相耳边说……”

不曾料到，因“第十九情报员”一案我经常与阿姆斯特朗见面。最近我一直在研究美国人保存的“维诺纳”密码电文。一个尚未破译的匿名引起我的注意。这个名字是“第十九情报员”显然，此人是苏联的一个重要间谍。他把记录丘吉尔

和罗斯福之间的一次谈话细节的文件提供给了苏联人。两位领导人于1943年6月举行的“三叉戟”会议期间的这次谈话意义重大。

美国认为“第十九情报员”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贝奈斯出席了“三叉戟”会议，公认他一贯给苏联人传递消息。我亲自分析了电稿后，对贝奈特是“第十九情报员”产生了怀疑。“第十九情报员”的情报涉及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就计划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谈，尤其涉及到海军和舰船部署问题。我发现，贝奈特未必被允许参加与此有关的讨论，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内陆国家，根本没有船只。

我继而考虑，“第十九情报员”是否是个离我们更近的人。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搜集所有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三叉戟”会议期间的会谈记录，如果可能，列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大海捞针似的寻找这次会议记录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奇异的一段经历。维克多为我安排与罗博特·阿姆斯特朗见面。他热心帮忙。罗博特官运亨通，现在人们已经揣测他将是未来的内阁大臣。由于获得这项殊荣需要得到情报界的支持，他急于想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我提出要求后，罗博特孩子般地全力以赴在唐宁街十号搜寻一切可以找到的会议档案，但是几个星期过去，我们一无所获。

阿姆斯特朗建议我拜访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爵士和他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先生。可是，尽管两人都记得“三叉戟会议”，他们都未参加讨论。我又试着找到玛丽·丘吉尔。她也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况。最后阿姆斯特朗安排我登门拜访

研究丘吉尔的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从他那里了解到丘吉尔的一位私人秘书记录了丘吉尔任首相时的每日活动安排，吉尔伯特保存着全部记录，或许那里有记载。我把会议日期^①告诉吉尔伯特，他按索引查找起来。

“我的上帝，”他叫道，“没有那天的日记！”

调查“第十九情报员”的工作就此搁浅。时至今日，他究竟是谁仍然是个谜。

^① “三叉戟”会议实际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举行。

第十九章

汉利入主局长办公室后，显得局促不安。鉴于他的任命存有争议，汉利处处格外小心谨慎。为了取悦于政界和白厅的主子们并消除他们对他的疑虑，汉利比一个地位稳固的人做出更多的妥协让步。

汉利比弗·琼斯聪明，但缺少弗·琼斯的刚毅性格，我信赖琼斯，却信不过汉利。弗·琼斯一走，我的退休即已开始，我在局里的最后四年是逐渐隐退的四年。整个军情五局正在发生变革。

汉利上任不久，找我商量我的工作。

“彼得，我相信你。只要我在，这儿就有你的工作。”他对我说，话中不乏暗示过去人们对我产生的嫉恨。我怎能忘记在D处三科工作的最后一年，为此我精神倍受折磨。

汉利考虑我应该放弃K处顾问的职务，为他个人工作。

“我想请你做我的反间谍问题私人顾问。”他说，“你的办公室设在我隔壁，你像以前一样有权查阅所有文件。但是，我想让你为我分析一些新问题，不要纠缠K处目前调查的案件。我希望你面向未来。”

我们拟定了一项新的议事日程。其中有的部分我喜欢，

其它的不感兴趣。汉利要求我继续负责“维诺纳”行动，批准我们进行一次全球性的收集工作，以便找到现存的“维诺纳”无线电讯号。

汉利嘱托我注意北爱尔兰问题。

他对我说：“彼得，你足智多谋，我需要你出主意，就看你的了……”

汉利吩咐我坐镇计算机工作小组。这个组正在制定方案，预计在70年代中期军情五局的档案管理工作将跨入计算机时代。通过D处三科工作积累的经验，我尤其感到利用档案寻找线索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汉利希望我将这些技术电脑化。

起初，我以为爱尔兰问题能解除我过去的烦恼，使我开始新的生活。去了两次爱尔兰，勾起了我对以前塞浦路斯许多问题的回忆。英国政府采取的摇摆政策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难以解决的矛盾。我第一次去北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向全世界大肆宣传那里的局势正在好转。我在那里花了两个星期，分析十二个月以来所有爆炸事件的记载，画出一张图表。从表上看出：引爆的炸药重量呈急剧上升趋势。什么安全状况得到改善，全是谎言！同对待塞浦路斯问题一样，英国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完全拒绝正视现实。

我只提出一条重要建议，即设计安装监听爱尔兰共和国电话线的窃听系统。他们穿越边界的电话线十分隐蔽，但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①在共和国的西海岸和都柏林之间的通

^① 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是1969年爱尔兰共和军分裂成两派后，其中的多数派。这一派大多由年青人组成，主张以恐怖和暴力手段使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译者

讯联络非常活跃。我制定的方案是使用一个没有包装箱大的窃听装置，在都柏林英国大使馆的顶楼截收微波。尽管这项计划得到军情五局的批准，却遭到外交部的否决。当时正在酝酿签定森宁代尔协议，外交部极其害怕有关窃听计划的消息泄露出去，影响协议的签订。塞浦路斯问题使我们引以为诫的是：如果不在安全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通过政治谈判产生的和平局势就不能持久稳定。然而他们对我的意见充耳不闻。所以森宁代尔协议未能付诸实施，我并不感到意外。

都柏林计划夭折以后，我感到心灰意冷，这件事让我尝到官僚统治有何等严重。若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处理这个问题。我的确还建议考虑针对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安放诡雷的可能性。当时如果仿效在塞浦路斯对付格里瓦斯的手段，与军情六局采取联合行动，这项计划完全行得通。但是连军情五局的头头们也被吓得不敢继续探讨我的建议的可行性。

“那是谋杀。”他们对我说。

“每天都有无辜的人们被打死打残！你们认为英国人民喜欢我们采取哪种政策呢？”

爱尔兰问题仅是军情五局将注意力转向国内的一种表现。60年代高涨的学生抗议活动已被70年代初的工人罢工运动所取代。1972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汽车工人大罢工对希思政府的指导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搜集国内恐怖和骚乱活动的情报成了军情五局的首要任务。

国内的恐怖和骚乱活动是一位军情五局局长可能遇到的最敏感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一个强硬的局长才能顶住压力，保持自己和军情五局的独立性。有争议的任命束縛

了汉利的手脚，他缺乏应付巨大压力的能力。弗·琼斯坚持不懈地维护军情五局的独立性，而汉利一味地对他的主人们唯命是从。他开始动用一切技术力量为他们提供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K处在军情五局内一贯享有威望，F处则相形见绌。最有才华的军官不愿意在F处工作，它的主管是个态度和蔼的酒徒，在他的领导下，F处的工作犹如醉汉蹒跚而行。军情五局的工作重点转向国内后，汉利开始从K处调走大批人员充实F处。我们永远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批优秀反间谍人员。

一九七二年维克多告诉我，希思首相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的发言，感到震惊。他们俩是70年代初最有影响的两位领导人。

“特德^①觉得他们讲话的口吻像共产主义者。”他说，“我问F处的人是否可以证明他俩是共产党，当然他们是找不到确凿证据的。”

维克多听说最近投奔西方的捷克叛逃者正在揭发工会和工党进行的破坏活动，他向我追问详情。我叫他履行正式手续向我提出申请，我才好帮忙，那天晚些时候，我收到了维克多的书面请求。

“首相急需了解……”这是典型的维克多式开头。

我把维克多的申请交给弗·琼斯请求批示。琼斯在申请上批道：“告诉他所想知道的一切！”

我抽出文件，耐心写好一份长篇报告，原原本本地介绍

^① 特德——爱德华·希思的昵称。——译者

了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的**情报**，自己未加任何评论。

不料，我的报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整个白厅的人冲我大发雷霆。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先生把我叫去，责问我究竟是怎么想到在目前如此微妙的时候把有关反对党的材料交到执政党手里。

我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我的报告与政治无关。中央政策审议委员会主席跟我要情报报告，经军情五局局长批准，我照章办事，即使材料本身有令人不快和难堪之处，这怎么能怪我。

“如果情报内容令人难堪我们就拒绝汇报，那么，我们上送报告还有什么意义呢？”

弗·琼斯和维克多始终不渝地支持我。维克多从这次争吵中自得其乐，他做了一系列措词巧妙的备忘录在白厅内传阅，为军情五局辩护，指出军情五局有权按照唐宁街十号的要求提供情报。菲利普·艾伦则认为我故意怠慢内务部，他深为恼火，以后几年他都不理睬我。他交给维克多一张纸条，维克多笑眯眯地让我看。艾伦恶狠狠地在上面写道：“别踏进我的草地！”

正在吵得不可开交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维克多的内阁办公室里。突然，特德·希思从门缝探进头来。

“首相，”维克多介绍说，“你应该认识一下彼得·赖特。他可是白厅中少见的人才……”

希思一本正经地望着我，问我在哪儿工作。

“先生，安全局。”我答道。

他哼了一声。

“是赖特起草的最近那份引起争吵的报告。”维克多得意

洋洋地介绍。

希思立刻用冷峻的目光盯着我。

“你不该热衷于搞政治，”他怒视着我说，“那类材料里都大有文章。”

说完，他转身大步走出房门。

“上帝啊！维克多。”我叫了起来。

“别担心，”维克多说，“特德向来如此，以后我跟他谈谈。”

第二天维克多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希思已经兴趣很浓地看完了我写的报告。

“是真的吗？维克多。”希思看完后惊异地问。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希思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巩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

但是，人们并不是每次都想通过合法手续获得情报。一天晚上维克多邀我到圣詹姆斯大街他的寓所对饮。

“有一个企业界人士我想你该见一见。”维克多对我说，“他是位非常富有的实业家。”

那个时期，我经常和维克多谈论我的退休问题。1972年我终于得知，军情五局在1955年许诺给我的退休金待遇不能兑现。为了加入军情五局，我迫不得已放弃了在海军部的十五年军龄。这么长的资历对我的退休金举足轻重。当时，卡明痛快地答应给我优惠待遇，表示军情五局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但是，我们当时达成的是口头上的君子协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到后来我们的君子协定便成了有口无凭。按规定，我拿不到补偿退休金，尽管经过我据理力争，在我之后进入情报机关的所有科技人员（约五十人）领取退休金时，他们原来的资历都能连续计算。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使我在局里工作的最后几年很不愉快。我不可避免地考虑退休后去当安全顾问。虽然我不喜欢，但是这样做能挣钱弥补我的被不人道地剥夺的退休金。起初，维克多和我商量参加N·M·罗斯柴尔德的工作，但是汉利不赞同这个建议。所以，当维克多听说这位实业家正在寻找一位安全顾问后，热心地安排我与他会面。

一见面我就对这个人很反感。看得出他是个热衷于追求功利的人。他谈起他需要“内幕”人士的建议和指点，但却不直说他的真正意图，也不讲明准备付多少报酬。最后，他请我与他和他的同事在伦敦一家饭店共进午餐，进一步讨论他的建议。

他的同事都不是正经人。其中一些是各个不同的情报机关的退休人员。其他主要是商人。他们与间谍呆在一起显得激动不已，殊不知这些人早都大势已去。

这一次我未来的雇主说话直截了当。

“我们代表一部分担心国家前途的人。”他激昂地说。

他的表情与安格尔顿晚上不高兴时的表情有点相似。他表示他们打算阻止工党政府再度执政。

“如果工党政府执政，就会断送我们目前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他人点头附和着。

“那么，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答道，“我们需要情报。我肯定你掌握着情报。”

“你们具体要哪方面的？”我又问。

“任何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很多人愿意为这类情报出大价钱。”

“但是我是安全局的在职人员……”我开始解释。

他专横地挥手打断我。

“提前退休，我们会为你安排……”

那天晚上，我一直守口如瓶，与他们周旋。第二天我找到汉利，向他汇报了发生的一切，并提议我继续和他们保持来往以便监视他们的行动。汉利认为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这是肮脏的勾当，你要躲远点。”

汉利对60年代收集到的有关威尔逊及其工党的材料全然不知。所以，我催促他仔细研究这些材料。我对他说，大选即将来临，过去的问题可能会重新突出起来。

“这个案情与‘流畅’行动调查的案情相似。”汉利看完文件后说，“雷声大、雨点小。”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汉利同意复查此案。那时候，安格尔顿为了威尔逊的问题，又开始对我们纠缠不休。我提醒汉利，现在做出任何举动都会被认为是政治阴谋。

1974年随着少数派的工党在大选中获胜，英国政治局势开始走向高潮。军情五局正在进行的调查，如果走漏半点风声，无疑将引起后果不堪设想的丑闻。首相本人被调查的消息至少能导致他辞职，军情五局一些官员对此很清楚。

一天下午，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突然两位同事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三四名军官。我合上正在看的文件，问他们找我有何事。

“我们知道你正复查有关威尔逊的案件。”一位高级军官说。

“你们知道我不能谈论此事。”我说。

我回答时自觉不够理直气壮，但是我可不喜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受到逼迫。

“威尔逊是个祸根，”其中一个年轻的说，“该让公众了解真相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1968年在军情五局里，这种憎恶情绪非常强烈。曾有人试图给威尔逊制造麻烦。尤其是长期为我们服务的《每日镜报》老板塞西尔·金明确表示，从军情五局得到的任何对威尔逊不利的消息，他都愿意发表。塞西尔·金策划政变，试图颠覆工党政府，并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

1968年我把局里人们日益高涨的反威尔逊的情绪汇报给弗·琼斯，但他反应冷淡，没有助长这种情绪。

“你可以告诉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问题，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弗·琼斯知道他的话会起作用。

但是，到了1974年，局里人们对威尔逊的厌恶不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计划采取行动。鉴于国会局势不稳，大选即将来临，军情五局里一些人打算在大选前几个月里筛选出不利于工党头面人物，特别是威尔逊的某些详情，透露给反威尔逊的舆论界人士以及我们在报界和工会里的人。一旦这些消息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人们就会认为威尔逊上台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准备工作正在军情五局里暗中进行，将近三十人支持这项计划，一些机密文件被影印后将散发给外国报纸，为了极力扩大事态，还将把问题捅到议会。1928年，正是一封复印的季诺维也夫信件引起了一场灾难，最后使拉姆齐·麦克唐

纳的工党在竞选中一败涂地。

话说那天下午一群军官到办公室找我。

其中一位说：“我们要把威尔逊揭露出来，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揭露出来！”

“可是，你们为什么需要我呢？”我问道。

“唉，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能接触到最新文件——盖茨克尔案件和其它有关情报。”

“但是，这些文件都锁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你可以抄出来呀。”

“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我请求说，“干这种事我必须三思而行。你们给我几天时间。”

鬼使神差，我开始动心了。我正在虚度退休之前的时光。毋庸置疑，像这样疯狂的一个计划必然对我很有诱惑力。我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冲动。国家岌岌可危，为什么不拉一把？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秘密像沉重的负担压在我肩上，卸掉一点只能让我过得更轻松。

维克多劝我不要参与此事。

“我也不比你更欣赏威尔逊。”他对我说。“但是，如果你卷进政治阴谋，就一切都完啦。”

维克多说得对。我再呆一年多就退休了。为什么让一时冲动毁掉一生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泄密。

“我很想帮忙，”我说，“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已经损失了一半养老金，损失不起剩下的一半啦。”

听了我的答复，他们中的一些人急了，反复强调他们把搞垮威尔逊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一旦你退了休，我们就再也别指望得到机密文件了。”

但是我主意已定。纵使他们奚落我胆小，用激将法激我，我亦无动于衷。

1974年某余的时间和1975年初，我尽可能地不呆在国内。为搜集“维诺纳”无线电讯号，我周游世界。尽管有关威尔逊的丑闻从未出现，我看得出那些人尽了最大努力为威尔逊上台设置障碍。无怪乎威尔逊以后曾说他成了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1975年夏的一天晚上，我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去洛克茨饭店吃饭。我们定期共进晚餐。他很孤独，最喜欢一天工作结束后跟人闲聊。在两次周折以后，他终于登上了军情六局局长宝座。我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就是爱管闲事。那天晚上，我看出他心中有事。

莫里斯把话扯到威尔逊的问题上。你们局里人情绪怎么样？他一直关注着各种传闻。

我未置可否。

“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威尔逊，认为他会使国家触礁啊。”他说。

莫里斯一再把话题扯到这个问题上，显然他想跟我谈谈。

他终于说：“彼得，你没有把实情告诉我。”

“是的，我没跟你说过……”

莫里斯的语气突然变了，对我说：“昨天我被首相召去，他说有人策划阴谋推翻他。显然，首相听到有关你们局的人制造舆论，煽动人们反对他，马西亚·福尔肯德和其它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分子的传闻啦。”

莫里斯越说声音越低，好像他讨厌这种事。

“彼得，事情很严重，”他又说，“我需要知道一切。你看，华盛顿发生了水门事件，如果我们不加小心，伦敦也会出类似的政治丑闻。”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事情的真相。我叙述了上一年夏天军情五局一批军官策划颠覆活动的前前后后。莫里斯问我汉利是否知道实情。

“不知道。”我告诉他，“我想最好不再提起这件事。”

“我要你明天回到局里把全部经过告诉汉利。”

莫里斯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睡觉去了。走出几步回过头来冲我喊：“别担心。”

“我才不呢，”我答道，“只剩几个月我就一走了之啦。”

第二天上午汉利听了我的汇报，脸色吓得煞白。他也许猜到局里人们的反威尔逊情绪不断高涨，但他万万没料到自已手下的一半人积极策划推翻首相的阴谋活动。每逢此刻，我庆幸自己没走宦途之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利听说是莫里斯叫我告诉他后，勃然大怒。

“该死的莫里斯！”他吼叫着，“他倒把手伸到我这儿来了！”

汉利平静下来以后，问我都有谁参与了此事。

我如实向汉利交代，我感到难以拒绝他的要求。我在一一道出他们的姓名时，突然体会到了当初布伦特受审时的心境：躲在背后揭发朋友，真不是滋味。

“你对他们关照着点，行吗？”我请求汉利。

“他们要受到调查是不可避免的喽。”他答道。

1974年推翻哈罗德·威尔逊的呼声发展到甚嚣尘上之际，霍利斯的案件一时又受到人们的注意。1969年对霍利斯进行讯问以后，案子就搁置下来。起初，我满怀希望，以为汉利上任后会重新组织调查。但是，我很快看出来他的态度是莫惹是非。为了忘掉过去的创伤，他不想让我插手正在进行的任何调查和K处的案件，而且离得越远越好。

只要我一提霍利斯的问题，他总是说：“我会考虑的。”

由于60年代的动乱，人们当前最大的顾忌是丑闻。我感到重新调查霍利斯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便跟维克多商量有何办法可以促成重新审理此案。

“现在不是时候，”他说，“我们应该等待时机。我设法找特德谈谈这件事。但不是眼下，那样做会让汉利的局长难当。事关重大，得慢慢来。”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也正在为争取复查霍利斯一案在议员中积极游说。阿瑟已经退休，莫布雷的境遇每况愈下，大不如前。由于他坚定不移地鼓吹戈里金以及他的所有理论，60年代末他在军情六局很不得人心。他跟随良师克里斯托芬·菲尔波茨外驻华盛顿，一起返回伦敦后被安置在反情报处。但是1970年菲尔波茨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失去了保护人。迪克·怀特决意把他赶走。还是莫里斯·奥德菲尔德提了个折衷的建议。派他去马耳他工作一段时间。

1972年德·莫布雷返回英国后发现，霍利斯一案已被搁置。为了争取重新审查，他开始采取行动。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都害怕德·莫布雷万一心血来潮，把我们担心的苏联渗透问题泄露给某个议员。与此同时，阿瑟也正设法与议员取得

联系。退休后，他在议会里谋了个差事，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人们担心阿瑟把过去二十年间英国情报组织受到的创伤告诉他在议会里的新朋友。

德·莫布雷关心的不只是霍利斯案件。他认为英国情报组织的用人制度是任人唯亲，具有潜在的危险。他指出，一旦一个间谍篡夺了组织的领导权，他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任用自己的同伙。

一次，我和奥德菲尔德静静地吃晚饭。他提起德·莫布雷。

“他听你的吗？”奥德菲尔德问我。然后明确告诉我，汉利赞成阻止德·莫布雷继续活动。奥德菲尔德出于个人原因亦不希望继续追查霍利斯。迪克·怀特调任军情六局局长使他失去了一次升迁的机会。但是，出任C处处长仍是他求之不得的。

我告诉维克多，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对莫布雷施加影响，使他改变初衷。

“这没关系，只是不要向他们泄露任何情报。他们不明真相，亦不知事情有多么微妙，对他们稍有暗示，都可能引起丑闻，使我们遭受惨重打击。”

可怜的奥德菲尔德如此毫不隐讳，你能对他的抱负一目了然。那天晚上，他就迫不及待地谈起日后的打算。

他说：“一旦伦尼退休，有了空缺，我不想长期……”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他想让我转达他的意思。

几星期后，我和斯蒂芬共进午餐时，试图劝他暂时放弃行动。

我对他说：“霍利斯一案似乎被搁置起来，但许多事情仍

在继续，擒贼的方法不只一种，我们需要等待。”

他没有被说服，并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违心地传达汉利的旨意。

其实，我仍希望通过汉利批准的寻找“维诺纳”密码电文的行动，获得有价值的线索，以使霍利斯一案起死回生。说不定在某个地方积满灰尘的文件柜里，沉睡大量的“维诺纳”密码电文，一旦被发现，能启发我们查明匿名者的身份。

1974年，汉利和我着手准备将于五月在伦敦召开的下届“卡扎博”会议。我提醒汉利，美国和加拿大人可能会施加压力，要求他对霍利斯一案做出交代。自从审查霍利斯以后，我们成功地搪塞了对此作出任何评论的要求。但是，也有人执意要看书面材料，安格尔顿就是其中之一。

“我将说些什么呢？”汉利问

我叫他低调应付。

“告诉他们些事实，比如，以前的一系列指控仍待查清，有些抓间谍者可能在贼贖捉贼；霍利斯或许是最大的嫌疑分子。但是，尽管对他进行了讯问，我们仍未能做出结论。”

1974年的“卡扎博”会议与1960年十分热烈的聚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许多面孔从会议桌旁消失了。斯普赖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纳特也不在了。他本人在内部的“鼯鼠”行动中受到怀疑。我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他们这次清洗。（我相信贝纳特不是间谍，虽然他在接受讯问时表现异常。）赫尔姆斯已去职。看得出来，安格尔顿也已是事过境迁。在华盛顿，水门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中央情报局的家丑正被一一抖落出来。

汉利就霍利斯一案在会上作了简短发言后，与会者报之以一片沉默。大多数人触景生情，深知这种案件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汉利在发言结束时礼节性地邀请会议代表，根据他的发言，对这一案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做出必要的估计。这是白厅惯用的策略：摆出问题，然后让别人来下结论。

“卡扎博”会议以后，我仅见过一次安格尔顿。那次会面是在当年年底，地点是华盛顿。他知道不得不离开中央情报局。新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撵走。在东南亚反情报问题上，安格尔顿与科尔比之间存在分歧并僵持了几年。科尔比上台后，甩掉安格尔顿的机会来了。那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安格尔顿是一项大规模的国内邮件检查行动的主谋，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助手全部被迫辞职。

当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怒不可遏地咆哮着。

意识到他的全部高级助手都得离去，安格尔顿骂道：“二百年的反情报成果全完了！”显然，《纽约时报》的报道仅是这场讨伐战争的开始。不到六个月，中央情报局接连受到参议院的揭发和听证，遭到了一场灭顶之灾。各国对情报机关的敌视态度始于1974年。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们不问是真还是假，开始调查情报组织以往的不公正行为。我们这些从事安全情报工作的人成了当代贱民，受到憎恶、怀疑和讨伐。

奥德菲尔德和汉利对国外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唯恐事态殃及英国。他们还意识到新近在大选中获胜的工党政府也许乐意助长这种事态的发展。正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斯蒂芬·德·莫布雷决定他必须采取行动。1974年夏，他找到他的朋友，担任过前首相阿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私人秘书

的菲利普·米鲁埃塔，扼要地叙述了他对军情五局存在渗透的担心和对任用制度的不满。米鲁埃塔建议他去见新上任的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先生。莫布雷告诉莫里斯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即去唐宁街十号求见。

“他妈的，莫布雷想干什么？”一天上午汉利大发雷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该死的莫里斯又在多管闲事。他怎么能允许他手下的人神气活现地去唐宁街十号汇报。这是越俎代庖，简直不能令人容忍！”

我对汉利表示，依我所见此事已不可避免。因为，莫布雷一直打算越过军情五局和六局的领导向上反映。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去了唐宁街十号而不是议会。

结果政府同意进行复查。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当时人们个个好像满怀希望。只有到事后才意识到调查人有意使结果迎合上级的旨意。复查工作由前内阁大臣特伦德爵士负责。他将有权随时调阅全部文件，以便裁定两种意见中哪一种更能成立。

1974年底，特伦德第一次来到莱康大楼。局里为他安排了办公室，给了保险柜，还配备了秘书。他在六楼单独办公。几周以后，他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办公室。

特伦德具有典型的牛津学者风度。宽宽的额头，灰灰的头发，加上极富休养疗效的外表。

“我不想讨论案情，”他开始说，“我只想了解你们如何进行调查的。然后我去走访、调查、分析研究，最后再跟你讨论。”

所有十卷“流畅”工作小组的调查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那天上午，我们从头到尾浏览了全部文件。

“这个案子是怎么开始的？”他好奇地问。

这个问题正是我在晚上面对相同的文件常常苦思冥想的问题。事情是从何开始的？是1945年布伦特走后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克夫和古森科为我们提供情报后开始的呢？也许要早得多，大概当一个意志薄弱的肺结核病人走下从中国来的轮船，试图在英国情报机关谋职时就开始了。或者更晚，当蒂斯勒告诉我们军情五局里有间谍时，当戈里金大谈特谈西方情报组织里混进入成百上千的苏联间谍的时候才开始？或许米切尔案件是第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是我们的进行一次内部清查，但是没有查出隐藏的间谍。你能确定担忧从何时开始变成事实的吗？担忧就是事实，并且自始至终困扰着我们。

耗费了我们默默无闻巨大劳动的“流畅”档案，对我显得不可思议地陌生。我们把从各个情报机关点点滴滴收集的材料，仔细登记存档；我们为每个嫌疑分子规定的代号，逐一剖析的每个案情，全部记录在案；一共积累了十大卷。全部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是由我署名的著名文件，上面开列着急待审查的人员名单。

不止一次，特伦德问到案子的拖延问题。

“人们很难接受，”我解释道，“如果你和一个人一起工作多年，并且，你受到他的提携或者你提拔了他，你能相信他是间谍吗？这就是为什么迪克·怀特和弗·琼斯感到难以……这也是我们为了避免掺杂个人感情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

“是这样啊……”特伦德附和道。

“我想请您务必知道‘流畅’调查行动的每项决定都不是我的个人意见，而是我们全体六个人一致做出的决定。我们

总是看法相同。”

特伦德随手翻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这时停下来喃喃地说：“噢，是这样。”

特伦德对“中级情报员”尤其感兴趣。他让我解释我们如何推翻了原先的指控以及我们给三十四名审查对象列表记分的“对号入座法”。

我花了几个小时向他解释乍看希望很大，最后收获甚微的“维诺纳”行动。他竟被这残缺不全的拼板游戏迷住了。

我给他描述了我们如何确定匿名者的身份。尽管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几乎可以肯定斯坦利是菲尔比；希克斯是伯吉斯；约翰逊是布伦特。因为墨西哥问题属于菲尔比的管辖范围，我们断定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希克斯是伯吉斯的理由是：在一封电报里，莫斯科总部指示克罗托叫希克斯只报告事实、删掉理论。

“一点没错，就是那家伙。”我大笑起来。这么亲热地提起这个仅从文件里结识的人，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约翰逊是怎么回事？”特伦德问。

“疑点就在这里，请看这份文件。”我说着递给他一页“维诺纳”文件，上面附着几张纸。“你可以看出来约翰逊正在国外旅行。这和布伦特当时的行踪吻合。在截获这条情报的那个周末，他去了意大利。但奇怪的是，克罗托似乎不知道约翰逊的意大利之行。为此，我问了布伦特，他肯定至少提前六个星期就把出国一事告知了克罗托。”

“会不会是别人呢？”

“唯一在那个周末突然出国的人是‘讨厌鬼’……对不起，我是说霍利斯。他去加拿大见古森科。”

“这……”

“这点值得怀疑，”我轻声说，“不知何故，我不相信。我认为约翰逊是布伦特。大概他提前六星期告诉克罗托的说法把我们引入了歧途。约翰逊与希克斯和斯坦利来往密切，这就排除了其他人的可能性。不管怎样，仍有三个匿名者的身份未查清。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霍利斯。”

特伦德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他头脑敏捷、考虑全面、处理问题一丝不苟。会面结束后，我有受到冷静、耐心而又严厉的审问之感。令我担心的是，特伦德虽然是颇有经验的文官，但从未搞过情报工作。我怀疑他是否有能力从纷乱繁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材料中理出头绪，做出合理的判断。他没有依据可循，即使参照菲尔比、布伦特或布莱克的案件，他也无法断定案情对霍利斯的不利程度。只有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人，才能获得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局的威信很高。与思想怪诞的前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相比，大多数人更喜欢特伦德。他和我同属一个俱乐部。他退休后，我们有时在俱乐部碰上聊几句。他很谨慎，从不批评他的继任人。但时常暗示现在的事情处理得大大不如他在任的时候。特伦德办事从容。在整个60年代，他努力为情报部门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

特伦德继续在军情五局工作了一年。我们经常在楼道里碰面。他不爱讲话。1975年底，他再次召见我。那时军情五局已从莱康大楼迁到古尔大街阴沉的办公地点。

特伦德想和我讨论原来那些指控。在彻底剖析案情后，他认为案子太陈旧了。

“的确是这样。但是引人注意的是事情太凑巧了。很奇

怪，它们完全发生在同一时间。”

特伦德认为戈里金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证据。用他本人的话说，“没帮了忙。”就高层渗透而言，我同意特伦德的观点，戈里金的确未提出任何实质性的线索可供我们调查。他至多提醒我们存在着渗透。

特伦德还放弃了追查“中级情报员”。

“这个案情太复杂了。不能不分析一下，但是我考虑目前放弃调查是对的。”他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

特伦德转向一份有关沃尔科夫的文件，扶了扶眼镜，然后说：“现在谈谈沃尔科夫吧。”

他问我，在重新翻译沃尔科夫的供词后，我是否对指控的矛头所指过分咬文嚼字。

“我不这样认为，”我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处理诸如此类的案件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主观臆断揭发材料指的什么，将导致什么后果，然后确定处理意见。另一种是学术态度，认真分析案情，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科学地、精确地做出结论。”

“下面谈谈埃利吧，”特伦德接着说，“我看到你找阿克米多夫核查有关埃利的情况，但没有了下文，对吧？埃利没有在电报中出现。”

“我可没指望他出现。埃利是个地下间谍。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他与莫斯科的联络也就是地下的，不会通过大使馆。要是我们能找到索妮亚拍发的电报，肯定能发现埃利。可是，我们目前找不到所需材料。”

“你仍旧认为埃利就是霍利斯吗？”

“几乎可以肯定。”

“难道没有任何事情动摇你的看法吗？”

“没有。即使有，都足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特伦德无可奈何地说：“但是，没有思想背景啊……”

“有，霍利斯到过中国。”

“噢，对。中国……”他低声重复着，声音越来越低。

特伦德始终表现出专业人员的风度。我从未能通过察颜观色了解他的观点。毋庸置疑，我看得出他本人认为渗透存在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除了偶尔对霍利斯嫌疑最大表示怀疑，他不露一点声色。

我也未从汉利那里听说特伦德对案情的最后结论。我估计，在我于1976年1月去职以后，特伦德完成了他的调查报告。直到1981年，撒切尔夫人对下院宣布，特伦德爵士做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间谍。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清白的，犹如我相信他是间谍一般。这好比一个人可以信奉上帝而另一个人可以崇拜金钱。我现在意识到，归根结底凭印象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事实才能解开永恒之谜。”

在军情五局的最后几个月，厌倦时时涌上我心头。我不知今后该何去何从。是呆在英国继续斗争呢？还是善罢甘休，离开英国？我的健康状况不佳，退休金少得可怜。但是我拥有丰富的记忆。

圣诞节来临前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驱车和维克多去他的乡间别墅。不知从何说起，两人都沉默不语。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满腹话语闷在心里，呼之欲出。

“你今后有何打算？”他问我。

“噢，我不知道，也许去澳大利亚。”我回答。

湿湿的沼泽地从车窗外掠过，远处剑桥大学的尖顶渐渐映入我的眼帘。

“你希望我支持你走，对吗？”停了片刻，维克多又问。

“大概是这样吧。”

由于未能获得成功，我郁闷不乐。英国情报机关内部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完成。新教取代了天主教。我的战场属于过去，我已没有了用武之地。

“彼得，你应该走。离开秘密世界，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适应新环境，你会生活得更好。你一人干了三个人的工作。让别人也尝尝你所受的滋味吧。”维克多说。

汽车发动机单调沉闷地嗡嗡作响。

“彼得，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